

China
Spring

No. 30 DEC. 1985

中國之春

十二月號

總 30 期

創刊 3 週年
紀念專輯特大號

獄中申辯

西單民主牆
運動的領袖 **徐文立** 手稿偷運出獄
請聽他的自白



徐文立和女兒小瑾



獨家訪

中國法律專家
費能文談

法治與中國

北京大學部分同學
——就愛國大示威 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

迎接中國民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

大會籌備處募捐呼籲書

親愛的僑胞、讀者們：

中國民聯在艱苦的條件下已堅持了兩年，現已發展成有數十個分部、支部、小組、聯絡站的、遍及全世界的民主團體。今年年底，中國民聯將召開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總結民運的經驗教訓、制訂新的民運策略，健全民運團體。

出席中國民聯世界代表大會的代表很多是留學生，旅費和食宿費全賴各界捐款協助。為順利召開這次大會，我們呼籲各界解囊相助。

您的捐款，可獲減稅。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亦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凡捐助者，我們將致以感謝狀，歷史將記錄下您對中國民運的貢獻。

中國民聯二大籌備處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迎接二大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您願意接受人生的挑戰嗎？

您嚮往自由民主嗎？

將共產黨集權制度轉變為民主政體，

這是人類迄今遇到的最大挑戰。您若接受

這一挑戰，不願做專制的奴隸，做一個創

造歷史的主人，請與我們聯絡，加入民運

行列。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什麼是百年大計？

年輕化？知識化？還是民主化？

在「年輕化、知識化」的口號下，鄧小平正在加緊安排權力轉移工作。最近一個時期，尤其是九月份的黨代會上，大批老幹部從政治局、書記處及黨、政、軍重要部門退了下來，代之而起的是一批較為年輕、多半有大專文化程度之第二和第三梯隊人員。可以說，中共幹部的新老交替，取得了一定進展。

然而，在關鍵的部位，權力仍由老人把持着。這種實權難放的情況暫且不論，我們單就「年輕化、知識化」的接班方式做一評述。

鄧小平把「年輕化、知識化」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目的在使人相信：一些有知識的年輕黨員接班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就能解決，四化就能實現。答案果真如此嗎？

先談談幹部的年輕化。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建國時，毛澤東五十六歲，周恩來四十九歲，葉劍英五十二歲，陳雲四十七歲，鄧小平四十五歲，林彪才四十四歲，平均年齡不到五十歲，較當今尚未接管實權的胡啓立、田紀雲、李鵬組成的第三梯隊年齡還輕許多。然而，就是毛澤東率領這班當時還年富力壯的第一梯隊人員，把中國治理得國力凋敝、百廢待舉。四人幫執政時，年齡也都不大。還有，世界上有名的大獨裁者，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金日成，接掌實權時，年紀都很輕。因此，年輕化並不是保障國家走向長治久安、人民走向幸福富足的必然條件。相反，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領袖，雖年過花甲，但都為人民貢獻良多。再看看知識化。蘇聯在斯大林執政時期，

就非常強調幹部的知識化。在赫魯曉夫接班後，蘇共中央委員都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水準，文化程度遠超過當今即將全面接權的中共第二梯隊，也不比美國同時代的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班底的教育程度低。然而，蘇聯技術官僚治國的結果是國「強」民窮，高級科技乃需從美國偷竊。另外，不少中南美國家的當今領導人，都受過西方的科技教育，「知識化」的程度相當高，但他們領導的國家很多是軍事獨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反觀美、英、法、日等民主國家的當代領導人，在「知識化」、「專業化」方面並不十分出色。如美國總統里根的专业是演戲，前總統卡特乃農民出身，並沒有什麼特長。

因此，「年輕化、知識化」並不是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我們的觀點是，實現四化的關鍵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

只要建立起一套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制度，由「法治」而不是用「人治」管理社會，領袖年輕與否，並不足慮。美英等國，甚至在法治管理下的香港，從來沒把幹部年輕化當做頭等大事來抓。幹部老化只是專制制度的產物。

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年輕幹部代替老幹部，的確可以給開創新局面提供契機。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年輕的領導人杜布切克代替諾沃提尼，西班牙年輕的國王卡洛斯代替佛朗哥，都給本國的政治局面帶來了關鍵性轉折。卡洛斯結束了佛朗哥的獨裁統治，開放了政治民主。杜布切克則掀起自由化運動，若非蘇

聯出兵鎮壓，捷克完全有可能步上民主政治的道路。當然，年輕的杜布切克和卡洛斯本沒有必要承擔風險，只是享受接過來的權力、過崇華富貴的生活就行了。但是，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成了繼承專制的歷史庸人和歷史罪人。今天，中共第三梯隊的代表胡啓立、田紀雲和李鵬等人，也即將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結束專制還是延續專制的抉擇。如果他們致力於政治的民主化，其歷史功績將光昭日月。但如果他們仍致力於培養年輕化的第四梯隊、以延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那麼，他們的名字必將被續在獨裁者的族譜上，被後人所唾棄。

另外，我們也不否認幹部「知識化」的重要性，但我們指的「知識化」，不是數理化的「知識化」，而是民主政治和現代管理藝術的「知識化」。就專業知識而言，英國的撒切爾、美國的里根和法國的密特朗等民主國家的元首，可能並不比中國的李鵬和蘇聯的戈巴喬夫強。然而，由於民主國家的一套制度能夠保障全國的專業人員都能發揮各自的才幹，故全民的才能總和要比專制國家的大許多。因此，專家治國亦不是富國強民之道，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是現代化的法寶。

中國目前的三梯隊選拔治國人才的方式，是人類歷史上最落伍的，甚至不如以前皇權專制下的科舉制。科舉制尚能遵循多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使老百姓有平等的做官機會。按上一級的主觀喜惡，而不是建立一套客觀的選賢與能的制度去挑選接班人，這對崇尚平等原則的中華民族來說，無疑是不能接受的。這種選官制度，必定種下禍根。

鄧小平一再宣稱，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錯矣！中國真正的百年大計是自由化和民主化，歷史已經做出，並將繼續做出這個結論。

中國之春刊頭系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雜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總三十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號總三十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ending at Flushing, NY.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社論●

3 什麼是中國的百年大計？年輕化、知識化，還是民主化？

●讀者●作者●編者

6 是否真實·沒有才怪·與張諄女士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關於中國民聯與達賴合作的問答等

●民運報導●

- 10 海外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 12 呼籲中國留學生聲援國內大學生的正義行動(中國民聯總部)
- 13 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北京大學部分同學)
- 15 民主運動的國際聯合(中國之春駐歐記者)陸明
- 18 我們尊重個人的選擇
——中國民聯總部發言人就楊懷安訪台答本刊記者
(本刊記者·大陸留學生)傅英杰

●特別專輯●徐文立獄中申辯

20 歷史將宣判徐文立無罪——關於公佈徐文立獄中手記的說明
(本刊編輯部)

22 接過徐文立的火炬——初讀「我的申辯」有感(中國民聯)王炳章

25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徐文立的判決書

27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徐文立的終審裁定書

29 我的申辯(原「四五論壇」負責人)徐文立

54 此情無計可消除(徐文立在獄中寫給妻子康彤的一封信)徐文立

56 我心愛的瑾兒(徐文立在獄中寫給女兒小瑾的一封信)徐文立

●特稿專欄●

58 北京怎樣對待政治犯(中國大陸留學生)柯力思

●人物專訪●

64 步上法治之路——中國法律專家費能文博士談中國法律改革
(本刊編輯部整理)

●國內快訊●時評

24 炎黃子孫，勿忘國恥(華僑·美洲)晨全中

68 從中共的黨代會到台灣的萬年國會(中國大陸留學生)李兆陽

70 乘興歸鄉敗興返(華僑·美洲)晨全中

編者的話

十一月十七日，是本刊創刊三周年紀念日。在紀念創刊三周年的專號上，我們刊登西單民主牆運動的著名領袖徐文立的獄中手記，是我們的榮幸，也是對廣大民運人士的鞭策。我們相信，徐文立對祖國的滿腔熱血和對人民的忠誠之情，一定引起廣大留學生和海內外同胞的共鳴。親愛的讀者，您讀完徐文立的獄中申辯，有什麼感想，請寫成文字寄給我們。

本刊對中國法律專家費能文博士的專訪及留學生、徐文立的戰友柯力思的「北京如何對待政治犯」一文，可加深我們對徐文立冤案的理解。

大陸著名作家、電影「五朵金花」的作者趙繼康女士回憶散文家李廣田的文章，情文並茂，相信會打動很多大陸同胞的心。

本期為紀念中國之春創刊三周年特大號，頁數大幅增加。為與讀者共享紀念之忱，本期不增加售價。

由于刊登徐文立的獄中手記，不少優秀稿件不得不推遲發表，編者謹向作者們致歉。

下期預告

下期繼續刊登徐文立的獄中申辯，還將有徐文立戰友的回憶專文。

中國大陸在一片改革聲中，人權狀況到底改善了多少？國際間對中共虐待人權有何看法？您一定關心這個問題。本刊下期推出「中國大陸人權」專輯，資料詳實，評價客觀，不可錯過。

中國大陸居法作家張諄女士獲獎作品「巴黎的狂思」，曾引起熱烈討論。最近她又向前衝進一步，寫出更具挑戰性的「巴黎的瘋話」，您若想知道她又「吐出什麼狂言」，請讀下期。

專論

71 ■ 民主？統一？台獨？孰為關鍵？

——談民主運動與中國統一（中國民聯）王炳章

改革論壇

77 ■ 僱用工人一定有剝削？（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

85 ■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剖析（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洲）李輝

思想論壇

89 ■ 一部歷久彌新的民主論著——紀念多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出版一百五十周年（中國大陸旅美作家）秦修明

91 ■ 由里根開刀產生的聯想（華僑）周立仁

94 ■ 馬克思哲學理論危機的深刻化（中國大陸訪問學者）嘉華

95 ■ 與王炳章先生商榷（華僑·美國）陳弘文

97 ■ 陳麗萍為何被捕？（一群中國大陸留日學生）

98 ■ 我們這一代人（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玲玲

留學生園地

99 ■ 我們心中的憂愁——（回憶錄）

——悼念詩人和散文家李廣田去世十九周年

文藝園地

104 ■ 路路通（短篇小說）（中國大陸青年作家·美洲）魯人

109 ■ 致叛逆者（詩）（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齊升煥

110 ■ 戚克家的臉皮（雜文）（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劉龍江

111 ■ 電視機前斷想（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田江

113 ■ 公佈應徵草案·繼續徵求盟徽（中國民聯總部）

封面

徐文立和他的女兒小瑾





是否真實？

看了你們在二十八期（十月號）上刊載的中共中央統戰密件，我的第一個直覺就是：這會不會是真的？是不是你們偽造的？因為這和中共一向宣揚的和談條件簡直背道而馳，根本難以置信。你就說共產黨喜歡玩弄手法吧，但也不會這麼離譜吧！何況中共中央的密件又豈是那麼容易得到的？

如果是你們偽造的，我誠懇的勸告你們向讀者認錯，就算開一次玩笑好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愛護你們的讀者吳水雄 八五年十月二日

沒有才怪

看了你們第二十八期有關揭露中共中央統戰密件之舉；標題做得大大的，文章寫得意興高昂。這對我們這些從大陸出來的人而言，你們是小題大做了。如果你們主要是想說服一些海外的華僑，那還情有可原；如果是想說服我

們這些由大陸出來的人，那就毫無必要。我們太清楚中共的兩手政策了，中共的口蜜腹劍，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大陸出來的人那個不深有體會？還用得著你們苦口婆心的向我們解說？對於整個文件我的看法是：有這份文件不奇怪，沒有才奇怪！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孫 琛

八五年十月九日

毫不懷疑

中國之春自揭露中共中央統戰密件後，收到不少讀者及報刊雜誌的來函及來電質詢。主要是對這份文件的真實性產生疑問。我們在此鄭重告訴各界：我們從文件的字型、紙張、編號、行文語氣、行文方式、來源管道以及我們接觸這類文件的經驗，我們對這份文件的真實性毫不懷疑。現在文件的原件仍在我們手上，看過原件的人也不在少數，只要是常接觸中共文件的人士看完後都不表任何懷疑。而原件也可在任何時候通過最嚴格的考驗。

我們常常通過我們的管道取得這類文件，在絕對沒有安全顧慮的情形下，我們才會公開。現在，我們又公佈了徐文立的獄中手稿，這手稿也是通過曲折的管道由中共那種幾乎密不透風的監獄中拿出來的。而手稿的字跡在經過徐文立的海外好友看過後，都一致表示是真實的。（詳情請參閱十月十三日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及合眾社新聞稿）

我們自公佈中共中央的統戰密件後，發覺了一個奇怪但可以理解的現象，那就是：凡是由大陸出來的人士對這份文件都不表懷疑，反而台灣及海外的人士對這份文件有所疑問。

為什麼由大陸出來的人士對這文件不表懷疑？很簡單：因為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幾十年的經驗深刻的教育了他們。欺騙、耍弄、陰謀、陽謀對共產黨來說是家常便飯，如果今天還來相信你共產黨的甜言蜜語那是自討苦吃。有這份文件那是自然不過的事，何必大驚小怪？

台灣及海外的人士沒有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過，那是一種幸運；但如果不能把握這種幸運，不能由別人的經驗中取得教訓，這種幸運，很快就會變成一種悲哀！

中國之春編輯

林樵清

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兩點意見

(1) 我完全贊成旅美東北同鄉會員林力的「反對建立『遼瀋戰役紀念館』」，反得好。中共為林彪翻案而建此館，簡直是勞民傷財。林彪的死是極權制度統治必然產物，此種制度不改，雷同事件再次發生不足為怪。

遼瀋戰爭純粹是中國人打中國人，共產黨將國民黨趕往海南島，趕往台灣，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在當今統戰攻勢下，中共欲建此館簡直是自毀面具的具體表現了。

(2) 關於繁體字與直排的一點看法：本人建議應該堅持繁體字。如果使用簡體必將減少相當程度的讀者，較早期來外國生活的華僑們，他們對簡體字十分陌生。我的長輩收到國內的簡體字來信，多時請問我，這是事實。廣大華僑同胞們是民主運動的堅強支柱，不容忽視此點。我曾接受過十二年簡體字教育的，現時不會因繁體字而對中春閱讀有困難，何況學識高

深的留學生們更是不成問題。直排有傳統性，直排、橫排不成問題，且取決多數人的意見，本人同意直排。

移民加拿大的大陸人 歐占
八五年九月廿三日

與張諄女士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讀了貴刊二十五期（八五年七月號）法國張諄女士所寫的「巴黎的狂思」一文，有些感想不得不發，張諄女士認為文化大革命雖是毛澤東發起的，但毛澤東並沒有親手殺一個人，也沒有親手去毀壞一件古蹟或文物，這些滔天大罪行都是中國的愚民幹的。但是我覺得張諄女士如果懂得一點群眾心理，就會知道當群眾運動時候，所有群眾的思想行為都是盲從的，就如一顆子彈發射出去，絕不是發射的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當群眾被激動做出無理性的事情是不足為奇的。

又張女士說的，在學校和監獄中，所遇到被一些卑鄙的難友所出賣的情形。我也坐過牢，當我遇到這種現象時，往往會引用王荊公的詩來自我解嘲，這首詩是：「風吹吾瓦樓，瓦落打我頭。我不恨此瓦，此瓦不自由！」因此，以這種苦難的現象來責罵「這就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於事並無補益，如何重振我們的民族精神來戰此妖風，才能使「此瓦不再打我頭」了。

張女士認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流弊太大，不如用「人道主義」一詞來得妥當。其實人道主義一詞就真不會發生流弊了嗎？譬如抗戰期間，為了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國家要求

每一個國民當兵，如果我怕死，我可以說「當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殺人，殺人是人道的，所以我拒絕當兵」。你能說我的理由不冠冕堂皇嗎？可見任何名詞只要人有心去濫用它，是不患無詞的！如果說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可能濫用，而要打倒它，那就因噎廢食了。試想，對日抗戰我們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們不是靠的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嗎？所以孫中山先生說：「民族主義是國家求生存民族求發展的寶貝」，真是不錯！

說到這裏，使我覺得孫中山先生真是最懂得民族主義，也是最會運用民族主義的人了。譬如當滿清時代，教育落後、民智未開，他如提倡民權革命，不僅得不到民衆的共鳴，而且會被人視為「大逆不道」，所以提出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但是到民國建立後，他不僅沒有「驅逐韃虜」，反而立刻宣佈「五族共和」，後來鑒於中國事實上不只五族，而改為團結國族，共禦外侮，他提倡勵行種族同化，結合全中國的各民族成爲一個大中華民族，並主張漢族放棄故有的優越地位，扶助各弱小民族。

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一詞雖有可能被濫用，但是我們要冷靜的去觀察，它胡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不要因一時的衝動就隨便喊打倒。就中共來說，我大膽的說它不夠資格當民族主義者，它不配說愛國！說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人，他內心裏必須有一顆愛人的心（那人道主義），才配談愛國家愛民族，否則，他只不過是一個披有羊皮的豺狼！

爲避免像張女士所說的拿愛國的帽子亂壓人，我對「愛國」一詞的解釋是：「國家是人民組成的，愛國必先愛民；不愛民者就是不愛

國。」這樣就不致將不愛某一個政權或不愛某一個政黨或某一個當權者視爲不愛國了。我們能如此區分也就不必要去打倒愛國主義了。

美國華僑陳弘文
八五年九月廿五日

讀「徐松林談反統戰」一文的感想

我認爲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對中國有巨大貢獻，其主要內容至今仍適合中國國情。尤其是民生史觀，更值得認真研究，以爲今用。不應將三民主義視爲今日國民黨的專利品。但是對於孫中山個人則不宜多作偶像崇拜，否則有很大副作用。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偶像崇拜根深蒂固，是民主化現代化的一大障礙。沒有龐大的南京中山陵，也許不會出現今日北京的毛廟和台北的蔣廟。

對於徐松林先生敢于單槍匹馬闖進大陸，與中共要員進行面對面的抗爭，我極表欽佩。竊望海外能有更多的人進入大陸，對中共上至鄧小平，下至基層幹部展開面對面的民主攻勢。特別是當中共大官開始面孔一板，八股橫飛時，海外人士不必過于拘禮，三緘其口，而是據理力爭，當仁不讓。大陸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

大陸留學生桑羊 八五年九月廿九日

向陸明同志請教

讀中春九月號您的文章「從胡耀邦、王兆

國批准「多餘電廠」看改革失控」後，我有點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來向您請教。如有不當之處，請多包涵。

您文中的前面部份（從一至五節）所講的，都是一些拉關係走後門的現象，不但在今天經改時期是如此，而是在經改以前早就如此。記得在六十七十年代在東北地區流行的一句口頭禪是「一有權，二有錢，三有聽診器，四有方向盤。」這四種人正是拉關係走後門所依靠的對象。這說明拉關係走後門在大陸是歷來如此；也許發展到今天更為嚴重而已。然而這些現象並不能說明經改失控。

您文的後部份講到二汽因國家電力供應不足而要自辦一個電廠（因為電力計劃指標是由國家計委直接控制的），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及批准。何以故？因胡是由王兆國陪同來到二汽的，而王兆國又是由二汽調到中央的。有了這層關係，事情當然就好辦多了，這也充分說明了「權」的作用。由此二汽打着「自辦」的牌子而使用了很多「非法」手段，以求解決自辦電廠中的各種困難。這些「非法」手段不是說明了拉關係走後門的現象麼！不知與改革失控有何關聯？是否因自辦電廠而浪費了不少人力物力財力就算是改革失控呢？

您文的結論部份說「中國是一個經濟現象極為複雜的大國，主體計劃經濟是必要的」。我看這句話正是您文章的主旨，因為您說二汽自辦電廠是「無計劃的『計劃經濟』」；它違反了計劃經濟的原則，並非甚麼改革失控。說到計劃經濟，它正是共產極權制度下的產物，也正是目前陳雲烏籠派所極力主張的；它窒息了整個經濟的活力。因此中共統治大陸以來，真是「三十年如一日」，仍然是一窮二白。現在改革派在經濟領域實施了一些改革，並已收

到一定的成效，便又遭到恢復派的反對；而您文却主張計劃經濟是必要的，不知用意何在？！

在此我要聲明一下，我不是學經濟的，對經濟學是一竅不通。但從閱讀中春各期有關論述經濟的文章之後，使我得到一個印象是自由經濟比之計劃經濟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且不必說美日英法諸國，單以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而論，在短短的十數年中，其經濟起飛的速度及成就已達到世界前列。這難道不足以說明自由經濟的優越性嗎！

最後我還同意您的看法是光有經濟方面的改革是不夠的，還必須伴以相應的上層建築的改革。換句話說，大陸如果沒有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則經改不論如何進行，都不會成功的，可能會半途而廢。管窺之見希不吝指教。

大陸新移民 讀者袁 著上

八五年十月六日

對中國民聯與達賴合作的疑問

十分意外地讀到中國民聯與達賴喇嘛合作的新聞。我們這裏幾個「中國之春」的忠誠讀者不禁有幾個疑問：

問題一：達賴，其身份是西藏地區喇嘛教的首領之一。在他失勢前，他所統治的是一個落後的奴隸制的社會，所以，他實是一個奴隸主集團的頭頭。雖然經過卅多年的流亡生涯。他的思想或會有所改變，但很難想像他能變成民主派。中國民聯與他合作的積極意義何在？

問題二：達賴之所以成爲部份藏族人民（不算其親信的統治集團）心目中的領袖，很顯然是宗教迷信的作用。這與毛澤東過去幾十年在大陸推行的個人盲目崇拜一樣，是愚民政策的

結果，是今天民主派要極力打倒的對象。達賴與西藏人民毫無共通之處。中國民聯爲要在西藏人民中找尋團結的力量而與達賴合作，恐怕只會產生壞影響。

問題三：政治鬥爭講究分清敵我。但絕不能學毛澤東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今天，中國人民最大的敵人是民主的制度和利用各種漂亮言詞裝飾下的一黨獨裁。達賴在外流亡多年，似乎并未發表過任何有關改革西藏的主張，更沒有宣言放棄他奴隸主的特權。他在國際上到處要求他的所謂真正的西藏自治，因而被現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所反對。如只爲這點而聯合他，我們以爲大可不必。因爲他畢竟是廣大中國人民心中否定的政治勢力。

以上問題，或者出于我們知識薄弱，或者由于政治見解偏狹。同時，我們并非中國民聯成員。似乎不容過問。但估計這也是有些相當一部份讀者不理解的。特提出，請解答。

中國留學生、加拿大讀者鍾 衡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四日

敬答鍾衡先生

鍾衡先生大鑒：

首先多謝您經常爲我們寫稿，而您的作品也常常獲得廣大讀者的共鳴。

您對於我們和達賴交往所提出的幾點問題，現就我所知的加以答覆。

在我們和達賴的交往中，達賴本人和他駐紐約的團體，都是贊同民主的。在基於追求民主的這一點上，我們與之交往。

中國之春出現及中國民聯成立以來，達賴

在紐約的團體就立即加以注視，並主動予以聯絡；對於我們所揭舉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也都十分贊同。在經過了兩年多的交往之後，雙方覺得時機成熟，乃有聯合聲明的發表。

(見中春第二十七期，八五年九月號)

如果達賴在紐約的團體到現在還堅持專制封建，我們只能認為這是美國民主政體的失敗。一個在美國二、三十年的團體如果還不能受到民主的薰陶，還是追求封建獨裁，那只能說明民主根本不值得去追尋而已。當然，昧着良心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去追尋封建獨裁，那是例外。但與我們相交的西藏人，並非這種人。

史學家湯恩比說的：「文明不能倒懸」。意即文明低的不能永遠統治文明高的。一些文明低的民族或以武力得逞於一時而統治了文明高的民族，但遲早是要被文明高的所同化。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多的是這類例子。今天，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精神確實高於中國和西藏的封建精神。故達賴和他的團體追求民主乃自然不過的事。

至於您認爲達賴之所以成爲部份藏族人民的領袖是由於宗教迷信的作用。我要問：「何爲宗教迷信？」爲什麼羅馬天主教就不是宗教迷信而西藏喇嘛教就是？我們應尊重別人的宗教信仰就像尊重別人的人權一樣。羅馬天主教有教皇和西藏喇嘛教有達賴基本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今天，天主教教皇廣爲世人所接受乃是因爲教徒衆多而新聞媒介廣爲宣傳而已。最近幾屆天主教皇都是擁護民主政體的。現任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更是十分關注他祖國的民主運動，故天主教教皇少爲人所垢病。同樣的，達賴喇嘛也贊成民主，但今天却仍被世人視爲封建的宗教領袖，乃是因爲喇嘛教徒不多及不大利用傳播媒體而已。

雖然我們今天和達賴共同面對著一個需要我們去改變的專制政體，但我們仍有我們自己的原則和做法。決不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中國民聯和達賴的團體在很多方面可能看法不一致，但在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原則上是沒有異議的；只要在這些原則上相同，我們就可以合作。當達賴的團體和我們簽聯合聲明之時，就已經是公開表明了達賴的立場。聯合聲明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就是：「雙方一致同意，必須堅持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原則。」

西藏將來的發展如何，我們不能預料，因爲這完全要取決於西藏人民的意願，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民主原則，沒有人（包括我們和達賴）可以越俎代庖。但我們可以預料的是：如果誰違反了這個民主原則，都會立刻聽到來自四面八方反對的聲音。

中國之春編輯林樵清謹上

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與孫隆基博士商榷

我曾看過孫隆基博士的「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一書，亦看過在二十四期貴刊對他訪問記錄。感到其民族學非常博大精深。高發傳先生對其批評，並未拿出理由。很多推崇中國文化而貶抑西方文化的人，都是一知半解，如見美國工業發達而破壞環境，而稱西方「以人滅天」，不知他們是否看見過文藝復興、古希臘羅馬的藝術、以至格林童話、和路狄士尼卡通、及一般歐美郊區民居、田園、國家公園、宮殿……。他們未見過中國各大工業區、河道、荒漠……，不知中國人對自然破壞的程度，幾不

亞於核戰。

儒家只是九流十家之一，但被捧成爲了中國文化主流，中國獨尊一家，何以稱爲博大？回到儒家只是限制中國文化真正能博大的機會。胡適回到儒家不表明「母胎化」？

不過孫氏的書仍有問題，如「母胎化」一詞不明確，吾人常不明白，一個人若果缺獨立性更有可能父權引起。母親在理論上，其愛是無條件的，不妨礙個人成長，認爲母愛妨礙成長，是狩獵社會對男童的獨特看法，原因只是女性一般不參加狩獵，對現代人毫無意義。其次，孫過份推崇北歐系民族，雖未明言，但北歐人是唯一未被攻擊的主要民族，以致中國人同樣有優點，反被視爲缺點，這就是所謂「中性化」，即不強調男女性徵和陽剛陰柔，這是防止男女過份分工，以及大男人主義及野蠻好戰的因素，日本人和阿拉伯人便屬是此情形，但孫氏反稱他們把「性化」和華人的「非性化」對比，莫非他不知日本人已非性開放民族，阿拉伯人更是世上最貶抑「性」的民族。孫爲使其體系完整，而不顧事實，稱中國人愛國是溫柔，而鞏固母胎化理論。莫非他不知精武門、中華英雄、霍元甲、陳真、霍東閣……等電影、漫畫、電視的民族主義才得一般非大陸華人欣賞，雷鋒和李小龍是大陸和非大陸人民的英雄，更是真憑武起家。對祖國的愛是子女對母親的愛的擴大，中國人不多，只有少數知識份子如此。在美麗、纖細、富文化修養和藝術氣質的人才易有此感情，所以真正優美的歐洲各民族反而例子多得多，這也許才是真的母胎化，所以有人稱母胎化是最好應是如此意思，這很可能是一詞多義的問題，涉及語言哲學，不在此多談。

琳 姆於香港八五年七月廿日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國內學生運動的新發展

繼北京大學生抗議當局崇洋媚外、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及要求自由民主的大示威之後（詳見上期報導），西安及武漢的大學生積極響應北京大學生的號召，亦展開了愛國示威活動。

西安大學生的示威活動規模，甚至超過北京。十月一日，西安萬餘名大專院校學生在市中心集會五小時，高呼「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莫忘國耻、振興中華！」西北工業大學的學生不畏中共陝西省委派出的荷槍實彈的軍隊包圍，衝出校門，參加了集會。西安是除北京外高等學府最多的城市，自抗日戰爭以來，一直是學生運動的中心之一。這次西安高校學生的大示威，震驚了陝西省委，省委曾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壓制措施。

九月廿六日，長江沿岸重鎮武漢市的華中師大學生，貼出了大批大字報和大標語，響應北京大學生的愛國行動，要求當局「抵制日本的經濟侵略」，「停止崇洋媚外政策」，要求自由和民主。大字報嚇壞了學校黨委，黨委立即召集各級黨組織幹部開會，第二天派人撕毀

大字報。華中師大的愛國學生對黨委的蠻橫態度異常憤慨，於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再度將大字報和大標語貼滿校園，但大字報又遭到撕毀。學校黨委目前正在清查帶頭「鬧事」者，對積極份子進行各種威脅。

四川成都的大學生十月初也有類似示威。中國大學生的愛國行動立即見效，最近，日本首相中曾根公開表示，取消再次去「靖國神社」拜謁。

大學生最近的示威活動顯示了年青人要求政治參與的強烈願望。

中國民聯呼籲留學生聲援

國內大學生愛國示威行動

十月七日，中國民聯總部委員黃仕中和總部辦公室公共關係秘書吳軍在紐約舉行記者會，向記者散發了北京大學部份同學轉出的「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全文見卅期中國之春）及中國民聯的呼籲書。北大部份同學的公開信詳細解釋了北京大學生「九·一八」大示威的真相，對當局的無理壓制提出抗議。中國民聯在呼籲書中，呼籲留學生們通過各種途徑聲援、支持國內大學生的愛國行動和爭自由、爭

民主的鬭爭。紐約一些報紙報導了中國民聯的記者會，並有些報紙全文刊登了北京大學部份同學「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

中國民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 大學講演座談

九月廿八日傍晚，中國民聯在美國南部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學舉行講演和座談。講演會由中國民聯路易西安那州聯絡站推動，由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學香港同學會歐陽竟主持。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以「民主運動與中國統一」為題發表了演講（全文刊於卅期中國之春）。

王炳章在講演中指出，民主化是大陸與台灣的根本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而統一和台灣獨立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案。他說，兩岸民主化可以促進中國的統一，而海峽兩岸的多邊接觸又會給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創造契機，統一運動與民主運動是相輔相成的。

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學共有中國大陸留學生人員（連家屬）八十多人。王炳章先生講演的那晚，正值大陸同學舉行「中秋·國慶·迎新」晚會，大陸同學參加講演會的人不多（參加者多為台灣及香港同學）。但在講演中途，中國大陸同學送來條子，邀請王炳章先生在講演後去參加大陸同學的「中秋·國慶·迎新」聯歡晚會，並舉行座談。

講演會後，王炳章應邀去中國大陸同學的聯歡地點，與多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就中國的民主化與現代化問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討論至午夜。多數人認為，中國未來走向民主與法治是肯定的，但如何達成這一目標，大家各有己見。

經過面對面的討論，中國大陸、台灣及香

港的留學生們加深了對中國民聯的認識和瞭解。王炳章選與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的負責人研究了今後工作開展的計劃。

中國民聯參加美國國會 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

喚起國際間注意中國大陸虐待人權的現狀，從而迫使中國當局在輿論壓力下改善人權狀況，是中國民聯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國民聯與美國國會關心人權的組織有定期聯絡，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美國國會舉行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

在美國國會關心中國大陸人權的人士和組織的關心和努力下，在中國民聯等團體的促動下，美國國會於十月十日下午，在眾議院雷邦大廈一樓大廳裡，舉行了歷時二個多小時的「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

會議由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和國會人權國際組織小組聯合召開。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眾議員主持了聽證會，人權國際組織小組主席雅特隆眾議員致了詞。眾議院官員理查德·布什、凱利·波羅尼斯以及國務院有關官員出席了這次聽證會。索拉茲在開會詞中指出，毛澤東的統治，至少在後半階段，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獨裁統治，在這種獨裁統治下，爲了強制推行一種正統思想，竟使人權受到廣泛的侵犯。

有三位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在這次聽證會上作證，他們是：布魯金斯研究所哈定博士、馬里蘭大學法學院的丘宏達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黎安友教授代表國際特赦組織發言，其它兩位證人則發表個人見解。

三位學者一致認爲，中國大陸自從實行開

放政策以來，雖然比毛澤東專制統治時期較爲開放，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在人權問題上仍然存在嚴重問題。專家們列舉的事例中，包括殺嬰、強迫墮胎、長期關押和虐待政治良心犯、逮捕宗教界人士、鎮壓要求民主和爭取改善中國人權現狀的民運人士、以及在打擊刑事犯罪份子運動中大開殺戒等許多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爲。

「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民聯」總部工作人員吳軍先生、「民聯」華府分部負責人黃奔先生和宗繼祥先生等，出席了這次聽證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使館也有兩位官員出席了聽證會。

「中國民聯」成員除了向與會者贈送了最近出版的「中春」雜誌及「民聯」簡介外，還在會上散發了一份材料，材料中簡要地列舉了十項中國大陸違反基本人權的行徑，其中除了專家們在聽證會上提到的以外，「中國民聯」指出中國大陸違反人權的做法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如：禁止出版民刊；限制人民的遷居自由；當政者根據其政治上的需要任意修改法令；懲罰犯罪者時對黨員和非黨員罪犯的量刑判刑採用雙重標準等。「民聯」的材料中特別提到，把「四個堅持」寫進憲法，也是明顯侵犯人權的做法。

聽證會上，無一否認中共當局虐待人權，然而北京官方却在某些公開場合說什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存在人權的問題。」人權問題不能在中國自由討論，是當今最大的問題所在。

這類聽證會對未來美國制定對華政策有很大影響。正如索拉茲主席在開會詞中指出，如果今後美國政府就援華問題希望獲得國會認可，按照法律規定，國會將從中國政局及中國人

權記錄兩方面進行估量，然後決定贊同與否。而專家們在聽證會上所作的證詞，則是國會進行研究時的重要依據。

中國民聯將繼續與美國國會關心人權的組織密切聯繫，推動規模更大的聽證會的舉行。

包鋼工人舉行大罷工

國內內蒙古包頭鋼鐵公司的工人在今年七月間曾舉行了一次大罷工，震撼了中共高層，消息一直被嚴密封鎖。

據消息來源稱，此次大罷工是抗議不公平調整工資而發生的。共產黨的政策好從一個極端步向另一個極端，常遭到人們不滿。中共包鋼黨委爲了落實中央「重視知識份子」的政策，提高包鋼的產量，用了一些廣大工人不能接受的名堂給包鋼的知識份子和幹部變相提高工資，如發給幹部和知識份子「書報費」即爲一例。意即：知識份子和幹部需要讀書看報，因而需要額外的「書報津貼」。工人忿忿不平道：難道我們工人就不需要讀書看報？他們紛紛要求也發給「書報津貼」，但遭到黨委拒絕。工人們舉行了罷工。最後，工人獲勝，爲求公平待遇，也得了「書報津貼」。

目前，中國大陸的工資制度遠未體現「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原則，調工資的大權，仍握在黨委少數幹部手中，因而常激起人們不滿。包鋼工人罷工，只是人們不滿情緒的一種發洩形式。其實，比罷工更嚴重的是怠工。因爲罷工常遭到鎮壓並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人們便用怠工的辦法來對抗。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本來二個人可以完成的事，却有三、四個人來做。這種怠工帶來的損失，遠較罷工爲巨。

呼籲中國留學生

聲援北京、西安和武漢

大學生的正義行動

中國民聯總部

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以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侵略中國為起因，進而舉起了「民主、科學」的旗幟，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光輝燦爛的一章。

今天，在中國人民飽受中國共產黨三十多年專制統治的壓迫之後，面臨新的歷史抉擇之時，富有光榮「民運」傳統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又毅然喊出了「不忘國耻，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與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及其它大學的學生一道，冲破北京當局的重重阻撓，在「九·一八」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大遊行，目的在於喚醒國民。繼北京學生遊行之後，西安大學的學生們舉行了更大規模的萬人大示威，抗議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同時也抗議北京當局崇洋媚外的政策。學生運動也波及到華中重鎮武漢市。一度沉寂的中國大陸學生運動，又呈現新的生機。

海外關於北京、西安及武漢學生運動的報導，多出自外國通訊社的觀察。最近，中國民聯總部接到由國內北京大學轉出的部份學生「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及國內關係提供的一些資料。這些第一手資料，使我們對北京學生運動全貌有了進一步認識。北大部份同學表示，他們希望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向國內正在與專制者進行關爭的大學生們伸出援助之手。由於國內的特殊環境，「公開信」中的某些詞句是可以理解的。

根據中國民聯國內消息來源，北大學生繼「九·一八」遊行後，在校園內貼出了許多大字報，除要求北京官方停止崇洋媚外的政策外，還要求自由和民主。像「五·四」運動一樣，當前這場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導因的學生運動，正在向民主運動的層次轉化。因為大學生們已經意識到，在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真正的愛國反常被當局認為有罪。近幾年來，當權者們的愛國主義的宣傳激發起青年人

的愛國情緒，然而，當青年人真正愛國時，當權者又反過來加以壓制，歷史就是這樣嘲弄專制者！

據消息來源稱，目前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北大黨委使出全力壓制大學生們的愛國情緒和民主要求，強迫參加遊行的大學生們進行檢查，並以將來畢業分配為威脅。未名湖畔，一片緊張氣氛。

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立刻引發了連鎖反應。十月一日，古城西安萬餘學生自動舉行集會，群情激憤，發出了一個怒吼：「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愛國無罪！」中共陝西省委當局按中共中央指示，對學生的愛國行動進行無理壓制，省委甚至派實槍荷彈的軍隊圍堵西北工業大學的學生。學生們義憤填膺，聲言要拆毀校門。在學生們的壓力下，當局被迫允許西北工大的學生加入示威行列。大學生們在市中心集會五小時，精彩的演說不時被掌聲打斷。整個西安市當日洋溢着節日氣氛。然而，示威活動後，各校黨團組織秉承省委指示，對示威活動進行清查，有的還整理了黑名單。

學生的愛國行動很快也波及到華中武漢。九月廿六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的學生們貼出大批大字報，表達他們關心國是、抗議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心情。第二天，大字報被校方黨委組織人員撕掉。憤怒的大學生們於十月一日的國慶節又貼出了第二批大字報，當局又派人予以撕毀。學生們的抗議情緒正在高漲之中。成都的大學生也舉行了示威活動。

國內大學生們爭取愛國自由的正義行動，驚動了北京當局的高層。九月廿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留蘇派首領李鵬在召見北京的大學生代表時，指責大學生們的愛國行動「過火」，強調要對大學生加強控制。

毛澤東曾說過：「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他的這句話並沒有錯。可是，向來說一套、做一套的毛澤東，最後也怕起了學生運動，被「四·五」運動埋葬了。今天，中共當局無理壓制大學生們的愛國行動，也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在海外呼吸着自由空氣的我們，在此強烈要求北京當局停止迫害參加愛國行動的北京、西安、武漢的大學生們，呼籲廣大留學生、研究生、訪問學者及華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徑和手段，向北京當局進言，保障國內大學生們享有憲法所規定的言論、遊行、示威的自由，保障他們有愛國的自由。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
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

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

北大學生成中國留學生的原稿信。

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

同胞們：

大概你們還沒有忘記「九·一八」這多悲慘的日子吧。五十四年前，就因為這一天，四萬萬同胞淪為亡國奴，兩千萬生靈慘死。而今，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愛國青年見此情景怎能不義憤填膺。北大學生帶頭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紀念「九·一八」，但遭到學校和市政府的強行阻攔，使這次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而且事後封鎖消息，各家報紙噤若寒蟬。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如此轟動的事件，「北京晚報」不敢提及一字，「美國之音」廣播電台倒做了較為詳細的報導，雖然與事實並不那麼相符合。我們希望大傢了解真相，公正地評判一下到底孰是孰非。

早在「九·一八」到來之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會首先提出倡導，要求到天安門廣場遊行，抗議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祭奠兩千萬死難的同胞，喚起十億民眾報國之心。很多同學貼出大字報，響應物理系的倡導，但校方對此竟視若大禍臨頭，大動干戈。先由學生會出面張貼告示：「紀念活動在校內進行就可以了。」北大的學生會早已不是學生的學生會。

十六日，校方請來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來談中國關係問題，絕口不提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近年來日本軍國主義日漸抬頭：先是篡改教科書中侵華歷史的內容、拍攝軍國主義故事片「啊！海軍」、「東條英機」等，最近，中曾根又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為首級戰犯招魂悲歌的事實，也不提日本在中日貿易中一再欺詐中方的事實，如寶鋼（不必贅述，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通篇說教，實為日本粉飾辯護。

同胞們：

大概你們還沒有忘記「九·一八」這個悲慘的日子吧。五十四年前，就因為這一天，四萬萬同胞淪為亡國奴，兩千萬生靈慘死。而今，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愛國青年見此情景怎能不義憤填膺。北大學生帶頭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紀念「九·一八」，但遭到學校和市政府的強行阻攔，使這次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而且，事後封鎖消息，各家報紙噤若寒蟬。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如此轟動的事件，「北京晚報」不敢提及一字，是中國記者遲鈍嗎？相反，事發的第二天，「美國之音」廣播電台倒做了較為詳細的報導，雖然與事實並不那麼相符合。我們希望大傢了解真相，公正地評判一下到底孰是孰非。

早在「九·一八」到來之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會首先提出倡導，要求到天安門廣場遊行，抗議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祭奠兩千萬死難的同胞，喚起十億民眾報國之心。很多同學貼出大字報，響應物理系的倡導，但校方對此竟視若大禍臨頭，大動干戈。先由學生會出面張貼告示：「紀念活動在校內進行就可以了。」北大的學生會早已不是學生的學生會。

十六日，校方請來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來談中國關係問題，絕口不提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近年來日本軍國主義日漸抬頭：先是篡改教科書中侵華歷史的內容、拍攝軍國主義故事片「啊！海軍」、「東條英機」等，最近，中曾根又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為首級戰犯招魂悲歌的事實，也不提日本在中日貿易中一再欺詐中方的事實，如寶鋼（不必贅述，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通篇說教，實為日本粉飾辯護。

十七日，北大校長丁石孫親自出馬，勸說學生不要去廣場，理由有二：一、正在召開黨代會，學生遊行恐西方記者「電訊」造謠中國局勢不

穩，社會動蕩；二、一小撮壞人會藉此機會與風作浪。竟是如此膽怯！不相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成長起來的覺悟青年，視我們為「阿斗」，砍斷自己的手脚去堵洋人的嘴。紀念「九·一八」、抗議法西斯乃中國人民之正當行為，難道要外國人點頭才能進行嗎？這是對我們的侮辱！物理研究生會迫於壓力不得不聲明退出遊行。一時間，校內一片嘩然，許多同學寫文章有感於「座談『紀念』九·一八」，稱之為「靜悄悄地哀悼」。也有同學悲憤地寫道：「默哀默哀，默默地……哀吧！」有些同學說：「紀念碑不是非去不可，但校方非去不可的做法令人氣憤。」十七日晚，黨員、幹部連夜召集開會，校方拋出一張二十分鐘前貼出的反動小報，小題大做，企圖歪曲這次活動的動機。為了阻止遊行，校方竟不惜代為散佈反動言論。此「不良」之後果倒不去顧及，用心何其苦也。會上明確下達禁令：黨員同志應以此為鐵的紀律，絕對服從。

十八日，空氣異常緊張，原定下午騎車進城一路遊行到天安門。誰知，校方早有準備，請來大批軍警包圍了學校。校內警察、校衛隊、學生會幹部、系領導嚴密控制，校外警車呼嘯，周圍商店裡藏滿了荷槍實彈的保安人員。堂皇的「北大」校牌下鐵門緊閉，群情激憤的同學圍在鐵柵欄裡高喊「大刀進行曲」，其狀慘乎！學校不是監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豈能容白色恐怖！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欺的，愛國沒有罪，儘管學校堡壘森嚴，仍有一部份同學巧妙地溜出學校代表北大，領導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

即日，北京市遍佈警察，西單通往天安門的街道戒嚴，說是因為正在召開黨代會（黨的會議居然要戒嚴起來開，千古奇聞）。外交部日本人大使館也戒嚴，怕學生去抗議。天安門廣場上氣氛更是陰森。警察比學生還多，警棍、電棒、步話機、摩托車比比皆是。遊行時，警察將廣場上的遊人全部趕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排成警戒綫。不足兩千人的遊行隊伍被圍起來，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下繞場一周，高呼口號「不忘國耻、振興中華」等。總共只有四十分鐘時間，隨後立即被驅出廣場，這就是「九一八」紀念活動的真相。

我們要鄭重聲明：1 這次活動完全是自發的愛國行動，無人組織。外界謠傳與中共黨內矛盾有關之說純屬無稽之談；2 廣大青年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黨中央，反動言論的出現不得人心；3 要求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目的在於喚醒國民，而不僅是激勵北大青年；4 要求向中國根遞交抗議書，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國甘心受辱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5 定「九一八」為國耻日，永遠鞭策子孫後代。



九月十八日，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及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大示威，表示他們憂國憂民的情懷。圖為遊行示威的場面。

事發後，中國新聞司長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輕描淡寫地說：中國曾就「參拜神社」一事向日方提出抗議。但我們覺得這無異於勸說劊子手下放屠刀，提醒惡狼別忘了它「不吃人」的諾言。日本作為戰敗國，首相公然「參拜」當年的法西斯罪犯，尚且不怕國際輿論譴責，而中國學生的紀念活動却橫遭禁止，生怕「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還談什麼抵禦外邦，維護主權？況且，市政府肆意踐踏法律，制定出所謂「關於禁止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的通告」，侵犯了公民的正當權利。

目前，北大校園內一片沸騰，大小字報層出不窮，但校方仍不改口，對此事能否有令人鼓舞的結局，我們將拭目以待。

相信廣大留學生們能夠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振興中華貢獻一份力量。

北大部份學生

一九八五、九、廿一於燕園

民主運動的國際聯合

——中國民聯法國支部與東方社會主義國家持不同政見者在巴黎聯合舉行人權「集會」

(中國之春)駐歐特派記者 陸明

法國——是現代民主思想的策源地，歐洲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從這裏擴展開來，不光把埃菲爾鐵塔樹在了古色古香的巴黎，把自由女神送到了美國，而且這現代民主思想及與之緊密聯繫的現代工業科技革命也輸入到了亞洲，造就了現代化的日本和反封建革命後，正在向現代化社會邁進的中國(包括海峽兩岸)。

九月十四日，是法國的「人道節」。這一天，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或集會，聲援世界各國的人權運動。與往年不大相同的是：今年的人道節多出了一個由東方各社會主義集團國家流亡在法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組織的人權集會。

這個集會由「波蘭團結工會駐法聯絡站」、「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法國支部」、「蘇聯及東

歐保衛自由協調委員會」和法國的青年人權組織共同主辦，來自波蘭、蘇聯、中國、羅馬尼亞、法國、智利、英國及意大利各國的幾百名持不同政見者、流亡藝術家、留學生和青年工人參加了這次集會。會議從下午兩點開始到深夜一點鐘止，十一個小時之中進行了內容豐富的活動。

首先，大會在展覽廳展覽了由波蘭、中國、蘇聯、智利和阿富汗等國「持不同政見組織」所主辦的圖片資料展覽。展覽分為波蘭、中國、蘇聯及東歐和阿富汗四個部份。共展出各種圖片、資料、漫畫三百多幅。中國民聯法國支部製做了四十八漫畫和圖片，從「人」的生活、中國人民在近三十多年中的遭遇狀況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及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在若干年

中對「人」、「人權」和「人生」所造成的摧殘。同時也介紹了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團執政後「民生」的好轉及對「民運」的敵視，圖片也着重介紹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不少國家的藝術家和作家也在會場展銷了自己的藝術品、詩歌、著作。在法國雕塑界有了一定影響的中國青年雕塑家王克平原北京「星星畫展」重要成員，其作品曾刊登于「中國之春」雜誌第五期封面和第二十六期封面，也曾介紹于「中報周刊」和「九十年代」雜誌。在會場的休息場地展出了他的著名作品「沉默」。(見圖)

放影四部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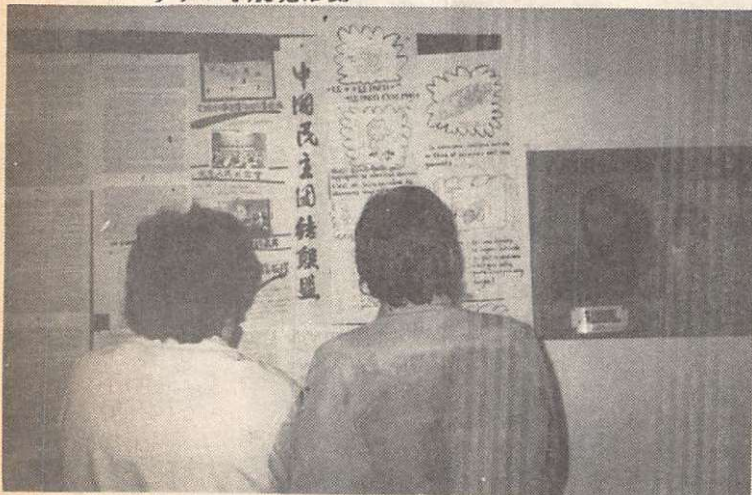
下午四時，會場在影視室放映了介紹中國民主運動的錄像帶「中國民主運動」。這個錄像帶是由法國赴華的漢學家們多年辛苦收集和製做的，從「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到「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和學生運動及全國各地的民辦刊物都做了詳細介紹。接下來又放映了法國電視台製做的「毛澤東的自白」一錄像片，放映了「波蘭工人運動的興起和被鎮壓」，放映了中國冤案的「右派」學生林希翎的案件紀錄帶。在四部錄像帶的放映過程之中，放映廳座無虛席，連走廊中都站滿了人，不少外國朋友在看完了錄像帶後對我們說：「……我們只聽說中國現在改革，情況好多了，並不知道還這麼落後和專制……」

餐會上的公報草案

晚上八時，大會籌備處出售了特價的飲料



大會的中國部份展覽室，由中國民聯法國巴黎支部籌辦。中國民聯成員沈先生（中）參加了展覽活動。



中國民聯的展覽圖片。



與會者在選購「中國之春」雜誌。

。快餐和帶有各國民族色彩的小吃，這種露天餐會輕鬆愉快，不同國家不同語言不同愛好的人群聚成了一個個「圓桌會議」，大家邊吃邊談，互相加深友誼與了解。

餐會期間，來自各個國家流亡政治組織的代表進行了「聯席會議」，討論「七國持不同政見組織聯合公報」草案，「公報草案」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共同立場：

一、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是專制國家變革和進步的首要條件，沒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任何社會的改革和興盛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動員一切力量營救獄中的思想、言論和政治「犯

」是今後一個時期這些組織的主要任務，「公報」呼籲這些國家政府釋放上述「犯人」並呼籲國際社會各界力量給予聲援。

二、我們將努力通過自己國家的人民、知識份子和執政黨中的開明份子逐步實現「人民憲法權力」，——結社、集會出版、言論、信仰的自由和普遍選舉政府官員的權力。

三、在今天國際化的時代，專制國家的被壓迫力量必須聯合成爲國際力量。在這次集會之後，「聯合組織」將繼續舉行多次同類集會，加深世界各國民主力量之間的了解，溝通和支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組成「東方國家民主

統一陣線」。

中國民聯法國支部負責人劉梓桑代表中國民聯法國支部參加了「聯席會議」談判。

文藝晚會

晚上八點，大會在音樂廳舉行了由各國流亡藝術家演出的文藝晚會。會前，中國民聯法國支部負責人之一耿晨代表大會致了開幕詞：他說：

……今天，來自世界各國的思想界的優秀

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他（她）們之中，有在波蘭工人階級和人民反專制的自由工會運動中奮勇鬥爭過的優秀工人，有親身參加過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民主運動戰士和學生民主運動的中國青年，有為蘇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而進行反對蘇共一黨獨裁專制並坐過牢的俄國知識份子，也有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會反抗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專制」運動的老的「人道主義」戰士和參加過五十年代匈牙利事件，中國「鳴放」民主運動的老戰士，並有很多人遭到東方「社會主義」各國專制黨迫害的藝術家、作家和科學家，時代告訴我們：現今世界各國人民爭取的鬥爭早已隨着生產力、科技和經濟的國際化而國際化，特別是我們所生活的東方專制社會主義各國，儘管這些國家中執政的共產黨在策略上有所不同，但他們用以統治人民的國家機器模式、制度和對待人民民主運動的態度幾乎都是一樣的，從匈牙利事件、捷克事件、波蘭事件、蘇聯鎮壓民間「小冊子」運動並迫害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到中國的「反右」事件，「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和近年的「反自由化運動」、鎮壓「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和學生民主運動……可以看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所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列寧的「專政」和「暴力」學說指導下所建立的東方各國共產黨的操縱下，已經走向了歷史的反動，所謂的「社會主義」運動不但沒有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經濟生活上的繁榮，進而却把這些國家人民的政治權力剝奪已盡。連說話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都剝奪盡了。使人民完全變成了供統治者驅使的機器的奴隸，這事實上又延續了這些國家的封建主義傳統，使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以政黨的「社會主義」形式重新復

辟。

今天的時代，已經到了科技、生產與人文革命都不可阻擋的時代，在這種潮流下，東方執政的各共產黨「變」也要變，不變也要「變」，在社會變革的浪潮中，不變就必然死亡。在這個方面，中國共產黨、捷克和匈牙利共產黨有了些變化，略有所清醒，但僅僅是一個小的開端，這種「以變圖存」的「被動改革」距離人民的要求和社會的需要，還差的太遠太遠。沒有人民的廣泛參政，共產黨是不可能領導社會走向繁榮之路的。因此我們一方面奉勸各執政的共產黨不能對人民間的「民主運動」



各共產黨國家的不同政見者在進行聯合座談會，中國民聯巴黎支部負責人劉梓桑（中）和林希翎女士（後）等成員參加了會議。

採取視態度，歷史上從來的新思想都是壓抑不住的，越「壓」越走向反面，激化這些國家的政治矛盾從而阻礙這些國家的經濟進步。從這一點上來說，在這個社會矛盾中，處關鍵地位是執政黨本身。

從另一方面來說，一個社會的進步、開明、民主、繁榮和自由是靠人民自己的鬥爭才能得來，沒有「鬥爭」和「力量」永遠不會有統治者的認可，這是歷史所證明了的。……

音樂文藝晚會中，法國女青年學生比亞娣斯擔任了翻譯。來自各國的藝術家表演了豐富的節目。舞蹈、默劇、中國武術、化裝劇、音樂演奏等。在巴黎的林希翎女士還親自登台演奏了二胡獨奏曲「良霄」。晚會在「自由舞會」中結束，來自十八個國家的青年、中年、老年手拉手，跳起了帶有各國特點的「迪斯科」自由舞，直到深夜一點，會議場中還是「興猶未盡」，各國的朋友一致提出建議：今後多多舉辦同類型集會，讓政治走出枯燥的圈子，與生活、藝術、愛情和知識融為一體。

我們的祝賀與感謝

我中國民聯法國支部的多數成員參加了集會。

在會議的籌備期間，民聯法國支部的全體成員都參與了圖片、資料和標語的製做工作，中國民聯總部委員，比利時聯略站的負責人莊虹琪同志，利用假期休息時間從比利時轉赴巴黎，為大會活動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民聯成員林娜、朱興、「君都利用讀書和工作之餘投入了大會的籌備工作。在此，謹向我們的同志表示祝賀，向大會籌備處的各國青年朋友表示感謝，也對總部的關心和支持表示感謝。

我們尊重個人的選擇

——中國民聯總部發言人就 楊懷安訪台答本刊記者問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傅英杰

編者按：最近，曾在中國之春雜誌社工作過一段時間的楊懷安先生訪問了台灣，並應邀參加雙十活動。海外某些中文報紙對其訪問台灣進行了報導，新加坡報紙和台灣報紙稱楊懷安為「中國之春骨幹」。這些報導，使外界有些議論。為澄清真相，本刊記者就有關問題尋問了中國民聯總部發言人。總部發言人做了詳細解答。下面「問」為記者，「答」代表總部發言人。

問：請問，楊懷安先生是中國民聯的正式成員嗎？

答：不是。楊懷安先生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即中國民聯成立大會之前，就離開了中國之春。

他更沒有填表參加中國民聯。

問：楊懷安先生何時參加過中國之春雜誌社的工作？

答：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八月，楊懷安先生曾受僱於中國之春雜誌社，做為雇員工作了一段時間。自一九八三年九月，他就完全脫離了中國之春。

問：是由於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嗎？

答：他離開中國之春雜誌社的原因較複雜，政治立場為其部份原因。楊先生有一個哥哥在台灣的海工會聯繫密切（否則這次也去不了台灣）。他在很多問題的表態上，站在國民黨一邊，觀點是較「右」的。當時，中國之春雜誌社的負責人多次向他明確指出，中國之春在政治上是完全獨立的，既不依附於共產黨，也不依附於國民黨。楊懷安先生明顯的親台政治傾向，注定他早晚要與中國之春分道揚鑣，也注定他早

晚要走在這一步。

問：楊先生是什麼身份來美的，是訪問學者嗎？

答：楊懷安先生原是上海農學院的外文系講師，專業是俄語。出國後，據楊先生說被提升為副教授。他來美國，既不是來探親（他在美國無親無故），也不是來進修他的俄語專業。

問：那他是什麼身份來美國的？

答：他是被中共當局作為統戰工具出錢派到美國進行策反工作的，策反對象就是他在台灣警察局做官的哥哥。中共的如意算盤是：派楊先生來美國，楊先生再把他的哥哥從台灣叫來，然後楊把他的哥哥策反回大陸，製造第二個「馬曉事件」。誰知，中共弄巧成拙，楊懷安先生反被台灣方面「統」了過去。

問：有誰甘願作統戰工具？奇怪的是，美國政府怎能容忍中共派人來美進行策反和間諜工作呢？

答：美國政府對中共一直有天真的幻想，總認為與蘇共不一樣。後來，大概楊懷安先生向美國政府講明了他的身份，美國於是給了他政治庇護。

問：中國民聯總部對楊懷安先生訪問台灣怎麼看？

答：這是他個人的政治選擇，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政治選擇。政治信念這東西，是強迫不來的。尊重每個人的政治信念和政治選擇，歸根結底是屬於人權問題。國共兩黨都不夠尊重別人的政治信念和政治選擇，動輒指責別人為「反革命」、「共匪」或叛徒。

尊重別人的政治信念和選擇，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個起碼原則。我們在西方住過一段

時間了，對人家的政黨政治應多做觀察。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互相跳槽的人很多。現任總統里根，年輕時曾為民主黨員，後投入共和黨。人家跳槽，並不被指責為「叛徒」。

我們中國民聯所要求的，是希望國共兩黨和其他人士也尊重我們的政治選擇：開展民主運動，推動大陸新的獨立政治力量的形成。

問：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有人也訪問過大陸嗎？

答：未公開的成員訪問大陸的很多。但中國民聯沒有一個正式成員公開地訪問大陸和台灣並對國共兩黨歌功頌德。對了，應指出的是，早期參加中國之春工作的某些人，最近公開訪問了中國大陸，並對中共說了很多讚揚的話。這和楊懷安先生訪問台灣一樣，都是個人的政治選擇，我們是尊重的。

問：中國民聯不允許其成員公開訪問大陸和台灣嗎？

答：中國民聯的章程沒有這條禁令。我想再強調這個觀念：我們完全尊重個人的政治選擇。參加中國民聯的人，可自由公開地走訪台灣和大陸。但是，有一點應說明，既然參加了中國民聯，就要信奉她的宗旨，走到哪裡都是一樣。如果他改變初衷，信仰起共產黨或國民黨來了，那就沒有必要再留在中國民聯，我們會尊重他的抉擇。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柯翠派克去年投入了共和黨，就等於自動退出了原來的民主黨。中國民聯自正式成立以後，再沒有出現過分裂，今後還會有分裂嗎？

問：中國民聯正式成立之前，中國之春雜誌社會出現過兩次人員離退事件，這些事情都被過

份渲染了。中國民聯成立之後，組織逐漸健全，工作慢慢上了軌道。二年來，中國民聯一直在穩步發展。然而，二年來，也有一些成員離開了中國民聯。這些，都應視為正常現象。

一個團體裡，成員的出出進進是難免的。中國之春雜誌在第十一期「堅決擁護中國之春的獨立」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共產黨出了吳榮根，國民黨出了馬璧，都不代表其整個黨的立場有了轉變。我們和國

●留學生園地●

陳麗萍為何被捕？

一群中國大陸留日學生

陳麗萍是一位中國大陸留日學生，去年三月回上海探親，結果是一去不返。後來有知情者告知，陳麗萍已在上海被捕，所加之罪乃是為台灣做事。驚聞此事，同學們不禁要問，陳麗萍何罪之有？

麗萍是一位品學兼優、性情活潑開朗、作風正派的女同學，在校頗得教授和同學們的好評，就連中國駐日大阪總領事館人員對她印象也都很好，並且常請麗萍向國內家屬轉帶物品，因此，麗萍不可能是那種所謂為台做事的人。

留學期間，陳麗萍曾與一台灣留學生孫××情投意合並論及婚姻之事，但她（他）們的言行都是光明正大的，從不避人，我們大家對此都了解。然而，陳麗萍却因此受到中共人員的嫌疑。中共當局心虛，唯恐陳麗萍成為第二個周令飛，丟中共的臉，於是將陳強行拘捕。

據說在陳被拘押期間，當局曾威迫陳與孫

共兩黨的原則差別在於，我們尊重個別成員的立場轉變，尊重個體的自由選擇，我們從來不指責他們為叛徒，更不是設法去消滅他，而是認為，他們只不過是選擇了另外的人生道路，他們雖然離開了原來的團體，我們還會以和平共存的方式，共容於一個社會之中。」

我相信，只要我們本着來去自願的原則，中國民聯會健康地發展。

某斷絕關係，並要陳「為國家做點事」，意即做對台統戰的秘密特務工作，否則，陳將得不到釋放回日留學。但這一切均遭陳嚴詞拒絕。中共當局惱羞成怒，遂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于陳麗萍，還振振有詞地公佈于報刊。

對於中共當局這一無視留學生人權利益的行為，同學們無不感到氣憤！海峽兩岸的青年留學生談愛或結婚，或到任何一岸生活居住，這是他（她）們的個人選擇，他（她）們有自由有權利作出這樣的選擇，中共當局無權干涉！近幾年來，中共當局不是在連連要求台灣當局與之「三通四流」嗎？為什麼無端地干涉兩岸青年的正當相通呢？這不恰恰暴露了中共對台統戰的虛偽了嗎？中共如此不信任我們這些留學生，那麼我們怎能不擔心我們將來回國後的待遇呢？怎還能使我們安心為國學習呢？

最後，我們認為陳麗萍完全無罪，并誠懇地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陳麗萍，允許她返日留學。

歷史將宣判徐文立無罪

關於公佈徐文立獄中手記《我的申辯》的說明

本刊編輯部

徐文立在獄中寫就十一萬言的「我的申辯」一書和他寫給家屬的部份信件（復印件），最近經過北京市公安系統同情民運的人士冒險協助，轉到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中國之春」決定從三十期（今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起，分三至四期全文刊登，並受委託保留版權。

徐文立，一九四三年生，安徽安慶市人，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後參軍，為海軍航空兵地勤機械員，一九六九年復員，分配到豐台鐵路工廠當鍛工，七三年調北京鐵路分局建築段當電工，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西單民主牆創辦「四五報」，不久即與趙南的「人民論壇」合併，出版「四五論壇」。徐文立將自己的臥室騰出作為編輯部，「四五論壇」在那裡編輯、刻鋼板、油印、裝訂。「四五論壇」先後出版了十五個月，經歷三個年頭，共出十七期，於一九八〇年三月停刊。「四五論壇」刊載的文章立場溫和、穩健、切中時弊，在「北京之春」時期成為華北第一大民刊，每期均刊登十幾篇文章，約三—五萬字左右，最多時油印一千多份。「四五論壇」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主張改革。政治上，提出立法、司法、行政、黨權四權分立；修改憲法、保障人民真正有權監督和管理自己的國家，成為國家的主人；健全和完備法制；取消終身幹部制，代之以選舉制；國家武裝力量聽命於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真正實現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見七九年一、廿二「四五論壇」第四期）。經濟上，提出發展商品經濟；鼓勵合法競爭；提倡適當的消費；「小河沒水大河乾」，應打破大鍋飯制度；在農村應給予農民自主權（散見各期）等。七九年十月一日星星美展遊行，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徐文立是第一線總指揮。一九八一年四月九日夜徐文立在家中被捕，此後渺無音訊長達一年兩個多月，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下旬家屬才接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判決徐文立犯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罪合計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法院判決依據為（判決原文）：

一、一九八〇年六月徐文立為首糾集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等在北京市甘家口秘密聚會，圖成立「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打破一黨專制」。因王希哲認為條件不具備，應先作思想和組織準備，徐文立乃聯合上述三人及徐水良、傅申奇分頭主持出版「學習通訊」，共出六期，散發至十八個省市，誣蔑我國社會主義是「特權官僚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叫囂「必然導致第二次革命」。八〇年冬至八一年春徐文立又秘密策劃成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撰寫了綱領，並決定派人去香港勾結反華反共份子，陰謀將反革命組織總部設在香港，下設「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四個分會」，妄圖搞成一個「打不爛、摧不垮的政治實體」、「組織臨時政府」、「舉行大選」，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二、徐文立立「西單牆」張貼、散發傳單、搞民意測驗、發表演講、撰寫文章，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煽動群眾，反對司法機關對反革命份子的公正判決，並將詆毀司法機關的文章送外國記者、駐華使館，採取郵寄、傳遞等辦法擴散到海外，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為反華反共勢力對我國的攻擊和誣蔑提供藉口。

徐文立對這兩項指控在法庭上逐一辯駁。他說：「甘家口討論」是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處於轉折、眾說紛紜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幾個人就社會主義發展前途而進行的探討。並且，當時就自行否決了我的某種設想。一九八一年十月，葉（劍英）委員長已經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九條方針，明確提出歡迎每一個中國人，歡迎各政黨、各民主團體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對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貢獻。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提議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怎麼竟成了組織反革命集團？檢察官的這一指控豈不是把葉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方針置於失信於天下的地位嗎？

並說：根據我國刑法，只有具有反革命目的的反革命行為，才能判定為反革命罪。然而，我既無反革命目的，又無反革命行為，憑什麼指控我犯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單從行為上說，我當時行為只是「討論」

和「醞釀」，和「組織」什麼「集團」根本沾不上邊，何況更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了。

徐文立接着說：「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一個部門、或一個司法機構把它的某些規定和具體判決，和它的立法機關和經過立法機關頒佈的法律、法令等同起來，更何況，我只是對某些部門的違法行為和不公正的判決提出批評意見，……如果一個行政機關和司法機構的具體行為和司法判決，不允許別人評論和批評，豈不是太霸道了嗎？」

「我的申辯」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在北京市監獄總局六街四號寫就，共二百四十一頁，約十一萬字，分為八十四個章節。前半部份敘說作者自身成長的過程，文筆流暢感人，可一窺解放前後出生、在紅旗下成長的一代新人的心路歷程。後半部份描述作者積極參與七八年底勃興的大陸民主運動的梗概和被捕關押、預審、判決的全部經過。尤其是對預審和判決經過的揭露，撥開重重雲霧，使全世界認清中共「法制」下秘密審判的真面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預審人員任意篡改、刪節原始證據，斷章取義，甚至捏造材料；審判員採用「有罪推定」，一切唯上面之命是從，毫無司法應有的獨立、公正。凡此皆歷歷在目，句句控訴！

根據中國民聯人權小組的調查和轉來中國民聯總部的三十封獄中書簡的陳述；獄方給予徐文立「特別照顧」：徐一直囚禁在單身牢房，大小便上廁所都有人陪，不許和獄中其他人犯交談；每天提供人民日報和其他學習材料閱讀，每周看一次或數次電視，每月一、二次電影，均單獨欣賞，故次數較他人為少；每周去澡堂洗一次澡；一日兩瓶開水，晚餐為細糧，星期四為休息日只供應兩餐，每周三次伙食中可見肉，年節改善伙食供應富強粉麵食和米；幹一些輕微勞動，每月掙二塊五；可買些水果、糖、花生等零食；八二年十月十九日第一次允許家屬探視後，約每兩個月會面一次，每次約四十五分鐘，但探監未形成制度化，探視時間均由獄方臨時通知家屬，家屬送食品或書刊，時許、時不許。中國民聯對徐文立案的立場如下：

中國民聯的立場

一、根據當時憲法（一九七八年三月五屆人大通過）第四十五條：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我們認為，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徐文立的兩項指控不能成立；徐文立完

全有權撰寫文章、出版刊物，並張貼、散發他的作品，完全有權進行成立「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討論，有權醞釀「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促進中國和平統一。中共高層領導人一再聲言：歡迎每一個中國人通過各種方式對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貢獻；却對徐文立醞釀「促進會」的構想進行指控，不禁令人懷疑中共對香港的保證、對台灣的承諾、對祖國的統一的誠意？

二、基於上述理由，我們強烈要求：立即釋放徐文立，重新公開審判，給予平反，恢復工作，並賠償無辜受刑期間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損失。

三、鑒於，劉青在公佈了他的「沮喪的回顧與展望——我向社會法庭控告」一書後，勞教三年的期限被無限期延長，迄今下落不明，音訊全無，且劉念春（劉青弟）與路林（原「探索」成員）更因此事被無辜牽連逮捕下獄；我們曾考慮到發表「我的申辯」是不是會帶給徐文立及其家屬更多的災難？經內部徵詢意見後，我們傾向於：徐文立被無辜重判十五年徒刑，其內幕鮮為人知，公開後只有更加引起世人對他的關注，迫使中共當局重新審理他的案子，對他只有利沒有弊。所以還是決定刊登，以喚起世人對他、對中國大陸所有政治犯的密切關懷。

四、同時，我們藉此再次強烈呼籲：

(一)立即釋放魏京生、王希哲、傅申奇、劉青等所有在押的政治犯，並比照第二點所列方法給予補償。

(二)修訂刑法，取消「反革命」罪。「反革命」一詞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的，含有主觀判斷的意識型態用語，與嚴謹、客觀、講求事證的法律條文格格不入。

(三)公安部門不得違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任何人進行非法拘留、逮捕、關押；依法執行上述行為時應在廿四小時內通知當事人家屬，並允許當事人或其家屬隨時聘請律師或辯護人維護當事人的權益。

(四)增補刑事訴訟法，明確劃定公安部門和檢察部門預審、偵訊的範圍和權限。公安人員不得濫用此項權限。

(五)修訂「社會治安管理条例」，明確規定公安部門無權作出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的判決，此兩項裁定應交由司法部門循法律途徑行之。

我們堅信，歷史將判徐文立無罪！

一九八五、十、十二

接過徐文立的火炬

——初讀「我的申辯」有感

(中國民聯)王炳章

倘若整個民族都容忍不公允而沒有勇氣對之指責，那麼，這個民族是注定要被淘汰的，是不值得憐憫和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中華民族不是這樣的民族，她在任何時候，那怕是最黑暗最專制的時期，也不缺乏捨身真言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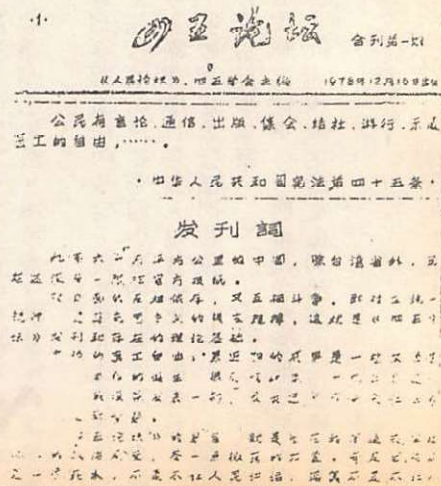
——摘自原《四五論壇》編委劉青獄中手記

徐文立獄中手記的原稿，突破固若金湯的北京第一監獄，逃過中國海關過篩般的嚴密搜查，越過重洋，轉到了紐約中國民聯總部。我手捧天藍色塑膠封面、內有徐文立十一萬字親筆記錄的筆記本，真覺得它有千斤重！徐文立的獄中手稿「我的申辯」，脫稿於去年十二月七日，始終找不到合適機會轉運出來。當中國民聯總部從國內的關係得知這份珍貴的文獻時，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從轉運計劃開始實施起，我就日夜記掛着執行任務人員的安危。在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中打滾出來的我們，深深知道，有關人員一不小心，其後果將是什麼。兩個多月過去了，當我在長途電話中聽到「東西已安全轉出」的報告時，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經過民運戰士機智而果敢的行動，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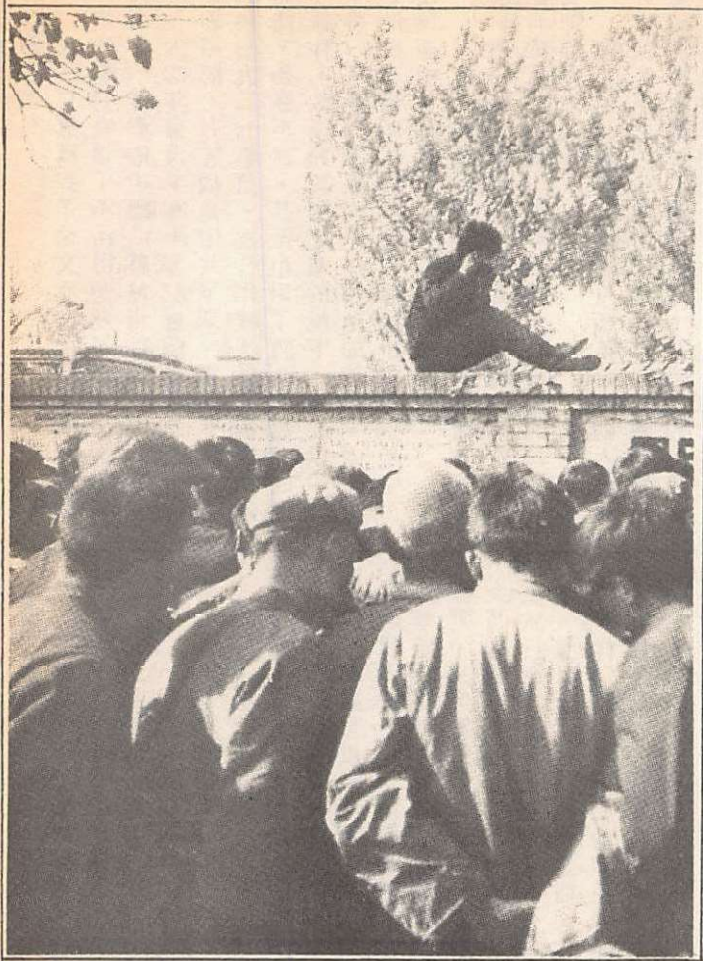
立向世人公佈其案情真相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我一頁一頁翻閱着徐文立的獄中手稿，當讀到他追憶西單民主牆的描述時，我彷彿又被帶回到那熱火朝天的年代。一九七九年初，西單民主牆運動達到高潮，我正在北京語言學院緊張地集訓，準備出國。我一有空，便到西單民主牆看大字報，參加討論。徐文立描述的某些場面，如孫維邦建議書引起圍觀，「四五論壇」與「探索」的筆戰和人們爭相購買民刊等，至今仍歷歷在目。記得七九年七月廿三日，我去教育部留學生管理司美加組辦理出國手續後，黃昏去西單民主牆看新的大字報。我和一位從南京出差來北京的幹部討論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我在一張大字報的某條「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批語旁作了一條評語，大意是「不

要害怕批評，正確的黨不怕批評，怕批評的黨不會正確」。我剛寫完，一只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是事先約好見面的一位老朋友。他在年初就曾約我一同去找「北京之春」和「今天」的人談話，由於兩人都忙，一直沒抽出時間。我問他：「今天我有一空，你有時間嗎？我們可以找找他們。」他把我拉到一邊，小聲說：「你還沒聽見風聲嗎？中央要全面掃蕩了，現在我們還是謹慎點好，等等再說吧！你出國有準確消息了嗎？」我告訴他，我剛去過教育部，手續已辦好，九、十月份大概可以出國。他沉思了半晌道：「既然你肯定可以出去，就應該更謹慎一些，你看那邊躊躇的人，我懷疑是便衣。靠鄧小平，我看是不行了，他已下決心抓人，不只是魏京生。你有機會出國，要珍惜這個機會，眼下能獲得這個機會的人不多。說不定需要時，你們可以像周恩來、鄧



徐文立、劉青等人創辦的「四五論壇」創刊號。



西單民主牆是中國現代化改革的先聲。圖為一九七九年民主牆前的熱鬧場面。

小平當年在法國一樣，把火從外面點起來，起碼聲援一下國內。我看，你從今天起，不要再來這個地方了。」我們在西單一家小飯館分手後，我到了一位高幹的家，他是我一位當幹部的親戚的老上級。從他那裡，我證實了中央決心掃蕩自由化運動的消息，而且要像五七年反右一樣，等「蛇」統統出了洞，再一網打盡。這位高幹說，從壓制群眾民主這一點來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沒什麼兩樣。他是很同情民辦刊物的。

現在，我們在海外創辦的中國民聯，能將徐文立的手稿轉移出國，中國之春能有機會刊登他的獄中手稿，向全世界宣佈民運人士的清白無辜，呼籲海內外同胞關注大陸的人權。我

自慰地想，就憑這一點，我的留學也就算值得了。

據「我的申辯」記載，徐文立等人原來有一個構想，即創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下設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四個分會，將民主運動組織化，並將大陸民主運動的海內外運作配合起來。徐文立的這一願望，今日逐漸變為現實。中國民聯目前所展現的組織架構和昭示的奮鬥目標，正是被北京當局扼死胎中的「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的精神再現。不同的是，我們今天能夠自由地把一些宗旨和原則說得更為明確。

有些讀者在讀完徐文立的「我的申辯」後，可能覺得並不「過癮」，因為文中不少處流

露出「相信共產黨」、「擁護共產黨」、「幫助共產黨」的意思，文中還有很多處應用馬克思主義批判共產黨的專制，等等。對此，我願意表示一點看法。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發展是一浪高過一浪的，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認識水準去要求幾年前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我們在進入青年階段後，回顧一下童年的所作所為，會感到幼稚。但是，沒有童年的幼稚，也就沒有青年階段的發展，更沒有壯年階段的成熟。民主運動也是一樣。對於付出重大代價的民運先鋒們，我們沒有理由去苛求他們。我敢預言，人們在數年後再回頭來閱讀今天的中國之春，也會發現很多東西是幼稚可笑的。

另外，我願提醒大家，徐文立的獄中申辯，是在鐵窗之內，也就是說，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老虎嘴中寫的。徐文立必須防備，萬一他的手稿被中共當局發現，他將不會因這一手稿而「罪」加一等。特別是在一九八三年打擊刑事犯罪運動的高潮中，徐文立的手稿一旦被查出，實有殺身危險。在這種處境下，他必須在「申辯」的遣詞造句上，加十二萬分的小心。他的用意是，既使手稿被中共查獲，也讓當局啞口無言，甚至能博得有良知的共產黨員的同情。正因為他足智多謀地採取了「幫助黨」、「與當局合作」的姿態，他才博得一些監獄人員的同情，使十一萬言的「我的申辯」得以完成，並轉移出獄。我們身處自由土地的人們必須設身處地地為囚在單身牢房的民運人士着想，才能透過表面的單紗，窺見「申辯」的深刻內涵。

有不少人出於對共產黨專制制度的痛恨，一提起共產黨就咬牙切齒。豈不知，共產黨是公開聲明「不怕罵」的，它所懼怕的，正是像徐文立「我的申辯」這樣令共產黨員讀後都感

到心碎的檄文。

我一口氣讀完了徐文立的申辯書和他滿懷深情的幾封家信，不由得想起了方志敏當年將其著作「可愛的中國」轉移出獄的故事。在大陸長大的年青人，在小學就會聽老師講述方志敏的事跡。方志敏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國共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合作破裂後，被國民黨逮捕，始終不屈，甚至拒絕了蔣介石招降的優厚條件，最後死於國民黨的槍下。方在獄中曾手書「可愛的中國」，抒發他的抱負，由同情方的獄卒協助，其手稿先轉到上海魯迅手中，後移至中央蘇區。

正像共產黨後來把方志敏的獄中著作當成教科書一樣，中國民主運動也必將把徐文立和劉青的獄中手稿，做為珍貴史料激勵為民主而奮鬥的後來人。

盡管中共奪取政權後卅多年將中國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方志敏等某些先驅者為理想而捐軀的英勇事跡仍然是十分感人的。我常常思考這樣一些問題：難道可以說早期共產黨人的理想情操不崇高嗎？是什麼原因使他們革命的結果與早期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馳呢？我獨自思考的答案是：早期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富國強民的抱負是無可置疑的，但他們一開始就種下了絕對化和一元化的禍根。這禍根就是：認為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是絕對真理；認為只有共產黨才是馬列主義的化身，才能救中國。這種偏見，共產黨至今沒有消除。他們從革命一開始就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認為自己是「聖人」，共產黨是「太陽」。他們根本不懂得「反對派」和「制衡」的觀念。他們創建了一套等級授權制，來保護自己的「聖人」地位。結果，「聖人」一旦出現錯誤和偏差，便無法糾正，直至在錯誤的道路

上碰得頭破血流。

共產黨人這種唯我獨尊、排斥他人的特質，年輕一代有理性的民運戰士從一開始搞民運起，就十分警惕。徐文立在其「我的申辯」中指出：「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教訓，我認為都是社會對執政黨缺少有效的群眾監督，因而重大的決策上的錯誤不可能及時發現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致給無產階級事業帶來重大損失。『四人幫』倒台之後，這類問題仍未解決。既然資產階級可以用兩黨制或多黨制來調整內部的階級關係，以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為什麼無產階級不可能更自覺地應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原理，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認為，打開這個大門的鑰匙，就是突破一黨制，在社會主義國家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崇尚多元，相信制衡，承認自己會犯錯誤並需要他人的批評和監督，肯定政治反對派的價值，是新一代民主人士與共產黨人的根本區別。

徐文立，以及魏京生、王希哲、何求和傅申奇等民運先鋒們，還在鐵牢之中。徐文立的妻子康彤和女兒小蕾，還要等他十年之久。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抓了徐文立，還有後來人。正是在魏京生、徐文立等人的激勵下，中國之春才揭竿而起。如果中共當局用人道的方法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加以殘酷鎮壓，我堅信，將激發更多的人投入到民主運動的洪流中來。

我撫摸著從北京第一監獄傳出來的、凝聚著徐文立心血的筆記本，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我感到，我們接過來的，不僅僅是這個小小的筆記本，而是獄中民運戰士的理想，是他們手中的民運火炬。放心吧，徐文立，放心吧，尚在獄中的戰士們，我們將把火炬舉得更高，直到勝利！

國內快訊·時評

炎黃子孫？勿忘國恥！

（華僑·美洲）晨全中

近幾年來，目睹小日本在侵華戰敗之後，經濟迅速起飛，並重新躋入世界經濟強國之列，於是日本人又大擺驕狂自大、不可一世之醜態。日本人以其著稱的刁猾欺騙手段向中國大搞經濟侵略，致使日本汽車、電器產品、工業科技等產品在中國各地風靡一時；致使中國在引進或合作的各大小企業合同上連連上當。其在文化方面的侵略，台灣有識之士也早有隱憂。更令人髮指的是，日本當局竟多次陰謀篡改侵華歷史，妄圖一筆勾銷昔日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久前，日本內閣總理中曾根康弘更無視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強行參拜靖國神社，猶有重燃昔日軍國死灰之勢。當我正為下一代中國人擔憂之際，國內連連爆發了反日示威的學生運動，方見中國人民仍然未忘昔日國恥。但應該指責的是，中共當局却對中國人民的這種正義行動百般阻止和曲解上綱。

當我看到報上日本當局迫使一台灣老人在其簽證上按指紋一事時，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即建議中共當局明令規定：凡在中國旅居經商超過一個月以上之日籍人士，必須在各有關證件上按指紋存案。我個人認為，這種做法也談不上所謂破壞中日友好，只不過是一種以牙還牙的外交慣例而已。何況日本人有一處世待人的哲學：當有人羞辱你的時候，你不僅不應無原則地忍讓，而應趁機將對方一軍，但你若縱容對方的無禮，對方反認為你軟弱可欺。因此，我的建議，中共當局值得一試。

最後我再呼籲，凡我炎黃子孫，永遠勿忘國恥！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2) 中刑字第一三八號

公訴人：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檢察員張起生。

被告人：徐文立，別名徐溫立，筆名徐庶、南容、客卿，男，三十歲，安徽省安慶市人，原係北京鐵路分局北京建築段工人，住本市永定門火車站鐵路公寓。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拘留，因反革命罪，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被逮捕。現在押。

辯護人：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劉述芬。

被告人徐文立反革命一案，由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公訴來院，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檢察員張起生出庭支持公訴，依法公開審理了本案。現查明：

一、被告人徐文立為了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策劃成立反革命集團，為首糾集廣州、青島、安陽等地的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均另行處理）等，於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及十二日連續三個晚上，在北京市甘家口旅館秘密聚會。被告人徐文立在此會上，誣毀我人民民主專政是「一黨專政」，圖謀以「突發的形式」發起全國性的行動，成立反革命組織「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以這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打破「一黨專制」。王希哲等人認為「條件還不十分具備」，應先「做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因此，被告人徐文立等決定出版「學習通訊」，由被告人徐文立、王希哲、孫維邦、徐水良、傅中奇、劉二安等在北京、廣州、青島、南京、上海、安陽等地分頭主持出版，由徐文立在北京充當總「調度」，並負責審稿以及封面、插圖的審定。同時，策劃了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手段和方法，用以製造輿論，誘惑或攔截，網羅同黨。一九八〇年七月至一九八一年（註）二月，共出版了六期「學習通訊」，每期數百份，散發至全國十八個省市，公然誣毀我國社會主義是「特權官僚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叫囂「必然導致第二次革命」等等，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為了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被告人徐文立又打着「民主建國、和平統一」的招牌，於一九八〇年冬至一九八一年春，先後分別勾結劉二安、孫維邦等人，秘密策劃成立反革命組織「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被告人徐文立為該反革命組織撰寫了「綱領」，還決定派人去香港等地與

反華反共分子進行勾結，並親自給香港反華反共分子寫信，策劃成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的策劃和行動計劃，陰謀將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總部設在香港，下設「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四個分會」，「其他地區設分支機構」，將香港做為勾結反華反共分子的「橋樑」，「選擇適當時機，在香港或海外，絕對秘密地召開代表會議」，宣告「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成立，妄圖把該反革命組織搞成一個「打不爛、摧不垮的政治實體」，以所謂「實力」使共產黨被逼「讓步」，「組織臨時政府」，「舉行大選」，「組成新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二、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以後，被告人徐文立於一九七九年四月至八月在「西單牆」散發傳單，誣毀「通告」是「使用暴力鎮壓」，「扼殺民主」，煽動群眾抗拒政府法令的實施。被告人徐文立還搞所謂「民意測驗」、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張貼散發傳單，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煽動群眾，反對司法機關對反革命分子的公正判決和對違法犯罪分子的正確處理。並將詆毀司法機關的文章送外國記者、駐華使館，採取郵寄、傳遞等辦法擴散到海外，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為反華反共勢力對我國的攻擊和誣毀提供藉口。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被告人徐文立又向持有共同反動觀點的人，搜羅材料，組織反動文章，在香港反華反共分子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中造謠誹謗，誣毀我國是「扼殺」個性的「封建社會主義」。公然叫囂要改造中國的社會制度，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上述罪行，有證人證言，同案犯供述、技術鑒定及起獲的書證在案佐證，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人徐文立為首勾結他人，陰謀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造謠污蔑，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妄圖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已構成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情節嚴重，應從重懲處。為鞏固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懲處危害國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反革命分子，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第六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徐文立犯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刑中刑字第133号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张起生
 被告人：徐文立，别名徐温立，笔名徐之，南京，男，三十八岁，安徽省安庆市人，原系北京铁路分局北京建筑段工人，住本市永定门火车站铁路公寓。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拘留，因反革命罪，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被逮捕。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刘述芬。
 被告人徐文立反革命一案，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张起生出庭支持公诉，依法公开审理了本案。现查明：

一、被告人徐文立为了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策划成立反革命集团，为首纠集广州、青岛、安阳等地的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均另行处理）等，于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至今二日连续三个晚上，在北京市甘家口旅馆秘密聚会。被告人徐文立在会上，诬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党专政”，图谋以“寒盟的形式”“发起全国性的行动”，成立反革命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打破一党专制”。王希哲等人认为“条件还不十分具备”，应先“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因此，被告人徐文立等决定出版《学习通讯》。由被告人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徐水良、付中青、刘二安等在北京、广州、青岛、南京、上海、安阳等地分头主持出版，由徐文立在北京充当总“调度”，并

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二、查获之证物，予以没收（清单附后）。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法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丁凤春
 人民陪审员 薛家礼
 人民陪审员 张从良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时学琛

- | | | | |
|---------------|------|----------------|------|
| 1 油印機 | 1 台 | 2 鋼板 | 4 塊 |
| 3 圖章 | 3 枚 | 4 複寫紙 | 1 盒 |
| 5 臘紙 | 2 捲 | 6 手稿 | 1 捆 |
| 7 刊物 | 1 捆 | 8 雜誌「港刊」 | 8 本 |
| 9 「中報」 | 5 本 | 10 「爭鳴」 | 20 本 |
| 11 「北斗」 | 4 本 | 12 「廣角鏡」 | 5 本 |
| 13 「觀察家」 | 20 本 | 14 「觀察家」合訂本 | 3 本 |
| 15 「明報」 | 7 本 | 16 「鏡報」 | 4 本 |
| 17 「七十年代」 | 18 本 | 18 「天安門事件紀念週集」 | 1 本 |
| 19 「中國人」 | 14 本 | 20 「南北極」 | 12 本 |
| 21 「展望」 | 13 本 | 22 「動向」 | 16 本 |
| 23 「海澱雜誌」 | 2 本 | 24 王希哲發言 | 1 本 |
| 25 「新社會」 | 1 本 | 26 「左翼評論」 | 1 本 |
| 27 「大陸地下刊物匯編」 | 1 本 | 28 「香港與中國之間」 | 1 本 |
| 29 「鬪爭十八年」 | 1 本 | 30 「黃河」 | 3 本 |
| 31 「東西方」 | 2 本 | 32 「春秋」 | 3 本 |
| 33 「時代週刊」 | 4 本 | 34 「理工」 | 6 本 |
| 35 「學習通訊」 | 1 本 | 36 「怎麼辦」 | 1 本 |
| 37 「播種」 | 1 本 | 38 「當代」 | 5 本 |
| 39 筆記本 | 19 本 | 40 錄音磁帶 | 21 盤 |

〔編者註〕原判決書此處為一九八二年，徐早於八一年四月被捕，恐為打印之誤。查證北京高法終審裁定書，此處為一九八一年，據此改動。

沒收物品清單

二、查獲之證物，予以沒收（清單附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日內，向本法院提出
 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 丁鳳春
 人民陪審員 薛家禮
 人民陪審員 張從良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誤
 書記員 時學琛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終審裁定書

(82) 高刑終字第一二六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徐文立,別名徐溫立,筆名徐庶、南客、客卿,男,三十九歲,安徽省安慶市人,原係北京鐵路分局北京建築段工人,住本市永定門火車站鐵路公寓。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拘留,因反革命罪,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被逮捕,現在押。

辯護人: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劉述芬。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以(82)中刑字第一三八號刑事判決書認定徐文立犯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徐文立不服原判,以原判認定的事實不符,自己的行為未構成犯罪等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

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俞新根出庭執行職務,公開審理了本案,現查明:

一、上述人徐文立為了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策劃成立反革命集團,為首糾集廣州、青島、安陽等地的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均另行處理)等人,於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連續三個晚上,在北京市甘家口旅館秘密聚會,徐文立在會上誣毀我人民民主專政是「一黨專政」,圖謀以「突發的形式」「發起全國性的行動」,成立反革命組織「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以這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打破一黨專政」。王希哲等人認為「條件還不十分具備」,應先「做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因此,決定出版「學習通訊」,由徐文立、王希哲、孫維邦、徐水良、傅申奇、劉二安等人在北京、廣州、青島、南京、上海、安陽等地分頭主持出版,由徐文立充當總「調度」,並負責審稿以及封面、插圖的審定,同時策劃了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手段和方法,用以製造輿論,誘惑攔絡,網羅同黨。一九八〇年七月至一九八一年二月,共出版六期「學習通訊」,每期數百份,散發至全國十個省市,散佈反動言論,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徐文立等人為了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打着「民主建國,和平統一」的招牌,於一九八〇年冬至一九八一年春,先後分別勾結劉二安、孫維邦等人,秘密策劃成立反革命組織「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徐文立為該反革命組織撰寫了「綱領」,還決定派人去香港等地與反華反共份子

進行勾結,並親自給香港反華反共份子寫信,策劃成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的策略和行動計劃,陰謀將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總部設在香港,把香港作為勾結反華反共份子的「橋樑」,下設「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四個分會」,「其他地區設分支機構」「選擇適當時機,在香港或海外,絕對秘密地召開代表會議」,宣告「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成立,妄圖把該反革命組織搞成一個「打不爛、摧不垮的政治實體」,以所謂實力「使共產黨被迫讓步」,「組織臨時政府」,「舉行大選」「組成新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發佈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以後,徐文立於一九七九年四月至八月在「西單牆」散發傳單,誣毀「通告」是「使用暴力鎮壓」,「扼殺民主」,煽動群眾抗拒政府法令的實施,還搞所謂「民意測驗」,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張貼、散發傳單,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煽動群眾,反對司法機關對反革命份子的公正判決和對違法犯罪份子的正確處理,並將詆毀司法機關的文章送給外國記者、駐華使館,採取郵寄、傳遞等方法擴散到海外,欺騙輿論,混淆視聽。為反華反共勢力對我國的攻擊和誣毀提供藉口。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徐文立又向持有共同反動觀點的人搜羅材料,組織反動文章,在香港反華反共份子主辦的刊物上發表,誣毀我國是「扼殺個性的封建社會主義」,公然叫囂要改造中國的社會制度,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本院認為,上訴人徐文立為首勾結他人,陰謀策劃組織反革命集團,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造謠誣毀,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妄圖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已構成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應從重懲處。原判認定的犯罪事實證據充分,定罪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徐文立矢口否認其反革命目的和犯罪事實,提不出任何證據,顯係狡辯,應予駁回。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不准上訴。

審判長 董成鈺

審判員 劉真

代理审判员 張文學

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誤

書記員 劉曉玲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裁定书

刑高刑终字第1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文立，别名徐温立，笔名徐庄，面容、容卿，男，三十九岁，安徽省安庆市人，原系北京铁路分局北京建筑段工人，住本市永定门火车站铁路公寓。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被拘留，因反革命罪，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被逮捕，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律師劉述芬。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以刑中刑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文立犯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徐文立不服原判，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不符，自己的行为未构成犯罪等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俞新报出庭执行职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上诉人徐文立为了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策划成立反革命集团，为首纠集广州、青岛、安阳等地的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均另行处理)等人，于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连续三个晚上，在北京市甘家口旅馆秘密聚会，徐文立在会上诬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党专制”，图谋以“突发的形式”“发起全国性的行动”，成立反革命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以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打破一党专制”。王希哲等人认为“条件还不十分具备”，应先“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因此，决定出版《学习通讯》，由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徐水良、付中奇、刘

方法扩散到海外，欺瞒舆论，混淆视听。为反华反共势力对我国的攻击和诬蔑提供借口。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徐文立又向持有共同反动观点的人搜罗材料，组织反动文章，在香港反华反共分子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诬蔑我国是“扼杀个性的封建社会主义”，公然叫嚣要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文立为首勾结他人，阴谋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造谣诬蔑，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已构成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从重惩处。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证据充分，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徐文立矢口否认其反革命目的和犯罪事实，提不出任何证据，显系狡辩，应予驳回。本院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准上诉。

审判长 董成征

审判员 刘京

代理审判员 刘述芬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刘晚玲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裁定书

(原件)



徐文立：「法律程序就是這樣地玩弄在他們股掌之中！」

二安等人在北京、广州、青岛、南京、上海、安阳等地分头主持出版，由徐文立充当日“调度”，并负责审稿以及封面、插图、的审定，同时策划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和方法，用以制造舆论，引诱找路，网罗同党。一九八〇年七月至一九八一年二月，共出版六期《学习通讯》，每期数百份，散发至全国十八个省市，散布反动言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徐文立等人为了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打着“民主建国，和平统一”的招牌，于一九八〇年冬至一九八一年春，先后分别勾结刘二安、孙维邦等人，秘密策划成立反革命组织“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徐文立为该反革命组织撰写了《纲领》，还决定派人去香港等地与反华反共分子进行勾结，并亲自给香港反华反共分子写信，策划成立“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的策略和行动计划，阴谋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总部设在香港，把香港作为勾结反华反共分子的“桥梁”，下设“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四个分会”，“其他地区设分支机构”“选择适当时机，在香港或海外，绝对秘密地召开代表大会”，宣告“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成立，妄图把该反革命组织搞成一个“打不烂、推不垮的政治实体”，以所谓实力“使共产党被迫让步”，“组织临时政府”，“举行大选”“组成新政府”，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以后，徐文立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八月在“西单墙”散发传单，诬蔑《通告》是“使用暴力镇压”，“扼杀民主”，煽动群众抗拒政府法令的实施，还搞所谓“民意测验”，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张贴，散发传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煽动群众，反对司法机关对反革命分子的公正判决和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确处理，并将诬蔑司法机关的文章送给外国记者、驻华使馆，采取邮寄、传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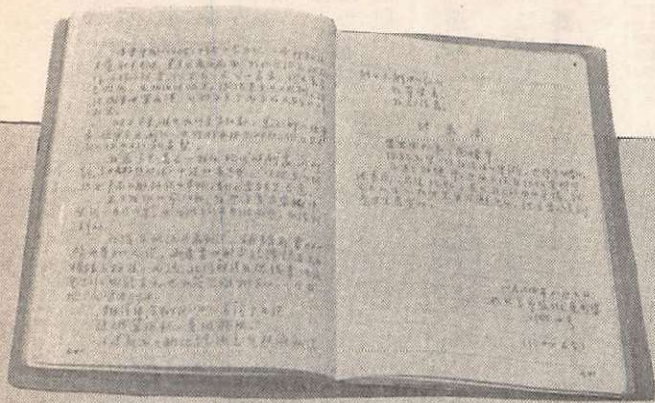
西單民主牆運動領袖、

原《四五論壇》負責人徐文立獄中著作

我的申辯

(初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徐文立「我的申辯」的最後一頁(第241頁)。



編者按

「我的申辯」一書，除極個別幾個字因筆誤所致加以改正，及「九九拜三哆嗦」一節涉及某先生，應當事人所請，隱去其名之外，未加刪改，全文刊登。但考慮到目前大家最為關注的，當是中共對政治犯的秘密審判過程；所以我刊先登載自第五十九節「對「四五論壇」的簡單回顧」至最末一節「結束語」部份。同時，為使讀者對全書有一梗概的認識，及瞭解作者申辯的緣由，本期亦登出卷首語、目錄及最前面的兩小節。其餘分期順序刊登。



徐文立及其妻子康彤和女兒徐瑾。

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

——卡爾·馬克思

有所作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費里德里希·恩格斯

獻給我心愛的人、朋友

——彤和瑾

不要看到江河向下流去，
就擔心江河不求上進；
不要看到樹枝朝天怒發，
就擔心樹木有插天的野心。

……
昂首闊步，也有的在走下坡路，
勾頭屈腰，很可能在艱苦攀登。
朝陽和夕陽都是一個不老的太陽，
用不著向晚風感嘆落霞黃昏。

——《致父親》

原載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編者：以上為徐文立寫在《我的申辯》正文之前的三頁題句)



偷運出獄的徐文立所用日記本，內有徐文立親書十一萬言的「我的申辯」。

目錄

- 1 特等獎賞
- 2 嗚咽的痛哭
- 3 無光的童年
- 4 童年的「朋友」
- 5 第一啟蒙人
- 6 第二啟蒙人
- 7 一樂即悲
- 8 一場惡夢
- 9 見義勇爲「反遭殃
- 10 難忘的羞耻
- 11 離家遠行
- 12 第一件荒唐事
- 13 冷的長春
- 14 一強一弱二朋友
- 15 難忘的一課
- 16 第一名
- 17 入團
- 18 休學
- 19 摯友
- 20 遠足
- 21 下鄉
- 22 閃電式的大連之行
- 23 參軍
- 24 嚴己又嚴人的教訓
- 25 好心不得好報?!
- 26 最高的評語
- 27 知遇
- 28 我的「左」
- 29 返樸
- 30 憂
- 31 憂
- 32 憂

- 33 憂源何姓「屈」?
- 34 出路何在?
- 35 總理逝世
- 36 一份極重要的「揭帖」
- 37 四月四日夜的流血事件
- 38 「四五」險遭抓
- 39 偉大的「四五運動」
- 40 追查中的幸存者
- 41 年年一月八 年年四月五
- 42 我的徒弟
- 43 欲當教師不成
- 44 投考研究生受辱
- 45 牆前的「私生子」
- 46 「四五論壇」
- 47 懇談會
- 48 截然不同的態度和作法
- 49 錯誤的第一步
- 50 錯誤的第二步
- 51 與「探索」商榷
- 52 宗旨的再討論
- 53 民主討論會
- 54 更錯的第三步
- 55 對具體案件的判決發表評論難道有罪嗎?!
- 56 我的又一件荒唐事
- 57 談話第一次被竊錄
- 58 「四五論壇」在內外夾攻下停刊
- 59 對「四五論壇」的簡單回顧
- 60 最後一次接見外國記者
- 61 談話第二次被竊錄
- 62 庚申上書
- 63 談話第三次被竊報
- 64 火災
- 65 一盒錄音帶
- 66 拘禁
- 67 預審員們

- 68 僵峙到「妥協」
- 69 轉捕
- 70 九九拜三哆嗦
- 71 開庭前的波折
- 72 開庭：讓審判長迴避
- 73 開庭：打回他的下馬威
- 74 開庭：窮追原始證據
- 75 開庭：簡單的結論和否定
- 76 開庭：滿頭大汗的檢察員
- 77 開庭：平心靜氣的律師
- 78 開庭：恢復了尊嚴
- 79 例行公事的二審
- 80 入監
- 81 問題的實質
- 82 歷史的回顧
- 83 未來的展望
- 84 結束語

我的申辯

如果我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份子，我就不必申辯。
如果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終究會公正地解決我的問題，我就不會申辯。

特等獎賞

我坐牢已經快四年了。
去年元旦，女兒來信告訴我，她「正看『尼爾斯騎鵝旅行記』，這是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女作家的作品，是日彩色動畫片，好看極了，一共五二集，我希望，演不了幾場爸爸就回來和我一起看，你得答應我抱着我看，我好久沒和你撒嬌了。」

今年大年卅，女兒又來信說：「我給你寫這封信是在三十的早上寫的。我在想：人家過三十都是一大家子在一塊團團圓圓的，可是咱家。唉！沒辦法。不過我堅信咱家今後會永遠團聚。」

這十歲孩子家的話，字字句句灸我的心。這字字句句又溫暖着我這囚徒的心，這是一個囚徒所可能得到的特等獎賞——妻子和女兒深沉的愛，這是愛的獎賞，我想這恐怕也是任何一個人難以得到的特等獎賞，我盼着早日去領受。

盼望總有憂慮伴存。她們既盼着我早回去，又總是怕，怕我不能完好無缺的回去。更怕：萬一，萬一回不去……

我從她們的封封信、言言語語，閃着淚花的雙眼裡看到了這種與盼望伴存的憂慮。

雖然，這種萬一的憂慮大可不必：一、我決不會輕生；二、我清清白白，我用不着越獄，用不着逃跑；三、我身體很好，沒有任何足以致命的疾病。所以，即便有喪盡天良的人想加害於我，也難以找到向世人交代的藉口。何況，當今中國，正義和公理佔着絕對的上風。可是，作為親人的她們怎能會不有這樣的憂慮呢？

嗚咽的痛哭

有人說，男兒的眼淚比金子貴。又有人說，會哭的男子是好人。我會哭，我哭過，我是個好人嗎？我是個好男兒嗎？我的眼淚不如金子貴嗎？

八一年八月一天的深夜，在K字樓的二衛十三號。

這一夜失眠了，這在我一生中是極少有的。夜極深了，我才昏昏然，突然我打了一個寒顫，我驚醒了，我發現自己在哭，在嗚咽的痛

哭，聲音很小。

同監的那個人也醒了，他吃驚地問我：「怎麼？你怎麼啦？」

我一時語塞，好半天才哽咽出了一句一字一頓的話：「我居然成了反革命！」

「唉！別想它了，睡吧！」他說。

莫非他真的是「釘子」，夜裡也這麼警覺？或許是這種嗚咽的哭聲有特異的穿透力，能把別人從酣睡中喚醒？

（編者：以上為一、二兩節，以下為五十八節至八十四節結束語。三至五十七節今後順序刊出）

對「四五論壇」的簡單回顧

「四五論壇」自一九七八年底創刊，經歷了三年年頭，實際上僅僅一年多時間，共出十七期。每期一般有十幾篇文章，約三至五萬字。每期最多時一千份，最少幾百份。這不包括停刊後，我以個人名義發表的「答記者問」，那是為「以正視聽」而發表的。「四五論壇」有固定訂戶近二百家，在「牆」前零售幾百份，總是十分搶手，讀者是按預告時間排隊等候，往往難以滿足需要。國內讀者分布在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台灣地區，國外讀者分布在歐、亞、美、澳幾大洲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四五論壇」發表的主要文章，我印象深刻的有：

1. 「四五論壇」登載的文章重點是有關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也有一些有關理論問題探討的文章。譬如七九年初就發表了「從周總理晚年的遭遇看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等文章。「四五論壇」在改革問題上一貫的提法是「體制改革」而不用「制度改革」，這說明我

們主張的改革，是對體制的改革，而不是根本制度的改革。擁護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條是不變的，根本制度還是堅持社會主義。

當然，事情要回到四年前的環境中去看，「四五論壇」在當時，就明確了「體制改革」這個提法，也不是不需要一定勇氣的。誠如盧祖品在「神本賦」中所說：讀者同志想必記得，城市經濟改革那時（還不是指七九年，而是更早些——引者註。）尚處於醞釀階段，懷疑論者還頗有市場；在一段時間內，「改革」二字像彗星從報紙版面一閃而過，人們對此噤若寒蟬。

2. 當農村承包責任制尚未興起的時候，周老師在「民主的方向」一文中，就提出中國民主的方向在農村，主要是給予農民的自主權。同一作者，在與胡喬木商榷一文中，側重是談不可低估「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以及從根本上鏟除「四人幫」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的重大問題。實踐證明，這是二篇有見地的好文章。

3. 當短途、長途販運還被列為打擊對象的時候，湯戈旦的文章專論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的文章，無疑是大膽的。

4. 當許多人仍然認為只有全民所有制，才是唯一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時候，王冲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的「論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前途和發展」等文章，無疑也是大膽的。

5. 當社會上仍然有人在報紙上鼓吹「大河沒水小河乾」的「大鍋飯」理論時，「四五論壇」鮮明地提出了「大河沒水小河乾」不但合乎自然規律，也不合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只有富民才能富國，從根本上否定了那種流行有一百多年的「富國窮民」的理論。三年之後，「小河沒水大河乾」的說法才被人們所普遍接



「四五論壇」曾提出政府應保護和鼓勵人民在經濟上的自主和合法競爭的權利，與後來中共的某些改革內容一樣，但「四五論壇」却被封禁了。圖為大陸一烤鴨攤。

受。

6. 當社會上有些青年人，對西方自由和民主有一些模糊認識的時候，「四五論壇」發表了「美國是民主樂園嗎？」等文章，重申了一個老口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必要的。

7. 當社會上一些守舊的人對青年的服飾變化，大肆討伐的時候，「四五論壇」發表諷刺小品，予以回敬，也是必要的。這個問題經過幾個回合，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報」作了結論：「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大的社會變革往往是和生活方式的變革聯在一起的。」「有人甚至把一些現代的生活方式，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來批判。這就妨礙

人們，尤其是青年的消費積極性，限制生產的發展。」

8. 當時提出的工資應改為三部分組成：逐年增長的基本工資、崗位工資和獎勵工資。現在這方案已逐步在一些改革先行的單位成爲現實。

9. 當時提出的經濟上應保護、鼓勵合法競爭的原則，八四年七月九日「人民日報」肯定地說：「唯有競爭出活力。這一條，要得到確認。」

10. 當時發表的十幾萬字的長篇文章「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七十年代初寫的作品。作者原本是獻給毛澤東的赤誠禮物。沒想到，不但沒能獻上，還把他作爲「反革命份子」關了起來，在獄中身體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疤，「四人幫」倒台後被釋放。這篇文章，雖然尚未脫出毛澤東的某些理論的窠臼，但它的意義在於，作者實質上是建議毛澤東放棄「文化大革命」，來進行「體制改革」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對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作了一些設想。從這個意義上看，這篇文章在現今也有一定積極的意義。「對於探索真理的認識運動來說，「異端」那怕只有滄海之一粟般的眞理性認識，也比墨守陳規的思想有價值，因爲後者無益於社會的進步。」（摘自「人民日報」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關於「異端」的斷想》）

僅憑記憶，就回顧這些吧。

實踐既然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要有那麼一點點實事求是的精神，也不會把主辦這樣的「四五論壇」的徐文立定爲反革命份子的！

作爲一個兒子，面對祖國和人民，我是無愧色的。

今天的我，是不求有功，但求無罪，就心

滿意足了。

今天的我，更多的不是欣慰，而是悲哀，一份雜誌和人一樣，它的生命鐘有了提前量，它的結局往往是可悲的。

最後一次接見外國記者

八〇年初，我最後一次接見的外國記者，是英國國家電視台（BBC）的記者，與他同來的是一個攝影錄音小組。根據法國和美國記者的事先聯繫，原定採訪有關「四五論壇」的一般情況。但是BBC電視台的記者要了一個滑頭，完全超出原定內容，提出了許多敏感而又棘手問題，採取先通過翻譯一問一答的方式進行（即記者問，翻譯翻譯，再記者問，我答覆）。該記者仍嫌不夠刺激，乾脆用無考慮時間的一問一答方式進行（即記者先對翻譯說，翻譯翻譯後，我就答覆）。雖然，事後我對原聯繫的法、美記者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們紛紛表示道歉。可是，當時我是十分從容地應付了他們的挑戰。我的答覆，引得他們一次又一次的驚訝和贊嘆。他們臨行時，特別是攝影組的小伙子們一再向我表示祝福。事後，我估計他們這樣作，主要想得到更眞實的第一手資料，倒沒有什麼其他惡意。

譬如他們問我：您對魏京生等人的被捕、判刑有何看法？

我告訴他們：應該說，魏京生等人的被捕、判刑，有關當局在作法上雖有許多缺陷和錯誤，但還是注意按法律規定進行的，這說明我國法制在進步，這一點值得肯定。應該看到，從人治到法治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至于對魏案的判決，我有公開評論，我認爲判決是不公平的，在此不準備再重複這些內容了。

他們又問：辦民刊的據說多數人都被捕了，您爲什麼沒有被捕？您認爲您會被捕嗎？

我答道：據我知道辦民刊的人不是多數人都被捕了，而是大多數人沒有被捕，被捕的是少數。至于我爲什麼至今還沒有被捕，這不是我能決定的，如果記者先生有興趣，可以向我國的有關當局去了解這一點。不過，一個人的五隻手指頭伸出來，都不一般齊嘛，總不會都一個樣。我會不會被捕呢？我看有這種可能性。政治上引起誤解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我被捕是完全可能的。既然是誤解嘛，我想也就一定能得到公正的解決。

談話第二次被竊錄

「四五論壇」停刊後閒散多了，但思想并不平靜。各種消息不斷紛至沓來：什麼有人仍想效法毛澤東集黨、政、軍于一身哪；什麼「你辦事，我放心」的眞僞哪；什麼「十來個大慶」哪；什麼「南水北調」缺乏論證哪；什麼寶鋼決策中有失誤哪；什麼一米七軋機沒有設計電源哪；什麼做壽問題哪；什麼中日友好船的問題哪等等，攪得我憂慮不堪，特別是「凡是派」與改革派的爭鬥，以及重大決策上的失誤又不能及時發現和糾正這一點，再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任何憂國憂民的人，思慮的重點都不在問題的表象，而在于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和解決辦法的探究上。

眞怪啊！莫非「晝夜不眠的苦戰，席地而臥的夜晚，簡易沙發上的瞌睡，人刻手推的印刷，提心吊膽的辦刊」，還沒把人折騰夠？莫非「上求索」眞要「九死而不悔」？……

儘管，後來事實說明個別消息不盡準確，

甚至是誤傳，可多數還是準確的事實，這些大道不暢，小道風行的消息，足以讓人憂慮無窮……

正當此時廣州王希哲、青島孫維邦，先後來信希望來京看看談談，我表示歡迎。

要接待二個人的住宿，我是有困難的，只好委託陳德堯代爲辦理，我和陳是在「牆」前相識的。一次出售「四五論壇」十分擁擠，以至將公共汽車場的門口堵塞，我立刻要求停止出售，并引導讀者讓開汽車場出口，向東排成一行。當時我大聲地向搶購的讀者宣傳：「我們既是擁護民主，又擁護法制的，那我們就應該模範遵守交通規則，不能影響汽車的通行，請諸位多多幫忙，向東排成一行，按順序出售，謝謝大家了！」這番話，事後很得陳的讚揚，這正是我的弱點：容易接受所謂的合情合理的讚揚或恭維，甚至有共同的合情合理的見解者爲朋友，且信人不疑。

誰知，陳在甘家口旅館爲王、孫安排的住宿處，又是一個陷阱。我們這類人也防不測，但又很不善于保護自己。陳告訴我，這是他爲外地採購員預定的旅館，他們尚未到，我們可以先頂他們的名字住幾天。這就是後來在法庭上所謂「化名」住旅館的由來，我當然也據實辯駁。

這一次，我藉機向他們二個人，談了我有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否試行無產階級兩黨制和多黨制的設想。

大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1. 蘇聯的教訓和中國的教訓，我認爲都是社會對執政黨缺少有效的群眾監督，因而重大的決策上的錯誤不可能及時發現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至給無產階級事業帶來重大損失。「四人幫」倒台之後，這類問題仍未解決。既然

一九七九年，北京民運人士在西單民主牆前發售民刊。



資產階級可以用兩黨制或多黨制來調整內部的階級關係，以利于資產階級的統治，爲什麼無產階級不可能更自覺地應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原理，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認爲，打開這個大門的鎖匙，就是突破一黨制，在社會主義國家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我們知道，西歐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已經公開宣稱，當他們掌權之後，一定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我覺得，這把金

色的鎖匙已經在我們的眼前晃動，但歷史的老人並沒有把鎖匙交到我們手中。所以，我對此并無把握，希望聽聽他們的意見。

2. 如果要搞無產階級兩黨制、多黨制，是不是可以考慮先搞一個「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

3. 如果要搞「同盟」一定要公開，決不搞秘密的，要公開向中國共產黨打招呼，向政府註冊登記。但是考慮到我國一向對組織問題十分敏感，那麼在籌備的過程中要保密，要突然出現。

4. 如果要搞「同盟」，特別重要的是，要向中國共產黨充分說明，這樣做對中國共產黨只有好處，而不會有害處，「同盟」的目的是促進，決不會反對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5. 在談話中我還向他們介紹了我所了解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情況。據我了解胡耀邦在領導科學院工作時，「五子登科」，（住家房子、入托孩子、上班車子、煤氣爐子、解決兩地分居的妻子等問題。）很得人心，是個體察民情的幹部，有可能出任黨的總書記，但華正全力阻止。新任的趙紫陽在四川工作是得民心的，有幹勁和魄力，注重實際。談話中雖然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但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關於「同盟」的設想，王、孫聽罷一致表示當時不宜考慮這個問題。這次討論，就在當天晚上作罷了。後二個晚上是一些朋友見面，互相介紹介紹情況。

但，考慮到需要加強思想上的溝通，王、孫同意輪流辦一個「學習通訊」。通訊實際出了五期，第一期是一份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提綱和書目，另三期由我、王、孫各辦一期，第五期由南京徐水良辦的，我并未見到，就被捕了。

這是回憶的大致內容，可以與真實的錄音材料相對照，不難看出這次討論絲毫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和行為，只是一次有關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探索性討論，而且未形成任何實際的結果。

所以，當事後不久，我知道這次談話已被有關部門錄了音，我絲毫沒有什麼驚慌和不安，甚至當時都沒有認真想一想是怎麼讓人家竊錄的，以至以後再次上當。當時甚至天真地認為，有錄音也好，正好說明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主義，沒有錄音反倒說不清，反倒容易被人歪曲為組織反革命組織等等。却沒有深想，錄音也是可以刪改、歪曲的，也是可以作為捏造錄音的「可靠依據」的。罪名事過境遷，我就漸漸的淡忘了，以至預審中，我說什麼也想不起來，這次討論是在哪月哪日，預審員一定認為我是裝的。然而，這段歷史對於我，則已成爲過去，又沒有形成實際上的成果，記着它有什麼用。何況，我知道有現場錄音、錄像和各種記錄，完全沒有必要在這個細節上裝糊塗，可能後來，他們已相信我是忘了，才提醒我那是八〇年六月十日的事情。

預審中我又知道，他們居然「細心」到，我和家屬陪孫維邦等人到香山去玩時的歡聲笑語，也由姓陳的錄音下來，去邀功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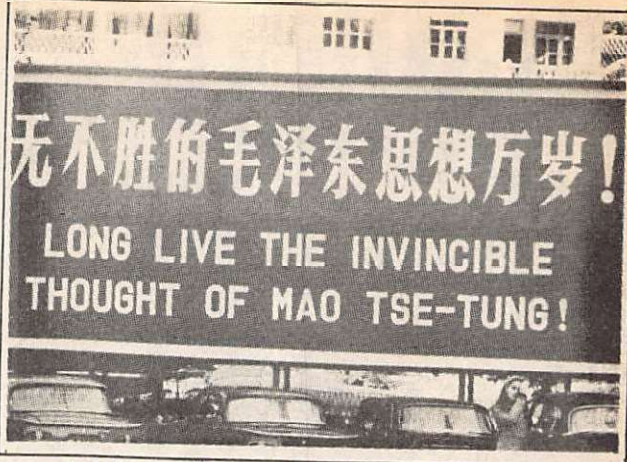
庚申上書

八〇年下半年，我除了向香港的《觀察家》投了以南客、客卿署名的二篇文章以外，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中共中央上了一份庚申改革的建議書。

年底據聞，在中央的「凡是派」破產了，改革派佔了上風，我心裏十分高興，感到國家有了希望，隨即寫了這份建議書，其結果又是泥牛入海。

記得庚申上書的主要點有這樣一些：

1. 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作爲人類迄今爲止最科學、最完整的體系，繼續作爲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無容疑義的。但是世界是無窮盡的繁複，并不斷地向前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曾一再聲明，他們並沒有窮盡真理。我們也不應該要求一百多年前產生的馬克思主義，把今天的世界對理論的要求，以至千萬年後的世界對真理的探索，都已全部預知或預告。事實上，當今世界上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裏，爲全人類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全新的理論和知識。如對現代社會有指導意義的《信息論》的作者，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虛心而又坦白地宣稱，他接受過馬克思對他的啓發，對他形成新的理論有巨大影響。在這一點上，難道我們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應該比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更不保守、更不僵化嗎？而更會在繼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完善它，發展它，同時也不拒絕吸收人類一切新鮮的經驗和理論，爲建設社會主義服務。鑒於中國社會曾大大地吃過「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片面性的惡果。因此，我建議黨中央公開宣佈，在確立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不搞獨尊，而提倡「博採衆家」，廣泛地學習和吸收全人類一切先進的思想和成果。然而有些人由於輕視整個文化積累的功能，儘管也學習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按說他應該講唯物論，而在實際上充滿着唯心論；按說他應該實行辯證法，



共產黨人一貫自稱為歷史唯物主義者，但中共却搞了幾十年政治上的行而上學、個人迷信、唯英雄史觀。

而在實際上却處處表現為行而上學；按說他應該主張歷史唯物史觀，而在實際上却專搞個人迷信，搞唯英雄史觀。

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趙紫陽對華人學者專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講話，我是非常贊成的。他說：「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要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凡是符合這些要求的政策我們就採取，否則就擯棄，不受任何模式、任何規定和原則的束縛。這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的重大意義所在。」

2. 明確教育作為我國現代化事業的基礎。
3.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明確無論大小企業一律逐步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體制，使

企業既有活力，又有壓力。

4. 為鞏固農村改革的成果，儘早頒布新的土地法規。農業問題歸根到底是個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徹底解決，在一定條件下，難免承包戶不搞掠奪式經營。

5. 壓縮現役兵員，提高部隊素質，逐步增加嚴格軍事文化技術訓練的職業軍人充任軍隊的骨幹。

6. 逐步實行收取公民個人所得稅制度，以調整人民內部的經濟關係。人們終將明白，勞動致富，一定要將一些人先富起來，允許有差距，但不可能允許差距越大越好。在保護合理的差別和差距的同時，也要注意保護先天的弱者，這是客觀存在。

另外，只有採取收取公民個人所得稅，才有可能使每個人客觀地認識自己的社會價值，增強社會責任感和當家作主的迫切願望。

7. 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國勞動力必然過剩，又鑒於我國幼童和青少年，在家庭和校外缺乏教養的情況相當嚴重，常此以往下去，不能不影響我們整個民族的人口品質。我認為應該在自願的原則下，允許女職工實行半日工作制。反對男女平等是錯誤的，不承認男女天然差異也不全面。應該承認，有人類的全部歷史，早已向人們顯示了，婦女在教養後代方面，有着先天的優越性。一些家庭負擔很重的女工，對那種空喊「婦女解放」，而不從實際上關心她們、幫助她們的那一套，十分厭惡。據我了解她們中很多人都很想學習一些家政、育童的知識，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的精力更多一點。這對維護一個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也有深遠意義。

談話第三次被竊報

八〇年底，我考慮到中國不論大陸還是台灣，以民刊為主的民主運動處境都十分困難，恐怕都與議政過多有點關係，這不是它的過失，但在目前中國政治情勢下，總是難以為執政者接受。我想如果兩岸的民主運動都能把自己的重點放在促進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上，恐怕是一舉數得的好事。於是，我請劉二安徵求了孫維邦的同意，就開始着手醞釀這件事。本不想要孫來京面談，可年初（八一年）他有空閒，一面想來京完成新創的刊物「一人」，并想推銷點海蕓為辦刊物籌些經費，他來到北京。一天，我陪他去看電影，散場後我想既然他來了，就再當面談一下。那天正巧陳德堯也隨同看電影，他邀我們上他家談話，我嫌遠，就選了宣武公園坐坐。

我談的主要內容是：

1. 和平統一祖國，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大陸和台灣的民主運動，可以通過香港為「中介」，再將海外愛國人士聯合在一起，為這一大業作點貢獻。是否可以組織一個「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來辦這件事。促進民主進程，促進和平統一，這就是它的宗旨，它是一個民間的群眾團體。

2. 考慮到國共兩黨積怨甚深，誰也怕對方企圖吃掉自己，特別是國民黨方面。那麼國共的談判，祖國的和平統一，都需要一個媒介，一座橋樑，這就是「促進會」的作用所在。同時，中國的民主運動也可以從中得到發展。

3. 有關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的一些具體建議和設想。

4. 考慮到大陸、台灣民主運動的處境都不好，又要聯合搞「促進會」，所以它的初期處

境將會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設想，可否將總部設在香港，對於國共雙方都鞭長莫及，又便于聯繫海外僑胞和籌集經費，尋求支持。

5. 對於台灣方面的民主運動不十分了解，知道陳鼓應是贊成社會主義的，似可作為主要聯繫對象；麟祥（？）比較穩健，影響比較大，也可聯繫；美麗島雜誌那些人情況，可能複雜一些，可能有台獨的成份，聯繫上要慎重。（這些人報紙上，都一再公認為台灣的民主人士，可判決書却稱他們為反華、反共分子，真是實用到極點！）

6. 要搞的「促進會」決不是秘密組織，一旦醞釀成熟，立即向國共雙方申報註冊，要求承認和支持。

可惜這一番對祖國的苦心和好意，又被陳德堯密報上去，肆意歪曲，為我種下了更大的禍根。

火災

這也是一場本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在八一年春節的前十幾天，晚上的七點多鐘。

當時我和妻、女兒、老母親正在陪妻的女朋友和孩子吃晚飯。火起于我家正上方的三層樓上。三層樓這大單元裡，住了三戶警察，屬鐵路公安分處。肇事者是一位老警察，姓張，五十開外，在公安刑警隊幹了二十多年了；另二位都三十多歲，一位是女的，打字員；另一位是幹警，妻子任廠醫。

老張圖點小便宜，讓大兒子從房山「石化」，用大轎車捎來廠出的煤氣罐，一大罐才五毛錢，當然不包括那大轎車，每次專程或順道所耗的汽油費。這次的罐與市內煤氣爐的管口不合扣，老張不死心，仍想使用，亂擰上幾扣

，便試火，火卻從接口處着了起來。剎間，煤氣罐成了噴火的火焰噴射器，老張不懂擰死瓶口即可滅火，却急忙回屋拿被來捂，不想忙中出錯，將瓶捫倒，氣化液流出，火面騰起。這時，他驚恐了，蹣跚着雙鞋就往外跑，一連催促老伴抱着孫子，二個男孩、一個女孩，向樓外跑去，一邊嘴裏失聲地喊着：「快！快！快！快救火！」

我聞聲竄了出去，上樓時，那位肇事者正狂奔下樓，然後光着雙腳，帶着全家一直站在樓下呆看着。

和我同上來幾個人，開始用臉盆接水潑，猶如揚湯止沸。我奔向大門口拖來一根水管，也無濟于事。這時我們和老張一樣不動腦筋，其實只要衝進去把瓶口擰死或扔出窗外，即可化險為夷，不動腦筋真是誤事！

火勢愈來愈猛烈，煤氣烟火已噙得人快窒息了，人們紛紛下樓，我只見一黑影衝了進去，瞬刻抱着一物跑下去，并大聲喊道：「誰家的電視，你們怎麼什麼都不要了呢？」老張一看不正是自家的嗎，連忙去接這全家唯一「遺物」。此時此刻，真不知這位終年一身警服或警便服的老警察，面對着這位曾被他視為「小流氓」的青年作何感想，其實這青年就多穿了一條喇叭褲子！那位女警察想起了自家的電視，她聽小伙子說，煤氣輕，浮漂在上層，他是彎着腰進去的。她有點發狂了，丈夫說：「那是身外之物！」她不聽，衝了進去，居然一個人抱起了平時二個人，才抬得動的二十四吋電視下來了，這也是唯一「遺產」。頂數那位去報火警的中年幹警最慘，夫妻倆一個兒子一齊跑往門衛，連手表都沒帶出來。事後，夫妻倆只穿件毛衣也不知冷，都木了、傻了，幸虧他妻子在工廠頗有人緣，千把人為這位廠醫捐獻

了一千多元，救了他們的急。

我無可奈何地下來時候，消防隊的救火車趕到了。火勢主要還在三樓的廚房，火焰剛開始從單元門往外竄，如果消防隊此刻能即時撲滅火源，仍不至釀成大禍。可是消防隊也只懂向火源噴水，一會兒二車水就用光了，他們居然找不到消防水栓，我連忙奔波幫助去找。救火車越來越多，聽說有四個中隊，一輛接一輛，已經排了一千多米長，從院裏排到水電部，聽說最多時排到白廣路電影院。火勢却絲毫沒有減弱，又起風了，風助火威，整個單元的七間房已全燒着。這時我發現消防隊只顧噴水，而沒有切斷火路。這木結構的房頂是連成一氣的，夾雜着煤氣的火被水一噴更向頂棚蔓延。我也急成了一團火，大聲喊叫：「快去切斷火路，上房！上房！切斷火路！」我身旁的小指揮根本不聽我的建議，并指着大指揮說：「我們得聽他的。」我又奔向那大指揮，對他解釋，他仍不領悟。難怪有人說我有野心哩，這時的我很不得從這大指揮手中奪過他那指揮話筒，這個笨蛋！瞎指揮！只知道噴水、噴水再噴水！

火不停地向東撲去，片刻又燒了一個單元的六間房。這時消防隊才上了屋頂，揭瓦、砍樑，噴水斷火路。又三家被火吞噬了。西樓三層的住戶和樓頂上的消防隊員正看熱鬧。真是天有不測風雲，火正向東進軍的時候，風突然轉向，由東向西刮去，西樓的人們慌亂之際，火苗順着頂棚立即向西竄。火路又未預先切斷，西樓頂上的消防隊員們正在「一切行動聽指揮」哩！風更大了，不到一刻鐘，西樓二個單元的十三間房子也成了一片火海，住戶的財物搶下的甚少，比我們南樓的受災戶強不了多少。最後火總算被切斷在西樓與北樓交接處了。

救火的水龍已從「八一影廠」宿舍、六六中操場向火海噴去。

這時，我又儼然以一個「指揮員」的姿態去找來幾個小伙子，讓他們看守樓口，以防有人趁虛而入。

火勢在減弱，我這才發現妻站在我身旁，告訴我，她女友帶孩子走了，母親和女兒安置在別人家。妻一見我就痛哭起來，哭得像個孩子。她很內向，性格堅強，極少哭。那次與瀾別三十餘年的哥哥見面，我一面向她大哥哥說她悲哀的童年，一面禁不住淚淋滿襟，她却一滴淚也沒有，好像不是說她的童年。也許剛見面那一刻已經把淚水哭乾了；也許過度悲哀，麻木的心是冷的，冷得將淚凝固。這時的她，却抬着淚眼向我說：「立，咱家就這樣完啦？」她是就心那辛辛苦苦積攢了十年的家。哦，那會傾注給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的母親的最大的愛，隨着母親的去世，已經完全轉移到這個家上來了。這就是寄托，人沒了寄托才是悲哀啊！我笑了，安慰她：「不會的，絕對不會的，火再大也燒不透樓板，頂多被水泡了。」她釋然了。

火熄滅了，三、四樓門一片漆黑。人們看着我，我明白了。妻問我：「能行嗎？」是啊，到處是水，地上是水加濘泥。我答她：「沒問題。」我心裏想：不然還算什麼電工！先摘掉了綫路上的荷載，找來幾個乾椅子，登上院中的抗震棚，用鉗子刁着掐斷的電源綫，接火、按閘、復明。

回到家裏一看，水深過膝，向外掏水吧。水繼續從樓板上流下來，上面殘存的牆垣與樓板成了小水庫，儲滿了不計成本的水。各家顧各家，只知道向外掏水，千篇一律。是啊！不能怪這些善良的人們，中國人多少年來腦細胞已



中共不取消「四個堅持」又要人們「解放思想」，豈不就如籠中放鳥，欲得「解放」難矣！

經壓縮扁了。愛思想就可能被議論，就可能冒尖，冒尖就可能被槍打「出頭鳥」。隨大溜最安全，早滂保收，別說小小老百姓了，那些大幹部、名學者、文化人也都彼此彼此嘛！許是大禹的遺傳因子，在幾千年後仍然起作用吧，我這個「異教徒」沒戴什麼帽子，反正也差不多。我就大着胆子想了一想：上邊小水庫不消除，水最終也能掏乾淨，時間可就長了，傢俱更要挨淋。我充分地利用了，自己在左鄰右舍中還有那麼一點小小的信譽，動員每家出一個勞力到樓頂上，在瓦礫中開渠、鑿穿

殘牆，先排小水庫的水。妻和我并肩在樓頂，陸續又上來幾個人。東方吐白，上水洩盡，下水也自然枯竭。

這段往事常常促使我想到許多許多，甚至想寫點什麼。那位貪圖小利，臨陣脫逃的老刑警不值得人們深思，那是一目了然的，值得人們深思的倒是這位刑警和那位穿喇叭褲的青年的對照。當然，更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平常人的無知和消防隊的無知是多麼的可怕！房子被燒二十六間，九戶的財產蕩然無存。三樓程家每年布票買的布，捨不得給孩子年年做新衣，存了整整二鎊柜，也毀于這一旦，這是三十年的積財啊！還有三戶也所剩無幾，整個損失折合多少人民幣，事後并無人統計，經驗教訓的總結仍然是走走形式。浪費啊，浪費，火災是浪費，形式主義更是不應該的長期浪費！

不知人們想過沒有，對於消防隊的首要的教育不再應該是什麼「不怕死」的教育，「輕傷不下火綫」的總結，首要的是消防滅火的知識和技術。不知人們想過沒有，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是骨子裏是胆小怕死的人，你再教育，到關鍵時刻，他也還是難以衝鋒陷陣；血性方剛的人，甚至不必什麼教育，到關鍵時刻，他也会挺身而出，你按都按不住他；教育只對介乎于這二者之間的人最起作用，對前二者當然也并非一點不起作用。一再的事實，使我確信這一點。不然，人類社會迄今不會有火，也不會使用火，藝術上也就不創造不出「普羅米修斯」這個形象。在那原始的狀態中，誰教育誰啊？當火災侵襲他們的野居地時，也必然有逃跑者、觀望者、救火者。救火者：救伴侶、救嬰兒、救簡單的生存財產。不正是在這「救與逃」之間，人們挑選了救火者為首領嗎？不正是這些首領們在救火的實踐中，把火「盜」到

他無言。

一盒錄音帶

人間，使人類脫離茹毛飲血的境地嗎？教育固然重要，人的天生本性恐怕不能簡單否認。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人的常識教育，技能教育，技術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更重要。人類不就是隨着征服大自然的領的增強，才更聰明、更理智、更大的嗎？人們啊，該多思啊！

簡單地否定一場錯誤不難作到，大至文化大革命，小至一場火災；深刻的反思更需要，更難做到。不要怕七嘴八舌，政見不同。不用政治家去教導思想家、文學家應該怎樣，或不應該怎樣思索。（不包括必要的互相的平等的批評。）權力有些時候，使人們反而更笨、更愚蠢。人們是會學會用非暴力的手段來自我教育的，只要不把不同政見都視為異己、仇敵。平等相待吧，朋友們！在防止暴力、動亂的同時，讓人們開動腦筋，暢所欲言吧。

說這些幹什麼？又得罪多少人啊？

命運對「異教徒」總是嚴峻的。

預審後期，一次「閑談」之中，預審員似乎想幫我總結經驗教訓吧，因而需要追索思想根源，因為他們一貫的作法都是這樣的，於是這位預審員第一次相當露骨地說我有野心。

我「哼」一笑。不由地把這場火災中的我的作為當成「評功擺好」的依據，並「囂張」地問：「按照你一貫的基本思路，有野心，必然自私，自私必然膽小，那我這個有野心的膽小鬼，怎麼會不顧自己的家小去救火呢？」

他毫不費力地就擋了回來，冷冷地說：「那是怕火燒了你的家！」

我「哼」在鼻中，「小人！」在口中。我只得告訴他：「失火在三樓，隔着厚厚的樓板，根本燒不到我的家。若真是怕燒到我家，我更應該首先搶搬自己的家財，安頓自己的老母和小女兒啊？」

八一年三月份，安陽的劉二安托人帶來一盤他講話的錄音帶，讓我也把要講的話錄上帶回。我記得有二點：1我認爲現在取消民刊，是對民刊的誤解，這樣作對民刊是不公平的。2我對劉二安拿我與波蘭的瓦文薩相提並論，我認爲不妥當，我無法和瓦文薩相比，希望他今後不要這樣作。我不喜歡別人這樣恭維自己，我會覺得不自在。

在劉二安受審查期間，他交出了這錄音帶，我並不責怪他，他有他的處境和自由。

拘禁

俗話說禍不單行。人們生活起來，倒也不提着心、吊着膽地盼着那禍成雙。可也怪，也可能是鬼使神差，我却在火災之後，不知不覺地在做着預防禍成雙的準備。

失火後，妻的大哥寄來錢，我湊上賣舊錶的錢，給孩子買一輛五羊牌小自行車，許是怕她日後的條件比不上人家？緊接着，借錢買了電視機，許是想今後什麼也不幹了，該娛樂娛樂了；許是怕小女兒到人家看電視，再受委屈？要知道現在想着一場好電視（這兒星期六、日反而不讓看，看也看不上好片子）這樣難，當時在家該多看幾眼啊！

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這樣緊鑼密鼓地在準備着，好像要到那裡去一樣……

四月一來，清明節就要到，又是抓人的季節來了。果然，要抓人的風，一天緊似一天。民刊的「激進派」又要進京向人大常委會進言

，要求撤回內部禁令，給民刊以合法地位。他們想讓我爲代表，我心想這些人真不了解某些人的脾氣，一旦定下來，變不了，偌大中國二、三個人請願，毫無用處，只能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更爲抓人提供藉口。

四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我一早先到天安門，向紀念碑前的週羅克像獻了提詞牌。然後，奔妻的學校去油漆那個請人打的寫字台，總愛「胡思亂寫」的人，混了三十年了，竟沒有一張寫字的台子，還妄談憂國憂民，豈不可悲、可憐！

傍晚，又携妻女拜謁烈士紀念碑。

七日晚下班到家，女兒對我說：「爸，我們要春遊啦！」

「哦，這可是第一次，要交錢吧？」真沒辦法，這窮人的共病，怕提錢，凡事又最先得要花錢。

「爸，要交七毛錢，看，我這都準備好啦！」她小手握着一個小包，滿是「鋼貝兒」。

我一怔，眼圍立刻濕潤了，這懂事的孩子，看透了這窮爸爸的口袋又是空的了。

我苦笑了笑：「那能用你的錢，拿去。」

掏出僅有的一元，充硬，慷慨。

晚上等孩子睡下，我告訴妻，妻很爲自己生了這樣懂事的閨女自豪。自豪感尚未從臉上消失，就遇上了我的故技重演。

「妳還有錢嗎？」她自然明白，又是讓她「繳械」，也習慣了，最困難的時候，每月初從我這兒接過五元錢，月底能交出四塊八，甚至五塊整，一根冰棒都捨不得吃，和「鄉音」的女主人公一樣「徹底投降」。

「有，這二毛，全給你，我還有飯票。」

毫不費力就「繳械」。

第二天又「偷」了晶兒小匣的四個五分「

鋼貝兒」，八號這頓午飯總得應付啊，還好，剩了一毛五分錢壓兜。

這一天，我可真有點窮急了，真是「圖窮七首見」。我對班長說：「快讓工長發錢吧，今天都幾號了，過了六、七天了！」我指的是獎金和午餐費、交通補貼的十幾元錢，過去總是月初發。

九號一早發了下來，下班直奔東單，像個腰纏萬貫的富翁似地採購：奶油卷、巧克力、香腸、話梅、桔汁、水果，家有茶葉蛋，對得起女兒了！

「嘿！咱們的小女兒，多美啊！咱小時候春遊，妳婆給烙張糖餅就得了！」

我得意了。吃飯、看報、給女兒裝書包、兌桔汁、裝餅，十一點多睡下。

妻讓我自立門戶。

差十幾分鐘十二點。「咚咚咚！」「咚咚咚！」我心裡明白，開門。

「開燈！」幸好各立門戶，立刻開了燈。「穿衣服！」

「爸，怎麼啦？」女兒在夢中問我，我忙答：「沒什麼，乖，好睡，沒事。」可憐的小機靈又昏睡過去。決不能讓她擔心受怕。

門口十幾位穿着警服和便服的攔在門口，無語，我亦無語。

穿衣，一想不能穿皮鞋，到那兒還要跑跑步，身體不能垮。伸手拿鞋盒，恰是「懶漢膠鞋」，二塊錢一雙，購於菜市口委託商店。

妻穿着她母親的一件舊灰襯衣（不是絲睡裙，也不是緞睡袍），今天要拿到委託，人家都不收，我這個作丈夫的！她雙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把我緊緊留在腦中，無語。她知道我愛用手帕，從床沿上拿過一方晾乾的手帕，疊好交我。我交她那塊大哥送的金壳錶，扣好風紀

扣。

「請出示證件。」我說。

「這是拘留證。」我並不須看。上銬。「卡、卡」鎂光燈閃了兩下。

無聲，離家。門外還有二十多位警察。永定門工區的單身漢也都聞聲而起，觀望。我心想：「在這兒抓我，對他們太有利了。要在白廣路，就是我不吱聲，那些鄰居也會圍得他們水洩不通，雖然說話的人倒不一定有。」我是早已想好，此時此刻是不必說什麼的。在內情極為閉塞的國度，除了像譚嗣同有必要以血喚醒民衆之外，搞什麼「付代價、無效果」的抗議、絕食等等，都是愚不可及，不如從容鎮靜地應付這一切，更讓人去思。何況，時代畢竟不同了。電影裡那一套必竟是電影。

一路無語，一青年便衣問我：「銬子緊不緊？」我搖搖頭。

到了牛步橋四四號下車，又是一陣閃光燈。早有人接、搜身、登記物品、簽字、入監。這時，我對那位後來的「主持」預審員說了一句話：「明天，我的孩子學校組織春遊，我希望你們不要影響她前去。」

「這個我們不管。去，我們不會干涉；不去，我們不會鼓勵。」答得不冷不熱，我不再語。無事懸心，心很安。

入二街十四號，電動門，單人，給了一褥一被，據說一般人不給褥子，並說：「被子不夠，明兒再說。」也再沒人來說。有點冷，剛停暖氣，和衣躺下，似乎想了什麼，又似乎沒想什麼，到天明。第二天搬九號，三人同住，難友供一棉大衣，足矣。

預審員們

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個月的預審，這在我國司法實踐上不算長的。過了二百多堂，這可能算多的有點出奇。頭一個月幾乎每天三堂：早、午、晚。每次二小時左右，不誤開飯，偶誤睡覺，每日有午睡，覺是充足的。

我共接觸過七個預審員，「真人」們均不露姓。

「主管」是一位白臉、勾鼻勾眼、薄嘴唇、斯文、持重、陰沉，五十開外。他是屬於「我說你有罪，你就不會沒有罪。順我者寬大，逆我者嚴懲」那類人。估計是位處長或副處長。

「主持」是接我的那位：戴眼鏡、欣長、精瘦，他是實現「主管」意圖的能手。一次聽人叫他「老張」，我如此稱呼他，他嚇一跳，不知為什麼姓都怕我知道。估計是科長級的。第一天晚上露了一面的胖子，可能也是科長或副科長，在審訊室頗隨便，說話粗俗，日後再沒露面。

還有一個黑瘦子，是個「老油條」，作過幾次記錄，說話更是信口開河：「我們這兒關鍵是看態度。態度好，能從砍頭變無期、有期，甚至釋放；態度不好，就重判，甚至砍頭！」他一個普普通通的預審員就敢作判決的主。這裡層層有否決權，層層有生殺權。

一個小青年，記過幾次錄。

二位三十五、六歲的「常務」預審員，可能畢業於公安學校。

但是，他們——

1 不懂什麼叫「流派」，什麼叫「社會學」。二位「常務」倒還不耻下問，那位「主持」覺得有失身份，連忙搶答：「社會學嘛，就是社會科學！」一語定音，我和二位「常務」



「中國共產黨萬歲」將中共一黨專制的心態表露無遺，難道其它政黨就不應生存嗎？中共若是為人民愛人民的，就應該稱「人民萬歲！」

一起瞠目結舌。

2 不熟悉「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內容。當審到討論「同盟」一事時，我說：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反對過無產階級兩黨制和多黨制，事實上還承認這一點。而且「共產黨宣言」就是為當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

「常務」吃驚，問：「不可能，在哪兒說過？」想考住我。

「在『共產黨宣言』上。」我告訴他。

他忙說：「那更不可能，『共產黨宣言』是我們共產黨的宣言，怎麼會宣傳兩黨制？」他以共產黨的代表自居。

「那可以查。」我慢慢地說。

他費了好長時間，總算找到一本「共產黨宣言」，事先還一定翻了翻，所以一回來就以勝利者的口吻質問我：「這，哪裡有啊？」

「別忙。」我翻到「宣言」中「共產黨與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那一部份。告訴他就在這兒：「馬克思明確地在這裡說，共產黨並不排斥其他工人階級的政黨，這就是說，馬克思本人沒有用共產黨的存在，來排斥和反對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存在；並在事實上承認在共產黨之外，可以有其他工人階級的政黨存在。」

「常務」立刻搬來了看家本領：「那是一百多年前說的，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能不考慮時間、地點。」好一個考慮「時間、地點」，怎麼運用的這樣靈活！怎麼不再誇口「共產黨宣言」是屬於他的了。反而搬來「國情論」，他恐怕還不知道當年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就唱過「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論！

3. 不懂什麼叫社會主義。在一次「閑談」

中，我問「常務」：你們認為我是反社會主義，那請問什麼叫社會主義，你能概括一下嗎？不然，怎麼知道我反對社會主義呢？

「嗯……，我們這兒不搞學術討論，我不跟你討論這個問題。」他有點氣急敗壞。

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頌葵在「無事的悲劇」中說得很生動：有些人「壓根兒還沒有開清什麼叫資本主義，却去反資本主義……，比唐吉訶德同風車作戰還要讓人感到離奇……。」真可笑！

可是，偏偏把我們這些人的生殺予奪的大權交在這些人手中！這可就笑不起來了，特別是搞學術研究的老夫子的命運可能就更可悲。悲哀啊！我相信，這決不是僅僅幾十個人的悲哀，說是全民族的悲哀並不誇大！

天津的老先生湯戈且，二十年代入黨，因被捕失掉組織關係。解放後，不但未能恢復黨員身份，反而幾遭整肅，他並不灰心，心仍向着黨，自費專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鍥而不捨。他確認建設社會主義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商品經濟，缺了這一課，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更別說建設共產主義了。他的這些思想和文章，長期得不到確認和發表，還備受排斥，只能與孫冶方、薛暮橋、于光遠進行書信探討。這樣的人，要是落在不知「流派」、「社會學」為何物者手裡，更是有理說不清了！

這就有點像，你讓一位酒家老闆去評判「安娜·卡列尼娜」，你很難不讓他告訴你：「這是一本淫書！」

今天的湯老的命運又該如何呢？十二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並行不悖的。又明確：要大力促進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可是，孫冶方去世了，健在的薛先生、于先生可肯為湯老說

句公道話啊？不然，可就難了，他「文革」後自己幾經努力，老戰友多方相助，也沒能夠恢復組織關係，落荒在民間，又因文章無處發表逼得和我辦的民刊結了點「親緣」，恐是難逃出此劫的！嗚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學的倡導者。

僵峙到「妥協」

四月十日，剛八點便傳我，劈頭就要我交待違法、犯法的行爲。我也乾脆：「我從來不作違法、犯法的事，你們拘留我，是違反法律的。」僵峙，一上午，又一下午。

晚間，我剛想躺下，又來傳。又僵峙，一個多小時後，我開始閉目不語。只露過一面的那位有點震怒，我連看都不看他，仍閉目不語。

再三催促，我說：「我跟你們不一樣，我是當工人的，九號上一天班，晚上剛躺下，就被你們請到這兒來了，到現在已經一天一宿沒合眼了，我頂不住。」當時的確很困乏，說完又不語，他們無奈，送我回去。

這樣過了一、二天，他們轉換了手法。從此，再不提犯罪違法，連「非法」也不提，一再「誠懇」地表示按九號文件精神辦，把問題講清楚就行了。我這個人就怕軟的，這是個大弱點。

那也好，我心裡有我的原則：

1 我辦民刊和其他活動，從來不是違法的秘密活動，而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活動，沒有什麼不可談。以後他們也不得不或先或後透露了他們掌握情況的程度，對這些我更沒有什麼不可談，甚至談清楚。

2 涉及別人的，我沒有義務談，即使非談

不可的，也以不會給別人造成任何不應有的損害爲限度，微小的可能性也不讓它存在。

3 凡是與我政見有點不合的人，絕對不談。

談，算進行下去了，車轆轆的話，轉着圈地談，一遍再一遍，絲毫達不到他們想達到的目的——提供不存在的事實。「逼、誘、詐」均不能奏效。倒還沒敢動武的。我也不會給他們提供藉口。

他們可能逐漸發現了我的弱點。從「逼」上下手了。先問我，我妻子對我的活動的態度，暗示我，他們不惜把我妻子牽進我的問題中來。開始，我對此訛詐，不予理睬。他們又進一步，露骨地提醒我：「如果我們把你的愛人也抓起來，你有什麼看法。」我怒不可遏：「那就連最起碼的人道也不講了！」

我知道，他們也知道，我妻子對政治毫無興趣，多年運動使她對政治極反感，出於不傷我的自尊心，又憐惜我的「懷才不遇」（實際上叫什麼「才」，不過她還是認爲我是有才的，許是作妻子的偏愛吧！），又深深地愛我，只得縱容我。可是，我從事任何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她均不參加，我也不徵求她的意見，既是避免在中國最不受歡迎的「夫人干政」（其實夫人不干涉政治，但參與政治並無妨，美國憲定總統必須由有配偶者擔任，是科學的，單身漢很難解家庭的問題，而家庭又是迄今爲止的社會的基本細胞。），又是尊重她不喜歡政治的自由。事實上，我的任何重要一點的政治活動，沒有一件是在家裡進行的，在家裡辦刊，也是和我們居室分開的。不要說因爲我，而抓我的妻子，稍有株連她，都是毫無道理的。

可是他們的威脅，我又不不得不認真考慮和

對待，他們是什麼事都可能做出來的。

考慮的結果是，我個人無論做出任何犧牲，也不能讓我無辜的妻子被牽進來，原因是：

1 我妻子從小失去父親，母親被迫回到娘家，倍受歧視，我妻從小也倍受包括親外婆在內的歧視，外婆帶所有孩子上公園，獨獨不帶她。我每聽到此事，說到此事，想到此事，就禁不住要落淚。她母親無奈改嫁，養父是工人，待她不錯，一旦有了親骨肉，總不如親生父，我妻又格外敏感、倔強，從小心靈就這樣受過大的創傷。初中畢業，成績很好，却不能考高中升大學，她痛哭一場。上中專，每天從西城走到南城上學。她從小體弱，上操竟會暈倒。可掙錢了，平日一個錢都捨不得花，全數交給母親。與我結婚，又是苦日子，生活剛剛好一點，又成天爲我辦民刊擔心受怕。她大哥從新加坡來找她，生活寬裕了，她驟然年輕了、漂亮了、神采飛揚了。我却又被捕了。這樣命運倍受波折的妻，我怎麼能讓她無辜受牽連啊！我寧可死，也不能讓她遭此辱。

2 我的二哥「文革」中受審查，二嫂被牽連，才落個自殺或他殺的結局。我記憶猶新，我不能不想到這種可能。

3 更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孩子，才九歲，是女孩，極單純、天真、又敏感。她媽媽要遭不幸，她可怎麼辦？親朋好友，不會不管，畢竟不是自己的父母，即便更細緻、周到，孩子的心裡難免有隔閡。特別是若有不測，孩子出點事，我關在裡邊，那才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我死也不能讓孩子再受更大的委屈。

因此，我寧肯粉身碎骨也不能讓他們的狠毒得逞，「妥協」是可以的，當然必須在一定限度之內。而且，必要的時候一點兒也不妥協！

他們要我軟下來的第一個目的是：搞一點他們掌握的竊聽錄音上所沒有的東西。

1 他們「提醒」我，我在甘家口討論會上說過：要和黨「分庭抗禮」、「平分秋色」。我肯定地答覆：沒有，我沒有用過這樣的詞匯。記錄在案，可供查考。幾次之後，我答覆：記不清楚了，可能有過這個意思。又幾次之後，我答：可能用過這幾個詞，記不準確。即使用過，也沒有任何推翻、打倒的意思。他們不敢再問了，怕這「成果」飛了。

2 他們又「提醒」我，甚至說我用過「取而代之」的字眼。我斷然否認，根本不可能。直到最後的不得已的階段，我承認從思想上認識就是這個意思。這種答覆是很清楚的，這只是一種分析，而不是事實，今後總有搞清楚的那一天。後來，他們在公開場合（不包括他們向上匯報）也不敢再提這一點，法庭上更不敢提這一點。法庭只問我說過「分庭抗禮」嗎？我答覆：不記得用過這個詞，沒有說過。而且這個詞按中國文字的本意，只是指朋友間相見，分庭而立，相互致禮的意思。與「打倒、推翻」的意思根本沾不上邊。

3 他們很明白：有關「同盟」的討論，我們自己否決了；「促進會」是爲了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很難加上「反革命」這頂帽子。他們就想先給討論「同盟」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拿「促進會」作身子，以便定案。於是，千方百計要讓我把討論「同盟」與醞釀「促進會」聯繫起來。我始終未讓他們滿意，因爲這根本不是事實，所以法庭上也未敢提出來，他們向上匯報怎樣說的，就不得而知了。

然後，就在我保存的材料上兜圈子，整整又兜了兩個月，他們也覺得無望了。

轉捕

八月十日升級了，轉逮捕。同時他們重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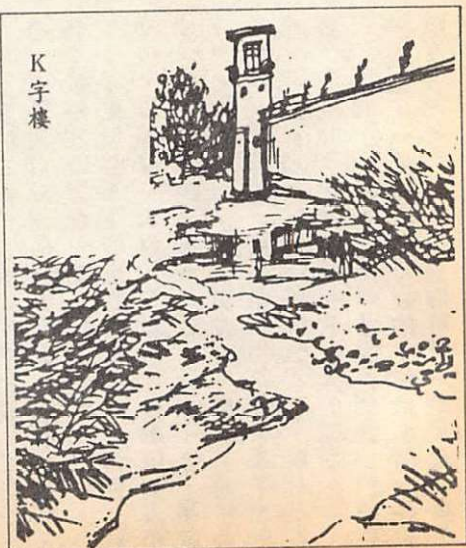
二點：

- 1 仍按九號文件辦，只要談清楚就完了。
- 2 只要交出材料，可以考慮我提出的任何條件。

同時，又拋出一些他們掌握的情況。

我知道遇羅克在最後時刻，曾錯過一個機會。這是他頑強、不苟且的表現。我當時的處境雖沒有那麼嚴重，但我有種種考慮，一定要爭取出去。「文革」中許多老幹部，不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公開宣稱自己是「牛鬼蛇神」嗎？對於不嚴肅的作法，也不必用嚴肅的態度對待之。這是一場滑稽戰，既不是面對階級的敵人，也不是面對民族的敵人，本無氣節而言。只是在嚴肅的場合，才有嚴肅對待之必要。他們要弄我，我也會要弄他們。真象總會搞明白的，但我不願意在黃土中去等這一天的到來，我要親眼看到這一天。只是方法問題，時間早晚的問題。

當時我身體狀況日見虛弱，腰疼的連端盆水都困難了。這個看守所，是不顧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有關中國既不實行「無罪推定」，也不實行「有罪推定」的規定，而在實際上實行的「有罪推定」，這兒的待遇本來只允許稍低於自由人，可是實際上比關押已決犯的監獄、勞改、勞教場所的條件、待遇差得多。每周廿頓，十八頓基本上是清水煮菜、窩窩頭，窩窩頭中間還是硬生麵。每周只有二頓細糧，一頓菜能見油葷。他們又故意不給我小灶待遇，當時關押已久的政治犯都吃小灶，只讓醫生按病號飯（其實按預審需要），給我開小灶。我在K字樓一年另五個月，吃了近五個月小



K字樓

灶。基本上沒有放風，一個月難得放一、二次。一、二個月放一次電影，政治犯唯我不讓去。不能接見，不能通信，沒有書和紙張，用筆對我控制格外嚴。室內有監聽設備，門上有從外向裡的監視孔，掛黑簾。當然裡面人也能想辦法向外看，事物總是兩面的。雖對我不會用暴力，但監所內的打罵聲、電擊聲，時常可聞。有的人已在這兒被耗了好幾年了。預審時限，在這兒根本不起作用。有的人已明顯呈垮象，我很怕被耗在這兒，被拖垮，爲了妻子和孩子也決不能垮在這裡。這兒層層有否決權，想向上反映，根本不可能。

我唯一可以妥協的，就是保存的那些材料。其他的儘管他們不滿意，我都實事求是地談完了。我也知道這是他們最後階段的主要目標。

他們越說什麼：只要交出來，什麼條件都會考慮；交出來，不正說明你沒有問題嗎？等等。轉了二個多月了，他們越是甜言蜜語，就越使我曉得其中有詐。但我也沒有許，有百分之

一希望也試一試；到時候說話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想給人家戴上的圈套，難免不是自己的圈套。

但是，他們不能理解一個正常人的心理，他們說了千句萬句，沒有一句能打動我，他們當然更不願意想到，他們詐我，我也會詐他們的。

其實我當時不交材料主要只有二點障礙，材料之中根本沒有他們想象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相反只有更充分地證明我是無罪的材料，正因此我才怕落到他們手中，而被篡改、或銷毀。

另外就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意義上的障礙。

1 我交出這些材料，將無顏見王殿元。

我與王殿元是摯友，情勝手足，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在他那兒放點東西，他從不過問，也不參與。我為自己，將他這自重、自愛的人置於警方和家屬委員會之前，那不但對不起他，讓他在不明真象的鄰居中抬不起頭來，也對不起小傳和孩子。又考慮到，事實將證明與他無關，衝擊波不會持續過長，只要我的問題清了，我再去償還他的損失，和求得他寬恕，儘管他不會要我這樣做。

2 我八〇年下半年，以南客、客卿的筆名在香港「觀察家」上發表的幾篇文章。

一部份是為齊白石的墓被毀，至今不予修繕；齊家的家傳國畫被抄，至今不退還而鳴的不平。迫切希望中央關注這件事，責成有關部門 愛護國寶、落實政策。希望有關部門，恢復解放初期共產黨人的好傳統，儘速解決問題。特別希望美術界個別負責人，不要因為曾將齊白石禁閉兩兒胡同，受到周總理批評，到了



圖為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大門。

今天視國寶為糞土，踐踏中華文明，事實確鑿，語詞懇切。

儘管如此，文章也已發表，但此文是我主筆，一旦公開，怕對齊家不利；又一想即便不利也大不了那兒去，也恐怕不一定就不利，這顧慮才有所消除。

另一部份，則是為郭羅基鳴不平的文章。當然文章的着眼點，不在於郭與蔣的個人糾紛，而是唯恐因郭的受壓，影響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進程，影響中國的改革進程。赤誠可鑒，肝膽照人。儘管如此，他們不會歪曲，不會不更加害於郭。不過想到此事此文也已公諸

於世，是我主筆之事，可能會從組織紀律這角度，再給郭找點麻煩，再不利郭的後果也不過如此了。真是本想幫忙，可能要幫倒忙了！

為了防止我的處境進一步惡化，爭取可能爭取的前景，和其他一些考慮，我已決定交出保存的材料，但我與他們定了幾條「君子協定」：

1 我在王殿元處保存的材料，與王殿元完全無關。決不能因我交出材料，對他有所傷害。拿取此材料，不可驚動王殿元所在單位和鄰居。材料的保存地點和內容，我會全部如實指明，除取材料，不得抄查王殿元的家庭，干擾他的生活。主人有口吃，任何人不得嚇唬他，由我寫一書信，讓他同意你們將材料取走。原來我要親自去，他們不肯，幾經堅持，他們仍不肯。

2 材料中涉及的人和事，不得再追究和株連，有任何需要承擔責任的事，由我個人負責承擔。

3 一旦我需要借用這些材料，將提供方便。

4 材料核實後，立即釋放我。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條件並不苛刻。我所以不交出材料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們預料。待我的要求，他們一一答應承諾之後，我才提供保存材料的地點和戶主的姓名。對他們的承諾，我沒有要什麼文字保證材料，因為我明白，如果他們不想遵守這些承諾，我要一份份文字保證也是白紙一張。我當時的處境，他們可以任意搜檢我的東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的時候，我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就被他們發現，並巧妙地當我面銷毀了。看來他們很怕這封信傳出去，所以才假手我毀掉它，恐怕這封信他們始終對中央是保密的，至於為什麼

他們這樣怕中央、怕外界了解真情，明眼人一看是不難看穿的。越怕被人看穿，他們就更竭力地想掩蓋，可謂煞費苦心，但總有一天要破產的。

九九拜三哆嗦

材料一旦交出，他們可是眉開眼笑地彈冠相慶了一番，甚至當着我的面露了一下他們買了多少酒。但是，他們也就再沒有什麼戲好唱的了，我才平靜了那麼一小段時間。

種種迹象表明，他們只準備小部份地遵守協議，大部份協議，從他們許約那一天起，就準備撕毀它，果不出所料，又來新花招了。

一、他們要求我有個原則上認罪的表示。開始我慎重聲明，我是無罪的，也不可能。有罪。他們就說，你總不會沒有錯吧？錯與罪並沒有嚴格的界線，從提高認識的角度要認識到自己是無罪的。現在九九拜都拜了，這一哆嗦就不哆嗦了？

看來似乎他們只要我原則上認個罪就算了，已經到此地步，認一個也無妨。廉價的肯定，也可以廉價的否定。必要時再說。話雖這麼說，對於一個真正知道自己並無罪的人來說，要這麼違心地作踐自己，心是要流血的，所以才有那「嗚咽的痛哭」。我料想了，我要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料想了，他們也不會不為此付出代價！而且他們應付的代價，我會盡早兌給他們的。

二、他們又要求我寫個認識過程的所謂「親筆供詞」。

長期以來，他們習慣於要人們按他們那主觀的形而上學的思路寫什麼認識材料，不管如何編造，只要有了它，就「合乎規律」了，也

就萬無一失了。我寫不來，他們就耐心地「幫助」、「提示」，總算「九九拜又哆嗦了第二哆嗦」。其實，這不過一張廢紙，因為它不過是一個通篇帽子與事實不符的官式文章，但他們需要用這廢紙騙中央、騙輿論、騙自己。

三、他們要我寫一份有關白天祥的材料。他們又厚顏無耻地要我，來這一個「九九拜第三次哆嗦」。我問怎麼沒完了？他們表示是最後一次了。那二位「常務」叫上鋒逼得也夠受罪的，只跟我說好的。但這是一支一箭雙鵰的毒箭，它等於告訴我，他們準備向白天祥下手；另外想再故技重演，讓我和外國人掛上，以便再次在必要的時候愚弄中國的百姓。

事實上，白天祥作為法國駐華使館的一名隨員，並非正式外交使節。他是一位老中國留學生，對中國很有感情，很熱愛中國。至少我從來沒有發現，他有任何一點點的反共反華的情緒、思想和言論。相反，他對中國很友好。他作為「四五論壇」的讀者，與我有過幾次接觸，因為雙方都忙，接觸也是來去匆匆。偶爾交談中，他曾很誠懇地說，據他看中國很有希望，這幾年的經濟改革，比蘇聯的改革步子邁得大得多。他作為香港「觀察家」主編許行的朋友，曾替他，給我帶過一些雜文，我也托他轉送許行一些「四五論壇」。最後一次，我請他帶一封信致××。托人辦事，我從不願意瞞着人家，所以對他簡要解釋了一下信的內容，是有關與××商議「促進會」的。他表示，信可以轉交，但他認為××先生不一定會同意。我表示，如果帶信覺得勉強就不必帶，如果可以帶，我很感謝。

他與我的交往就是這些，即使用一個外交官的身份要求他，他也沒有超越他身份的行爲。因此，想就此對白天祥作出什麼不友好的舉

動，是極不負責任的，既對不起白天祥本人，也對不起法國政府和法國人民，他們沒有把信任錯授給一個不相稱的人。白天祥對中法人民的友好事業，作出了努力。正像我們曾經誤傷過意大利的安東里奧尼一樣，總有一天會向白天祥先生道歉的。不過，這樣作的結果對一個國家聲譽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損失。可是，有些人並不在乎這一點，只要自己一時得利，他們什麼事也敢幹。

我與白天祥交往的事實真象就是以上這些，他們即使相信事實是這樣，因為不符合他們的要求而不肯罷休。繼續追問，以至胡攪蠻纏，不然難以達到某些上司主觀定下來的目的。這下子，我發怒了，我甚至號吵起來。他們見此狀，也知道再搞不出來什麼了，又怕已得的成果飛了。就讓我寫，寫來寫去總也不合他們口味。他們有點急不可待了，我也看出我再努力也難以阻止他們這瘋狂的一步。他們乾脆自己動筆了，我堅持事實不許有一點添油加醋，他們刪去有利白天祥的事實，又給他戴了幾頂空帽子，那我就管不了了。不過，這也正給我提供了一個在將來可以牢牢地套在他們頭上的圈套。而且，有眼力的領導人一眼就能看穿這材料不實，甚至有鬼。可惜，我至今還沒有看到在此案上有這樣一位有眼力的領導人。

此後不久，我就在法庭上當眾將這個，他們本想來套我的圈套，回敬給了預審員先生們。勿謂言之不預。我早對他們說過：「我是會一報還一報的。」當時，他們吃驚地把眼睛瞪得溜圓，囂張地說：「我們還從來沒聽說過，有誰敢對我們一報還一報的。」真是霸道！

至此，這些預審大員們再也不露面了，偶然的機會遇到我，也趕快地溜走。心中有鬼的人們，我不是曾問過你們其中的一位嗎：當你

帶着你的孩子上公園的時候，你想起了你會把一個你明知無罪的人送進監獄，而使他不能帶自己孩子去玩的時候，你的心靈會安寧嗎？

在此我慎重聲明：

1 在我案的今後的復查中，我只認可一切與我案有關的未經篡改、刪節的原始證據，包括原始錄音，才具有定案的法律效力。一切未經我本人再次確認的訊問記錄、審訊記錄、「親筆供詞」和其他在預審期間裡形成的文字材料，一概不具有定案的法律效力。

2 我再次重申在法庭上的聲明：由預審員動筆捏造的有關白天祥的所謂材料和預審員趁我不備而隱蔽搞的錄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由此造成的任何後果，我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希望有關部門不要據此作出任何有損中華人民共和國聲譽，和有損中法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錯誤決定。如果，因為錯誤決定，而造成的一切後果，其責任完全由七處的有關預審人員承擔，我概不負責。

這一聲明，我早已準備好的，在法庭上他們偏偏迴避這個問題，我只好找準一個時機，突然宣佈出來，審判長想制止已經晚了，聽眾大為驚愕。可能在座的那二位「常務」預審員一定如坐針氈、如喪考妣，從業十幾年可能從來沒有裁過這樣大的跟斗吧？我在法庭上又抗議，他們違反人道主義，不給我家屬送來的假牙使用，吃飯造成困難，以至在法庭上說話不攏風，可能不清楚，請各位聽眾諒解。這下子，他們更是恨不可及，一直把我的假牙，扣留到我轉一監時才不得不交出來。

至今我才明白，他們所說的「九九拜一哆嗦」，是那麽一種話，以此回敬：天底下哪有把舒服都給別人，只讓別人哆嗦，自己不哆嗦的道理哩？

開庭前的波折

在我預感到非在法庭上，與這班預審員的代表者交鋒的時候，我早打定主意，不必說他們會蓄意判我十五年，就是判我一年，我也要充分利用法庭的機會，公開抗爭。

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次「檢提」。這一次，我便聲明：我是無罪的。檢察員張起生大吃一驚，他沒有這種思想準備。他四十五歲左右，看得出來這個人這十多年一路順風、得意、主觀、盛氣凌人，比預審員們還「左」三分，他根本不想聽我的申訴和解釋，似乎他只負有起訴我的權力，而沒有檢察預審工作的義務，以至二個月後的八二年一月底，他還在起訴書上稱我「供認不諱」呢！

我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接到起訴書後，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原答應可以查閱的我保存的材料也不肯提供了，「刑法」都不肯借，只有同監的一本「詞典」，寫辯護詞的紙也沒有，這叫什麼允許「自我辯護」！二衝劉管教以「關心」的姿態借了「刑法」，給了紙，又以幫助我為名，提出幫我看辯護詞的稿。就在法院第一次找我的前幾分鐘，劉將我寫的辯護詞拿走了。不讓他們明拿，他們也有辦法。事後我立刻發現辯護詞可能被複印。

八二年二月十三日法院第一次找我。後來的審判長丁鳳春，是在一個戴着黑眼鏡故意裝着老練的人的保護下來的。丁的年齡與我相仿，可能為了旗鼓相當吧，讓年紀大的當主審豈不顯得太沒人了嗎？不過，一開庭，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個選擇是大大地失算了。丁某顯然是來自農村的復員兵，實際文化水準超不過初中，可能有適合那個時期的某種特長而爬上來的。「濫竽」一單練就顯形了，真是給那位

監護人添彩。這天，他梳着一個「高二林」相親時的頭，中山服，一本正經，頸項一直梗着，小嘴老是一撇一撇着。我知道向這種人重申我是無罪的，是白費功夫；可是又不得不向他重申，他根本不予理睬。談到請律師，我要求請馬榮杰或北京大學法律系一位曾表示願意給魏京生當二審律師的人（姓名現在忘了）。次日，丁某告，馬在國外講學，另一位查無此人，我不得不委託法律顧問處派一位律師。我要求家屬參加旁聽，未答覆。

二月十五日我的律師來了。劉述芬律師，她五十開外，一張飽經風霜的臉，敏銳。她細心地聽取了敘述，儘管不十分充分。談二次後，我發現她即便不能作到盡力而為，也不至於為虎作倀，可以信賴。事實說明，她是一位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在可能的情況下，盡了她的職責。她的公正而簡潔的辯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遠遠超出我起初的估計。

此後，不知何故，沉寂了二個多月，可能是內部意見不統一，也可能是政治氣候的影響。四月二十九日法院第二次找我，五月十八日檢察員又第二次來找。

在這個期間，他們籌劃了一個重要的陰謀，就是再次違約，把我為郭羅基鳴不平一事，補充列為起訴內容。這有二個意圖：一是為配合當時某種政治需要；二是用這件事更加激怒某些領導人，以增加他們執意要重判我的支持力量。完成這一步以後，他們認為萬無一失了，五月三十一日給了第二次起訴書。同時要撤回第一個起訴書，但我利用起訴書的空白寫了不少辯護內容，我只好要來墨水，將它塗成一片黑紙交給了他們。

法律程序就這樣地玩要在他們股掌之中！

開庭：讓審判長迴避

八二年六月八日上午開庭。我穿一條筆挺的藍色筒褲、白短衫、皮涼鞋，留着學生頭。開庭前，再次派二名書記員向我說明有關規定，我表示知道。

他們接受觀案開庭的教訓，上次雖是在內部進行，可是來人過多，坐滿了大法庭，估計有幾百人。這次法庭設在大法庭的休息廳，特意作了臨時佈置，莊重、威嚴。二部攝影機，鎂光燈、聚光燈。東側排着三台大錄音設備。電扇十多台。聽眾可能有五十餘人，多是來自本院各科室，有幾名記者模樣的，一律憑票入內。我認出二位「常務」預審員帶一個小青年來了。

一開始，審判長先問我：「法庭組成人員中，你需要提出迴避的嗎？」（心裏可能想，不會答：有。）

「有！」我肯定地答道，丁某一楞。我趁他一楞連忙問他：「請問審判長，在開庭之前我談過幾次話吧？」

「談過那麼幾次。」他答。（心裏可能想，他問這個幹什麼？）

我不容他多想，緊問：「審判長，你不是每次都講到，要我認識自己的罪行，以求寬大處理？」成了我審他了。

「是的。」他答，臉稍有鬆弛。（心裏可能想，原來是這麼回事，豈不等於在領導與眾人面前為我評功擺好？）

我想不能再解釋我的法律依據了，必須趁他鬆弛將「彈」放出去，我一字一頓地說：「因此，我要求審判長迴避！」

我雙眼在逼他，他臉頓成白紙，木然的眼向我的右後方第一排坐着的「牽綫人」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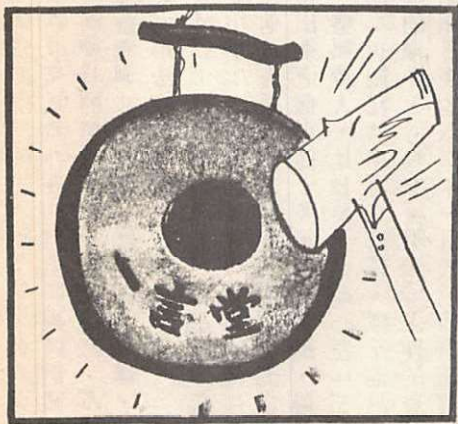
此後，這位「木偶審判長」的目光就總是怯怯地朝着那個方向。

他顯然得到暗示，慌忙宣佈：「休庭！」挺直腰桿的人們，一下子全塌下腰去，鎂光燈、聚光燈隨即熄滅。

「撲嗤！」一個鼓得足足的皮球，突然洩了氣。

「簡直是開法庭的玩笑，讓審判長迴避，還從來沒聽說過！他迴避了，誰審你，無理取鬧！重判，一定要重重地判他！」一定會有這樣暴跳如雷。

明白人也會想：怎麼讓這塊料當審判長，這不是明擺着的嗎？人大常委早已宣佈中國不搞「有罪推定」，你還沒有經過審判，就告訴人家有罪，那你還開庭幹什麼？沒開庭，你審判長一個人就給人家定了罪了，那這開庭不明擺着是作樣子嗎？那判決，不就談不上什麼公正不公正了嗎？



一錘定音

肖洛

有人可能說：「這是明擺着的，大家心裏都明白，你說這些有什麼用。」不，有用，雖說大家心裏都明白，說出來與不說出來，大不一樣。說出來，就說明不合法的事，你執法者更不能幹，你幹了難免人家不揭露你。法律從來是一把雙刃的劍，不是只管老百姓的。知書懂法的一代新人，不再任人擺佈！這種執法者公然違法的事，今天行得通，總有一天行不通；今天誰也不聲張，但它必將記錄在我國司法實踐史上，供人們研究、思考，以推動我國法制的健全和合理。着眼於未來，是我的基本行事準則。

有人說：「你這不是招恨嘛！」我不招他，就不恨不恨了嗎？他要吃你，刺激不刺激都一個樣。他總想給別人下馬威，今天就讓他先嘗嘗！嘗得他，再看見你的雙眼，心就發顫。再說判多少年，上鋒早已給他定下來了，你不招他，也輕不了；你招了他，他也無權無膽給你加碼。

這就叫依法抗爭！

開庭：打回他的下馬威

休庭十分鐘左右，又開庭。自然是駁回，我想從法理上簡單地解釋我要求審判長迴避的理由，丁某不容我說，我也罷了，讓聽眾自己去回味吧。只要有幾個人邊聽邊想，我就心滿意足了。企圖思想一律是絕對辦不到的。

法庭調查一開始，丁鳳春就搬出了他的下馬威。他們很清楚，要定反革命罪，依我國法律，前提是要有反革命思想和目的。然而，他們查遍我的大量的原始證據，包括趁我不備竊錄的材料，也找不出這方面的證據。這個事實應該讓他們清醒，不要迫害無辜，可是某種原

因使他們不這樣做。相反，檢察員找了一段南京徐水良的話，經過刪改纂編，移花接木地按在我頭上。可是這把戲太不牢靠，一旦有人拿證據戳穿了這一點，並證明徐水良的文章我連看都未看過，豈不釜底抽薪，整個定案的基礎都難塌了嗎？於是，丁鳳春又生一計，找來一個以前整個預審中從未露過面的「秘密武器」來了。

丁：「你主辦的刊物中有反動的內容嗎？」

徐：「沒有，根本不可能有。」

丁：「這是你主辦的嗎？」他通過庭上物

證出示員向我出示「學習通訊」第二期。

徐：「『學習通訊』是我主辦的，這一期刊登的是王希哲的文章，是由王希哲出的。」

丁：「你看過嗎？」

徐：「我看過。如果在內容上有任何問題，我不會否認我有責任。」

丁：「這篇文章說無產階級專政是血淋淋的專政，有這麼回事吧？」

徐：「沒有，不可能有，我從來沒有這個印象。請審判長把原文讀一讀。」

丁：「……。」

徐：「好，請審判長再把這一段的前後二個自然段讀一讀。」

丁：「……。」

徐：「問題已經很清楚。王希哲的文章是說有的同志錯誤地認為，地主資產階級曾經用『血淋淋』的辦法對付無產階級；那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也可以用『血淋淋』的辦法對付他們。這種認識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是不人道的，應該批評和制止。文章選說，何況多年來實踐證明，有許多所謂的『敵人』是虛幻的敵人。這正是捍衛了馬克思主義

，對『左』傾的有力批判。這難道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血淋淋的專政嗎？如果審判長用這樣的辦法定案的話，那我相信你的口中也一定出現過『無產階級專政』和『法西斯』這兩個字眼，我不加分析地，硬說你說的『法西斯』就是指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你豈不也成了反革命了嗎？『四人幫』已經倒台快六年了，你怎麼還沿用他們那一套，搖頭去尾，羅織罪名呢？！」

丁某一時不知所措，在「牽綫人」示意下，立刻轉換了題目。

開庭：窮追原始證據

如果說二位陪審員，一個是精明過人，一個則迷糊不醒，都三十歲上下。後者叫張從良，是由他險的我致XX先生信的底稿。這是給「促進會」定案的最重要的原始證據材料。

輪到我發言時，我指出剛才唸的這封信不是全文，我原信中最主要的一段不見了，那一段正說明醞釀「促進會」的根本目的，是促進國共和平談判和祖國統一，並為達此目的，而設想了許多建設性方案和意見。審判長立刻否認，肯定地說剛才唸的是全文。我當即要求查證，他有點慌，故意滿桌找了一下，示意這信的原件暫時找不到了。那位「左張」檢察員不知底蘊，居然不顧「檢、法」分立的原則，連忙跑到法官席上向審判長表示，他那兒有一份（可能均是復印件），可供查證。丁某連忙將他推回，並說：「暫時找不到那信，在庭上也不便查對，庭下再說。」我不同意，但畢竟權在他手中，執拗不過，我一再要他認可庭下一定提供原件給我查對，他允諾。

這是審判長公然違反有關的法律規定，即

定案的證據必須當庭質證，認定後，方可作為定案依據的規定。

六月十二日是記錄員時學琛來看守所送判決書的，由另一名記錄員陪同，丁鳳春不知為何沒露面。當我詢問，那封信的原件時，他表示早已為我準備好。我拿過來一看，這是原信底稿的影印件，看第一遍，我就發現此件與庭上念的一模一樣，被人有意識地摘去了其中極重要的四頁，他利用文章中段落標碼上的混同，讓粗心的讀者不易發現。我立即讓書記員時學琛看，他又給另一位記錄員看，時大吃一驚，認可是少了四頁。但他表示，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又讓我看法庭記錄，並讓我簽字，我一看，這記錄遺漏太多，至少漏了一半以上，又不準確，有許多重要的對答是故意刪掉的，我指出這一點之後，我表示我不能在這樣的法庭記錄上簽名。我問不是有錄音，他解釋說不准許用錄音轉為筆錄（？）。他要求我另紙寫明不簽名的原因，他回去好有所交代，我滿足了他的要求。他筆錄了我口述的理由，我在這份材料上簽了名。

通過窮追這封信的原件，果然使審判長等人露出了，為了加罪於我，他們不惜隱匿證據的馬脚。我國法律規定，故意隱匿證據，不論何方都是犯法行為。這嚴重的執法者，知法故意犯法的事實，是我本無罪的又一個有力證明，又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的鐵證。任何人妄想抵賴，決不會有好下場！

開庭：簡單的結論和否定

自我辯護和陳述時，我對所謂的組織反革命集團罪的問題作了如下概括。

根據法庭調查和我的自我辯護，大家已經

知道，我在一九八〇年六月提議進行的「甘家口討論」是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處於轉折、衆說紛紜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幾個人就社會主義發展前途而進行的探討。並且，當時就自行否決了我的某種設想。至於一九八〇年底，我提議醞釀的「促進會」一事，被檢察員提出來起訴，我感到十分吃驚，如果這種指控發生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以前，還情有可原。大家知道一



葉劍英曾在其「九條方針」中表明歡迎每個中國人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但徐文立却被定罪。

九八一年十月，葉委員長已經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九條方針，明確提出歡迎每一個中國人、歡迎各政黨、各民主團體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對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貢獻。我作爲一個中國公民，提議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怎麼竟成了組織反革命集團？檢察員的這一指控，豈不是把葉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方針置於失信於天下的地位嗎？這是公然和九條方針唱反調。我真是佩服檢察員的「勇敢」和「膽識」！根據我國刑法，只有具有反革命目的的反

革命行爲，才能判定爲反革命罪。然而，我既無反革命目的，又無反革命行爲，憑什麼指控我犯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罪？

如果我們單以祖國文字的內涵來衡量這種指控也是荒謬的。

祖國的文字既豐富，又是極嚴格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漢語辭典」說得很清楚。

什麼叫「組織」，就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請注意這是指「建立起來的集體」。什麼叫「集團」，就是「爲了一定的目的組織起來的共同行動的團體」。請注意這是指「組織起來共同行動」。可是，「討論」和「醞釀」的內涵則不同。「討論」就是指「就某一問題交換意見或進行辯論」。「醞釀」就是指「造酒的發酵過程，比喻做準備工作。」

只有搞清楚基本概念，才能正確判斷，這是常識。單從行爲上說，我當時行爲只是「討論」和「醞釀」，和「組織」什麼「集團」根本沾不上邊，何況更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了。這叫「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這不是文字遊戲，這是學習和尊重祖國文字的準確含義。不論從那個角度上說，我都不可能犯有反革命集團罪。

那位機警的陪審員薛家禮瞪着一雙大眼睛緊地看着我說，轉了一圈，又轉了一圈，不知在想什麼？或是什麼也沒想。

至於，反革命煽動罪的指控更是不值得一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一個部門，或一個司法機構把它的某些規定和具體判決，和它的立法機關和經過立法機關頒布的法律、法令等同起來，更何況，我只是對某些部門的違法行爲和不公正的判決提出批評意見，這和刑法

規定的反革命煽動罪是指「煽動群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實施」的含義，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一個行政機關和司法機構的具體行爲和司法判決，不允許別人評論和批評，豈不是太霸道了嗎？難道一個有低度民主的國家都允許的事情，我們作爲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國家，難道反而不允許嗎？

起訴書竟然說我在香港發表的那幾篇文章，是反華反共的反動文章。更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我若反華，何爲中華民族的瑰寶——白石老人爭一席之地？我若反共，何爲周恩來、沙千里等中國共產黨人高聲叫好？我若反華，何爲中國的改革大業出謀策劃？我若反共，何爲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途深慮？

親愛的先生們，實事求是吧，睜開眼睛，憑良心說話吧！

開庭：滿頭大汗的檢察員

當我從種種迹象中，覺查我第一次準備的自我辯護詞已有可能被人複印之後，我就只好將它廢棄，改變部份內容，特別打亂了原結構和順序，重新在粗糙的手紙上起草了新的辯護詞，然後日夜放在口袋裏，包括不讓同監的那位注意到。事後，我是完全告訴他的。這樣一來，大大地影響了自我辯護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的辯護的力量，法庭上只好憑當時的激情和自信，總算使整個法庭的自我辯護和辯論基本成功。

有弊也往往有利，由於這樣一變，也給檢察員帶來了他意想不到的困難。

雖然他們也知道，我對辯護詞可能被複印事有所察覺，但又估計我已來不及更改。法庭

上的檢查員席上，放着一疊準備辯論時用的底稿，約三十多份。可是，等我作完第一次自我辯護發言之後，開始法庭辯論。檢察員按他的臨時記錄，準備逐條反駁我的時候，可就亂了陣，因為他不可能順利地按現在的順序，找到原來的預備稿，原預備稿是按駁我原辯護詞的順序擺放的。越找不到，就弄得越亂，越亂越找不到。心裏一急，就更亂。心急火燎，頭上就冒開汗了，一直冒得他汗水淋漓！這就是一「蔣幹盜書」的下場！

等我發言時，我不無諷刺地向聽眾指出：檢查員似乎全知道我的辯護內容，逐條作了準備，臨到現場又找不到，亂成一團，這是爲什麼？

檢察員頓時尷尬，既不否認，也不接這個茬。

開庭：平心靜氣的律師

劉律師是在檢察員第一次發言，我的自我辯護之後講話的。開始，她略顯得有些激動，片刻就極鎮靜地闡述了她的三點辯護意見。她說，她接受了被告人的委托，出庭任被告的辯護律師，現發表三點辯護意見，供法庭考慮。

1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主辦的「學習通訊」，「誣蔑我國社會主義是『特權官僚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叫囂中國『必然導致第二次革命』，鼓吹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等反動內容的文章。」據我們查閱案卷，「學習通訊」第五期上刊登的一些話，是南京徐水良寫的，現在並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在這篇文章發表的事前、事後看過這篇文章。被告人也不再說明他從來沒有看過這一篇文章。現在要被告人爲這篇文章負法律責任，我們認爲不妥當

，請法庭考慮。

在律師發言之前，我也指出起訴書引用的這段話，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寫過，連想都沒想過。而且，這段引文不包括導語和標點共五個字，三句話，其中只有廿九個字來自據說的原文，其他的廿六個字都是檢察員後加上去的，特別是那些有關鍵意義的指向名詞，如「我國社會主義」、「中國」等等。另外，從行文上，也處處可見搖頭去尾的痕迹。

2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寫了有關劉青被判勞改的消息，郵往外地。我們調查，被告人是從劉青母親那裏聽到這個消息的，被告人在沒有進一步核實的情況下，把「勞教三年」說成「勞改三年」，並傳播給了別人，這和有意捏造是有區別的，這個事實請法庭考慮。

關於這個消息，我在自我辯護時說到，這消息我是從劉青母親那裏聽到的。劉母是有關部門口頭通知她的，通知的人沒有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將勞教通知書交給親屬一份，才形成誤傳。誤傳，若論責任首先在司法部門的告知人身上，而不在我們。預審和法庭都責問我爲什麼沒有核實，就傳播給別人，並給司法部門的聲譽（？）造成損失等等。我答覆他們，我一個普通公民到哪裏去查證這類消息呢？就是去了，人家接待嗎？人家肯證實嗎？我只要舉一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求。當劉青被拘留，有關部門違反法律規定，一直不通知家屬，他母親由於不知道兒子的下落，到公安局接待室查詢。接待人員不但一口否認他們抓過劉青，並且以不知道爲由將劉母粗暴地推出接待室。直到一位中年人看不下去，當場證實，他曾親眼看見一個叫劉青的到過接待室，並被抓走。這時候，接待人才不得不答應查查。這樣的接待機構，有可能回答我提

大陸著名民運人士劉青在演說。



出的查詢嗎？（我就差點沒說出我們有些部門已經變成了「門難進、臉難看」的衙門！）

3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煽動十幾個省、市的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成立了「營救劉青全國委員會」等等。據我們查閱案卷發現，被告人並沒有參加「營救劉青全國委員會」，甚至公開拒絕參加。這個事實，也請法庭考慮。

劉律師的後二點辯護意見，均被北京中級法院在判決時聽取和採納。至於重要的第一點判決書仍按原起訴，把它作爲我有反革命目的和理論的證據，轉載入判決書。

開庭：恢復了尊嚴

整個開庭中，始終處於十分被動地位的審判長，只是到了當天下午五點左右，最後宣判時來了點精神。可是好景不長，他宣讀早已擬

好的判決詞，我却絲毫沒聽進去，也不想聽。我雙眼一直盯着丁鳳春，越看他，他越毛，直到後來聲音更是走調，因為他本來就是裝的京腔，以至最後到了氣急敗壞的地步，當他聲嘶力竭地喊出：「把反革命份子徐文立帶下去！」時，我提前轉身，讓他們銬上，微微抬起頭，略有笑意，目不側視，平緩地向外走去，把一片沉寂留給那位可能即刻就要從審判長寶座上跌下去的丁鳳春，心裡想着：我，恢復了尊嚴！

第二天，一位自稱是看守所的負責人，便來了解我想法，談了談，他記了記就走了。

例行公事的二審

二審完全是例行公事。這，我已早料到，只是想再爭取一次公開抗爭的機會，但他們設法不給我。

北京高級法院第一次與我談話是六月三十日。第一次就不愉快。我當時完全無意另請律師，只想順便打聽一下馬榮杰是不是真的不在國內。我就問後來的高法審判長：「馬榮杰律師，您認識？」他表示認識。我又問：「他從國外回來沒有？」他答沒回來。我說：「聽說他回來了（我已聽說）。」他立即追問誰說的，而且堅持要問，並追問不捨。我一想，馬律師是否可能半年時間都在國外沒回來且不說，他的態度反讓我窺出他也是個串通一氣的人物。我便不客氣地答復他：「我沒有義務告訴你，你也沒有權力追問我。」

七月二十八日一早，就用小車將我載到法院，下午才開庭。法官席前放着一摞有二尺高的案卷，似乎想告訴我，有足夠的證據，可以駁回你的上訴，席後一溜排着四位，審判長

、陪審員這三位一律不再是嘴上沒毛的了，均五十開外，神情都很木，馬上使我想到布店櫃檯前的伙計，其中只有一人，像是還動點腦筋的伙計。書記員是位顯影自憐的小姐。八月四日我看記錄時，指出多處明顯的選詞不當，造成內容錯誤時，她甚至有點想發火，大聲說：「我是按錄音整理的。」我平靜地告訴她，可能是我對南方人口音的緣故，但按這個詞音反倒對了，按這個詞義就不通了，可能還是選詞有誤。她以頗不為然的神氣看着我。

一開庭，我便問審判長：「依照我國法律，公開審判是允許旁聽的，為何旁聽席上沒有一人？」此審除還有檢察員、記錄、律師，只有一人職守錄音機、一個法警。審判長胸有成竹地答道：「開庭前，我們已經貼出布告，但沒有人來旁聽，我們也要按時開庭的啊！」好一付油腔滑調！我當時又怎么可能去看看是否已貼公告，又沒有證據戳穿他，只好作罷。一笑了之，點到為止吧，讓它記錄在案。

審判長先讓檢察員發言。檢察員是一位稜角磨禿了的中年知識份子，與我談了一次，他勸我認罪，我回絕了，他表示那就不可能在二審發表不同與一審的意見了。他照本宣科，口氣平緩得有點無力。

檢察員發言完，按法庭的法定程序該由我發言，審判長却先讓律師發言。律師重申了她上次辯護意見的第一點，這次更加明確地補充指出：徐水良的原文並非是就中國情況，而是就蘇聯情況發的議論。這就更有利地駁倒了一審檢察員的無理指控。

在法庭調查時，我又提供了一個有力證據，即我對資料的保存是十分周到細緻的，從我交出的全部材料中可以看到，唯獨沒有「學習通訊」第五期，如果我事前、事後看到此文，

在我所保有的材料中是不會沒有的。經律師和我一再論證，高法裁定中，刪除了原判決書中這最重要，也是最要害的一條指控。

八四年七月二日第一次通知駁回我數年的申訴的時候，來人再次確認了這一刪除，但又詭辯說，那也不能證明我不是反革命。那好，我請他們從我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竊聽錄音中，舉出一件足以證明我有反革命目的的證據材料來。不然刪除原判決的那段話的後果，自然是，既然再也舉不出證據證明徐文立有反革命目的，為什麼還非要維持原來的錯誤判決呢？

律師發言之後，我開始了詳盡的自我辯護，審判長幾次想打斷，我未讓他的企圖得逞，堅持講完，我一定要在法庭上留下一個他們也不敢隨便銷毀的完整的辯護詞，供後人去覆查或研究。

在有關「促進會」問題上，鑒於判決書比起訴書更惡毒、更胡亂編造，甚至誣蔑我要以「促進會」組織什麼「臨時政府」。這一次，這方面闡述的更詳細，並特別指出他們這樣做的惡果。

這個問題越來越明朗，越來越可以看出他們這樣判決對和平統一事業的危害。

近幾年，為中國的和平統一，中共中央領導人一再希望，將經國和他的同僚們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誠意，請他們放心「誰也吃不掉誰」。這些真誠的宣言，無論是對國民黨的上層人士，還是對一般台灣民眾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如果仍然允許一些人，把我這樣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是在個別政治問題上發表過不同意見的人，判以重刑，關押在獄，那麼

蔣經國和他的同僚們是不可能不產生疑懼的。爲祖國的和平統一計，中法和高法還是盡早收回自己的錯誤判決吧！

而且，現在黨中央每推行一項正確的政策的時候，總要三番五次地向國內外人士一再保證，這個政策不會變，我們是守信用的，以至還有人疑惑不信，我國這樣一個歷來以忠信爲立國之本的古老國家，爲什麼會這樣了呢，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爲祖國的和平、開放、改革、四化計，中法和高法還是盡早收回自己的錯誤判決吧！

在二審時，我發言後，檢察員出人意外的，不準備發表任何反駁意見。

一場例行公事的審判就這樣結束了。

在整個審判期間，我們原來住在二衛的人，全臨時搬到三樓七衛，二審後又搬一衛。已決犯和一些老政治犯一般可定期看電視或電影，我雖已決，仍然不能。這時，我就積極要求他們執行判決，經要求給家寫的信，實際並未發，執行却付諸了。

入監

我是八二年九月十日單人用小車送一監的，與看守所一牆之隔。一監，不愧當年被毛澤東、朱德稱爲模範監獄，除了沒必要地扣了我和妻的十八封來往信之外，各方面是嚴格按黨的政策對待我的。

我住的這個樓是「龜」形樓。開始住一樓一衛，八四年三月搬二樓六衛四號，一直是住向北的房。我始終獨居，倒也每天能和雜務（由刑事犯充任，負責服務和監視）說幾句「天氣哈哈」之類的話，因此不至於喪失說話能力。這屋六平方米，有二扇窗，採光面積一平

米五左右，冬天有暖氣，衝道內生一爐火可煮、熱點東西，根據氣候一般能提前或推遲幾天供暖。單舖，床頭我陳有我妻女的小照。一小衣櫃，可放碗、杯、瓶、食物和洗換衣。一日兩瓶開水和飯均由雜務送來，走廊有暖桶，終日有熱水可用。大小便上廁所，夏季在樓上時終日開着門。床下有兩個紙箱盛衣物。牆角我用二紙箱和花布搭一書架，放書和妻女彩照的鏡框。八四年三月發了一套新學生桌、椅。

窗外本有一病柳，秋天伐了。

飲食，我吃雜務灶，在現有標準下辦得相當出色，每周改善三次，如肉包子、川丸子、肉等，燉肉少有三兩，多有半斤，近來冬季的休息日餃子多是富強粉，我自包單煮自吃。節假日的改善有一般飯館水平。細糧佔百分之四十，我早上喝玉米粥很習慣，每天一頓細糧略有剩，窩窩頭我吃的不多。家中送食品，時許、時不許。這裏不時可買到一些水果、糖、

圖爲由清政府所建的北京市監獄男囚室外貌，由若干衛構成。



花生等食品。送書和雜誌，也時許、時不許，均受政治氣候影響。

八三年開始幹一點輕微勞動，往塑料涼鞋上戴花飾扣，除休息日，也不是天天有活。每次少則百餘雙，多則幾百雙；少則幾十分鐘，多則一個多小時能完成。八四年下半年開始付獎金，我已得二七·九三元。

每天一份「人民日報」，曾看了一段「北京日報」，八四年開始借給一些小說看，有些古典和近現代中外名著。每周能看幾次或一次電視，有時長時間不看，每周一次較有把握。電影一般每月一、二次，不規律，冬天極少看。片子多是新的，中、外、港片均有。放風也不規律，有時每天，有時半個月沒有一次，一般二、三天一次，每周一般到小澡堂洗一次澡，擦身、洗衣服隨時可以。整個環境安靜，偶然聽見噪雜聲；清潔、衛生，走廊擦的鋥亮。我的室內始終保持整潔的習慣。

問題的實質

依照我國的刑法規定，有推翻和打倒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爲目的和行爲的，才可定爲反革命罪。司法實踐上，實際上是以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和行爲，定爲反革命罪。

那麼讓我們首先搞清楚什麼是黨的領導，什麼是社會主義吧。

在現階段，黨的領導，說的直截了當一點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綫、方針、政策，擁護它就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它就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社會主義呢？現在並無定論。我看以下四個方面可以概括：



中共整天介地貫徹什麼「精神」，但局面就是新不起來。圖為大陸的宣傳畫。

1 人民民主專政；2 生產資料公有制，但又不是切生產資料都為整個社會佔有；3 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4 實行按勞分配，當然要科學評價腦力和體力二種勞動的價值，不可偏倚。

如果按照以上這些，人們可能大都可以接受的標準，來衡量我的思想、言論和行為，我就不但不可能是一個犯有反革命罪的人；相反，是在一定的範圍內，為維護和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作出了應作的貢獻，儘管仍存在許多弱點、缺點、錯誤，但我是一個愛國、進步的人。

既然這就是我的實質，這才是我的本來面

目，那為什麼又有一些人和一些部門要千方百計地定我為反革命份子呢？

問題已很清楚，那是因為我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却在不適當時機、不適當的場合，以不適當的文章和言論開罪了一些有權力的個人或部門，儘管這並非我的本意，也並非我清楚知道開罪了誰、開罪了那個部門。

這就是我的問題的實質和要害。

歷史的回顧

一六〇〇年，布魯諾被教廷焚死時，留下了這樣的遺言：

「一、國家無命令人民作如何思想的權力

；二、社會不得以武力懲罰那些不贊成公

認教條的人……」

臨刑前，他向全世界喊道：「火並不能把我征服，未來的世界會了解我、知道我的價值。」

現在，人類社會理解和接受了布魯諾的思想。

羅馬教廷近四百年後為伽利略平了反，創造了人類平反史上的新記錄。

宗教改革的結果已被人們接受。嚴格地說，布魯諾、伽利略並不反對宗教。

宗教也是人類對宇宙的一種解釋。在政教分立的情況下，它也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或穩定起過某種積極的作用。它經久不衰，綿延至今，不能不承認它所包含的某些哲理對人類是有益的。但宗教畢竟不是科學。這也是布魯諾、伽利略的思想與宗教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它是科學。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一切科學的命運一樣

，都不會是一帆風順、毫無曲折的。它到了它的繼承人那裡，也一定會有不同流派。

斯大林不能說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又不能說他沒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正是他開創了運用權力壓制、迫害持不同意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思想犯的極惡劣的先例。受害者的數量，至今恐怕都很難確切地統計出來。人們現在已經知道，在十五—十六世紀，「異端份子」慘遭殺害的，是數十萬之多。

對不同政見者，毛澤東有時非常開明，有時又非常粗暴，甚至曾不惜以幾十萬知識份子的不說話（戴上帽子），來造成全體國民的不敢講話（怕戴帽子）。

這些影響是久遠的。

南斯拉夫作為一個國家，首先當了「異教徒」，受到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八十一個共產黨、工人黨的集體譴責。

今天，共產主義運動「唯一中心論」已被擯棄，「多中心論」成為現實。

歐洲共產主義理論的二次發明：「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已經不再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它在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取得的進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中國建國之後，也經歷了曲折的道路。許多自然科學家受到埋沒和壓抑，社會活動家和社會科學家的命運更是多舛。

震驚中外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潘漢年反革命特務集團案，已平反昭雪。

幾十萬五七年的「右派」摘帽、平反、昭雪。

彭德懷元帥恢復了名譽。馬寅初老先生的口學說、孫冶方的經濟

理論得到了確認。

民間慘死的張志新、週羅克及上海那位不知名的——一九七七年四月廿七日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的勇士，也得到了公正的評價。

比起這些大人物、知名人士，我這個才疏學淺、孤陋寡聞的小「反革命份子」，我自信，我的命運可能會比他們好一點，時間不用那麼久？或許成爲這個行列的最末一代？

未來的展望

特別自去年底進一步明確反左而不是反右，進一步改革、開放以來，我欣喜地注意到了「人民日報」去年十二月九日八版發表的祖佳攝的「暖冬」。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改革、開放之勢無可阻擋！

甚至一些敏感的禁區都在受着強烈的衝擊。譬如競爭的原則。

在中國，競爭的法則，首先在體育的領域裏得到共認，這道理很簡單：一個人的運動算不上競賽；一個人的「競賽」，成績不易提高；有對手的競爭，大家都提高的快。當然規則、裁判不可缺。

近年來，競爭的原則在經濟領域裡開始得到了確認，已經成爲我國經濟加速發展的催化劑。當然法則、監察不可缺。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未來中國的社會，將會不會出現一個各種政治力量和平共處、競爭發展的局面，我仍然沒有把握作這樣的預言，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用不着多長時間，在政治領域裏，談論競爭這個原則、談論國事決策反饋，可能不至於

再當成反革命份子來打擊。

對於未來，誰都有許多未知數，甚至那二位「常務」預審員也承認：也許將來你是對的，但是今天認爲你不對，就要整。

我看還是著名的我國現代戲劇家沙葉新，在「無標題對話」中說的有遠見：「以現在的認識水平尚不能認識的事物，都不要輕易否定。」

至於我個人的命運嘛，我想至多在監獄中坐在一九八九年，也可能較早解決問題，而得到釋放。

記得在報紙上看到過，胡耀邦曾對一些辦案子的人說，辦案要以能否經得住歷史的檢驗爲標準。又說，任何時候發現錯案，不論它是什麼時候定的，也不管它是誰批示的，一旦發現，就堅決糾正。

胡績偉今年十月一日一首詞中又說：

「絕然箕內耗，意誠胸袒。」

這些都在不斷地增強着我對自己問題能公正解決的信心。

我希望着，我期待着。

結束語

要寫回憶錄，尚嫌早。

但現在寫一份自傳體的申辯，也許是必要的。

在這個環境中，手頭又沒有任何資料可供查閱，只憑記憶。雖是自己經歷的事情，細節上的出入想必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要內容則完全是真實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於

北京市監獄龜形樓六街四號

（編者：以下為「我的申辯」全文結束後，徐文立在筆記本最後兩頁上的題句。）

愛人 彤

世上

唯有你——

令我幸福地戰慄，
也令我痛苦地戰慄。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摘自彤信中

我願是……

——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彤抄贈我的詩

我願是激流，

只要我的愛人，

是一條小魚，

在我的浪花裏，

快樂的游來游去；

我願是荒林，

只要我的愛人，

是一隻小鳥，

在我那稠密的樹林裏，

做窩、鳴叫；

我願是廢墟，

只要我的愛人，

是青青的長春藤，

沿着我荒涼的額，

親密的攀援上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再抄

徐文立的妻子康彤和女兒徐瑾。



此情無計可消除

——給愛妻彤

徐文立

彤：

今天16/5見到妳3/5信。這些天真是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妳的信。妳的每封信所給我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可能是妳四月份沒寫信？所以讓我如此久盼，以致惶惶不可終日的怕妳病了，累了，怕孩子不舒服了……今後不管如何，每月中旬一定給我一信，寥寥數言也好。

彤，我怎能不天天想念妳和孩子，每天清晨五點左右開始睡不着（因中午睡了），就用這最靜最靜的時刻想妳和孩子，這是我一天最美好的精神享受的時刻，想我們的過去，想像妳和孩子的現在，尤其憧憬我們的未來，我這個人雖然著重現實，但更喜好憧憬未來。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我是未來派，或算個理想主義者；然而在我的現實生活中，却又是個地地道道的現實主義者。這可能是我的最大特點，又是最大缺點吧！

彤，前二天想妳和孩子，想得作夢全是妳和孩子。……（編者按：此處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目，却上心頭。」不過我堅信未來是美好幸福的，一定是。如若不信，妳有空可帶孩子到雍和宮去看看那座象徵未來的巨塑如來，妳看那是多麼安祥靜謐，充滿信心。原旨的宗教形象並非「偶像」，從來是千百年來人們美好嚮往和喜哀好惡的化身，是人類解釋世界的一種方式。只是當政教合一，成了權力的婢女之後才被異化了。可是善良的人們自己心中總是自蓄有自己的上帝的形象，甚至一個外形相同的宗教形象在不同人的心中，總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形象。這也就是宗教歷久不衰，它的神靈總是在各國不同語言、不同信仰的名著中迴蕩，而我們現在也不主張人為消滅它，並容忍共存的奧妙所在。

彤，所以妳才能在十渡虛無的「望佛台」

上仰望見慈佛啊！這叫佛心自在。正如我常常能從信中看到聖母樣，儘管字迹歪歪扭扭，忽大忽小，不時還有幾個錯別字，或不甚通暢的句子，那都無甚妨礙。每每談起歸宿，妳可能以為是我偏愛，而太重了妳；其實是妳常有的妄自菲薄還在作祟。動筆固然要有技巧，我却更以為是心地純正，真情實感起決定作用。試看了玲的莎菲女士日記，不就是有膽魄、真敢坦露胸臆嗎？歌德的維特蜚聲文壇二百年不亦如此！寥寥幾筆描述孩子如何纏繞在大慈大悲的綠帶週圍等賜麵包，別人給的不吃，不就足以使億萬讀者的心微微顫抖……真善美啊！

彤，十分高興地讀到妳和孩子去十渡的遊記，如飲一掬清冽可口的泉水那樣浸我胸脾。八一年遠遊原本十渡，不知怎麼渡到諧和澗去了；這次妳們能去實在對。那時我正對塵事感到厭煩，為咱仁人準備下了白球鞋以便日後多和妳和孩子去遠遊的，可惜……

彤，世間從來否極泰來。國家正在一天天真正富強起來，人民生活也一天天真正富裕起來，儘管還有不如人意的的事情，眼下的中國畢竟天天在變，我們是不會被生活所拋棄的。

彤，如妳所盼，我一定會同妳們再遊十渡的，以至故鄉舊里，天下的名山大川。到那一天，望妳能更加朝氣勃勃，與我同遊。不過到那時妳一定找不到妳和孩子愛戀的故景。記得我從六二年開始，和二哥、同學四次徒步去八達嶺，去官廳水庫、燕山山脈，就沒有一次能重訪舊景。我想這是大自然造物主的創造力太偉大大神奇了。它總是每日每時地在改變着大自然的風貌，好像故意讓人們每有所得似的。這是任何城裡人造公園不可比擬的大自然美啊！唯她最美！當然遊人的心迹、足迹又何不總

第 3 頁

年 月 日

第 2 頁

徐文立致妻的信的原稿

形，從遊記上看到孩子在妳精心的愛憐下，仍然能這樣無憂無慮的像小鹿一樣歡暢，最令我欣慰。可是我怎能不知道我那慈悲的孩子怎

何時回？……

會不有時獨自出神的思念她的爸爸……！是我

的罪孽嗎！……：儘管如此這般，我也難免「嫉

妒」妳暫時獨享了這天倫的幸福，我只能從信

中，想像中稍許的分享一點。總而言之，我是

由衷高興的，放心的，而且深深地……：「嬌

倚母懷，囚父得歡快，賢妻從容立，愁雲不復

來。」（八三—十題彩照）記得不，那年遠遊

，孩子還要我背著爬山，朋友們背，現在已能

自立而遊了，怎能不高興，怎能不感慨，這裡

面包含著妳多少辛勞和愛憐啊！這是對妳無數

心血的酬勞啊！儘管妳從來不想到這一點。只

有妳才配啊！

今天17/5見到19/4信，唉！妳四月份怎能

（1156）

徐文立給愛妻形的原稿信。

不來信啊！看信的當兒，我眼眶肯定紅潤了。特別謝謝妳送我的裴多非的名詩。我也學著給妳和孩子寫了不少詩哩！是啊，是激流，是稠林，是階梯，現在和過去妳已如是了，今後該輪我了。以前我雖細心體貼過，却也未能讓妳過上一個女性應有的美的生活。

形，還記得我為妳買的那塊只有鄉間老嫗才肯配戴的線質方頭巾嗎？當時我是看了許多女人戴的方頭巾多漂亮，哪裡知道只有純毛的才能顯出華麗的美色。可惜當年缺錢啊！女人總該比男人更愛美些，這是自然的。日後待我自謀職業，勤做苦勞，一定要讓妳過上更美的生活，做妳想做、愛做的事情，不讓妳再為我就憂，我將為此竭盡終生，使妳青春常在。

從圖上看到咱家的立櫃和碗櫃，好看，總算也有了，可都是妳操持的啊！晶兒可以自我欣賞即興舞了。妳一定不可太累，將來一旦有條件就為妳買雙缸洗衣機替代妳這人工洗衣機。家搬好沒有？妳累着了嗎？甚念！我4/5信收到了嗎？妳身體檢查結果，我放心。妳說車子，怕得換帶、大修，又有行家修就不必急，多花點錢，安全就好。六月接見尚不知哪天？來時方便的話，請借馬恩全集（二），三國下冊，今年紅旗，西放論叢下，上已有。其他帶點名著雜誌由妳定，注意不要有「內部發行」字樣，和他人簽名。另帶涼蓆（家中有的，不要花錢去買）、藥皂，家中那件短袖尼龍衫。油沒吃完，只是騰空瓶罐。其它不再花錢，錢也不必帶。我身體精神很好，請放心！從電視上看到電影「赤橙黃綠青藍紫」及法國電視劇「兩個新嫁娘」。

編者按：此信寫於八三年。

妳的文立 六、二交

痛并不在醫生的身上。作爲醫生應視患者的苦痛如同自身的苦痛一般，千方百計地想爲患者解除這苦痛。自然也不能着急，要有耐心、韌性。天天都着急，會把自己急死的，那就不能爲更多的患者服務了，也就不是一個明智的醫生。

瑾兒，爸爸去年離開你的第二天（四月十日）正是你要參加學校組織春遊的日子。春遊對於孩子是最有吸引力的，正因此，你的這一次春遊竟成爲我一年多來常常懸念的大事。（那天接見又竟然忘記！）不知道你去春遊了嗎？（也不知道你媽媽準備第三天給你婆婆掃墓去了嗎？一定更難過。）我給你準備的吃的都吃了嗎？好吃嗎？我可能爲你準備的都盡力準備了，而沒用你攢下的「鋼貝兒」，就是你四月七日晚上捧給爸爸看的，你已經用紙包好的七毛錢「鋼貝兒」。那天，妳好像看透爸爸口袋裏僅剩一塊錢了一樣。（現在爸爸這個「敗家子」不在，有妳媽媽這「聚寶盆」，再不至於這般窘迫的。）爸爸問妳，春遊要交錢吧？妳說，爸爸爸爸，我都準備好了。爸爸看着妳小手捧着的那包「鋼貝兒」，含着淚笑了。我說，傻孩子，怎麼能用妳的錢哩！我「慷慨」地把那一元錢給了妳。到了晚上我祇好來「榨」妳媽媽了。這次祇「榨」出了僅有的二毛錢；每次妳媽媽挨爸爸「榨」的時候，都是「無條件徹底投降的」。祇好又「偷偷地」借了妳四個五分的「鋼貝兒」，第二天帶着上班去應付這天的午餐了。終於還剩下一毛五分的壓兜錢。好在這天下午領到了三月份的獎金，午餐補貼和交通補貼十幾元錢，這本是應在月初發的。九號下班才可能上街爲妳準備了較豐富的野餐食品。可是，至今不知道妳去了沒有？吃好了沒有？這是我每想起來這件事既感到心

碎又感到欣慰的。

瑾兒，現在每當爸爸想到這些年來，終日忙碌，無暇悉心照顧妳，很少時間陪妳玩。管教妳時又過於簡單，甚或暴躁，讓妳媽媽有時也不好受，爸爸真是無限的內疚和不安，以至悔恨。也許是在這兒的緣故，常常達到炙心的地步。尤其去年八月一日，爸爸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法國的戴高樂老爺疼愛他女兒安娜的軼事，更是百感交集，令我汗顏。戴高樂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國難當頭的時候，他挺身而出，抗擊法西斯直到取得勝利；和平時期，經濟建設中他也是兢兢業業；當他不當勝任，選民們不客氣地不再選他的時候，他坦然地甚至拒絕任何告別儀式而默默離開了愛麗舍宮。這樣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又是多麼深深地愛撫他的安娜啊！愛得那樣的體貼入微，高尚而又純粹。簡直是一顆偉大而又富於父愛的心。當然他追求的對女兒的愛，也祇是願他的女兒和其他人一樣，並不祈求有什麼與衆不同的殊途。這就更令人崇敬了，因爲他是有條件不這樣做的。（請參閱一九八一、八、一人民日報國際副刊，每星期日這版不錯。）

瑾兒，不可能寫得更多了，爸爸每想寫這些，總是激動不已！去年十月二日是爸爸和媽媽結婚十週年的紀念日，又是妳媽媽生日的前夕，爸爸是多麼想實現埋在心底的夙願，出她意外地送妳媽媽一個小小的禮品，哪怕是整隻腳、最廉價的哩！因爲爸爸是那樣的窮。可惜這一切祇能再次默默地埋入心底。妳媽媽是人世間最好的媽媽，她經歷了她同時代人最大的磨難和坎坷，她最懂得應該怎樣愛妳、教育妳長大成人。妳要好好聽她的話，好好學習本領，做一個有出息的人，成爲妳媽媽心上最大的快樂。

孩子，爸爸已經有一年零四個月沒看到妳了，但爸爸能常夢見妳那可愛的小身影。有詩爲記：「吾兒荷傘漫步行，呼兒兒喜淚淋漓，父女俱依臂交頸，頓覺心兒甜如蜜。小瑾急呼找媽媽，驚動我心突然醒，雙眼緊掃禿牆壁，可憐竟是夢中情。」（八二、六、一〇）爸爸現在注意鍛鍊，每晚刷牙，睡眠亦好，爸爸一定會儘早健康地回到我可愛的寶貝的身邊。到那時「雙雙凝眸向吾笑，歸日不從夢中瞧。」（八二、一、八）

回頭看，光陰似箭。今年暑假就要結束了，入學妳就是四年級的大孩子了，爸爸相信，妳一定會學習得更好。當然也要注意身體鍛鍊、休息和娛樂。這一年來，妳的扁桃體沒有發炎？沒有發過高燒？爸爸相信沒有，因爲妳會注意鍛鍊的。媽媽有時間帶妳到公園去玩嗎？一定要去的。以後再有寒暑假，如果可能的話，可以讓妳媽媽陪妳到四爺爺和李阿姨那兒，學畫中國畫和彈鋼琴。一個假期學會一樣，日後再鞏固、提高，要刻苦，這對陶冶一個人高尚的情操是必須的。我和妳媽媽都沒有這條件接受這樣一些必須的訓練。當然不可能做到，就不要勉強。

瑾兒，本應該在這應該讓妳祇有歡樂而沒有憂愁的日子，給妳以最美好的祝福，可是現在不得不以這長信，來作爲父親對女兒的十歲生日的祝願，我相信妳媽媽會替我做到我應該做的一切和我做不到的一切，而且她也會最敏慧地把這番祝願告訴給妳——我親愛的女兒「瑾」。

爸爸緊緊地吻妳，我的女兒！

妳最喜歡稱爲小爸爸的徐文立
擬於三十九生日·一九八二年十月廿九日寫·十一月廿九日定稿

北京怎樣對待

政治犯

作者簡介：柯力思，男，中國大陸赴美研究生，主修理工科，長期從事民運活動。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柯力思

中共標榜其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歷史的轉折點，在三中全會後全國各條戰綫都有明顯的變化。對於政治犯的鎮壓、迫害，也較從前緩和、減少。姑不論這是不是文革後客觀的社會背景不容許中國的政治犯再受到從前那種極不人道的待遇，但僅就中共本身來說，無疑是一進步。但應指出，這只是一小步，以我國現有的條件，中共還可以跨出更大步。本文擬就三中全會以來這段時間，中共政權對政治犯的逮捕、關押、審訊過程作一綜合性的報導。由於中共不承認政治犯這一事實，逮捕、審訊又經常秘密進行，使人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政治犯在押，無法作一全面的調查，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的一一加以陳述。但本文根據部分釋放的政犯及一些仍關押的政治犯家屬的口訴整理寫出，完全是事實，也有其一般性。在寫就本文前，作者呼籲中共（註一）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尤其是那些主張改革、民主的有理想的青年

們，釋放他們會促進改革的順利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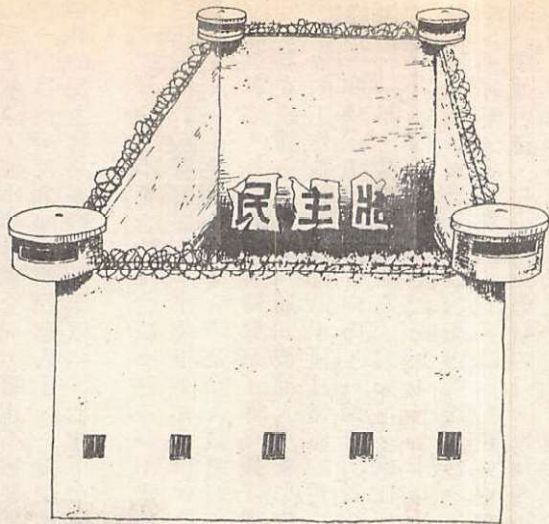
一、逮捕前

公安保密系統已不再像從前那樣只因三言兩語對黨、對領袖「不恭敬」就逮捕人。經過文革的衝擊，全國人民普遍覺醒，公安人員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但由於職業所要求扮演的角色及本身切身的利益，對於敢大膽放言的人，雖然他們還無法斷定這些言論或行動是否合乎或者將合乎「中央精神」，都特別注意，登記在案，並有專人收集、記錄這些人的言行。對於事態「嚴重」的，如民主牆、民刊活躍於全國時，各地的積極活動份子，都各自被另立專案，由專人負責監視。所以即使當鄧小平先生同意並讚揚民主牆的時候，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沒逃過監視，而在鄧小平下令捕人時，從前的言行歷歷在案，都作為罪證列出。除了公安

專業人員外，還有一些「業餘」外圍人員配合工作。如在這些立了案的人的工作單位指派專人（通常是這些人周圍的黨員或入黨申請人，後者表現尤其積極）匯報這些人的言行；在這些人的居所則由居民委員會負責（北京人戲稱「小腳偵緝隊」因為居委會多數是那些兩扇順風耳、兩排伶俐齒的老太太們）；有時還藉口「查戶口」出動「片警」突擊檢查。於是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的言行，如這一天什麼時候在單位裡？不在單位時去了哪裡？在家裡有些什麼樣的人來訪？何時來？何時走？無不落在他們的眼裡。這還不夠，因為這只不過反映了這些人的表面活動，只靠這樣的匯報，無法發掘這些人內心深處的想法，所以又派了一些受過一定訓練、懂得怎樣獲取情報而又不引起懷疑、無職業特徵的非專業公安人員，給他們點「實際的」好處，叫他們冒充右派、階級成份不好份子或文革慘遭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等等

，故作偏激、不滿言論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取得民運活動份子的同情、信任，打入這些民運、民刊組織核心，全面掌握他們更深一層的動態。

雖然掌握了這些人的「反黨」言行，也收集了「證據」，公安部門並不立即逮人。這些人都是社會上，甚至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人，公安部門不敢遽下命令拿人，他們拿不準自己



的魯莽是否會闖禍、是否符合當前政治需要（而不是合法不合法。）如果造成惡劣影響，他們自己也吃不完兜着走。要逮捕這些「要犯」，公安部門也得層層上報，以便推卸自己的責任。七九年「十一」徐文立領頭的北京長安街遊行，就是在他們層層上報的時間差上順利達成。可是即使不立即逮捕，却不能放鬆掌握這些人動態的佈置。哪天政治需要時一聲令下

，手到擒來，所有「材料」俱全；預審定罪時，公安人員充分掌握主動，這些人想「抵賴」也無從抵賴。

和三中全會以前相比，逮捕前的準備工作較多、較細緻，「潛伏期」較長；相對的「冤案、錯案、假案」較以前少。以前甚至沒有「潛伏期」，說抓人就抓人，先抓再說，錯不錯沒得說，抓你就沒錯；而且還有按配額抓人的政策。人盡皆知打右派就是「有計劃、按比例」進行的。現在這一進步，並不完全是中共主動改變作風，而是與人民群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公安人員）的覺醒分不開的。以前人們不知有政治犯，只知道「反革命」，「反革命」企圖破壞社會主義新中國、危害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敵人，對待敵人好像嚴冬那樣殘酷無情。文革後絕大多數人（包括一部分公安人員）則同情甚至支持政治犯。這樣的輿情，使人治的官僚作風體系下的公安人員害怕；弄不好得擔責任，為避免責任也就不敢輕舉妄抓。但像「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群眾反對之聲就不那麼強烈，中共就還是拿出一套：按配額抓人。其中當然不乏一些影響小甚至默默無聞的「持不同政見者」被抓來湊齊配額，送往青海勞改。

二、逮捕

三中全會以來，全國各地政治犯的逮捕實際上一直沒間斷過。然而，在國內除了被捕的政治犯親屬及接近他的朋友外，却鮮為人知；尤其各地民刊紛紛停刊後，消息更無從獲知。一來因為公安部門經常利用一些藉口造成刑事案件的假象。如魏京生最初就是以「探索」某一成員「盜用汽車」的罪名連帶被捕。陶森、趙南（原「四五論壇」成員）以「宿娼」的罪名被捕。另一方面則改進逮捕、審訊方式，盡

量縮小影響。他們深知絕大多數人同情政治犯，不願造成「法西斯專制」的形象，不再像從前那樣大張旗鼓的逮人、開大會批判、公審；而是靜悄悄的在深夜進行。會同「片警」（居住地派出所人員）、被捕人工作單位保安系統人員（如果住在單位宿舍大院裡）和居委會負責人，在出示搜索證或逮捕證（雖然不是由司法部門簽發，可這點比從前懂得用「法律武器」裝點門面）後，開始地毯式的搜索。帶走一切筆記、日記、信件、油印刊物，凡一切非鉛字印刷的白紙黑字幾乎一律帶走，也無暇分辨，先帶走再說。書籍、報紙等印刷品嘛，看都不看。因為國內印刷廠無一不是國營，無一不在黨的控制之下，鉛字印刷品是「安全」的，不用多此一舉。但書都被扔出書架，得檢查書架有無暗藏東西，還得檢查書架後的牆壁。牆的每一寸、地板的每一寸都要經過敲打證實有無暗門，所有箱子、櫃子都來個底朝天。集體合照都帶走，誰知道是不是「反革命集團」！錄音磁帶，更無暇聽了，管它是外語教學還是流行歌曲，統統帶走；有時甚至錄音機也帶走（作為罪證？）。搜索過程相當粗暴，一屋子的東西凌亂的撒了一地。本就心碎的家屬，看了這亂樣更是心碎，以後得要好幾天收拾。但是搜索的聲音不大，以避免驚動四鄰（註二）。當然最主要的是把人帶走，一進來不由分說，就先給帶上手銬，人是認得的，因為盯了很久了，局裡也見過他的玉照。帶手銬的那一刹那，還要「立此存照」，用附有閃光燈的相機拍下（好向上級交待？或是作為將來的宣傳材料？）

除了改在深夜抓人外，不易為人所知還有一個因素：打擊面盡量縮小，一、不牽連家屬；二、只逮捕某些重點對象，對次要份子，則視情節輕重，分別予以隔離審查、傳訊、約談等等。至於哪些是重點對象、什麼時候進行逮

捕，全以「中央精神」為憑，決定權並不在公安部。中央則根據當前政治需要及黨內權力鬥爭形勢來決定。八一年四月全面鎮壓、逮捕各地民運主要負責人，即由鄧小平拍板、彭真掛帥，中共中央書記處直接指揮，協調各地省一級公安部門進行。什麼人不能逮捕得向書記處請示。八〇年「一·一六講話」已顯露鄧小平對民運的不滿，鑒於波蘭團結工會對波共政權的衝擊，八〇年底九號文件決定鎮壓民主運動，但一直要等到八一年四月，華國鋒的勢力完全解除，鄧小平控制全局，再也不需要那些一度為他平反和呼籲的民運人士、一度受他稱許的民主牆來牽制「凡是派」，他才下令逮捕。

逮捕完全不管合法不合法（註三）；逮捕時往往沒給家屬逮捕令，家屬也不知道以何罪名逮捕人。在接到逮捕命令時公安人員還沒確立逮捕罪名，往往在預審時羅織了罪名後才通知家屬在逮捕令上簽名、通知被捕人所在單位開除他的工作職務，通知派出所註銷他的戶口及糧食關係。這段時間短則兩、三個月，長則半年、一年，甚至遙遙無期；家屬得不到任何一點消息，四出打聽也毫無結果；若是刑事犯好歹能漏出點風聲，但政治犯這問題太敏感，誰也不願意去惹這麻煩。有些政治犯在外地被捕（像傅申奇、何求、陳爾晉等），家屬毫不知情，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應在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家屬，却根本未這麼作。家屬不知道這些人到底出了什麼意外？為何久久不歸？去派出所報案，派出所也故作不知。大約半年後，因氣候變化，通知家屬送衣物，家屬才知道被捕。但為什麼被捕？現在關押何處？仍然一概不向家屬說明。至於請辯護律師，家屬則更無置喙餘地，也無任何律師敢主動承擔這類案件。儘管刑事訴訟法規定家屬有權聘請律師以保障、維護被捕者的基本人權。

三、預審

政治犯被捕後立即送預審處預審、關押，一直到法院判刑，確定刑期後才轉移至監獄。一般而言，預審處與當地監獄一牆或一網之隔而已。像北京市公安局的預審由座落在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的K字樓市局七處執行；魏京生、任曉町、徐文立、楊靖、路林、劉念春（劉青之弟，「今天」的成員，因為將劉青的獄中筆記轉送出版被捕），女犯傅月華、張諄等都在這裏「蹲」過。

對政治犯的審訊已不再採取惡劣而笨拙的刑求，預審人員也都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說善道。政治犯被捕後立即展開審訊，一連數



著名民運人士劉青在民主牆前演講，不久他就被捕了。

天數夜，不讓休息、睡覺，用強燈光照射。預審人員由三、四人組成。一個訊問，一個筆錄，每次兩人，輪番上陣，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以抗拒從嚴、家屬的安危來威嚇逼供，或者以坦白從寬、站在人民的立場反戈一擊來婉言相勸。這時候，逮捕前長期收集的各種材料更是派上用場。預審人員有意提醒受審者何時、何地作了些什麼，他們掌握了哪些證據，來套供。但只是很技巧的提示，他們堅持受審者自供全部過程，美其名為給受審者表白認罪態度的機會，甚至可以戴罪立功。事實上，他們希望從受審者不自覺的口供中獲得更多的、他們沒有掌握的資料。更有甚者，他們常用掌握的材料或被隔離審訊的其他人不自覺的陳訴中的隻言片語，欺騙受審者，告訴受審者的同伴已把一切供出來了，以此打擊受審者的信心，達到誘供的目的。各種精神壓力，及體力的不支（幾天幾夜不眠，甚至不食），使受審者的精神狀態處於迷糊、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按公安人員預定思路設想的罪狀就被誘、套、逼的供出來。這些供詞常常與事實不符。但被審者這時候的精神狀態往往無法作清醒有力的反駁。而這些簽了名的供詞是日後審判最有利的，甚至是唯一的證據。預審人員得到他們認為較滿意的供詞後，審訊才告一段落。受審者被解下手銬，有一定的休息、睡眠時間，但被安置在隔離的單身牢房，以防走漏消息或串供。審訊並沒有結束，受審者還要不斷的接受曠日持久的盤問。預審人員必須把每天的戰果層層上報；如果上面不滿意，打回來，審訊得從頭來。政治犯多全國串連，而審訊又採取「戶籍主義」，即不管人在何地被捕，一律送回戶籍所在地公安部門預審，同一案的政治犯往往往南地北各據一方，預審人員得到全國各地去核實口供。直到取得上級滿意的口供，直到把整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各種細節



大陸一名政治犯在強迫勞動中。

，包括思想根源都挖出來；審訊才算完結。整個審訊過程的長短，當然也視案情的簡繁、範圍的大小而定，可更主要是視受審人的「影響」而定。影響大的，審訊謹慎，不敢作主的層次多，一級級上報，時間就長；影響小的，往往草率，時間就短。有時候被逮捕的人身上實在搜羅不出什麼罪證，無法送檢察院起訴，只好經年的拖下去；最後，給定個三、四年勞教，送勞改農場勞改，不了了之。勞教不須經檢察院及法院審定，公安部門就有權決定。既無罪證，為什麼不把人放了？在大陸就沒有捉了人不加處分就放回去這一說。放了人不等於承認錯誤嗎？專政機關是永遠不會錯的！

無罪推定這概念在預審人員的大腦裡是不存在的。下令逮捕的那一刻，等於宣判了被捕者的罪行。預審人員所要作的只是得到口供及進一步的證據來證明他們的逮捕行動並沒有錯誤。他們得不斷的向上級匯報審訊結果，篡改口供，製造證據，從受審者的言行、文章中斷章取義，找出「反革命」言行，得出的罪名符合上面的意圖及預定的刑期，整個審訊過程才基本完結。以反革命罪名簽發的逮捕令，這時候才由被捕者或其家屬過目簽名。被捕者正式開除工職、停發工資，註銷戶口（註四）及糧食關係。這時候才算塵埃落定，罪名、刑期大致確定，檢察院起訴及法院定案不過是走過場的把戲。家屬在這時候或者稍晚些可以得到通知，送些衣物及日常用品如牙膏、牙刷、肥皂等給政治犯使用。預審處重新安排牢房，影響大的政治犯仍舊囚在單身牢房；不大的，常與刑事犯同監，但多是小牢房，頂多三、四人關在一起。只等法院判刑確定後移監。

誠如一些預審人員在預審時對受審者所說的：「你的罪可大可小。好好和我們合作，如果認罪態度良好，一切可以從寬，甚至無罪釋放，如果態度惡劣……你看着辦吧！」預審人員幾乎掌握了生殺大權。雖然上面的意圖早已決定了預審的方向。但預審人員是具體工作者的命運。預審已由偵訊過程變成定罪過程。在逮捕到判決的整個過程中，預審扮演著最重要的一環。對政治犯不再刑求，這點較從前進步；可是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虐待依然如故。而預審這一套，完全違背法律原則，與從前毫無二致。我們堅決反對這種「有罪推定」的預審程序。有罪、無罪，刑期長短，應由法院憑罪證依法裁決，而不是根據行政部門的意圖，更不是根據認罪態度定奪。公安部門在逮捕人後，依法偵訊，在一定時間內如沒有掌握充分而必要的證據，應立刻無罪釋放或交保候傳訊；如掌握一定的證據，應依法在一定時間內送交檢察部門處理，並通知家屬，延請律師等等，以保障被捕者的權益。

四、起訴與判決

政治犯的罪名、刑期，經過反覆「推敲」，在預審階段差不多已經確定不移。可是，裝點門面的招牌「民主與法制」還不能不要，檢察院偵察起訴、法院開庭審判的把戲即使走過場還要走。和以前不同，和八三年打擊刑事犯不同的，是政治犯不再在人民群眾大會露臉，開展批判。相反的，採取連家屬都不在參加之列的秘密審判。

公安部門將口供、「證據」和「犯罪」活動報告送檢察部門後，檢察院循例派人到預審處提問政治犯「瞭解」案情。文革後重建的檢察部門，固然也沒逃過點綴品命運，但多數人內心極力想爭取司法獨立，尤其不願受公安部門的宰制，不同意他們的採證過程，經常從

法律觀點駁回站不住腳的論據。檢察部門和公安部門不是同一系統，但同樣受黨的領導。領導人的意圖當然也直接或間接通過公安部門傳達給檢察部門。通常是檢察部門屈服於黨的指示，根據既定意圖，寫起訴書；然後，很快進入庭訊過程。若據理力爭；經上層協調，到公、檢雙方都作某種程度的妥協，政治犯要熬上一段不短的時光才能上法庭。遲遲不開庭，家屬就遲遲得不到任何消息，政治犯遲遲不能安定下來。但熬這一段還是值得的，有時能爭回日後好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光。檢察部門負責人在起訴書上簽字後，才確定開庭審判。

司法部「推薦」數名律師，由被告選擇。如果被告不選這些人而選了其他律師，司法部則從被推薦者中指派一名。若被告還不同意，乾脆就無辯護人。魏京生因不同意指定劉某為律師，乃自己辯護，即是一例。家屬沒有聘律師的權利。只在律師被選定後，才通知家屬，誰是辯護律師，並替被告交納律師費。家屬企盼從律師處得到點消息。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幹部的律師却始終守口如瓶，甚至避而不見。家屬問得緊時，他不但顯得不耐煩，還擺出一付冷眼瞧反革命家屬的姿態。有時被告想安慰家屬，或家屬想慰問被告，想通過律師轉達，律師連這也懶得理睬。也不告訴家屬何時開庭。一來他不能說，二來他確實也不知道。他三番兩次的接到開庭的通知，却又往往取消或延期。

開庭時間不定，乃由於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法院系統要求司法獨立的傾向更甚於檢察部門。許多法官不同意政治犯的審判，不願違背良心，當審判把戲的傀儡，又不能公開表示，只有找法理推托，不接這燙手山芋。不得不接時，往往在「預演審判」階段就不能按既定意圖審下去，只好一再撤換庭長。二、政治犯個個才思敏捷，口若懸河，不少更視法庭為民主

講壇，與呆滯木訥的審判員形成強烈對比。當局有鑒於此，為使審判按計劃順利進行；在正式審判前，先來個預演、排練。只知按上面意圖辦事的審判員往往被被告駁得不知所措；就得一再換審判員。三、「底下人」聽「上面」的「照章辦事。但上面意見不統一，老意見被新意見壓倒時，底下人又得重新來過。即使預演，事事仍難如他們所料，政治犯都是當今中國思想界拔尖人物，豈會受他們任意擺佈。審判文立前，過堂了二百多次，但正式開庭時，審判長第一句話就被駁得招架不住。審判長問徐庭上有無必須迴避的人員。徐答以：審判長在審判前曾去牢裏找我談話要我認罪；審判長既已先認定我有罪，審判乃有罪推定，毫無公允可言；故請審判長迴避。弄得審判長手足無措、目瞪口呆。旁聽席上一人頻向他施眼色，甚而比手劃腳，也無濟於事，只好宣佈暫停。

審判魏京生時，報紙、電視在全國範圍都開展了批魏報導。中共當局原想藉此殺一儆百，並抹黑民主運動，收一石二鳥之效。沒想到這一來反而替魏京生作了大量宣傳，引起多數人的同情。從此，政治犯的審判均秘密開庭。既不通知家屬何時開庭，更遑言列席。有時臨開庭前在法院門外掛出公告牌，但一分鐘不到就收進去。多數情況連這都省了。甚至把法庭門窗關得水洩不通，並單上黑布，如臨大敵。只有極少數政法部門幹部被挑選來忝列一席旁聽。庭訊時，檢、法雙方互相配合，用一些長串的名詞給被告戴上帽子，歷數罪狀，並發表宏論教育被告一番。被告的答辯常常只講一、兩句就被打斷。而律師，往往不能從法理上為被告辯護，反而承認被告有罪；只是說些，被告無知、受人煽動、不是主謀、文革遺毒太深、請求庭上寬宏大量、開恩減刑一類的話。旁聽者不是觀看一場原、被告激烈舌戰的審判，簡直像來上一堂頌揚「社會主義好！就是好！

的政治教育課。

定讞後，家屬很快收到判決書。直到此時家屬總算有了政治犯的初步消息。比起毫無信息、終日焦慮的等待來說，這個不幸的消息反而讓家屬心理感到踏實些。政治犯由中級法院審判，判決書上載明：不服判決，在十天內可向高級法院提出上訴。高級法院複審不開庭，只是紙上作業。家屬接到二審判決書時會發現，和第一張判決書幾無二致，只是在末尾多了一句：證據確鑿，被告尚妄圖狡賴，維持原判。

五、服刑中

二審判決確定後，政治犯才由預審處轉到正式監獄服刑。監獄設備簡陋，甚至沒有床鋪，得睡地鋪。牢房潮濕，許多牢房只能透進一點陽光。但牢房裡亮度極小的燈，却終日通明，夜裡睡覺時也不許關掉。重要政治犯仍被囚在單身牢房；影響小的，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單身牢房的正對面或左右，往往安排三到四個刑事犯監視政治犯的一舉一動，隨時匯報。政治犯上廁所、放風、洗澡等由他們輪流跟着，但不許與他交談。囚在單身牢房的，往往不派工作；和刑事犯一起的，則和他們一樣勞動，如裁縫、製鞋一類手工活，領取微小得可憐的零用錢。一個牢房每天給一桶水，洗刷吃喝全用它們。單身牢房在這點上顯得待遇較好。但幾乎所有關押在單身牢房的政治犯都抗議這種不人道的單獨囚禁。進入監獄一段時間後，政治犯才開始有「放風」見見天日的機會。逮捕後到現在幾乎都在黑暗的小鐵籠裡。第一次放風，那陽光、空氣，是有生以來最親切可愛的。按獄方規定，每天應有一定的放風時間；但實際上，放風變成恩賜，全憑獄方高興，視服刑表現而定。當然，政治犯放風的時間和刑事犯錯開，而且是單獨進行的。開始放風後，獄方

通知家屬會面。會面只限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一或兩個月一次，每次三十到四十分鐘左右。但很多地方的探監制度沒有建立。像家住北京的家屬，總是在家盼着通知。通知是在獄方允許後，由政治犯寫家信通知會面時間。遇有重大的黨或國家會議，會面時間就延後到開完會時；偏偏這類會議在北京召開又特別多。有一次楊靖家屬長達八個月未接會面通知，一再的去北京市第一監獄詢問，均得不到隻字片語的回答。八個月後見面，才知楊靖因託人帶紙條給魏京生被獄方截住，罰他禁閉半年。魏京生有一次也被罰禁閉了一段時間。那是在徐文立關進去後，魏聽說有一重要政治犯關在另一頭，於是設法打聽遞紙條，被獄方發覺。家屬會面時，可帶一些書籍（內部發行的除外）、日常用品、衣物、小量食品，經檢查後轉交給政治犯。第一次會面，往往是相互抱頭痛哭，但隨即被拉開，並被告以「下不為例」。以後會面總是隔着桌子或什麼的。每次總有男女獄吏各一人在旁監聽。當提到一些獄吏認為出格的話題，就被打斷，並被告以如再談起，會面立即停止。所以家屬會面僅止於問問身體，說說家常。獄中情景，家屬均不得而知。共產黨的監獄是「改造場」，政治教育不但免不了而且加倍的頻繁。政治犯還要定期寫檢查作總結。獄方供應人民日報，作為學習材料。有個電視室，遇有重大慶典、講話，電視轉播時，政治犯、刑事犯都得收視。偶而也選些娛樂節目如連續劇或電影故事片，組織受刑人觀賞。但重要政治犯需要隔離，所以他們收視的機會就比其他入少。政治犯的飲食沒有其他犯人那麼差。單身囚牢有時還享有自己動手煮些簡單食物的「特權」。

結 論

中共司法部長鄭宣最近宣稱：中共已頒發了一千五百多件法律、法規，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系統已經初步形成，中國基本走上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依法治國的軌道（註五）。我們希望中共真正落實。首先，我們要求依法逮捕、偵訊、起訴、判決，並把這一個過程公開；要求司法獨立，司法不受公安、黨政部門左右；要求廢除公安部門的預審制度，改由檢察部門偵訊；要求所有政治犯的案情公開、重新審判。最後，我們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

註一：同時也呼籲國民黨釋放所有政治犯。因與行文無關，所以另在註中提出。非獨厚於國民黨也！

註二：這裡說的是八一年四月全國性鎮壓政治犯。八三年八月的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則與此相反，公安部門極力造成聲勢，捕人幾乎都在大白天，大街小巷警笛咻咻作響。

註三：八三年八月，中共宣稱要整頓社會風氣，必須「嚴重」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此一行動實際與歷來的「運動」類似，各地公安系統按指示的人口百分比捉人。不少「異己份子」，在這次運動被捕。作者認為一個法治的社會，其治安應靠持續的、有一定標準的法律制裁來維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只要犯罪證據充足，不論何時、何地、何人均應逮捕。反之，則不應逮捕。而不是視政治需要，掀起一次次的清洗高潮。去年底，國民黨當局的「一清專案」真是無獨有偶，隔海同唱對台戲。

註四：八三年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時，特別明文規定，註銷「犯罪份子」的城市戶口。這就意味着：終身流放，犯人刑滿出獄後，不能回原居住城市及其他城市定居，只能呆在廣闊的天地——農村裡，「大有作為」！

註五：見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版。



中共常常發配一批批的政治犯去邊遠的山野中墾荒、築路。

步向法治之路

中國法律專家費能文博士談 中國法律改革



費能文教授接受本編輯部訪問時攝。

時間：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地點：美國紐約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辦公室

被訪者簡介：費能文教授（James V. Feinerman），美國前哈佛大學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費教授曾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法律有深刻研究。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費教授曾邀請王炳章博士前往哈佛法學院演講。一九八五年五月卅一日，費教授應邀來訪中國之春編輯部，就中國大陸法律改革與本刊編輯們侃侃而談。下面刊登的，是錄音整理稿。此稿曾經費教授過目。中代表中國之春，費代表費能文教授。

對中國法律感興趣

多次訪問中國

中：您是研究中國法律問題的專家，數次訪問中國，今天特來請您談談中國法律制度的改革問題。您是否先介紹一下您的簡歷？

費：我是在美國芝加哥出生的，在中學時開始學中文，從此對中文發生了興趣。中學畢業後入耶魯大學，專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一九七一年在耶魯大學畢業，並參加雅禮協會（YALE—CHINA），此協會成立於本世紀初，起初是耶魯大學和湘雅醫學院（現為湖南醫學院）的友好團體。後到香港中文大學教了二年英文。一九七三年我回到耶魯研究院，研究東方文學。在研究中國文學的同時，我還進入哈佛大學東亞法律研究所，向科恩教授學習，他在哈佛約教了二十年書，八一年退休。他的中文名字叫孔傑榮，前些日子在台灣出任江南夫人崔蓉芝的代表律師。在一九七九年我得到兩個博士學位，一個是耶魯大學文科博士，一個是哈佛大學法律博士。七九年初中國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後，我才得到到中國留學的機會。我是第一批美國國

家派出的留學生。當時，美國派到中國的公費留學生有三十人，五個人學法律。我原來想入北京大學進修法律，但學校說法律系不對外開放，不接受外國留學生，所以我祇好學中文。除中文外，還有歷史系、經濟系、哲學系接受外國學生，其他的系不接受外國學生，那四位美國留學生有三位入經濟系；另一位入歷史系。我在北大留學約有一年，以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律研究所作研究工作約四個月。

中：您第二次何時到中國？

費：我第一次從中國回來後，在紐約華爾街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一九八二年，我申請到富布賴特基金會（FULBRIGHT FUNDATION），到北京大學任教。這一次是去教法律，我教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英美普通法（COMMON LAW），共教了一年。回國後，在八四年七月我作康州律師協會的導遊又去了中國三個星期。今年我又到中國去過兩次。一次是今年一月我和另外四個曾在中國教過法律的美國教授到廣州同中國司法界、教育界人士開了一個座談會，談如何改進美國法律教授在中國的教育工作。這個座談會，也是富布賴特基金會資助的。今年另一次訪華，是陪美國青年企業家代表團去的，中國的副總理姚依林在人民大會堂接待了我們，開了約三個小時的座談會。

中：姚依林和你們談了些什麼？

費：主要動員美國企業家去中國投資。

「西單民主牆很偉大」

中：您第一次到中國，正趕上北京西單民主牆

運動及北大學生選舉風潮，您當時有什麼感覺？

費：我們剛到北京時，先在北京語言學院集中學習。我們常到西單民主牆去看大字報，也和一些民運活躍份子交談過。我們感到西單民主牆很偉大。八〇年北大學生選舉風潮時，我也參加過幾次辯論會，覺得言論很精彩。這是中國人在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

中：那時，北京正在審判魏京生、傅月華，當時你們對那些審判有什麼看法和評論？

費：一方面，我認為與過去比，當時的法制還是有些改進，因為審判半公開，得到允許的人可以旁聽。外國記者和我們這些外國人是不許旁聽的。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在運用法律方面很奇怪，因為中國的刑法在八〇年一月一日才公佈，而審判魏京生是七九年的事，那麼，究竟是根據什麼法律判他的罪呢？據說是引用了這部尚未公佈的「刑法」；根據尚未公佈的法律來判罪，這在西方是沒有的事。可是，按照某些中國法學家的看法，魏京生也犯了一九五一年「反革命法」。

在中國教學的困難

中：您在中國教法律時，感到有何困難？

費：主要是不讓我進入圖書館找資料，他們說我能看懂中國書，而中國書的有些部份是保密的。

中：對您教的法律課內容，校方領導有否干涉？

費：北大黨委倒沒有具體干涉，但有人說我教的是資產階級的國際法。我說，國際法就是國際法，祇有一個，如果國際法要分資

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就沒有國際法了。

中：還發生了哪些不愉快的事？

費：我當留學生時時常發現我們外國留學生的信件被拆閱。有一次，一個丹麥留學生收到一封信，打開一看，是一張黑人的照片，他根本就不認識（衆笑），顯然是中國方面拆了信放錯信封了。我們派代表到北大「留學生辦公室」去講這件事。留辦的人說，如果信件被拆開了，可能是裏面有不好聽的話。我們說，你們如果不拆看信件，怎麼知道裏面有不好聽的話呢？

中：還有些什麼有趣的事？

費：在我們住的地方，中國人來看我們時要登記。我們說這不妨礙了他們的集會自由？學校當局說，他們雖是中國人，但你們是外國人嘛！我們說，這不影響我們，而是影響了他們；他們登了記，他們的單位以後可能審查他們。學校當局還說，這樣做是爲了我們的「安全」。我們在中國真是「太安全」了（衆笑）。

中國憲法和美國憲法的不同

中：自鄧小平掌權以來，妳看中國在法制方面有些什麼改革？

費：首先是在八二年修正和公佈了憲法，這部憲法比七五年和七八年的憲法要好得多，基本上和五五年的憲法差不多，但還要好一些。這表現在保護私人所有權方面和保障外國人投資方面。但是，在保障個人的權利方面還是遠遠不夠的，它沒有真正保護個人的權利。試比較美國憲法與中國憲法的不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

會不得立法來限制人們的言論等自由。因爲我們相信，這些自由是天賦人權。我們美國的法律限制了政府不得侵犯人權。中國的憲法不一樣，它規定，你「有」什麼自由或「有」什麼權利，意思是，我們政府「說你有」你就有，不說，你就沒有。但中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如果政府說「你沒有」時怎麼辦？如果個人權利受到侵犯時怎麼辦？兩個憲法的差別，要深刻體會才能認識到。舉一個例子，剛才我提到我們在北大的外國留學生都知道來信被中國方面拆看了，可是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因爲憲法中雖然規定了個人有自由通信的權利，但沒有規定政府或別人侵犯了你這個權利怎麼辦？

另外，美國憲法的條文較少但很實在，中國的憲法多到一百多條，其實有些是不宜寫入憲法的，例如「中國的首都是北京」的規定。因爲，首都如果改換了地址，豈不又要修改憲法？國旗也不必寫入憲法；還有「優生」的問題也不必寫入憲法。憲法是基本法，祇有基本的原則就行了，如果「優生」這樣的問題也寫入憲法，就沖淡了憲法的尊嚴性。

中：您對四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有何看法？

費：從法律的觀點看，四項基本原則不應寫入憲法。四項基本原則是政治問題，從法律方面來看，這是中國憲法的最大弊病。

中：八二年憲法與以前的憲法比，是否有倒退之處？

費：八二年憲法取消了人民「罷工」的權利，可以說是倒退了。其實美國憲法裏並無罷工的規定，但人民實際享有了按照國家勞

動法規定的罷工權利。此外，七八年的憲法取銷了四大自由，這也是個倒退。我認為，憲法要有穩定性，中國自一九五四年公佈第一部憲法以來，七五年公佈了一次，七八年又公佈了一次，八二年公佈的是第四部憲法了。憲法如果需要修改時，祇修改一部份就行了，不必重新制定一部。美國的憲法已公佈二百零幾年了，祇有二十多次修正案，而不是重新公佈憲法。

中國極需經濟立法

中：中國當局現在也開始宣傳法治觀念。從一個法學家觀點看，您認為當前中國在法律方面最亟需改革什麼？亟需作些什麼？

費：如果中國要想經濟改革成功，必須完善立法。中國法律還有許多空白，尤其是經濟方面。現在還沒有公司法、工廠法、勞動法，也沒有民法。因無民法來規定什麼是「法人」，所以在解決法人問題時常遇到困難。比如，兩個農民買賣拖拉機，如何簽訂合同？合同發生糾紛如何在法庭上解決？如果法庭說，這是你們個人的問題，不干法律的事，怎麼辦？此外「所得稅法」也有些地方不明確，譬如一個「萬元戶」在繳所得稅時，是以「戶」來算？還是以戶中人口的平均數來算呢？此外，法律的穩定性也不夠，刑法自八〇年公佈以來，在八一年就修改了一次，八三年又修改了一次，修改得太頻繁了。而且，修改法律完全爲了政治形勢的需要。如八三年打擊刑事犯罪時，鄧小平要求「從快、從嚴、從重」處理，刑法就相應做了修改。再如「婚姻法」，在五〇年就公佈了，規定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可以結婚，但我遇到一個

司機，他說要到二十七歲才准他結婚。這樣，法律就沒有尊嚴。

中：您對中國的律師制度有何看法？

費：中國的律師制度才剛剛開始，因爲中國的法律教育在八十年代才恢復，國家的法律院校還來不及培養出許多專門的法律人才來，所以有的律師祇在短訓班受過訓。現



八三年，鄧小平為「從快、從嚴、從重」處理刑事犯，特將刑法修改並迅速公佈。

在要進行國際貿易，還要懂英語、日語、法語、德語的法律人才。法律工作需要較高的專門知識。現在中國法官的教育水平也很低，缺乏專業知識。

中：您是否注意到人大常委最近比較注重經濟立法？

費：這是好的開端，但仍須多多努力。

中國的律師制度

中：在美國，律師就是要爲僱他的當事人辯護，這點很明確。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以前要律師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講話，現在修改了一點，據說要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講話，你覺得這種說法合理嗎？

費：這要看法律怎麼樣（IT DEPENDS ON THE LAW）。按照中國「律師條例」第三條的規定，律師要熱愛社會主義，如果有一個被告在天安門廣場喊了反對社會主義的口號，來請律師辯護，律師就會爲難了，所以這樣的法律規定是有問題的。

中：您對律師拿國家工資有何看法？

費：這肯定有問題。你是國家的工作人員，拿國家的工資，你會認真替被告辯護嗎？而美國的律師，一般是受僱於當事人，而且他們認爲：國家的權力那麼大，個人的權力那麼小，應該替個人說話，所以美國的律師都有一點兒反政府的性格。

中：事情恐怕會慢慢改變，聽說中國現在已允許私人醫師開業了，那麼律師也會這樣的。

費：在中國，別人說被告有罪時，其他的人總是跟着說。

中：是不是他們不能獨立思考？

費：不一定，我在北大時知道有些人能獨立思考，但他們不敢說出來。

先假定無罪

還是先假定有罪

中：聽說中國法律是屬於大陸法，是保護原告的；而美國的法律屬英美法，是保護被告的？

費：這不很確切，例如法國的法律是屬大陸法，也是保護被告的。

中：您參觀過中國法庭嗎？

費：我看過一次刑事案件的審判，被告一開始就被當作一個有罪的人看待。雖然他在法律上有無罪的可能，但因審判長首先就認為他有罪，對於被告有利的地方就不會認真考慮了。

中：一九八〇年對傅月華的審判就是如此，法庭事先就決定要定她的罪，所以當一項罪名不能成立，就找另一項罪名定她的罪。起先是說傅月華誣告黨支部書記強姦她，傅月華說她并非誣告，她可以說出這位書記的下體有什麼特徵，頓時全場嘩然。當時有政法學院的學生參加旁聽，就喊叫要把這位書記弄到後面去查驗，看傅月華說的是否屬實。一時審判長慌了手脚，宣佈休庭。後來，審判長看到不能用「誣告」定她的罪，就用什麼「危害公共秩序」等罪名，判了她的刑。在中國，法庭審判時，先假定被告人有罪，再去找證據。在美國，先假定無罪，原告要拿出充份證據來，罪名才成立。

費：是的，在中國法庭上，被告一開始就被當成一個罪犯。

中：在美國，人民除法律規定禁止做的事以外，什麼都可以做，而政府祇能做法律規定政府可以做的事，不可越出一步。這樣，就保護了人民的自由，限制了政府侵犯人權。

費：按照西方的政治理論，政府的權力是個人給的，政府祇有那麼多的權力；個人的權力是天賦的，都為個人保留，所以個人享有除了違法以外的充份的權利（WHATSOEVER IS NOT PROHIBITED IS PERMITTED）；而在極權國家，專制者認為人民的權力是政府恩賜的，人民的權利少得可憐，人民祇能做政府允許做的事（WHATSOEVER IS NOT PERMITTED IS PROHIBITED）。

中：中美兩國在法制方面，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費：美國是法治，中國是人治。

政策與法律

中：現在，里根總統要進行稅制改革，這和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很大不同。里根的改革是法治下的改革。

費：對。里根總統要改革稅制，其條文要經國會通過才有效，而國會在通過法案前有一段徵求民意的期間（PERIOD OF PUBLIC COMMENT）。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并不先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是呀，中國的改革方案祇要黨中央討論通過就行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是以法律的保障，而是以政策的指導進行的。請問費教授，您是怎樣評價政策與法律的？

費：第一，法律更能代表民意，因它須經民意代表組成的立法機關的通過；政策祇能代表黨的利益。第二，法律是公開的，人人皆知，易於監督。如果政府壓迫人民，人民可以指出政府犯了什麼法；政策有很多是保密的，因黨內文件很多人看不到。它

說你違背了黨的政策，你無法看到文件，做何答辯？第三，法律相對穩定，政策易變。

中：以政策指導經濟改革，常出現這個文件與那個文件相抵觸的情況。政府各個部門的規定，如計委的規定和外貿部的規定，也可能出現衝突。這樣，下面容易鑽政策的空子，有時甚至用一個文件反對另一個文件，這樣的改革，易出亂子。

我們是「克格勃」

中：您在中國還碰到什麼趣事？

費：有一次有一個小汽車的司機問我：

「你是教什麼的？」

「教法律的。」我答，

「教法語？你不像是法國人。」他說，

「不是法語，是法律。」我解釋，

「教法律？我們中國沒有法律。」他說。

中：上級說的就是法嘛！

費：有一次我們騎自行車到西頤賓館去，這個賓館的外面有軍人站崗，我們一到就叫我們下車，叫我們登記；我們填的國籍是「蘇聯」，寫的姓名是俄文的，填的工作單位是「克格勃」（衆笑）。進了大廳，開始吃飯，來了兩個軍人說，你們是美國留學生，為什麼要填是蘇聯的KGB呢？我們說，你們既然知道我們是北大的美國留學生，何必要我們再登記呢！因此，我們跟你們開個玩笑（衆笑）。

中：您可以開這個玩笑，要是中國老百姓開這個玩笑，就要有麻煩了。

費：當然。

中：時間不早了，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從中共黨代會到台灣萬年國會

作者簡介：李兆陽，男，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某大學主修理工科，但對社會科學亦有廣泛涉獵。



中共領導人不會實行民主，却會表演「民主」，你看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陳雲、趙紫陽正在九月的黨代會上進行投票表演。

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人事新布局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特別代表會議在北京結束了。在此會議上，中央各領導機構人事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調整，其主要特點就是老的退去，年輕的上來。而關鍵性機構調整後的人事則是：

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共五人。

政治局委員：萬里、習仲勳、方毅、田紀方、喬石、李鵬、楊尚昆、楊得志、吳學謙、余秋里、胡喬木、胡啟立、姚依林、倪志福、彭真。

候補委員：秦基偉和陳慕華兩人。

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

書記處書記：胡啟立、萬里、余秋里、喬石、田紀雲、李鵬、陳丕顯、鄧力群、郝建秀、王兆國。

至此可見，新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形勢是：鄧、胡、趙對李、陳，顯然是改革派佔了一點優勢。這是自原政治局常委葉劍英辭退後，鄧小平堅持五人常委的結果。

書記處的具體分工：

胡啟立——負責總管與協調工作。

萬里——全面負責國民經濟。

田紀雲——主管經濟體制的改革。

李鵬——主管科技、教育和文化，並參與經濟發展計劃等。

王兆國——主管中央機關事務及負責機密工作。

郝建秀——主管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眾團體。

余秋里——主管軍政事務。

喬石——負責培養和選拔第三梯隊人選等中共幹部工作。

陳丕顯——負責統戰部和人大委員會的工作。

鄧力群——負責意識形態方面的宣傳工作。

關鍵在制度和路線

這次中共高層人事調整後的最大特點就是高層領導年輕化了，領導班子年輕化是鄧小平等改革派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新上任的年輕幹部大多都有較好的教育背景，有一

李兆陽

定的專業知識水平，再加上他們大多都在基層工作多年，除了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外，也比較能夠瞭解民心民情，因此，在他們的領導工作中，很少可能出現像「土八路」那樣外行領導內行、蠻幹一氣的現象。另一特點是，年輕人畢竟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比較開明，較有破舊革新的精神。年輕幹部的這些特質，無疑為繼續推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組織領導上的有利條件。那麼這種領導班子年輕化，是否就意味着中共根本解決了昔日中國政策多變和荒謬的問題了呢？我看倒不盡然。

在中共中央於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七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陳紹禹、董必武、任弼時、張聞天、陳雲、吳玉章、李富春、康生等十三人，平均年齡亦很年輕；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時，整個高層領導的平均年齡亦很年輕，其中有許多四、五十歲的年輕人，然而，在其後的幾年中，中共却一再推行一些荒謬不切實際的政策。這說明領導班子年輕化不是中共領導機構的關鍵問題，關鍵問題乃是在什麼制度下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

在集權專制的國家裡，由於缺乏各種監督和制衡力量，高層領導人的意志往往是制定政策的依據，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領導人多年輕或多麼有知識水平，你總不能事事正確，總不能擁有全面的知識，因此，常常推出不切實際的錯誤政策是在所難免的。一旦他們把錯誤的政策推出了之後，往往又無人有能力使他們收回，結果常給人們帶來莫大的害處。但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據是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離開人民之意志和同意，任何領導人或領導機構，不管他們多年輕或多麼有才識，都很難將自制的政策推行開來。因此，中國的根本問題仍是制度問題。

政治局軍人成份減少了

這次政治局新部署的另一特點是，政治局裡軍人較少了。例如，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軍人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德生、張廷發，這次他們都退出了政治局，現在政治局只有楊得志、余秋里兩人屬軍人身份，這無疑有利鄧小平百年之後繼續推行的改革和開放政策，同時也為胡耀邦的接班鋪下了有利的班底。這在中共的領導布局上，也是一大進步。但軍人成份減少，是否就意味着根本問題的解決呢？答案是不一定。在四五年的「七大」和五六年的「八大」上，當選政治局委員的軍人就很少，事實證明，在他們之後，中國出現的各種問題並不少。

台北國會代表也應年輕化

北京的領導班子年輕化了，使我們聯想到海峽另一邊台北的國會代表。提到台北的國會代表，我們不得不追溯到三十七年前的一九四八年，當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召集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共一千多人。這一屆代表本應於一九五四年六年任期屆滿時依憲法規定改選的，但由於國民黨其後不久被迫退居台灣，以致令改選無限延期，迄今已逾三十多年。四九年前後，有些代表留居大陸，有些代表移居外國，但仍有近千人退居台灣，這些人中最年輕的也不少於六十歲（當選代表的最少年齡為二十三歲，四八年至八五年已有三十七年）。雖然台北當局於七二年後每六年改選增額代表五十人進入國會，但由於人數太少，不能避免國會代表日趨老化的現象。據有關資料統計，現在的一千一百多人的國會代表中，約有四百人在六十歲至七十歲之間，五

百多人在七十至八十歲間，一百多人在八十至九十歲間，更有數人已逾九十高齡，老化之嚴重，可見一斑。

不錯，當初國民黨保留這些老代表的目的，乃是想在返回大陸等一些政策上能得到國會的支持，但三十年光陰如梭，今昔非同，而反攻大陸之舉仍無日可指，甚至渺茫無望，再保留這些老代表，不僅毫無意義，反而會影響台灣民主政治的進展，有損於國民黨本身的形象。再說老代表守席不去，年輕有為的欲上不能，國民黨欲圖趁機振興，豈不難上加難？因此，筆者建議台北當局不能僅等待老代表的自然消退，而應吐故納新，至少應將凡七十五歲以上的代表改選，以便減輕國會代表的老化現象，與北京當局形成互相促進的局面。

兩岸接班都應制度民主化

兩岸領導班子為什麼會出現嚴重的老化？某些領導人為什麼需要刻意培養所謂的「第幾梯隊」？歸根結蒂乃因政府領導機構的新陳代謝沒有制度民主化。不錯，這一次鄧小平好不容易把一批老幹部退去，把年輕的幹部提上來，但這些年輕幹部亦會逐漸走向老化，將來亦會遇到老人戀棧不去的困難，仍會遇到年輕人欲上無門的困難。再說這也是造成兩岸政局政策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既然兩岸的領導接班存在着這麼多的問題，那麼為什麼不使領導的接班制度民主化呢？領導接班若不制度民主化，猶如人體的新陳代謝系統不正常，總是難免出疾病的。領導接班制度民主化，可以自動消除領導班子的老化現象，可以穩定政局和政策，使政體的新陳代謝正常運轉，使政體少出疾病，有這麼多優點，兩岸當局何樂不為之呢？

一九八五、十、十六

乘興歸鄉 敗興返

(華僑·美洲)晨全中

這次國內之行，風頭出了不少，心願也都了却，實際情況更是瞭解得更清楚、更徹底，想做大陸生意的夢也就更清醒了。它們的政策，原則是不可變的，目前仍在十分落後的貧窮階段，所謂低工資低收入。海外的人都是高工資高收入，基本上以海外的高工資高收入，還要來賺低工資低收入者的鈔票，那簡直是慘無人道，於心不忍的事。難怪許多過去的合資工廠，當已賺回了原來的投資額以後，它們就修改法例，施加有形無形壓力，務令你投降，放棄為止。這是我這兩年來深入了解的實情。所幸自己還能克制，未受甜言蜜語所惑，並未投入任何資金或擔保責任。否則，時至今日，泥足深陷，悔已莫及了。

在南京，他們一片好心，派專車陪我參觀南京大橋。橋頭兩邊四個高聳建築物上均有三面紅旗。我這個不識相的貴賓，非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這三面紅旗究竟是代表什麼意思。弄得他們有苦難言，但又不能不說。從南京溯長江上武漢航經九江，但見大橋橋基都早已建妥，上部就空無所有。據說這已是十年前之事。目前兩岸鐵路也未建造，看來完工之期要留給下一代了。

整條長江上都有客船往還。一天有十萬個旅客在船上。我們搭乘的是標準型東方紅號（現已改名），規定載客量是一千二百五十個，目前平均都載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人，超載情

況十分嚴重。據說是船員向船公司承包客票收入，每月十萬元。超出十萬元的有一點獎金可分。不均每一船員每月可有五、六十元獎金，這就難怪國內常有翻沉客船秘聞。但因受新聞控制，不容見報。奉勸各位，將來回國旅遊，千萬留心交通工具，寧可多化一點冤枉錢，儘可能搭乘旅遊船（票價比普通客船高二倍而且必須付外匯兌換券。）也高於火車軟席，以及比較新的客機。

上海黃埔江押船的情況嚴重，有一百七十條貨船拋泊口外等待裝卸。我在上海的那幾天，上海市委丟下全部公事，全力抓碼頭裝卸問題。我回香港之時，市委已無能為力，已由北京交通部副部長親自來上海抓這個問題。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十分清楚，即使叫鄧小平來也解決不了問題。真正是隔靴抓癢，原來毛病還是出在政策、原則之上。去年全年包括今年一月二月，上海碼頭裝卸工人效率奇佳。船東、貨主甘心情願付出微不足道的幾點快裝獎金。工人們也自發自動發揮出最高效率。據說一名工人的全月收入可以超過四百元（如果用黑市計算，還不足五十元美金一個月）。三月份中央政策改變，略為收縮，認為碼頭工人的工資，超出中央大員部長級以上，那豈不是這一輩子的革命白革了？於是乎一聲令下，堅持原則、政策。咱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嘛！（天曉得十億人中有那一個能夠說明什麼才是社會主

義）最終目的仍是共產主義，工人的薪水連獎金不准超過一百六十元。好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紀律嚴明，沒有一個人敢反對、反抗，更別提敢於罷工、示威了。工人照樣上班下班，裝貨卸貨，思想問題却越來越嚴重了。據悉每個月賠出去的船期損失，以千萬美金作單位，也算不了什麼。咱們國家雖窮，這一點外匯還賠得起，不在乎。可就是不能讓工人的收入太高了！一條萬噸級的貨船，就誤一天的費用，至少在五千萬美元上下。這裏面包括船員的薪水、伙食、保險、燃料、船隻本身的折舊、利息，以及船公司的管理費用、代理費用、港口費用等等。

類似上述的情況，不勝枚舉。廣州的黃埔港也幾乎如此。一般海外華人，返國探親旅遊，吃得好、住得好，到處受到「H」式的狂熱招待，何樂而不為。偏偏有我這種不識抬舉的人，這次白吃白住，免費旅遊，還專門注意這些與我不相干的小事。

目前國內絕大多數人士，莫不奢望脫離苦海。能有機會調到特區，已算是昇上了天。能生活在香港，那簡直是進了天堂。但香港人也祇剩十二年命運，有錢有辦法的也把北美洲當作天堂。我們生活在天堂中人嚮往的天堂裏，是不是在過天堂的生活呢？下面有一段話是我要告訴國內位高權重的另一老同學的話：

「以我在美國的三等公民而且社會地位低微的下層群眾，目前回國受到隆重的貴賓接待，實在是受寵若驚，感慨萬千。

人在福中不知福。人生嘛，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幸福快樂還靠自己掌握。天堂決不限於美國、香港。相反的，我倒確實羨慕國內人士那種輕鬆悠閒的生活方式，落得普遍長壽。

……」

民主？統一？台獨？孰為關鍵？

談民主運動與中國統一

(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演講·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八日)

(中國民聯) 王炳章

編者按

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八日，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應邀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以「中國的民主與統一」為題發表演講。演講稿根據錄音整理，並經王炳章先生修改。王炳章先生在講演中，就民主運動與統一運動的關係問題，做了扼要但較全面的闡述。

明天是中秋節，今晚大家有慶祝活動，我也要參加，故不想佔用大家太多的時間。

唐詩曰：每逢佳節倍思親。適逢中秋佳節，身在異鄉的我，不但懷念在國內的親友們，而且更懷念那些為了爭取民主而被無辜關押的民運戰士們。

今天，我們討論民主運動與祖國統一運動的關係，因為最近總有人問，你們是搞民運的，為什麼關心中國的統一問題？提到這個問題，我不由得首先想到了尚在獄中的著名民運戰士徐文立。徐文立曾是《四五論壇》的主編，早在他被捕之前的八〇年，就深刻地認識到了統一運動與民主運動之間存在着相輔相成的關係。他一邊在北京出版民刊、推動民主運動，一邊籌組「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設想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海外成立四個分部，以便將統一運動與民主運動結合起來。推動統一本是北京倡導的，但令人髮指的是，徐文立籌組「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竟被北京當局扣上組織反革命集團的莫須有罪名，判刑十五年。北京政府在海外支持的、由宋希濂將軍等人搞起來的「和平統一促進會」，由鄭寶羅先生倡議組織的「民主統一促進會」，其宗旨與徐文立的基本一致。然而，宋希濂一直都是中共的座上賓，鄭寶羅先生也被邀回國、以禮相待，徐文立却成了階下囚。天理難容！北京統戰誠意

有誰相信？

最近，已坐牢五年的徐文立在獄中書寫的「我的申辯」經過種種曲折，偷運出國，轉到了中國民聯總部。中國之春雜誌自卅期起，進行連載，請大家注意。

兩岸的首要任務是民主化

我們認為，當前海峽兩岸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推展民主，不是急於統一，也不是台灣獨立。

中國過去為什麼內戰頻頻、至今處於不統一狀態？原因之一，是中國未建立起民主制度。一個國家的內戰或分裂，大凡有如下原因：(一)外國干涉；(二)種族問題；(三)信仰(宗教)不同；(四)社會制度不民主。國共相爭而致中國分裂，信仰不同佔一部份原因，主因是中國一直沒有確立民主政體。美國和加拿大的實踐表明，民主制度可以包容不同的種族和不同的信仰。可以說，中華民族至今尚未學會不同信仰、不同意見、不同種族之間的互相包容與和平共存，換言之，尚未學會民主精神和民主運作的方式，故產生內爭和分裂。

如果海峽兩岸不致力於民主建設，而是一方把另一方強行「統一」過來，中國的問題并不能獲得根本解決，國家并不能長治久安。歷史上，中國的唐朝和元朝都建立過統一的大帝國，但由於沒有確立民主政體，大帝國後來又都分裂了。看看今天的美國，其民族的複雜性和宗教信仰的多樣性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然目前看不出有分裂的跡象。各種族、各信仰之間不是沒有矛盾，但這些矛盾可以通過民主和法治的程序獲

得解決。

可以說，民主政體能使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長期和平共處。民主，才能使中國達到持久而和諧的統一。

另一方面，與中國統一相對立的台灣獨立，是否能夠將台灣帶上長治久安的道路呢？這也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如果台灣獨立後，建立起來的仍是一個獨裁政權，台灣人民還會掀起民主運動反對它。我曾和台灣人士講，關鍵不是台灣獨立與否，而是台灣民主與否。另外，台灣的前途還取決於大陸民主與否。大陸上是個專制政權，不管台灣是否獨立，是否建立了民主政治，台灣始終會受到大陸專制者的威脅。台灣人士說：「台灣獨立後，會尋求國際承認和國際保護。」但請看看中、越、柬之間的爭鬥。柬埔寨本來就是個主權國家，越南的獨裁者攻打它，有誰肯出兵相救？同樣，中國軍隊進攻越南，同情越共的國家還不只是口頭譴責一番？何況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宣佈獨立，中共出兵攻打，有哪個國家誠心相救？所以，台灣人民想真正安居樂業，不但台灣要建立民主政體，大陸也要建立民主政體。也就是說，只有推動兩岸的民主化運動，才是台灣的唯一出路。

我曾問自己，也問台灣人士：「為什麼中國人不在美國唐人街獨立運動？為什麼台灣人不在美國搞台灣社區的獨立運動？」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都享受着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與人權，雖然美國還存在着歧視少數民族的現象，但受歧視的人可通過合法的手段去糾正它。

冷靜地研究一下部份台灣人搞起的台灣獨立運動，不難看出它的起因有兩條：一是懼怕中共；二是不滿國民黨的統治、不相信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神話。於是，部份台灣人想到了獨立這條路。

獨立，是值得尊敬的一種很高的政治理想。要想實現這個政治理想，須有自圓其說、并說動他人的理論和正視現實的態度。台灣運動面臨的最大的政治現實是：它必須說服大陸人民（不只是中共當權者）理解台灣獨立。說不服就要衝突、就要打仗，打敗了，還是獨立不成。說服就要靠理論。目前台灣的主要理論——「台灣民族論」和「台灣文化論」，極大多數大陸同胞接受不了。一位大陸留學生說：「台灣如果講『我們仍是炎黃子孫，但我們不願淪于中共統治，因此不如像新加坡一樣獨立出去』，會比『台灣民族論』和『我們不是中國人』較能獲得大陸人民的同情。如果這些人不打台獨的旗號，而打民主運動的旗號，更能獲得大陸人民的同情。」這番話，值得台獨人士思考。台灣獨立的理想，關鍵點不在於獲得美國或其它國家的理解和認可，而在於獲得大陸人民的理解和認可，才能變為現實。

從多元的意義上講，當前的台獨運動有它的正面價值：(一)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形成壓力、批評團體；(二)做為政治運作的一種極端形式，給台灣島內合法民運的開展提供了掩護；(三)在破除中國人傳統的「大一統」觀念上起了積極作用，起碼台獨人士的大一統觀念少得多了。

從廣義民主的意義上講，海峽兩岸應允許台獨的言論和台獨人士用和平手段達成自己政治理想的權力。要做到這一點，海峽兩岸一般的民主化還不行，要實現高度的民主化。

我們提倡民主化還基于下述的觀點：人民的福祉是第一位的，國家是否統一、地區是否獨立是第二位的，因為，人民是永存的，國家大小是在隨時變動的。再過幾百年、幾千年，中國的版圖還是原封不動？很難說。世界歷史的經驗顯示：國家統一了，人民不見得生活幸福；國家分裂成幾個小國，人民也不見得生活愉快。只有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政體，自由、人權才能有保障，人民才能安居樂業。

談到獨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美國的夏威夷州不要求獨立？為什麼阿拉斯加州不要求獨立？它們離開美國的腹地不是比台灣離大陸更遠嗎？事實是：夏威夷當初是經過申請才加入美國的。今天，波多黎各想加入美國還不那麼容易呢！美國對夏威夷、波多黎各的吸引力來自它的富饒和造成這種富饒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國人是最留戀故土的民族，可是，如果美國取消中國大陸、台灣每年各移民兩萬名的限制、允許兩岸人民自由來美，恐怕願意離開故鄉的人不在少數。這說明，民主、自由比故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說得好：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

一言以蔽之，大陸和台灣都民主化了，中國的統一與台灣獨立就都不成爲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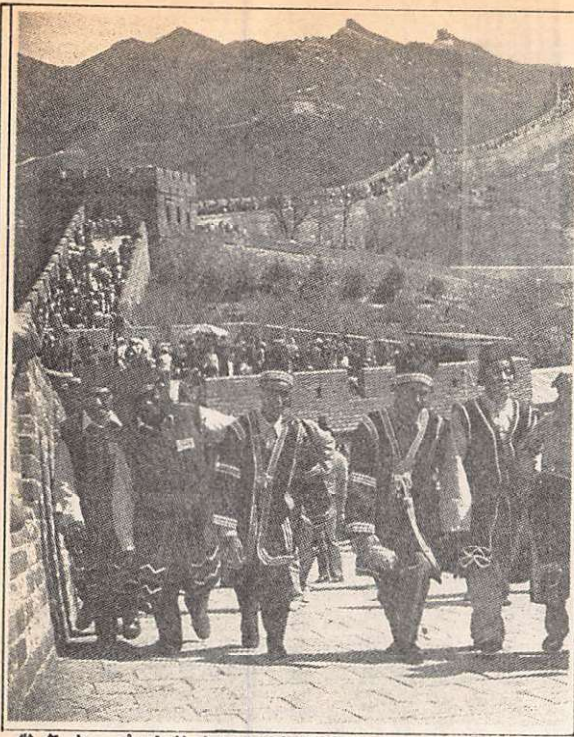
台灣、香港免於中共統治的重要性

我下面要談的另一個重要命題是：目前盡一切努力使香港和台灣免於中共的統治，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十分重要的。這個命題的根據是競爭和制衡的原理。

當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對峙，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競爭和制衡局面。這種競爭和制衡，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文化上的競爭和制衡。

有人認爲，華夏文化當今分爲四大支：

- 第一支：中國大陸、越南和北朝鮮——傳統華夏文化加上馬列主義；
- 第二支：台灣和南朝鮮——華夏文化加上部份美國文化的影響；



幾年來，中共對台統戰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惜用人民的血汗錢邀請了不知多少海外人士免費去大陸遊山玩水。這是中共邀請的海外台灣高山族人在遊覽長城，中共藉此向他們灌輸統一意識。

第三支：香港和新加坡——華夏文化加上部份英國文化的影響；

第四支：日本——華夏文化加上美、英等西方多元文化的混合影響。數十年比較下來，結果已擺在人們的面前：中國傳統文化加馬列主義者，搞得最糟。凡華夏文化（我稱之為群體主義文化——見中國之春第廿四期卅二頁）混與西方文化（我稱之為個體主義文化）者，效果較好。似乎有這樣的規律：群體主義文化與個體主義文化融合得越多，生命力就越強，國力就越盛。日本是中西文化大熔爐，生產力發展最快。

不要小看華夏文化這四個分支的競爭，它是促使當前中國大陸改革的外在鞭策力量。共產黨搞了這麼多年，中國大陸落後於受華夏文化影響的其它國家和地區，它怎麼向老百姓交待？把責任都推給四人幫？為什麼同是華人地區的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不產生四人幫？

過去，共產黨欺騙我們老百姓說，美國富足是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財。我們曾天真地接受了這種宣傳。今天，這樣的宣傳再也不能哄騙人了，為什麼？因為連台灣和香港都富了，這就給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迫其求變。

文化之間的競爭，親緣關係越近，造成的促進力就越大。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文化親緣關係極近，故彼此的促進力非常之大。試想，一個美國學生得了西屋科學科的首獎，對你沒什麼促進動力；首獎為華裔所得，

對你就形成了鞭策；如你的表兄弟獲獎，對你的觸動就會很大；如你的哥哥、姐姐拿了首獎，對你的推動力就更大了，因為大家基礎近似。這就是親緣關係越近、促進力越大的道理。同樣，德、法、意等國富足起來，遠不如台灣、香港富足起來對中國大陸的鞭策力大。

發展需要競爭，防止犯錯則需要制衡。一個統一體內的政治上同級之間（包括最高級權力）的公平競爭和制衡，就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之間，日本自民黨內的各大派系之間，都有公平的競爭。要使競爭形成制衡，對手的力量就要差不多，否則，形成不了制衡。中國民聯的力量尚小，對國共兩黨目前還不能起到制衡作用。誰對共產黨可以形成一定的政治制衡作用？眼下是國民黨。反之亦然。可惜，國共兩黨并非共容在一個共同的政治體內，而是在一個共同的文化體內，所以中國未形成民主政體。儘管如此，一個文化體內存在競爭和制衡，也是意義十分巨大的。

如果中共強行將香港和台灣「統一」過來，等于消滅了香港和台灣這兩個華夏文化的分支，也就是說，連目前僅存的文化上的競爭和制衡也消失了，這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沒有一點益處。

我們不斷揭露中共在統戰上的兩手政策，不斷敦促北京政府對台統戰要抱有誠意，不斷呼籲海峽兩岸政府放棄武力解決彼此的爭端，目的就是防止共產黨用武力吃掉台灣，以維持文化上的競爭和制衡的局面。

為什麼我們鼓勵海峽兩岸接觸

我們多次呼籲海峽兩岸要加強接觸。有人或許要問：「既然你們主張台灣被中共吃掉，為什麼又要鼓勵海峽兩岸彼此接觸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聽完下面的分析，您就會理解我們這種主張是「貌似矛盾、實則有理」。

首先應指出，我們所說的兩岸接觸，并不限于國共兩黨之間的狹隘接觸，而是指從人民到政府的立體層面的廣泛接觸。

從理論上講，不同政治集團在一個政治體內循着大家都遵守的規則和平競爭并互相制衡，便是民主政體的運作。目前中國人還沒有學會這種管理社會和生活的形式。國共兩黨尚不能共容於一個政治體內，而只是在一個共同的文化體內競爭。將國共兩黨及其它的政治勢力從一個共同的文體移入一個共同的政治體，彼此從事公平競爭和制衡，中國的民主政體就確立了。而要完成從一個共同文化體向一個共同政治體的轉

移，非彼此接觸達不成目標。這是我們鼓勵兩岸接觸的理論依據。你可能說，上述構想只具有理論上的價值，在實際上是難以達到的，因為國共兩黨水火不相容，「漢賊不兩立」。其實不然，如今有很多場合（在香港及海外），國共雙方及台灣黨外力量能夠心平氣和地對話，這在五年前，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時間將證明，隨着國共兩黨第一代元老退出歷史舞台，兩黨之間的敵對情緒將會逐漸降低。

從實踐上講，海峽兩岸的接觸，尤其是國共兩黨的接觸和談判，將給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發展創造契機。國民黨甚至不用真正走上談判桌，只是宣傳「要求中共像國民黨政府那樣，允許持不同政見的雜誌出版、發行，開放縣級政權的選舉，國民黨才與中共談判」，就會對北京政府產生震懾，在海外輿論的助力下，迫使其開放一些有限的民主，大陸民主運動也會乘勢逐步發展起來，在國內形成對中共當局有一定制衡作用的壓力團體。中共只有在受到內部的制衡時，才不能毫無顧忌地對台灣動武。大陸民主運動發展，對中共的箝制就越大，台灣的安全系數也越大。國民黨要求共產黨開放民主的同時，也必須在台灣加速民主化的進程，否則自己說話無力。因此，國共接觸，對台灣的民主也有促進作用。如果國民黨出現埃及薩達特總統那樣有胆識、有魄力的叱咤風雲的人物，像當年毛澤東那樣「赴重慶、入虎穴」，與中共據理力爭，就有可能打破大陸目前一潭死水的政治局面，大陸民主運動就會迅速發展。然而，正像一位國民黨元老痛心指出的，台灣只有幾條經濟鰻魚，出不了政治蛟龍。儘管如此，台灣的宣傳至少應該轉向，用不着忌諱「統一」、「談判」的字眼，在宣傳上要求中共實行像國民黨一樣的「有限民主」。如果連宣傳轉向也辦不到，恐怕連做鰻魚的資格都沒有，只能做藏在污泥裏的泥鰍了。

從歷史教訓上講，國民黨由于僵守「漢賊不兩立」的概念，不知吃了多少虧。據說，一九七一年台灣政權退出聯合國之前，美國眼看大勢已去，曾推動一項折中提案：承認北京政府佔據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但保留台灣政府普通會員國資格。如果此方案先獲得通過，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接納北京、驅逐台北」的提案可能會被否決。根據當時的情況，美國的腹案獲得通過的機會很大。然而，美國的意見被台灣愚蠢地以「漢賊不兩立」拒絕了。結果，台灣被無情地逐出聯合國。如果台灣國民黨當年不那麼愚蠢，有點彈性地接受美國的提議，它今天或許在聯合國還有一席發言之地。說不定，北京同樣會以「漢賊不兩立」為由而至今仍徘徊于聯合國之外。時過境遷，今天，台灣國民黨再想進入國際社會，那怕承認自己是「賊」、中共是「漢」，也不那麼容易了。

不是嗎，去年奧運會時，一百多個體育代表隊中，只有台灣代表隊舉着奧運會旗入場，其它都持國旗入場，成了地地道道的「賊」立「漢」不立的局面。此情此景，台灣人民作何感想？

所以，政治家既要有政治理想，又要注重政治現實。當今中國的政現實首先是：中共是第一政治實體，國民黨是第二大政治實體，台灣黨外有潛力成爲第三個政治實體，中國民聯只是一個壓力團體、一個政治舞台上的變數；其次是：這些政治力量正在彼此消長。承認這兩個政治現實的政治家，才會制訂出有戰略眼光的實際策略。國民黨保守派們像鴛鴦一樣，把頭埋在沙堆裏，是不會制訂出符合現實的策略的。

一個令人玩味的問題是，到底誰怕「接觸」？誰怕「談判」？我們心中有數，真正從內心中怕接觸、怕談判的是共產黨本身。何以言之？請看兩件事實。第一，有人充當中間人角色，拉北京駐紐約總領館的官員與中國民聯成員接觸（甚至只是私下談話），紐約總領事館官員始終不敵；第二，北京政府千方百計地阻攔中國大陸外人員與中國民聯接觸。起初，留學生出國時，他們給留學生訂了「三不政策」（大概借用了國民黨對中共的「三不政策」）：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不過問、不接觸、不介入。最近，中共領導將政策改爲「二不一上交」：外人員對中國民聯不理睬；對中國之春雜誌不閱讀；接到中國民聯的宣傳品一律上交。這一新政策與中國民聯派人到紐約機場迎接中國民聯航班機、向外人員散發宣傳品有關。一次，紐約領事館也派人到機場迎接政府高級官員，領館的人要了一份中國民聯的宣傳品，手舉着宣傳品向步出機場的外人員高喊：「大家不要拿這份資料！」你們看，到底誰怕誰？中國民聯凡是與北京政府官方代表碰面的場合，我們都積極主動地和他們接觸，却往往遭到他們的迴避。很明顯，怕接觸的不是我們，而是中共，因爲他們不掌握真理。

你或許又要問：既然中共害怕接觸、害怕談判，爲什麼中共又向國民黨擺出和談姿態呢？我們的看法是：中共早已看透了國民黨不敢和談的窩囊心態。

就目前國內形勢而言，中共當權者是不願看到台灣的力量涉足大陸政壇的。中共元老們都是打仗出身，論打游擊，我們十個恐怕也頂不過他一個。他們深深懂得一個重要的戰略戰術：盡量避免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同時進行。當前，大陸經濟改革暗潮洶湧，保守勢力處處發難，民主運動尋機而動，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台灣國民黨和黨外力量對大陸進行政治登陸，與中共打一場談判仗，那中共當權者將陷于內外綫同時作戰的兩面夾擊的境況。爲避免這種形勢，中共演出了諸葛亮的空城計，

大聲向國民黨吶喊道：「你進城談判吧！」國民黨呢，果然像司馬懿一樣驚恐萬狀，不但不敢長驅直入，反而「後退四十里」、高掛免戰牌。我們是從大陸出來的，完全知道大陸人心思變，乃為空城一座。鄧小平之所以敢于扮演諸葛亮，因為中共元老們看透了國民黨，對其心態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們常說：共產黨看透了國民黨，而國民黨始終看不透共產黨；中國民聯看透了共產黨，却對國民黨感到莫名其妙。

自然，中共也不能總是唱空城計，空城計只是權宜之策。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司馬懿（國民黨）退兵之際，恢復經濟、養精蓄銳，一旦抓住時機，便用武力封鎖等手段拿下台灣。這樣，中共某些領導人想用達成統一來建立個人歷史地位的願望也就實現了。待到中共從文革的積弱中恢復過來、即現在的「空城」變為將來「實城」之時，中共動武的輿論已做好：「等待是有限度的，國民黨始終不談，我們只好用封鎖迫談」。那時，恐怕國民黨再想對等談判，中共也不會接受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果國民黨如此僵化下去，台灣當年退出聯合國的一幕還會重演。

台灣的前途在大陸

歸納上面所談，我們一個重要的論點是：台灣的政治力量（包括國民黨和黨外）不應無視政治現實，應制訂策略與中共接觸、談判，并以此給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發展創造契機。中國大陸民主化了，台灣的前途才有真正的保障，統一及台獨之爭才會獲得解決。所以說，中國統一運動有助於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反過來，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是推動中國統一的最佳手段。

台灣朝野及台獨人士常討論：台灣的前途在哪裏？我們的看法是：在某種意義上講，台灣的前途在大陸。試想，大陸如果永遠是一個專制政權，台灣會安寧嗎？不管台灣是國民黨掌權、還是黨外執政，不管台灣是專權政體、還是民主政體，不管台灣政府宣佈仍奉行一個中國的政權、還是宣佈獨立，只要大陸由中共一黨專政，北京的執政者就一定會干涉台灣、「統一」台灣，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當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蓬勃開展，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崛起并對中共形成制衡時，北京當局才不敢為所欲為，台灣才會安全。從這點來說，台灣國民黨的開明派與黨外都應積極支援大陸的民主運動。遺憾的是，這一具有長遠眼光的戰略性觀點，台灣朝野尚未能普遍認識。



真正的「台灣民族」是山地人，真正的「台灣文化」是山地人的文化。這是山地人阿美族的豐年祭儀式。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未來如何解決？這裏存在兩個極端的方案：一是台灣獨立建國；二是台灣完全統一和受控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之下。在這兩個極端的方案中間，還存在着很多妥協方案。民主政治是講求妥協的，是講求現實的。在解決大陸與台灣關係問題上，政治家要顧及到兩個現實：第一，部份台灣人民自決、自治乃至獨立的意識很強，今後，兩岸政治分割的時間越久，獨立的意識就越顯增加；第二，一般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及部份台灣人民的傳統大一統觀念根深蒂固，認為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認為中國疆域越大越好。不管這個觀念是否正確，是否不夠現代化，它的影響力絕對不容忽視。做為一種現實的妥協方案，它必須既滿足台灣本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要求，又遷就于中國人傳統的大一統意識。有一方不能接受方案，便會衝突，以至打仗。這一現實的妥協方案便是聯邦制，即台灣的地方事務全權由台灣地方政府決定，而國防、外交的事務交由聯邦政府統一管理，像當前加拿大魁北克政府與聯邦政府的關係一樣。當然，要達到這一境界，還會有漫長的路程。

中國大陸需要新的政治力量

剛才談及，如果台灣國民黨及黨外能與中共積極接觸的話，將有助於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開展。然而，中國民主運動的壯大，并不單純寄



中國大陸人的大一統意識仍很強。圖為大陸的宣傳畫，上寫着：「思歸盼統一，兩岸一家親。」

望于台灣的助力。台灣政治力量延伸至大陸，是大陸新政治力量形成的一個加速因素，并非決定因素。沒有台灣現存政治力量的助力，大陸的民主力量也會逐漸壯大，不過時間拖得久些罷了。

中國民聯崇尚多元的民主政治。政治多元化的重要標誌之一，是多黨制。中國民聯正在為推動中國大陸多黨政治而作鋪墊工作。如何實現多黨政治？說來簡單，組織新的、主張民主的政黨就是了。這一政黨可在適當時機出現于國內，也可能先成立於海外，再移植于國內。

不少人問：自二、三十年代開始，就有很多人嘗試組織獨立于國共兩黨的第三黨（或稱第三勢力），但都沒有成氣候，現在有希望嗎？我們在慎重地回顧歷史和審視現實之後，認為是有希望的。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國民黨是一個欣欣向榮的黨，北伐戰爭獲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國民黨吸收了大批中華民族的精英。到了四十年代，國民黨被權力所腐化，共產黨的號召贏得了人心，大批優秀份子跑到延安去了。二十、三十及四十年代，儘管也有人組織第三黨，但由于當時國共兩黨像兩個參天大樹，尤其共產黨這棵大樹更是朝氣蓬勃，它們把中華大地的營養統統吸收走了，第三黨的幼苗在樹蔭下不可能成長起來。六十年代之後，共產黨亦被絕對權力所腐化，經過文革，更成了老朽之木，其枝葉已在不斷脫落。此時，中原大地上一個新的政治幼苗就有了崛起的機會，共產黨的朽木每脫落一批枝葉，就給新的政治幼苗提

供了一批營養。大陸的民主運動，就是在這個環境上興起的。

有人要問：共產黨成了朽木，國民黨這棵樹不就可以趁勢長成嗎？事實是，國民黨這個樹已被中共請出了大陸，而它自己又不敢由台灣重返大陸（對中共採取「三不」政策），它在大陸當然就失掉了成長的機會。另外，國民黨這棵樹也已老態龍鍾，又有先天的不足，否則，它早該對大陸有所作爲了。因此，大陸人民及海外同胞對國共兩黨的失望，正是新政治力量崛起于中國大陸的群眾條件。

當然，我們也歡迎國共兩黨的新生，要新生，就要蛻變成民主政黨。國共兩黨的開明派若新生，首先要放棄「四個堅持」和「以不變應萬變」，否則，就談不上新生。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並不是國共兩黨的。國共兩黨在中國的歷史上都起過作用，老一代人都爲實現他們富國強民的理想奮鬥過。每一政治力量都有其興起、成長及衰老的過程。國共兩黨顯然都老了，它們在中國人民抵達理想的旅途中，起了第一級和第二級火箭的作用。次級火箭燃畢之後，就要退下休息，由第三級火箭接上推動，而我們這一代人，應承擔第三級火箭的角色。我們感到吃力的是，一、二級火箭雖然已快燒到盡頭，但就是不願退下休息，還願意呆在那裏起鈍化作用，第三級火箭要把它們規勸下去，看來還要費些時日。

在大陸或海外形成的政治力量，全靠嚮往民主的人士的聚集。組織就是力量。參與的人多了，就會形成政治影響力。大陸的政權壓制、抓人，不讓你組織力量怎麼辦？我們說，組織新的政治力量追求民主，坐牢是難免的。但請記住：當大陸有百分之一的人都勇敢地走向專制主義的牢房時，牢房就會被踏成平地！喚起民衆、聯合民衆，仍是民運的首要任務，也是民運最終勝利的根本手段。

結 束 語

用這麼短的時間談中國的統一與民主問題，顯然是談不清楚的。然而，我的發言大致可以描繪出這樣一個輪廓：統一運動可以促進民主運動，而民主運動又給統一運動創造條件。要推動民主，非要有新的政治力量形成不可。

講演中途，中國大陸留學生遞上條子，邀請我講演完後去參加他們正在舉行的「中秋、國慶、迎新」晚會，并希望深入交換意見。時間有限，先講到這裏。謝謝大家的光臨。（完）

僱用工人一定有剝削？

對馬克思剝削論的商榷

作者簡介：黃有光先生，澳洲莫納斯大學經濟系教授，澳洲科學院院士。近年多次赴中國大陸參觀、講學，並經常在海外中文報刊上發表有關政治、經濟學的精彩論文。

（社會科學院院士·澳洲）黃有光

前言

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領導下，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影響深遠的經濟體制改革。這改革的進行，還受到保守派的牽制，也受到中下層官僚陽奉陰違的拖滯。這些反改革的力量，有其既得權益的因素，也有其思想因素。這思想因素，主要是由於馬克思主義框框的限制。許多人認為當今的改革是在恢復資本主義，違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允許私人企業僱用工人，等於允許剝削。因此，要想改革能徹底進行，改革派要為其改革提供有說服力的理

論根據。

我不敢自稱是改革派的理論家，只是站在以人民利益為依據的立場，希望經濟改革能徹底完成，並進而達到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因而替經濟改革說幾句公道話。在四月份的「中報」上「中國應推行準社會主義」一文，我認為現在在中國推行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自由企業、自由競爭的生產關係（應稱「自由企業主義」，即使叫做「資本主義」，則它是正路資本主義，與國民黨時代財團壟斷，勾結官府與非法活動之邪路資本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不但沒有違反馬克思主義，而且真正符合馬克思

主義歷史唯物論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只有用符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等生產力高度發展，超越美國水平時，才能考慮是否能進入社會主義。既然現階段的自由企業主義（如果改革徹底完成），是由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的政黨領導推行，而又準備將來能進入社會主義，所以我建議稱為準社會主義。

既然從人民利益立場看，為經濟發展着想，應該推行自由企業主義，而且又符合歷史唯物論，則即使是「允許僱工即允許剝削」，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即使是奴隸制，在它取代原始無產制度，而能更好促進生產力發展時

，從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也是一個進步。現在允許私人進行生產，僱用工人，能夠搞活經濟，提高人民經濟福利，並減少失業。即使有剝削，也是一個進步。

馬克思主義，有其基本上正確的部份，也有其不盡正確的部份。其關於僱主僱用工人，一定是對工人的剝削的剩餘價值理論，就是一個極需商榷的部份。我在「中國之春」五月號的文章，已經提及馬克思剝削論的錯誤，但沒有詳細論述。本文在簡單複述剩餘價值理論後，先論述爲什麼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相對與絕對貧困化的理論，與其利潤率下降的理論，在純邏輯上自相矛盾，然後舉一些數字證明其貧困化理論違反事實，再論述爲什麼其剝削論違反正確的經濟學理論，也違反常理。最後，提出我自己對剝削的看法及爲馬克思本人辯護。

剩餘價值論

一個工人在工廠工作八小時，假定生產出價值一百二十元的產品，這是毛產值。扣去原料、能源之使用，機器之折舊等共八十元，剩下淨產值四十元。從這四十元的淨產值，這個工人只得到二十元的工資爲報酬，其它二十元，根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乃是被資本家剝削去了。

用在原料、能源、機器折舊等的八十元，馬克思稱之爲固定成本或不變成本，因爲馬克思認爲原料、機器等是死的東西，它們不能創造出新的價值，只能將它們本身的價值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例如一塊錢的麪包裡面，可能有三毛錢是麪粉的價值所組成。既然原料、機器等的價值只能照原值移轉到新的產品中，則其價值不變，故稱爲不變資本。

資本家用在僱用工人，或購買勞動力上的二十元，稱爲可變資本，因爲這值二十元的勞動力，在勞動生產的過程中，創造出四十元的淨產值，比原值增加了二十元。這所增加出來的部份，稱爲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乃爲被資本家剝削去的部份。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的比例，稱爲剝削率。在上述例子，剝削率爲二十比二十，或爲百分之百。

利潤率下降論與無產階級貧困化之相互矛盾

剩餘價值對總資本（即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之比例稱爲利潤率。在上述例子，這比例是二十比一百，也就是說利潤率是百分之二十。利潤率雖然有波動，但在整個歷史時期來說，其總趨勢是明顯的不斷下降。馬克思怎樣解釋這利潤率的下降呢？

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之比例，稱爲資本之有機構成。如果僱用工人在無人佔有的森林採集，則沒有用到不變資本，資本有機構成等於零，隨着生產之複雜化，不變資本之比例越來越大，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高。假定剝削率不變，同樣二十元的可變資本，照舊得到二十元的剩餘價值，如果不變資本從八十元增加到九十元，則利潤率從百分之二十下降到百分之十八強（二十比一百一十）。用簡單的數學即可證明，如果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剝削率不變，則利潤必然下降。這就是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論。

馬克思的一個更重要的理論是關於無產階級之相對與絕對貧困化。所謂相對貧困化，就是比起資本家，工人越來越窮；所謂絕對貧困化，就是說，即使不和越來越富的資本家比較

，工人本身也越來越貧困。由於絕對貧困化，工人最後一定被迫起來造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理論和他的利潤率下降的理論，在純邏輯上，就自相矛盾。何以見得呢？

爲什麼資本有機構成低的生產方式會逐漸被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生產方式所取代呢？既然資本家主要的目的是在追求利潤，這必然是因爲用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生產方式，以同樣的總資本，能賺取更多利潤，也就是利潤率比較高。但是，馬克思說，這只是當少數資本家用先進的、資本有機構成高的方式進行生產時，才能提高利潤率。當其他資本家也競相用這方式生產時，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使利潤率下降到比原來更低的水平。

當大多數資本家還在用舊方式，在每百元之總資本中，有八十元爲不變資本，二十元爲可變資本時，假定生產出一百二十件產品，每件一元，則淨賺二十元，利潤率爲百分之二十。如果少數資本家用比較先進的生產方式，同樣一百元總資本中，有八十五元是不變資本，十五元是可變資本（僱用工人六小時）生產出一百二十五件產品，每件照舊一元，則淨賺二十五元，利潤率是百分之二十五。但是，當大多數資本家都用這種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較先進的生產方式生產時，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利潤率必會回跌到百分之二十或更低。不過，這先進生產方式的產品數量並不會減少，還是每百元的總資本生產出一百二十五件。將使利潤率由百分之二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二十或更低，只能由於工資增加或價格下降。不論是哪一種，實際工資必然上升。

只要實際工資不上昇，則用舊的方式生產

，能繼續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潤率，平均利潤率絕不會下降到比百分之二十低。假使利潤率因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下降，實際工資必須提高，工人不是貧困化，而是絕對富有化。如果要使工人絕對貧困化，則必須使剝削率提高甚多。但這樣利潤率必然是上昇而不是下降，違反歷史事實，也違反馬克思之利潤率下降論。

上述道理，是我中學生時代，思想左傾自修馬克思主義時就發現的，當時我根本還沒有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影響，可見上述道理是很明顯的，是純邏輯上的東西，與資產階級學說無關，是左、右、中各派人士，只要有頭腦，就應該接受的。

貧困化違反歷史事實

如果說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則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也應該被拋到九霄雲外。歷史證明工人階級不但沒有貧困化，反而進步到連普通非技術工人也能坐汽車，看彩色電視，喝啤酒的水平。左派的解釋是：這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掠奪後，分一點甜頭給少數工人貴族。但是，不單是有廣大殖民地的英國之工人坐汽車，而沒有殖民地的、其國際貿易只佔國民所得百分之五左右的美國，其工人坐更好的汽車，而且並不是少數工人貴族，而是絕大多數人民都富有化了。這不是靠什麼剝削或掠奪，而是靠資本累積與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經濟成長。

資本主義國家（稱為自由經濟國家更適合）的工人階級不但絕對富有化，而且越來越有錢的資本家也相對富有化。富者越富是事實，但窮者富得更快。從表一可看出，勞工所得之百分比，在英、美兩國都有明顯的增加，其他西方國家情形也差不多，法國增加的更多，從

一八八五年與一九二九年之百分之六十左右，增加到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八十四點七。

從表二可看出較新的資料，也顯示工人與職員（統稱僱員）之所得比靠財產與經營企業者所得之比例也是有增加的趨勢，至少是一九七五年時是這樣。一九七五年後略有回降。但一九七五年時的比率高到顛峰，尤其是英國的情形，僱員報酬等於財產與企業家所得之四點六倍。這是造成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經濟困難的原因之一。

再看個人的總所得（不論是工資還是利潤）之分配情形。表三顯示美國之所得分配歷年來之變化，大體上也是富者變得相對越來越不富，貧者越來越不貧。而且表三的資料是在政府稅收與福利支出前計算的，稅收與支出後之所得會更平均些。從表四英國之長期資料，也可看出英國所得集中指數（指數越高越不平等）長期來有很大的下降。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工人階級也好，窮人也好，不但沒有絕對貧困化，而且大體上絕對與相對富有化。資本累積與科技進步的結果，使富者越富，但使工人與窮人富得更快。科技進步使總產量提高，資本累積使勞工相對稀少，物以稀為貴，工資在資本家競爭僱用工人之下而提高。加上政府實行累進所得稅與福利開支等措施，使貧富差距縮小而不是擴大。

剝削論說不通

工人雖然沒有貧困化，但馬克思主義者可能說，至少他們還是在被資本家剝削着。本節論述為什麼剩餘價值論說不通，為什麼資本家如果沒有用欺騙、強迫等手段，並不能說對工人有什麼剝削。

生產出淨產值四十元的產品，工人只得到二十元，怎麼說沒有剝削呢？原因是這二十元的淨產值，並不是單靠工人的八小時勞動創造出來的。如果單靠八小時勞動，就能創造出不少於二十元的產品，工人何苦去賣勞動力給資本家，只得二十元的工資呢？在沒有欺騙與強迫的情況下，工人願意工作八小時，只領二十元的工資，可見單靠八小時勞動，不但創造不出四十元的產品，連二十元的產品也創造不出來。

除了八小時的勞動，還要其它生產要素，例如土地、購買原料、支付機器折舊等的資本、技術與經理財管人員的合作，才能生產出四十元的淨產品。因此，工人只得二十元，並不能說有剝削。

馬克思主義者會馬上反駁我說，上述論點證明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腦力勞動也是一種勞動，如果技術與經理財管人員的勞動，也有助於創造四十元的淨產值，則他們的勞動時間，也應該包括在創造這百元淨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內。假定按比例算，八小時或二十元的體力勞動，配合一十元的腦力勞動，則對勞動的報償，在四十元淨產品中佔三十元，只有一十元是剩餘價值，剝削率是百分之卅三（十比三十），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數量雖然不同，終究還有剝削。不然，不勞動的資本家與地主，他們的錢是怎樣賺來的呢？

資本家這個詞兒，有時是指資金的所有人，有時是指創辦與主管生產單位的企業家。為明確起見，對後者，本文只稱企業家，不稱資本家。企業家沒辦法開辦有利社會生產的單位，使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得以結合，以從事經濟生產，是對社會生產有重大貢獻的。他們

表 一

勞工所得占淨所得之百分比

| | 1880 | 1911 | 1924 | 1938 | 1952 | |
|-----|------|------|------|------|---------|------|
| 英 國 | 63.2 | 59.5 | 70.3 | 72.2 | 74.4 | |
| | 1919 | 1926 | 1929 | 1939 | 1949-51 | 1953 |
| 美 國 | 71.9 | 68.8 | 71.9 | 76.3 | 76.8 | 80.1 |

資料來源：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1960, PP. 618-619

表 二

僱員報償對財產與企業家所得之比例

| | 1965 | 1970 | 1975 | 1980 | 1981 |
|-----|-------|-------|-------|-------|-------|
| 澳 洲 | 1.884 | 2.112 | 2.444 | 2.253 | 2.436 |
| 英 國 | 2.841 | 3.219 | 4.617 | 3.997 | 4.140 |
| 美 國 | 2.324 | 3.274 | 3.267 | 3.347 | 3.241 |

資料來源：OECD NATIONAL ACCOUNTS Vol II, 1964-1981, PARIS 1983。

表 三

美國稅收前之所得分配 1929-1977

(表中數字為占總所得之百分比)

| 年 份 | 最 低 $\frac{1}{5}$ | 次 低 $\frac{1}{5}$ | 中 間 $\frac{1}{5}$ | 次 高 $\frac{1}{5}$ | 最 高 $\frac{1}{5}$ |
|---------|-------------------|-------------------|-------------------|-------------------|-------------------|
| 1 9 2 9 | 12.5 | | 13.8 | 19.3 | 54.4 |
| 1 9 3 6 | 4.1 | 9.2 | 14.1 | 20.9 | 51.7 |
| 1 9 4 7 | 3.4 | 10.5 | 16.8 | 23.8 | 45.5 |
| 1 9 5 7 | 3.0 | 10.3 | 18.1 | 25.2 | 43.4 |
| 1 9 6 7 | 3.7 | 10.5 | 17.2 | 24.7 | 43.9 |
| 1 9 7 7 | 4.3 | 10.3 | 16.9 | 24.7 | 43.8 |

資料來源：J. L. HOCHSCHILD, What's Fai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第三頁。

表 四

英國稅收前所得與集中指數

| 年 份 | 平均所得 (英鎊) | 所得集中指數 |
|---------|-----------|-------------|
| 1 6 8 8 | 32.2 | 0.551 |
| 1801-3 | 99.8 | 0.555 |
| 1 8 1 2 | 98.0 | 0.536 |
| 1 8 6 7 | 59.3 | 0.521 |
| 1 8 8 0 | 76.2 | 0.474-0.629 |
| 1 9 1 3 | 105.0 | 0.467-0.588 |
| 1962-3 | 853.0 | 0.33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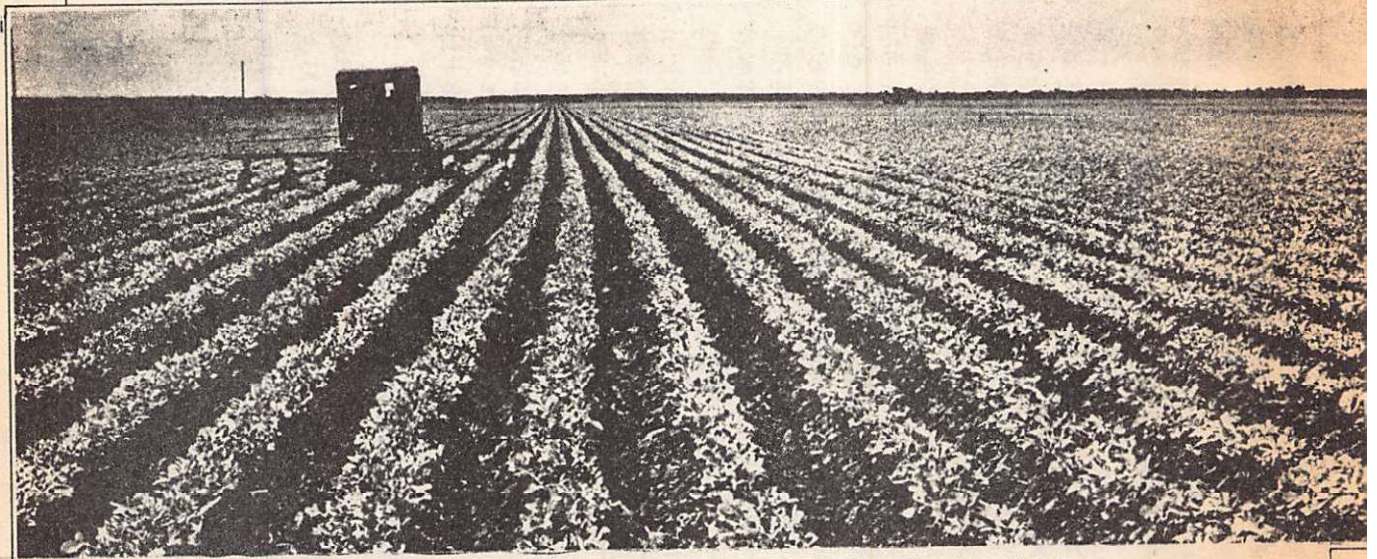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A. B. ATKINSON 所編 Wealth, Income, and Inequality, 第二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第六十頁。

的報酬，也應該屬於勞動報酬。當然，有些企業家也花時間與精力在設法如何逃稅、如何欺騙工人與消費者，這種時間，不能包括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內。但是，我們現在要談的，是在沒有強迫、欺騙及其他不法因素的情況下，是否有剝削。因此，欺騙的問題，我們可以暫時不談。假定四十元淨產值中，有五元是給企業家的報酬，還有五元給資本家與地主的報酬，是不是剝削呢？

先說地主，他們擁有土地，把土地出租給農民、商人、企業家等，坐收地租，不必勞心，也不必勞力，這不是剝削嗎？但是，沒有土地，農民、商人、企業家與工人都不能進行生產。因此，土地本身有促進生產的作用。如果沒有收取地租，反而會造成人們對土地的誤用，減低經濟效益。因此，對使用土地者收取符合供求情況之地租，並不是剝削。如果租用土地是被剝削，誰要去租用呢？在沒有壟斷與誤導的情形，供求均衡所決定的地租，等於土地的邊際生產力。同樣的資本與勞動力，如果多用一分的土地，可以增產一百元，則一分的土地租金是一百元。地租的償付，只是對土地之邊際生產力的報酬，不能說是剝削。

在有自由競爭的情形，其它生產要素（包括工人的勞動力）的報酬，也是等於其邊際生產力。為什麼企業家肯花二十元僱用一個工人呢？因為一個工人一天的邊際生產力等於二十元。如果低於二十元，則企業家不願僱用；如果超過二十元，則多僱用工人能增加利潤，各企業爭相多僱用工人的結果，使工資上升，至達其邊際生產力為止。

資本也是得到資本的邊際生產力的報酬。資本有什麼邊際生產力呢？先看看不用資本的生產，像原始人只用雙手或只用現成的樹枝



農民若擁有足夠大的土地，不僅會促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而且也會促進工業上的發展。

、石頭，在森林採水菓，河中捉魚，只能生產出少量的物品。如果分一些人人工去製網，然後用網捕魚，可以捕捉更多的魚。但在分人去製網時，消費必須下降。因此，要累積資本，必須減少消費，即必須儲蓄。如果資本家的資本，是通過其勞動成果之儲蓄累積起來的，得到其邊際生產力的報酬（利息），則乃其以前勞動所得成果累積而使社會總資本增加，因而增加社會總生產的報酬，不能說是剝削。對資本的使用，如果不收取利息，會造成誤用，不合經濟效益。

土地所有者得到土地邊際生產力的報酬，資本所有者得到資本邊際生產力的報酬，勞動力所有者得到勞動力邊際生產力的報酬。這樣的情形，如果說資本家與地主剝削工人，同樣可以說工人剝削資本家與地主。這樣的「剝削」論，有什麼用呢？

單單資本和土地，不能生產出產品。單單勞動力，也不能生產出什麼產品。必須資本、土地、勞動力、企業能力、技術等相互配合，才能生產出大量的、各式各樣的產品。在自由競爭的情形下，可以用嚴格的數理經濟學證明，如果勞工、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都得到其邊際生產力的報酬，則總報酬剛好等於總產值，不多也不少，沒有誰剝削誰。（對這個證明，幾乎每本大學高年級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都有闡述，例如 W. J. BAUMOL *Economic Theory and Operations Analysis* Prentice-Hall, 第四版，第廿四章，第四節。）

在有壟斷的情形又如何呢？這在下節再談。馬克思的資本論是談有自由競爭，利潤率因資本家之間的相互競爭而在各行各業達到相等之均衡情形。因此，要反駁馬克思的剝削論，單單談自由競爭的情形也可以。

正確的剝削論

否定馬克思的凡利潤（包括利息與地租）即是剝削的剩餘價值論，並不是說社會上沒有剝削的現象。地主與資本家得到其土地與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之報酬，並不是說所有地主與資本家都應該獲得這些報酬。

如果地主與資本家，他們用來購買土地、股票、債券的錢，是靠他們以前勞動成果儲蓄而來的，則他們的報酬，是其勞動成果之累積而對社會生產力之提高的報酬，除了交納國家稅收，應該由該地主與資本家所得，才不會打擊人們對累積社會資本的積極性。如果他們的錢是其父母遺留，而其父母亦是靠勞動（包括辦企業）賺來，則也是除稅收（包括遺產稅）外，應該歸他們所有。

有些有錢人，是靠走私漏稅、濫用權力、貪污賄賂等有害社會之不正當手段而發財的，則他們的錢的來源，是基於對社會的剝削，是不義之財。他們得了這不義之財，也有用來從事正當的生產的，或辦工廠、或開商店。他們這種正當生產而賺的錢，是不是對工人的剝削呢？如上所述，這正當的生產，並不能說有什麼剝削。不過，既然辦工廠的資金，是來源於對社會的剝削，則這工廠資本之利息報酬，也應屬於社會所有，因為這是社會被剝削去的資金之邊際生產力。但這問題不在於現在工廠生產過程對工人的剝削，而是以前資金來源時對社會的剝削。

有些商人或企業家，靠欺騙消費者或欺騙工人的方法賺錢，以劣貨充良貨，偷工減料，不讓工人知道其工作環境對健康之不利等，則是對消費者或工人的剝削。但在有競爭的情形，只有那些欺騙的比平均水平更厲害者才有剝

削的成份。如果所有的商人都用二等貨充一等貨，則競爭的結果，真正是二等貨的所謂「一等貨」，價格也會跌到等於二等貨的成本（包括平均利潤），消費者購買「一等貨」，實際上買到二等貨，但也只付二等貨的價錢，商人也不能多賺錢，沒有什麼剝削。這可見自由競爭之重要性，本來欺騙能造成剝削，但在自由競爭下，剝削被消除。

甚至於逃稅的問題，在有自由競爭的情形，也能大體消除逃稅者對社會的剝削。如果只有一兩個商人逃稅，則他因逃稅而多賺的錢，是對社會的剝削。如果每個商人都逃同樣百分比的稅，競爭的結果，使產品價格下降，等於把政府的稅轉移給消費者，商人本身並不能得利。例如銷售稅，如果每件產品成本（包括平均利潤）十元，銷售稅二元，則商人必須以十二元賣給消費者。如果商人逃稅，每賣一千件虛報五百件，等於實際上每件交一元的稅，假定逃稅本身之成本微不足道，則每件產品賣十一元就能維持平均利潤，競爭的結果，消費者只須負十一元，商人照舊只賺平均利潤。逃稅的結果，只是把稅收轉移給消費者，如果政府因稅收不足而提高稅收至每件四元，則完全恢復未逃稅的情形。

當然，我並不是支持逃稅。實際上逃稅需要可觀的成本，而且各個商人逃的程度不同，造成多逃者對少逃者及社會的剝削，而且浪費逃稅的成本，及影響法治與社會公正。上述論點，主要在講自由競爭的重要性。

在競爭不完全的情形，尤其是壟斷的情形，廠商不必以成本（包括平均利潤）水平出售其產品，可以提高價格來多賺取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在一定意義上，可說是廠商利用其壟斷的局面，剝削消費者。但是，我認為問

題在於壟斷局面之造成，不在於其利用。如果只有我一個售賣一種產品，我承認我一定訂一個可以賺最多錢的價格。廠商的目的在賺錢，你給他壟斷的局面，他當然要利用這局面賺錢，不然他就是傻子。不過，有些廠商，却採用流氓的手段迫害其競爭者，或勾結官府，走私行賄，獨佔貨源，排斥競爭者，以便造成其壟斷的局面，這才是真正造成其能剝削消費者的原因，這才是真正應該反對與取締、制裁的歪風。

走私漏稅、以權謀私者對社會的剝削，劣貨充優之商人對消費者的剝削，壟斷市場者對消費者的剝削，都不是對工人或其他僱員的剝削。對工人的剝削，多數牽涉欺騙或濫用權力地位，與馬克思的剝削論，相去一萬八千里。根據馬克思的剝削論，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在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禁止私人僱用工人，結果造成經濟呆滯，青年失業。根據本文的剝削論，正當的生產活動，不論僱用幾千幾萬工人，都沒有剝削。要取締真正的剝削，在於健全法制，禁止歪風，鼓勵競爭，打破壟斷。不但不禁止私人僱用工人、經營企業，反而要鼓勵公私企業互相競爭，才能提高效益，消除剝削，促進社會發展。

馬克思無罪

本文極力論述馬克思剝削論之錯誤，可能會被誤以為是反馬狂徒。其實，我認為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但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也會受其歷史時代之局限，也會犯錯誤。犯錯誤不等於犯罪。不過，到了現在，歷史事實與經濟理論之進展，已使我們看到馬克思錯誤的地方，如果我們不對這錯誤的地方進行改

正，使錯誤的理論限制正確改革之進展，危害人民利益，則近乎犯罪了！

在科學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的牛頓，其理論也有錯誤的地方。如果牛頓的承繼者，不修改牛頓錯誤的地方，不以愛因斯坦相對論來補充牛頓力學之不足，堅持牛頓力學在近光速情形也能適用，我想牛頓在九泉之下若有靈，一定要暴跳如雷，和這些所謂徒子徒孫劃清界限。像馬克思這樣的偉人，也一定不會喜歡後人以「馬克思主義」之名，堅持馬克思錯誤的地方。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若不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改正與發展，則是馬克思的敵人。

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比自然科學研究對象複雜百倍，當然更容易犯錯誤，何況馬克思剝削論有其一定的歷史根源。當資本主義發展初期



文革開始時，北京的紅衛兵抬着馬克思的像在街上遊行。

結語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對人民宗教式地灌輸馬克思主義，造成人們把馬克思的剝削論當作聖經，很難擺脫其束縛。現在雖然實行開放政策，允許一定程度的雇工，但還是沒有人敢於

，小生產者受大規模生產的衝擊造成貧困有一定的增長，而工資沒有增加。當時富人越富，窮人有些真的越窮，而社會沒有及時採取稅收與福利政策來解決這種所得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這種情形，明顯地存有社會不公平的因素，馬克思提出其剝削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當時經濟學還不發達，邊際分析還未問世，我們不能怪馬克思錯誤地把窮人貧困的問題歸根於經濟生產中的剝削。當時的確有嚴重的社會問題，不在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而在於財富分配不均（不均之原因與對策見敝作「取消價值補時為何能對窮人也有利？減少分配不均之政策」一文，發表於「中國之春」）及一些欺騙與非法活動。要解決貧困問題主要在於促進經濟發展，而這又主要在於資本累積與科技之進步與在企業上之應用。應該鼓勵自由企業、自由競爭，而不是打倒自由企業制度。在純自由經濟下，各生產要素得到其邊際生產力的報酬，但這種所得分配，不見得符合社會公正。例如殘廢者之邊際生產力等於零，但我們不願意讓他們活活餓死。因此，累進所得稅、遺產稅、福利支出等，只要不太過份，雖然略為打擊生產積極性，是可以考慮實行的。不過，更重要的是要擴大市場機制（包括自由企業、自由競爭）的作用範圍，提高法治與輿論自由，以減少以權謀私者對社會的剝削。（詳論見「爭鳴」五月號上的敝作。）

批判剩餘價值論。

中國現在允許私人企業家只僱用幾個工人，這是完全講不通的。這好像是說，你可以殺人，但不可以多殺！如果馬克思的剝削論是對的，則僱用一個工人就已經有剝削。如果凡有剝削就必須禁止，則不能允許僱用任何數目的工人。但大家明明知道，允許私人企業家僱用工人能搞活經濟，減低失業，對人民有利，則為什麼只限於僱用幾個人呢？

我認識一位大陸留澳學生，他關心中國經濟、政大事，勤學深思，對許多問題有深入的觀點，見解也開明大膽。但是，當我向他說明馬克思剝削論的錯誤時，他却一直不能接受，說剝削是一個定義的問題。我乃說，這樣的定義，是歪曲普通語言的意義；例如說，我把一個人定義為狗，可以嗎？

另一位大陸留學生，看了本文初稿後，則說，「我認為持有與您相似觀點的，在國內也大有人在，但苦於敢想不敢寫。」許多人知道聖牛為患，但沒有人敢先出來觸犯聖牛。作為一個海外華裔學者，在中國朝着開放、改革的大道前進時，我希望徹底完成改革大業，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覺得有義務冒着被指控為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危險，撰寫本文。

附註：

一九八五年寫於莫納斯大學

①為計算方便起見，假定貨幣工資不變，六小時勞動力照舊是十五元。若要維持剝削率不變（百分之百），利潤只能是十五元，一百二十五件產品只能賣一百一十五元，價格必須下降百分之八，原價每件一元的产品必須下降至九十二分。實際工資同樣提高百分之八，原來六小時勞動只能拿得十五件產品，現在可以拿得十六件又三分之一。

即使不維持剝削率不變，只需要利潤率不因資本有機構成之提高而增加，維持在百分之二十的水平，則一百二十五件的产品，也只能賣一百二十元，價格也必須下降百分之四，實際工資上昇百分之四，工人也要略為富有化。

後記：剝削與社會公正

本文寫完後，寄給上述認為剝削是定義問題的學生某甲。他看完後，還是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如果沒有政府在稅收與支出上的平均貧富的作用，難保不會貧富不均之擴大，認為還是有社會不公正，也就是有剝削。我認為他的看法是對「剝削」與「社會不公正」之間的概念上的混亂。有這種看法的人不見得只是某甲一人，因此，我以為有必要補寫這後記。

顧名思義，「剝削」即是剝人家的皮，剝人家的肉。當然，一般上的用法，並不是字義上的剝皮削肉，而是在經濟上掠奪人家生產出來的財富。有剝削就有社會不公正；但有社會不公正，不見得一定有剝削。例如一個殘廢的人，他的生產力等於零，不能生產出任何東西，如果他沒有繼承任何財產，也沒有得到任何施捨，則在定義上就不可能受到經濟上的剝削。他一無所有，剝不到皮，削不到肉。當然，如果有人欺侮他殘廢，拿他來當足球踢，或是憑權勢強姦婦女，這是對人身體的剝削，不是馬克思所講的經濟上的剝削。

上述沒有生產力的殘廢者，雖然在定義上就不可能受利經濟上的剝削，但是如果一個相當富有的社會，讓他活活餓死，則我認為有社會不公正。這例子證明，有社會不公正，不見得有剝削，也可以說，沒有剝削，不見得沒有社會不公正。

在馬克思的時代，一方面由於長期以來因正當或不正當的財富累積，在財富分配上有很大的不平均，另一方面因為生產力落後，勞工之邊際生產力很底，造成當時窮人很窮，富人很富的兩極分化現象，而社會沒有及時對窮人作出適當的幫助，在一定程度上有點像讓殘廢者活活餓死的情形，可說有社會不公正。馬克思正確地看出這個不公正的現象，但是他在分析這個不公正現象的原因時，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為僱用工人即有剝削。如上所述，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與經濟學水平下，是一個無可厚非的錯誤。不幸地，這個可以理解的錯誤，却被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下去，沒有改正，而且被應用在實際經濟上，禁止私人僱用工人，造成社會主義國家之經濟呆滯，人民生活困苦之重大不利結果。

在國民黨時代，貧富兩極分化很嚴重，而且許多致富者是靠非正當方法賺錢，所以也有很大的剝削與社會不公正。在當時，實行「共產」，雖然對一些靠正當經濟活動、勤儉起家者是一個極大的不公正，但對那些靠不正當方法起家與對多數窮人來說，有一定的正義性。現在已經「共產」過了，大家從頭做起，只要健全法制，糾正歪風（關於如何剷除歪風，見「爭鳴」五月與七月上的啟作），讓人民進行正當的經濟生產，即使僱用成千上萬的工人，不但沒有剝削，也沒有社會不公正，反而能促進經濟發展，最後使大家富有起來。即使少數人先富起來，而大多數人沒有什麼進展，可說有一些社會不公正，但這不一定是剝削。解決的辦法，不是禁止僱用工人，而是設法促進經濟發展，鼓勵資本累積，提高科技教育水平，以提高工人之邊際生產力，使工資自然增加。在這目標未到達之前，可以採取適度的抽富人

的稅，幫助窮人的措施，但不能做得太過份，以免會扼殺會生金蛋之鵝。

即使富人越富，窮人越窮，也不一定有利。例如兩個島嶼，甲島窮而乙島富，而且甲島或因天氣土壤變差而越來越窮，而乙島因資本累積與科技進步而越來越富，如果兩島根本沒有來往，不可能說乙島剝削甲島。這個例子證明，窮人越窮，富人越富不一定是由於剝削所造成。即使甲乙兩島通商，如果是進行互惠互利的交易與投資，也不能說乙島剝削甲島。至於乙島是否應該援助貧窮的甲島，則是另一個問題。如果乙島不願意援助甲島，你可以說有不公正，但不能說有剝削。

同樣的，資本家與工人合作生產，對彼此有利。如果各個生產要素得到其邊際生產力的報酬，不能說有剝削。但是如果因為勞工邊際生產力很低而造成工人很窮，有錢的資本家是否應該幫助工人，則這是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除非資本家用欺騙、強迫等手段，不能說他們對工人有剝削的行為。

剝削與社會不公正的區分，並不只是用詞上的問題。把企業家因僱用工人進行正當的生產而發財定義為剝削，則會造成採取禁止私人企業僱用工人的錯誤政策。相反地，把企業家（不包括以權謀私者）致富，工人貧困的問題，正確地看成是生產力上的問題，把由於生產力不同而造成的貧富不均的問題正確地看成是社會公正而不是剝削的問題，有助於採用允許自由企業，允許私人企業僱用工人的正確政策，而把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交由政府的稅收與支出（包括教育）等幫助窮人的政策。這兩種不同的政策，對中國是否能搞活經濟，導致經濟甚至政治上的現代化的目標，有着關鍵性的作用，不可不明察。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剖析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洲) 李輝



大陸城市改革中的海港夜景。

要充份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形成和建立合理的經濟區域和經濟網路。

中共近年來狠抓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想通過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來改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在經濟管理體制中，長期以來感到頭痛而不能很好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中央和地方條條（部門）和塊塊（地區）的關係。過

去三十多年來，在對待和處理這一關係時，不是發生集中過多，就是發生下放過頭兩種偏向，始終沒有把這兩方面妥善地、有機地結合起來處理好，從而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响。中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解放了過去的思想束縛，敢於面對現實，研究、探索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其中中央和地方條條和塊塊的關係就是這類問題之一。為了正確處理這兩者的關係，尋求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途徑，並制定相應的對策，近年來開展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組織過多次的座談討論，企求找出比較合理地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而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形成和建立合理的經濟區域和經濟網路問題的提出，便是嚐試解決這個問題而選擇的一個「突破口」。中共（包括高級領導）再三強調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形成和建立合理的經濟區域和經濟網路，不單是為了解決中心城市本身發展的問題，着眼點在於通過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衝破條條、塊塊的束縛和各種人為的限制，溝通經濟發展的縱向和橫向聯系，把條條塊塊合理地結合起來，協調處理好中央與地方條條與塊塊的關係。

當前經濟體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領導多頭，流通阻塞，條塊分割。

中共當前經濟體制中條塊分割的狀況十分嚴重，已成爲阻礙經濟發展的攔路虎。趙紫陽總理在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中共當前經濟體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領導多頭，流通堵塞，條塊分割」，同時指出解決這一問題，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形成和建立合理的經濟區域和經濟網路，並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列爲今後體制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當前中共經濟體制中條塊分割對經濟發展的不良影响，猶如人體的血管堵塞對人的生命影响一樣重要。我們知道，人體的血管由大動脈，小動脈及各種微血管組成，人體的血液循環就是靠這些血管的暢順流通而得以維持，若人體某一部份的血管阻塞，就會對人的生命造成嚴重威脅。我們可以把整個國民經濟比喻爲人體本身，而把條條和塊塊之間各聯系的渠道比喻爲人體的血管，經濟體制中條條之間、塊塊之間以及條塊之間只有在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系

的情況下，整個國民經濟才能得到順利發展；如果由於條塊分割使條塊之間的經濟活動不能發生密切的聯系，那末，猶如人體血管阻塞、血液不能正常循環一樣，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關於當前中共經濟體制中條塊分割的狀況，存在的問題很多，現列舉數例如下：

部門所有制在許多方面割斷了部門之間的正常聯系。

①在部門分割和部門壁壘方面：中共經濟體制，由於受部門所有制的限制，在許多方面，割斷了部門之間的正常聯系。例如企業按所有制劃分，有全民與集體、個體之別；按隸屬關係劃分，有中央企業與地方企業之別；按用途劃分，有軍用企業與民用企業之別；按部門劃分，則各個部門林立，如冶金、煤炭、石油、化工等部門。本來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繫，但是，由於目前受部門所有制和部門利益的限制，這種正常的聯繫被人為地切斷了。例如，在鋼鐵聯合企業中建有焦化廠，副產焦爐煤氣，焦爐煤氣中氫（H）值含量高（有的比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還高），是制化肥的理想氣體原料，又比用煤焦為原料制化肥在經濟上合算得多，因此，中共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建了不少用焦爐氣為原料的化肥工廠。但是，由於鋼鐵廠與化肥工廠分屬於不同部門管理，前者屬冶金部管，後者屬化工部管，冶金企業從部門利益和從鋼鐵企業本身熱平衡考慮，就不會把焦爐煤氣供給化肥廠使用（即使能取得較高

的社會經濟效益），而寧願把它作為煉鋼和軋鋼煤氣燒掉，而使已建成的用焦爐煤氣為原料的化肥廠成爲無米之炊，不能做到合理利用焦爐氣資源。在石化部和紡織部之間也存在着類似的問題，例如，煉油廠在對原油進行加工煉制過程中產生的炭4（即C4），是化纖廠生產合成纖維的中間體，但由於目前中共煉油廠和化纖廠分屬於不同部門管理（前者屬石化部管，後者屬紡織部管），因此，煉油廠從部門利益考慮，不願將C4供應給化纖廠使用（即使取得較好的社會經濟效益），而是迫使化纖廠要以原油裂化開始，從原油中提取C4，再進一步加工成各種化纖原料，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把沿海的先進技術向西部轉移；把西部的原材料，能源供應東部沿海地區的需要，就能取得最佳的社會經濟效益。

②在地區分割和地區壁壘方面：中共經濟體制，地區分割的情況也很嚴重，目前把全國分成二十九個省，一個市（自治區），即切割成二十九塊。本來，在全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各地區之間存在着緊密的技術經濟聯系，但在現行體制下，這種正常的聯系往往被人為地切斷。例如，中國大陸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廣州、上海、北京、天津、沈陽等一些大城市，經濟基礎較好，技術水平較高，產品質量較好，但原材料，能源資源比較缺乏；而西部地區，經濟比較落後，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產品質量較差，但各種礦產能源等資源比較豐富。

如能打破這兩類地區互相分割、封鎖的格局，開展這兩類地區的技術經濟協作和聯系，即沿海的先進技術向西部轉移，西部的原材料，能源供應東部沿海地區的需要，就能取得最佳的社會經濟效益，同時，也能促進東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的共同提高。但是，在現行體制下，東西部之間的技術經濟協作，雖然政府一再大力倡導，但阻力不少，進展滯緩。原因在於，各有各的打算，沿海地區怕先進技術轉移到西部，西部技術水平提高了，造成「扶植徒弟，打倒師傅」的局面，因此，不願真心誠意地把先進技術轉移給西部，存在着封鎖技術的現象；而西部地區不願多供應原料能源給東部沿海地區，不願當「第三世界」，寧願多截留原材料、能源在當地發展各種加工產品，存在着封鎖原料和市場的情況，採取地方保護主義政策，不許沿海質量高的產品進入本地市場，沖擊本地產品的銷路。在這兩類地區內部各省市之間，同樣也存在着地區之間的分割和互相封鎖，因此妨礙了地區間正常的經濟發展。

經濟體制既不宜強調按條條（部門）進行管理；也不宜強調按塊塊（地區）進行管理。

③在條條（部門）和塊塊（地區）分割方面，存在的問題更多。例如，在經濟體制強調按條條（部門）進行管理時，有利於國家對宏觀經濟的控制和決策，協調好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比例，有利於制定好部門和行業的發展規劃；但同時却存在着對地方限制過多，使他們的積極性不能很好發揮，不利於資源的

合理和綜合利用，妨碍地方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基礎設施大大落後於生產發展的需要，形成「幾十只手往下插」不利於搞好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而在經濟體制強調按塊塊（地區）進行管理時，有利於發揮地方的主動性與創造性，使地方能夠根據本地的有利條件，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建設事業，發揮地區經濟優勢，搞好專業化協作與配套，密切地區內部各部門之間的聯系，實行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但同時却存在着使國家不能集中力量進行重點建設，分散建設力量，使經濟發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助長地方主義的發展，容易造成地區之間的分割和封鎖，阻斷地區之間正常的經濟聯系，容易促使地方追求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地方工業體系，不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

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以打破條條，塊塊的束縛，解決條塊分割的矛盾問題。

爲了打破過去經濟體制中條塊分割的情況，協調條條和塊塊的矛盾，中共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在研究流通過程中，建立貿易中心以打破地區的封鎖和束縛的問題。同時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目前的一些中心城市由於受現行管理體制條條、塊塊的束縛，其經濟功能和幅射範圍，及與周圍地區聯系的廣度和深度，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進一步提出要充份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以打破條條、塊塊的束縛，解決條塊分割的矛盾問題。但是，中心城市不能孤立發展，它是在周圍地區爲其提供原材料、能源

和各種農副產品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時，中心城市形成和建立起來以後，又能在技術和產品擴散等方面帶動周圍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必然要建立在城市爲依托的經濟區域和經濟網絡。

某些中等城市在近年來經濟增長較快的一條重要經驗是：這些城市能把屬於市內各個部門的企業統管起來，打破了條條和塊塊的束縛。

爲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摸索經驗，最早中共先選擇幾個經濟發展快、效益高的中等城市如常州、沙市等進行試點，同時開展調查研究，摸索城市體改的經驗。常州、沙市等中等城市在近年來經濟增長較快，各項工作較有起色，其中一條重要經驗是：這些城市能把屬於市內各個部門的企業統管起來，打破條條和塊塊的束縛，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經濟的內在聯系，進行統籌安排，適當分工，實行專業化生產和協作，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條塊分割的矛盾，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但是，常州、沙市這樣的中等城市，工業門類不多，經濟結構比較簡單，企業隸屬關係大多是市屬企業，省屬企業少，中央企業更少，因此，市裏就能有權對市屬企業進行統籌安排，實行專業化協作生產。但是常州、沙市的經驗不一定適用於大城市和省會城市，一般說來，大城市和省會城市工業門類較多，經濟結構比較複雜，在企業隸屬關係方面，中央企業佔不少的比重

，這些城市就難以對全市的生產分工、專業化協作等進行統籌安排，這方面的工作就開展較慢。

由於生產有重複，產品有很大部份要外銷，因此就發生互相爭奪銷售市場的矛盾。

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形成城市聚集區的階段以後，正向帶狀城市的方向發展。中國大陸也存在若干城市聚集區，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上海、蘇州、無錫等城市聚集區，京、津、唐城市聚集區，遼寧南部沈陽、鞍山、扶順、本溪、遼陽城市聚集區等，而且這些城市聚集區也存在着向帶狀城市發展的趨向。因此，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就不單要考慮中心城市本身的發展問題，還要考慮與周圍城市的分工，與周圍地區發展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建立以城市爲依托的經濟區域和經濟網絡。這項工作先在上海經濟區和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進行試點，前者工業現有基礎雄厚，但城市間、部門間的矛盾很多，重複生產很嚴重；後者屬於遠景發展規劃性質，隨着山西煤炭能源的重點開發，必定會在地區間和部門間存在許多矛盾，如何協調以求得合理解決，是經濟區規劃所要解決的任務。就以上海經濟區規劃來說吧，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成立已有幾年，進行了不少調查研究，邀集實際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開展了多次的座談討論，但至今問題依然如故，矛盾重重，工作很少有進展。因爲上海、杭州、蘇州、無錫等城市經濟特點基本雷同，原材料、燃料要依靠外地

供應，經濟結構以加工工業為主，而且都是以機械、紡織、輕工、電子等產品為主，生產有不少重複，以自行車行業為例，上海有「永久」、「鳳凰」等全國名牌產品，常州、無錫等城市也製自行車，（當然產品質量等方面不如上海），按規劃要求，要進行合併、調整，常州、無錫等城市當然不願意。由於這幾個市生產有重複，產品有很大部份要外銷，因此，就發生互相爭奪銷售市場的矛盾，即所謂「銷售市場相碰」。而江蘇省對此，另有考慮，因現有上海經濟區的界綫，只把蘇南幾個經濟水平不高的城市劃入，而把比較窮困的蘇北地區劃在區外，這樣，今後不會發生擴大窮富差別？而且從江蘇省考慮，蘇南、蘇北經濟是個整體，蘇南經濟發展，離不開蘇北在原料、能源、農、副產品等方面的支援，而蘇北區經濟的發展，又離不開蘇南在資產、技術、管理經濟和各種工業品的支援，現在上海經濟區把蘇南和蘇北人為地分隔開來，從江蘇省來說，積極性不大。

在於存在這些矛盾，各城市都各自從本市的利益着眼，而很少從全經濟區着眼考慮問題，因此，規劃、協調工作很困難，不容易打破條條、塊塊分割的局面。

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採用市帶縣或市領導縣的形式，有利於經濟發展。

中共在近年來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提出了一個屬於市帶縣或市管縣的問題。這項工作首先是由江蘇省和遼寧省開始搞起來的，以後

，就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廣。典型的例子是：無錫縣從地理位置上說緊靠無錫市，但從隸屬關係說，無錫縣不受無錫市管，而是屬於蘇州專區管轄，由於行政隸屬關係的原因，無錫縣本來與無錫市在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傳統經濟聯繫，就被切斷，而不能正常開展，城鄉之間物資、產品、技術交流就不能進行，後來由於實行市帶縣，由無錫市直接帶動無錫縣的生產發展，取消蘇州專區對無錫縣的遠距離控制和領導，大大促進了無錫縣經濟的發展，同時亦有利於無錫市生產的發展，密切了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縮短了產品的運輸距離，節省了運輸費用。但是，市帶縣或市領導縣這種形式，只是對市鄰近的周圍縣而言，對於距市較遠的一些偏僻縣，就不能起到市帶縣的作用，而這些地處偏僻縣的生產如何發展，由哪一級政府機構進行領導？如專區取消，由省直接領導，會產生「鞭長莫及」的弊端，這些都是在實踐中沒有解決的問題。誠然，實行市帶縣的體制，有利於溝通城鄉經濟聯系，實行城鄉經濟結合，按城鄉一體化的要求統籌安排城鄉的生產和建設，如城市可對周圍縣進行產品的擴散，進行技術幫助，扶植周圍縣鄉鎮企業的發展；周圍縣可在原材料、農副產品等方面，供應城市生產和居民生活的需要。但是，這裏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如城市擴散工業，往往是把一些有礙環境衛生、污染嚴重的企業，由城市遷往農村，實行污染搬家，而沒有就地治理，給當地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許多危害。有些鄉區企業的發展，存在着與城市企業爭原料能源等問題，而且產品質量較差，競銷能力較低。

中心城市應該以經濟辦法管理經濟，避免成為新的塊塊。

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擴大城市的權力，充份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固然有利於打破原有的條塊束縛，溝通部門間、城市間和市鄉間的經濟聯系，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要求來組織生產。但是，在現行整個經濟體制沒有根本改革的情況下，單靠擴大一點城市的權力，賦予中心城市組織協調城市內所屬（不管是中央或地方）企業經濟活動的職能，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弄得不好，舊的條條塊塊的束縛和分割的矛盾沒有解決，還會產生新的矛盾，即中心城市變成新的「塊塊」，對企業來說，增加了一個新的層次。這個擔心是有一定根據的，因為，目前在發揮中心城市作用問題上，着眼點都放在城市的擴權和爭權問題上，無非是爭財權和物權，至於爭到了權如何利用，對於中心城市如何採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中心城市如何避免成為新的塊塊，則考慮不多。

關於城市經濟區要不要有一個明確的地域界綫問題，存在着不同意見，有些人認為，城市經濟區的界綫是模糊的、混沌的，只是大致有那麼一個區位，如果要確定明確的界綫，進行分區劃界，容易形成新的「塊塊」，割斷地區與地區之間經濟的內在聯系；另有一些人則認為，城市經濟區如果沒有明確的地域界綫，就難以行使城市經濟區對經濟活動的協調和組織作用，所謂打破條塊的束縛，解決條塊分割的矛盾，就沒有明確的對象。對於上述意見分歧和不同看法，至今還未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展開深入討論，從而得出比較一致的看法。

一部歷久彌新的民主論著

中國大陸作家
(美國) 秦修明

紀念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出版一百五十週年

今年(一九八五)十月八日,是《美國的民主》出版一百五十週年。這部書,除被譯成英文外,早已有德、荷、意、俄、西、瑞和塞爾維亞等文字譯本。中文譯本乃經英文轉譯,由香港今日世界社在一九六五年出版,至今恰好二十週年。

專制者為何自稱民主

二十世紀以來,民主已成一個通用標語。就連反對或扼殺民主的政權,往往也要竊取民主作為招牌。多黨的較有人權保障的法治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固然提倡民主。一黨專政,沒有人權保障的國家,如蘇聯,也自稱民主。而且,馬列主義還把民主一分為二,強調無產階級民主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在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更把「民主」和「專政」,一虛一實,混在一起。除此之外,民主還被加上其他名目,諸如「有指導的民主」,「訓政時期民主」,等等,等等。

民主為何這樣吃香?不講教條,單憑常識,民主比起獨裁寡頭和集權,顯然比較優越。因為在民主制度下,人民至少享有較多的自由、平等和其他人權。絕對的民主,也許只是一種理想。但在現實衆多的禍害政體中,民主無疑是其害最少的一種。民主也免不了它的某些弊端,但只是通過民主程序,才能比較和平而有效地糾正這些弊端。

權力的分配和行使,在任何社會,都是決定政治體系的中心問題。民主制度的產生,需要何種條件?保障民主制度,必須對權利的行

使作怎樣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民主的運作與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息息相關。要建立「確保和發展民主」,又必須怎樣去適應和調整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

民主作為一種政體既然常被混淆和誤解,民主的運作既然涉及文化和社會的各個層面,民主的問題既然如此複雜,難怪兩三百年來討論民主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棟。這裏面,當然不乏比較簡單的政綱或宣言式的作品,可也有不少彈精竭慮的終典著作,包括阿勒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EVILLE, 1805-1859)的《美國的民主》(1835-1840)。

論述民主,獨居一格

托克維爾是第一個系統地研究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法國學者。他的《美國的民主》(DEIZ D'EMOCRATIE EN AMERIQUE)第一卷出版於一八三五年,上離美國獨立革命有半個世紀,下距美國南北戰爭約四分之一世紀。雖然他所觀察的只是美國民主的初期,但他的高瞻遠矚的智慧,使他的著作被美國著名政論家和學者賀拉西·格利里(HORACE GREELLEY, 1811-1872)譽為「歷來論述民主政治的性質和效用的最重要作品」。在托克維爾之後,還有過兩個傑出的英國政治學家研究英國民主政治,寫過十分重要的論著。一是布萊士(JAMES B. BRYCE, 1838-1922),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美國聯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是拉斯基(HAROLD J. LASKI, 1893-1950),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美國的民主制度》(THE AMERICAN DEMOCRACY)。這些作品,都各有千秋。但拉斯基在評論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時,曾認為它是一切以外國人身份論述他國事務中最偉大著作。

一八三一年,托克維爾受法國政府委派,與友人庇芒(GUSTAVE DE BEAUMONT)前往美國考察監獄制度。當時他二十六歲,花了九個月時間,訪問了美國聯邦當時的大多數的州。足跡所至,由紐約到波士頓,北抵加拿大邊境的蘇聖瑪利,西至威斯康辛的青灣,南到新奧爾良,全程一共走了七千哩。但在他僕僕風塵之中,令他感到興趣的並非監獄制度,而是當時正在美洲新大陸上孕育成長的民主制度。「我要坦白承認,」他後來說,「我在美國所看到的東西多於美國本身;我在該處探尋了民主本身形象,它的種種嗜好、它的性格,它的偏見和它的激情,以便知道我們必須從它的進步中害怕什麼或希望什麼。」(上卷 P.14)。

經過九個月考察,托克維爾和他的朋友庇芒於一八三二年返回法國。庇芒寫成了關於美國監獄制度的報告,托克維爾却立即着手他的巨著《美國的民主》。這部書分上、下兩卷,先後於一八三五和一八四〇年間問世。上卷主要論述從鄉鎮到州,從州到聯邦,從立法行政到司法的美國民主體制和運作程序;分析多數統治的意義,法律和守法精神的重要;政黨、社團、家庭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同時也觸及種族問題和蓄奴制給美國帶來的隱憂。下卷的主題則在剖析民主制度與美國社會風俗習慣、學術文化、思想風情之間的交互影響。托克維爾特別看重文化、社會和政治間的關係。他的研究方法,在許多方面,不啻為二十世紀的政治社

會學和政治文化學開了先河。

偉大的預言

條件的平等，是托克維爾所發現的美國民主制度的中心點。雖然這種條件的平等會給社會和文化帶來問題，民主是大勢所趨，歐洲可從研究美國民主制度得益：

「誰都明白，一場偉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們之間進行。但是，大家對之看法却有所不同。在一些人看來，這場偉大的民主革命好像很新奇，却也很偶然，而且，既然如此，他們就希望仍有可能去加以限制；在另一些人看來，這一場偉大的民主革命却彷彿是無可抗拒的，因為它是歷史能找到的的一個最一致、最古老和最持久的趨勢。」（上卷 P.1-2）

顯然，托克維爾在一百五十年前所作的這個有關民主的預言，既適用於當時的歐洲，也適用於今天全世界的廣大地區。預言的天才，不僅使托克維爾觀測到政治制度的動向，而且也使他預見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的發展。誰能相信，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國際形態，竟在一百五十年前托克維爾筆下出現：

「我正在臨近我的研究的結尾……現時世界上有兩個偉大民族，從不同點啓行，却彷彿朝同一終點前進。我指的是俄國人和美國人。他們兩個都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成長起來。當人類注意力放在別處時，他們突然擠身到了各國的前列。……美國人與自然放在他面前的障礙搏鬥，俄國人的對手却是人。……美國所征服的東西是憑耕犁取得的，而俄國人則憑刀劍。……美國人依靠私人利益達到他的目的，予人民的不受指導的力量和常識以自由發揮機會。俄國人則把社會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一個

人的單隻胳膊上。前者的主要工具是自由，後者的主要工具是奴役。他們的起點各異，道路相同。不過，他們都彷彿被天意派定，要去支配半個地球的命運。」（上卷 P.416-422）

《美國的民主》法文原著在一八三五年出版後，立即引起廣泛注意，價值受到公認，並且不久即被譯成英文。這部著作，當然不是沒有缺點。例如，由於托克維爾在美國只旅行了九個月，主要的觀察點在美國的北部而非西部和南部，研究所據的某些事實和材料就難免失誤，甚至以偏概全。另如托克維爾旅美期間，正值總統權力比較虛弱，他便認為美國的行政權力弱於立法和司法。更重要的是，托克維爾的視野和預言力，局限在當時的歐洲和北美，因而整個忽略亞、非和拉丁美洲。但是，所有這些，瑕不掩瑜，畢竟小於他的著作的優點。托克維爾在著述中收集資料的勤奮，分析的細緻和透闢，加上他罕有的洞察力，使他的《美國的民主》歷久而常新，經過一百五十年而讀者始終不衰，至今仍被列為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必要參考讀物。

西方國家，為紀念托克維爾和他的《美國的民主》，今年曾有不少活動。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法國「托克維爾協會」，今年十月八日曾在華盛頓聯合舉辦一天研討會。在會上宣讀討論的有「托克維爾的思想源流」，「托克維爾的新自由概念」和「《美國的民主》的現實意義」等論文。

中國人應掙脫一切禁錮

《美國的民主》對當前的中國，有沒有現實意義呢？作為這部書的翻譯和研究者，筆者覺得托克維爾彷彿為中國社會科學者提供了兩面鏡子。第一是怎樣真正從考察外國政治制度

中去取得借鑑。第二是怎樣在民主與專制之間作出抉擇。

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如從鴉片戰爭算起，已有一百四十年歷史，幾乎與《美國的民主》這本著作同樣久遠。從清末到民初，從民國到解放，從十年浩劫到四個現代化，由政府外派的欽差大臣、外交使節、考察團、代表團、交換學者和留學生，前後五六代人，何止千千萬萬？可惜至今還難找到一部研究另一外國的詳實著作。毛病也許出在各種教條、框框和緊箍咒上。先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繼而改為「馬列為體，鬥爭為用」，現在則是「四個堅持」。在只求「船堅砲利」「兩彈」「攻關」的政策下，社會科學不但受到禁錮，而且一直淪為奴婢。中國的社會科學者一天抬不起頭來，一天難望對任何社會制度作任何認真的研究。

前面已經提及，托克維爾一百五十年前對美國和俄國，曾作過一番對比：「美國人依靠私人利益達到他的目的，予人民的不受指導的力量和常識以自由發揮機會。俄國人則把社會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一個人的單隻胳膊上。前者主要工具是自由，後者的主要工具是奴役……」世事確離奇：在托克維爾作出上述對比一百一十年之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於是，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就來了一個「一邊倒」，「把社會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一個人的單隻胳膊上。」不但以俄為師，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直到「早請示，晚彙報」，「堅忠字旗，跳忠字舞」，神化領袖，形同發瘋……

現在，文革的瘋狂已經過去，中國仍在現代化的長途中摸索前進。願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能為中國的社會科學帶來借鑑。

論共產主義的局限和荒謬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美國」凱雲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它在本質上是個極其複雜的「多元函數」。也許人們對於社會問題的研究比人們對自然規律的探索更為艱難。其原因在於：自然規律儘管複雜，我們所知有限，但自然規律本身是不變的。它等待着人們去探索。隨着探索的進程，人們對它的了解，也逐步加深，但社會科學却不一樣，它所研究的是「活動」的對象，而這個活動的對象又是極其複雜的，當你還沒有把它認清前，它早已又變化了。也就是說社會規律本身同時也是時間的函數。因此社會科學永遠是對社會實踐之後的局部現象的重述。更難指望用它去指導社會實踐了。

但是馬克思却不同意這觀點，他把他的學說自封為是絕對真實的科學，是絕對真理，因此它還具有能預示社會將來發展的功能。在馬克思的學說中，他把過去人類社會歸納為四個階段：1「原始共產主義社會」，2「奴隸制社會」，3「封建制社會」，4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他還得出結論，認為人類的極終階段一定是「共產主義社會」。既然是極終的，也就意味看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也就不再發展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下面談談我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破綻百出

共產黨人稱頌馬克思主義具有三大組成部份。這三個組成部份是：1 政治經濟學，其代表著作是「資本論」；2 哲學，名為「辯證唯

物主義」；第三部份為「科學社會主義」或稱「科學共產主義」。

在這三大組成部份中，除了「資本論」代表其經濟學說外，其他兩部份，馬克思本人並無專門著述。

據共產黨人宣稱，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來源於德國古典哲學家赫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既然來源於別人，而自己又沒有專門研究，那就不能說是馬克思的學說，充其量只能說馬克思贊同他們的學說罷了。這就像一個中學生認同牛頓力學定律，但絕不能說力學定律就是這些中學生的學說一樣。

至於第三組成部份，科學社會主義，是來源於歐文、傅立葉等早期社會活動家。他們不但有理想，而且有社會實踐。由於他們的社會實踐失敗了，馬克思指出他們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並吹噓他自己的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至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究竟怎樣「科學」法，馬克思並沒有專門著述，我們也就無法去探索。我們只聽說他的基本精神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在馬克思死了近一百年後，即前幾年又被重新解釋為「各盡其能，按需分配」。什麼是「需」？那自然是有權的特權階級，共產黨人，才「需」得多，被統治的階級自然是被指定為「不需」的，這樣一改，這個「科學社會主義」也就不那麼吸引人了。到底哪一種說法是馬克思的原意，這是很難追究的。其實，追究「原意」也無意義。不過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共產黨人的「真理」是

可以「按需」篡改的。

馬克思唯一的有系統的著作是「資本論」，而「資本論」中主要論點是「剩餘價值」學說。在這個學說中，馬克思武斷地斷定「價值」是「唯一的由勞動所創造」。其實「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並非馬克思的獨創見解，而是他繼承了美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的經濟學說觀點。不過這「唯一的由勞動所創造」倒是馬克思的發明。由於這一發明，倒是把他的經濟學說引到了不能自圓的困境。比如說，空氣和水是人人必需的，自然有價值，但它並非勞動所創造，在一般情況下是隨時可得的，就憑這個例子就足以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創造價值的「唯一性」。馬克思為了克服這個矛盾，只好把「價值」觀念區分為「使用價值」與「勞動價值」。對於「使用價值」，在他著作中並沒有作進一步分析。却在「勞動價值」之上大作文章，竟然寫出了三巨冊的「資本論」。在「資本論」中所談的「價值」都是指「勞動價值」而言，至於他所提出的「使用價值」並沒有解決他的學說中的矛盾，只是成了他的「避風港」，迴避他無法解釋的矛盾。

馬克思經濟學說和他的其他學說一樣，把問題絕對化，把多量的複雜函數抽象為單元函數，這自然造成許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除了「使用價值」與「勞動價值」的矛盾外，還有「價值」與「價格」的矛盾。大家都知道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商品都不是按其勞動價值出售，其間差別很大，他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又提出了「價格

可以「按需」篡改的。

馬克思經濟學說和他的其他學說一樣，把問題絕對化，把多量的複雜函數抽象為單元函數，這自然造成許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除了「使用價值」與「勞動價值」的矛盾外，還有「價值」與「價格」的矛盾。大家都知道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商品都不是按其勞動價值出售，其間差別很大，他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又提出了「價格

「這一觀念，並指出「價格」才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但「價格」一般不與「價值」成比例。這樣說來，他的「價值」學說還有什麼意義？」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說矛盾百出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否定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否定了市場的機能以及其他人為因素，如社會主義社會中政府的壟斷的作用。他把一個複雜的過程武斷地簡化為單一過程，這就決定了他的學說的偽科學本質。

另一方面，他把「勞動」與「創造價值」認為是自然的因果關係。為了反駁這一點，我們只要舉出一個事實，比如士兵的勞動却是破壞價值，而不是創造價值，當士兵在戰場上作戰時，你總不能說他沒有勞動，而在士兵的勞動中也的確破壞了社會財富。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的荒謬性

馬克思主義除了以上三大組成部份外，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階級及階級鬥爭」學說。共產黨人把這一學說引伸為「階級鬥爭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階級」的提出，似乎還有點現實意義。即人們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由於社會地位的不同，就有不同的利益，對於社會問題也就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不過他所提出的階級地位是由經濟地位唯一確定的。這就使得他的階級學說陷入唯心主義。

比如說，英國長期存在着貴族階級，這些貴族後來沒落了，有的甚至變得貧困，但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他們的社會地位仍在，

其他階級，是闖不進他們的階級集團中去的，甚至不能使用他們的姓氏，別說通婚了。

又如印度歷史上長期存在過四大階級，其最上層婆羅門，即僧侶，他們擁有特權，但並非最有錢，他們的高貴在於他們控制着宗教。

再如在中國大陸，由於實行了「社會主義」，一切生產資料都不允許私有，人人都靠工資生活，人與人的經濟差別只是大貧與小貧之分。這樣說來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應該不存在「階級」與「階級矛盾」了。但是事實並不然。在當前的中國大陸又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統治特權階級，除了中國共產黨外，其他社會階層都變成了受奴役的被統治階級。

「階級」說明了人們的「社會地位」，但社會地位並不唯一的由經濟地位來決定，事實上在不同的社會中還常常存在着超越經濟的權力因素，正如上面所列舉的事實。也就是說，不同的社會條件有不同的階級形成的因素。因此可以斷言，馬克思的經濟地位決定階級地位的學說，只是他的唯心的臆斷，並非真理。

荒謬的「階級鬥爭」學說

由於馬克思提出了階級學說，在這基礎上，又延伸了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學說。他的徒子徒孫們又把它發展為「階級鬥爭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的理論。

人類社會既然存在階級，在階級之間存在矛盾，由於階級矛盾而存在階級鬥爭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馬克思在其階級學說中，只強調了矛盾的一面，而否定了共同利益的另一方面，由於在階級間共同利益的存在，有可能形

成階級合作。而這種階級合作，在事實上要比階級鬥爭更為普遍。只是馬克思及其徒眾不願面對這一事實罷了。為了支持這一論點，下面舉兩個人們極其熟悉但其本質被忽略的事實：

在封建社會中，地主與佃農自然是兩大主要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必然存在着階級矛盾，因而不時地發生階級鬥爭，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往往是契約關係）是一種階級合作關係，這種階級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的，一般說來，並無協迫存在。封建經濟就是地主與農民的合作經濟，而封建社會在中國竟然延續了幾千年。

另一個例子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關係，也是階級合作的一個典型範例。這種關係的聯繫紐帶是資本與勞動力的合作，正是由於這種先進的階級合作才使人類社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發展，這種高速度是社會主義國家中（他們自稱沒有階級剝削）所望塵莫及的，這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着先進的勞資合作關係。

固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罷工的事實，在封建社會中也有退租，退約甚至造反事例，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安定的生產總是主流。在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天天處於革命戰爭中，又有哪家公司天天處於罷工狀態？馬克思及其徒眾置主流於不顧，而在支節上大作文章，即使不是危言聳聽，至少也算失之偏激。

至於說到「階級鬥爭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更是荒謬之至。這裏，我們不妨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這一馬克思主義學說：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人類的原始社會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既然是共產主義社會，也就不存在階級的劃分，更談不上階級鬥

爭的存在。因而也就沒有社會發展的動力。那麼「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又何以發展到比它高級的「奴隸制社會」？

其次，按照共產黨人的說法：人類的極終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存在階級與階級剝削，也就不會有階級鬥爭。既然沒有階級鬥爭，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也就沒有社會發展動力了，其邏輯結果是人類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社會發展也就停止了，試問這種社會制度還有什麼優越性？

事實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共所控制的中國大陸，雖然他們尚未到達共產主義社會，但其經濟發展停滯的情況已在不同的程度上體現出來了。過去被認為工業發達的國家如東德、捷克，其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被過去經濟落後的非社會主義國家超過，難道是偶然的嗎？

「階級」地位的可變性

其實，個人的階級地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天的百萬富翁，也許明天一貧如洗。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今天的風雲人物，明天也許成爲階下囚。他們的社會地位變了，對於社會上的一些措施的態度自然也會變了。從前他們擁護的，明天他們也許會反對，他們的階級成份變了，階級利益也會變。但是共產黨人都把「階級」看成僵死的，一成不變的。只要被劃上「剝削階級」那麼你一辈子也是「剝削階級」，儘管你的生產資料早已被剝奪，而且一貧如洗。

更荒謬的是這種階級地位還能遺傳，老地主被折磨死了。還要在他的親屬中挑選一個來頂替，有一位共產黨員告訴我，在他的老家有

一個由勞動起家的比較富裕的自耕農，由於比較富裕，在土地改革中，被劃成了地主，因在中共統治下，階級鬥爭是天天要「抓」的，名爲「階級鬥爭教育」，實際上是殺雞儆猴，不久這老地主就一命歸天。當他死後，地主的帽子就「遺傳」給他兒子戴上，後來兒子也死了，這頂帽子又傳給兒媳，這位兒媳恰恰又是出身於貧農家庭，她一輩子也沒有享過富裕的生活，却受了當「地主」的罪。這種事在中國大陸並不是少見的，但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共產黨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所搞的階級鬥爭的荒謬和殘酷。

「階級」已成為共產黨統治的工具

馬克思的階級學說，本來是純理論，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階級」實際上已成了共產黨統治民衆的工具。誰反對共產黨，誰就是「剝削階級」，是「反革命」，就是「罪該萬死」。

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破壞性

共產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它在理論上否定了自由競爭的原則，否定了人們個體才能的差異與勤奮差別，無論人們對社會與人類貢獻多少，享受都一律「平等」，這實際上是假平等。由於個人所獲與個人貢獻並不成比例，這就扼殺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尤其甚者，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中，連這種假平等都沒有做到，而是新的特權階級——共產黨，對勞苦大眾的剝削，共產主義以消滅剝削爲號召，結果却造成

了共產黨對全國勞苦大眾的剝削，這簡直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由於共產主義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在共產黨掌權的國家自然創造不出他們所預期的奇蹟。對此，公開承認錯誤當然是不甘心的，否定了他們的主義也就否定了共產黨存在的價值，因此只好採用自欺欺人的辦法，對國際實行鎖國政策，對國內禁止新聞及言論等一切自由，壟斷新聞傳播媒介，實行人人互相監督的高壓政策，逼說假話。但這惡能使矛盾越積越深，到後來積重難返，變成了共產黨人根本就無法解決的矛盾，中國大陸的現狀就是一個有力證明。

既然共產主義本身並不科學，共產黨人又多半是教育水準不高，有些甚至沒有上過學，比如陳永貴居然當上了副總理，上過學的也只是只「紅」不「專」的劣等生，比如毛澤東居然成了「偉大領袖」。總的說來參加共產黨的人的動機，不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迷信，就是出於政治野心，而且後者是大多數。基於這種原因，世界上任何一個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毫無例外的是最專制，最獨裁的社會。共產主義是最具欺騙作用的學說，它具有極大的煽動性。

由於共產主義給窮苦大眾帶來了幻想，而窮人又總是大多數。尤其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掙扎在生命線上的貧苦大眾又比比皆是，因此，共產主義就有了天然的廣泛市場，試看當今共產黨人活躍的地區不都是貧窮落後的地區嗎？

人們太容易受騙了，當他們還沒有弄清這深淵的危殆時，就紛紛要往裏面跳，一旦跳進深淵，也就不能自拔了。這難道不是我們人類社會的不幸？

由里根開刀產生的聯想

(華僑·美國)周立仁

美國總統里根七月十三日開刀，切除了腸癌。因為美國的國際地位與眾不同，她的總統的健康情形和生命安危，當然是舉世矚目的。但身為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的華人，却因里根的這次手術產生了許多聯想。

誰都知道里根是演員出身，而且還不是什麼大牌演員。一九八〇年他和卡特競選時，英國人說美國的兩名總統候選人，一個是影星，一個是花生農夫，有什麼好選的。在里根當選後，法國人還說，別忘了里根是一個喜歡騎馬甚於讀書的人。這些話充分顯示了歐洲人到現在還有點瞧不起美國的當政者。

但是這位演員出身的總統，不但在八年加州州長任內作得有聲有色，而且在一九八〇年競選總統，還以破竹之勢擊敗了在職總統。一九八四年競選連任時，又以風捲殘雲的威力使對手沒有招架之力。這證明了在美國這個國家，教授、律師、大戰英雄、國會議員、花生農夫乃至於演員，不但都有機會當選總統，而且還可以當很不錯的總統。

原因很簡單，美國的制度使然。任何人只要依照憲法賦予的權責行事，在正常的政治運作和制衡下，即使是一個談不上有什麼才幹的平庸總統，也不會把國家搞亂、搞垮。庸才總

統四年任滿，人民不選他，自然非下台不可。即使是出類拔萃的，最多也只能幹兩任、八年。

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是沒有什麼偉大領袖或英明領袖的。任何一位在職總統，在民意測驗中能得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支持，就算上大吉了。在美國甚至還有人開玩笑說，選舉某人出來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THE LESSER OF TWO EVILS)。我們華人可不一樣，那些在位的領袖不但英明、偉大，而且都是從小就處處表現出是當領袖的材料，當然，他們的人格也是完美無瑕的。

又因為美國人最憎惡專制獨裁，生怕鋒芒畢露的人上台後大小一把抓，所以雄才大略、語出驚人的英雄或政客，反而沒有機會當上總統。事實上，千百萬人中，又有幾個是雄才大略和天賦英才？只要有良好的制度，誰當總統對老百姓來說，都沒有多大關係。

放眼天下，今天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恐怕還只有在美國，一個演員可以憑選票當上州長，繼而入主白宮。如果在一個靠槍桿子出政權的國家，里根別說當州長、當總統，說不定還要擔心以前拍過的一些片子，會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批、被鬥。

正因為不靠槍桿子出政權，所以有心人都

敢於出來角逐總統寶座，競選失敗大不了仍回去幹自己的老本行，不必擔心人頭落地。

白宮在里根入院之前，就對全國發表他的病情，手術之後也鉅細無遺的公佈醫療經過，連他得了癌症也毫不隱瞞，絕不像我們華人的政權，黨政領導人不管多老多病，只要還在呼吸，在官方的報導中，都永遠是非常健康的。

美國人民儘管關心他們總統的病情，但一點也看不出有任何慌亂，因為總統的繼承順位，法律有明文規定。在美國如果有人問誰是里根的接班人，一定叫人笑掉大牙。肯尼迪總統遇刺後，詹森在飛往華府的飛機上，由一位女法官主持宣誓，就成了新總統。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下台，福特馬上搬進白宮，老百姓照樣過自己的日子，絕不會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

西洋人相信「世界上沒有不可少的人」這句話(NO ONE IS INDISPENSABLE)。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時領導英國人渡過了那麼大的難關，但戰後却在選舉中慘敗。卡特在四年任內沒有建樹，選民立刻叫他下台。國家元首或政府領袖死亡，人民最多只是表示惋惜，絕對看不到如喪考妣的可笑鏡頭。至於到處供奉着死人的照片，成天對活着的人高呼萬歲、永遠健康的情形，在美國也是絕對沒有的。

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十億華人也能知道他們領導人的真正健康情形，不必一天到晚在那裡談論、揣測誰是誰的接班人，不必等到在位者噁氣之後還要經過一番折騰才能出現新的領導人，不必擔心的領導人上台後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基本權益會否受到影響，不必作一個只會喊偉大領袖的機器、談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話，那我們就有福了。

但願這不是一個奢侈的願望。

馬克思哲學理論危機的深刻化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美國) 嘉華

歷史上，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表明：當一種新的思潮出現時，不是統治者專制權力的高壓、或恐怖牢獄所以完全禁錮的，而舊的學說的過時，也不是依靠國家鎮壓機器、或槍桿子所以維持的，而其結果往往和他們的主觀願望相反，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也不會例外。

去年底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以評論員名義，發表「理論與實際」文章，首次鄭重承認：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當前的問題，也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雖然第二天就羞羞答答地增添二字，修改為「所有」問題，仍逃不過中共上層保守勢力的主要代表，軍方的「解放軍報」的攻擊，同樣以評論員名義，在十二日發表「黨的紀律不能『鬆綁』」的文章來對抗，以至胡耀邦親自出面干預，人民日報二十一日又發表「再談理論與實際」，重申原來的觀點，使事情暫告一段落。當時，在世界輿論哄動一時，也包括許多著名政論家和「中國通」，都認為中共這一回真的放棄馬列主義了。他們這些「專家」「權威」，對中共問題如此不了解，真使我們搖頭三嘆。對於中共來說，要他們放棄馬列主義，這個賴以建立和生存的理論基礎，怎麼可能呢？他們這樣說，不是北京的內心本意。因為中共從來將科學理論，當做自己使用的奴婢，這樣說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借肅清左毒，排除異己，在經濟上推行體制改革。實際上，鄧

小平仍繼續用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保障中共黨的利益和延長他的統治，確是用心良苦。

但是，中共希望長期維持馬克思主義的生命是一回事，大陸人民對「三信」危機，實踐上不斷動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又是另一回事，馬克思主義在各方面越來越經不起時間和實踐的考驗，那是不以中共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已經出現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實在已使中共無可奈何了。

大陸學者近年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最重要著作「資本論」，在時間、材料、方法和結論等方面，都作了探討性「接觸」，因為中共目前的經濟體制改革，對馬克思主要經濟原理，如勞動、商品、價值、貨幣、利潤和社會生產關係的運用，有許多不同作法，對世界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進程也不符合他的預言。以致使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即鄧小平現在大陸推行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了仿效西方的資本主義，或毛澤東生前大力批判的東歐共產國家的現代修正主義，而且步子比他們走得更遠。中共在大陸對於馬克思哲學的領域，一向被視為禁區，周揚、王若水、汝信等輕輕地提了一下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問題，就立刻受到胡喬木、鄧力群等打手的圍剿，其規模僅次于鎮壓大陸的民主運動。其次，對國外哲學，也只准批判不准讚許，前年，有人在法國哲學家薩特去世時，對其主義稍作介紹，就給予批判。可見作為認識世界的宇宙觀、人

生觀等的最基本的科學—哲學，中共對之十分敏感，也反映了其內心的恐懼。

歷史在前進，理論科學在發展，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阻擋，中共企圖運用權力，築起一道銅牆鐵壁來保衛馬克思哲學行得通嗎？不僅在國外，有些在大陸的學者，也逐步發現馬克思哲學的落後和弱點，例如三月六日廣東「羊城晚報」發表，十五日由北京「人民日報」轉載的，鍾陽勝的「必須改變當前哲學研究的落後狀況」一文，就反映了這樣的問題。按大陸的情況，中央轉載地方報刊文章是極不尋常的，其所以轉載，是因為已多少認識到無法長期掩蓋其缺點了。文章提出大陸哲學研究四大落後：(一)內容「老化」未能綜合和概括自然和社會最新科學，提出新原理，「幾十年一貫制」，跟不上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現代科學；(二)研究方法片面性，背離了哲學探索未知的本質和職能，使馬克思哲學變成保守的哲學；(三)研究隊伍的創造力不強，不能解決改革實踐提出的各方面重大問題；(四)缺乏自由討論的空氣，那種給學術討論劃框框，定調子，給不同意見扣帽子的做法，不利于哲學的繁榮和發展。又具體指出研究方法存在五大問題：「一講學術價值，往往就是面對死人，進行經典式的考據；一講為現實服務，往往離開對真理的探求而為某一種實踐理解和辯護；一講聯繫實際，往往就是例子加原理，變成標籤式；一講哲學普及，往往片面地搞成簡單化、庸俗化；一講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往往

必須改變當前哲學研究的落后狀況

钟阳胜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时代变革的伟大实践，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和改革融为一体，反映改革潮流的精神。

前几年，哲学界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起了先导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哲学研究落后了。这种落后，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内容“老化”。哲学研究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综合和概括自然和社会的最新科学知识，提出新的观点，抽象出新的原理，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认识工具。但长期以来，由于对实践关心不够，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和不少哲学小册子，却总是那么几条干巴巴的原理，“几十年一贯制”。在当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竞相问世和发展的形势下，哲学研究如果不面对现实，不追踪其变化和发展，不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其运动的规律，就必然要使自身“老化”，甚至变成“冷漠的哲学”。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片面性。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研究，一讲学术价值，往往就是面对死人，进行经典式的考据，一讲为现实服务，往往离开对真理的探求而为某一种实践注解和辩护，一讲联系实际，往往就是例子加原理，变成标签式，一讲哲学普及，往往片面地搞成简单化、庸俗化，一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往往自己封闭自己，不求哲学的创造性发展。这种研究方法，完全背离了哲学探索未知的本质和职能，继续下去，必然要使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保守的哲学。

第三，是队伍的创造力不强。长期的封闭状态，使哲学研究的队伍不仅老一代的专家、学者，而且青年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在实践上缺乏感性经验，在知识上缺乏对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了解，造成了人们知识结构的单一和基础的薄弱。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整个队伍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不利于哲学的高度创造性地解决改革实践提出的各方面重大的问题。

第四，哲学研究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哲学要反映改革潮流的精神，应允许不同的学派，在学术上进行自由的讨论和辩论。那种给学术讨论划框框，定调子，给不同意见扣帽子的做法，必然使哲学远离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利于哲学研究与改革实践相结合，促进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实践是哲学之树常青的沃土。只有在一种自由讨论的百家争鸣的空气里，哲学才能充分地反映改革主体的要求和改革潮流的精神，才能获得巨大的时代活力。

(原载1985年3月6日《羊城晚报》)

自己封闭自己，不求哲学的创造性发展」。這裏已最明顯不過的點出馬克思哲學基本原理實際上已成爲束縛哲學研究和發展的教條。該文雖短，却是針砭得宜，刻劃出馬克思哲學理論的弱點，既不能說明現實問題，也不能解決多少問題，那不就是說馬克思哲學理論危機的繼續惡化嗎？

又如在哲學兩軍對戰的基本問題中，雖仍抱着唯物論的一元史觀，但已承認唯心主義哲學的作用。在大陸已先後恢復美學、心理學、邏輯學、社會學等科學的合法地位；有人指出，如仍信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矛盾統一律，那麼，再保持現有黨的集權專政和一元化領導，不發展社會民主自由，在理論上就站不住了，因爲人民群眾始終站在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則相反，二者必居其一；在歷史唯

物主義上面，鄧小平抽去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内容，豈不成了舊日批判法國聖西門等的空想社會主義！這也沒有給馬克思哲學唯物史觀立足的餘地。遑論現代世界科學技術和社會進步大量出現的新概念、新範疇和有待探討的新問題，更在舊有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根據。

目前，大陸出現各種矛盾現象，是昔日神聖不可侵犯的馬克思主義框框容納不下的，如爲了支持鄧小平借助外資並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得不翻過去的觀點，爲在歷史上長期受批判的滿清封建洋務派李鴻章、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康有爲恢復名譽；爲了發展城鄉商品生產，利用市場經濟，又不得不把過去被打倒的革命對象——富農和資本家拉攏入黨，抬作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連長期被改造受排擠的

知識份子，也一下子由「臭老九」變得有點吃香了。

可是，問題在無法掩蓋之下，雖然被捉了出來，但要中共改變也難，他們長期以來有一套老作風、老辦法，以致在實際上，講的和做的不一致，甚至相反。但人民不僅要聽其言，而且還要觀其行。過去，誰不知道毛澤東批判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但他竟青出於藍，後來居上，把造神運動推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今天，鄧小平肅清毛澤東左毒對國家人民造成的浩劫，是應該的，但他還是政治「走私」，大量發行鄧選，作爲新的理論。如果有人以爲鄧將吸取教訓，實行徹底改革，最終放棄「四個堅持」，讓大陸人民享受民主政治、學術自由和康樂生活，那倒是最天真不過的。

與王炳章先生商榷

(華僑·美國) 陳弘文

近讀貴刊幾篇討論中國文化和民族性的文章，能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性，以發掘自己的缺點，是很好的嚐試。不過我讀過您「打破民族性、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間的惡性循環」一文之後，覺得有幾點值得商榷的，想提出來以就教於先生：

為公不一定滅私

先生認為儒家學說的精神「仁」，強調二人及多人間的互愛關係，即公字為體現的群體主義，抑制個體，甚至抹煞個體。我覺得這個假設似乎在中國歷史中找不出有力的證據。當然，如果強調墨子的「兼愛」思想，「磨頂放踵以利天下」的話，或許有抑制個體發展的可能，但像儒家主張的「推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想不至於流弊到抹煞個體的程度。因為一個人雖可抱著「天下為公」的胸懷，但不一定就要求自己「公而忘私」，甚至於「只為公不為私」，他只要能公私兼顧也就不會有人責備他自私了。至於您說的「存天理，滅私慾」，其實應為「存天理，去人慾」。這是後來宋明理學的主張，

並提倡明心見性，是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並非先秦儒家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沒有排它性

您在文中表示中國傳統文化是具有強烈排它性的。我想，如果就某位統治者或某位學者個人而言，或許可能。但是，就整體中華文化而言，恐怕不是事實。就儒家而言，主張「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萬物並育」是事實，「不相害」則非事實。就中華文化發展的過程來看，「道並行而不悖」大致說來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說中華文化是有強烈的排它性的話，那麼外來的佛教、回教和基督教的文化怎麼在中國能生存發展呢？雖然佛教有所謂「三武之禍」，基督教有清初驅逐教士的事，那都是因為當時宗教的發展影響到皇帝老子的統治權了，否則統治者是懶得管這一門子的閒事的。再就另一方面看，您認為日本文化沒有排它性。其實日本早期的文化也是以從中國傳入的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為主，既然這兩種思想構成的日本文化沒有排它性，那麼在中國本土的儒佛思想也就沒有排它性了。

儒家也主張革命與造反

您謂儒家尊重傳統和維護現有秩序，在其著作中找不到造反、革新的詞句，也非事實。在孟子答齊宣王的話中就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又如：「君之視臣若草芥，則臣視君若寇讎！」又如易經上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不都是反應革命造反的言論嗎？再說，歷史上王莽的改制，王安石的變法，清末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的洋務運動，以及康梁的維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這些人不都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儒者嗎？

奴性是在專制統治下養成的

先生提到儒權互利，以及「知識份子得意為儒（做官），失意從道（隱退）。儒道皆榮，絲毫沒有反抗之意，一反抗便『大逆不道』」。我覺得用孫子「求之於勢，不責於人」的話來解釋這種現象，我們就不會厚責古人了。關於中國人的胆小、怕事、奴性等，我認為都是在長期專制的高壓下養成的！要想改進這些缺點，恢復中國人的自尊自信，就非推翻專制不可。不過有一點需提出來以供參考。就是百餘年來，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之中，民氣消沉，很多人都已失去對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自信心了。就如一個因久病而元氣太虛的人不可輕言動大手術一樣。一個失去自信心的人，如果你一直批評他的缺點，無疑會使他更加自暴自棄。也許是這種緣故，孫中山先生才會去寫他的心理建設，羅家倫先生才會去作他的新人生觀吧。我想，對於一個病人，究竟是先給他進補強身，還是先給他動大手術，這就有賴醫生的智慧了。

我今年三十二歲，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停學停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之一。做爲一位親身走過這一段路的人，我深深地了解我們這一代人缺少文化教育的苦痛，同情我的親友們的處境。在美四年來，我無時不關心着這代人的命運。我爲他們一點一滴的進步而高興和欣慰，也爲他們生活中的苦惱而擔心和焦慮。今年好不容易挨到了工作後的第一個假期，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回國的路程。在國內的幾十

星期抽出幾個半天時間上學聽課，每天晚上既要做作业，又要和愛人一起帶孩子。讀啊！讀啊！讀了一年又一年，天天都要學到十一點鐘。他告訴我還要再讀一年多才能拿到相當于大學的文憑。他一個月只拿幾十元錢，還要養活兒子，可他的書架上擺滿了各國各地有關企業管理的書籍。有香港的、台灣的，和美國哈佛大學的。我問他哪裏來的這麼大的勁頭學習鑽研，他說他要努力把失去的光陰奪回來。他認



我們這一代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玲玲

天內，我拜訪了數位同代年青人，看到了他們正在以驚人的毅力和進取精神改變着自己的命運，創造着自己的生活。

我們這代人的特點是能吃苦。我有位表哥，今年三十七歲了。他文革初期高中未畢業就下鄉插隊了。勞動數年後直到患肝炎才得到病退返京的批准。回京後他被分到一個工廠當工人。他不甘心停留在原有的文化程度上。幾年前他考入了人大函授學院，學習企業管理。從八〇年到八三年，除每日繁忙的工作外，他每

爲只成了家還不夠，要立業。他的理想是拿到文憑之後，和有志的朋友們搭伴辦廠子，扭轉一些工廠的虧損局面。多有志氣的人啊！我想有這樣的人出力，國家有希望、能富強。

我們這代人勇于創造條件。我有位阿姨是位退休幹部。她退休之後閒不住，跑到一所社會大學做管理工作。社會大學在中國是個新名詞，與美國的社區大學（COMMUNITY COLLEGE）相似。他們主要是組織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年青人業餘補習大學課程。這所大學共

有二十七個專業，如中醫、科技新聞、營養食品工業、學前教育等。這個大學完全是學員們自己出錢辦的，沒用國家一分錢，沒有佔一寸投資面積。學校從各個單位請專家來講課。學生是就職工作人員。相當多的是我們這個年齡範圍的，下過鄉的知識青年。他們過去沒有機會上大學，現在大多數成了家，工作也很忙。可是看看他們那些在一所小學借用的教室裏，每個座位都有人，人人都聚精會神地聽着、記着。我的阿姨告訴我這些學員來自北京各地，每週來四次，每晚學三個小時。他們說：我們上不了正式的大學，就上這沒有圍牆的大學吧。

我們這代人較能任勞任怨。就拿分房子來說吧，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住房一般來說是相當吃緊的。國家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要先照顧資歷更高一些知識分子。三十幾歲的小家庭夫婦，常常擠在很小的一間房子內。我家隔壁的鄰居就是一個這樣的小家庭，丈夫是工農兵大學學生，學日文的，現在做日文翻譯工作。妻子是衛生站的衛生員。兩口子結婚都有七八年了。如今孩子都快上小學了，全家仍擠在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小屋裏，連張雙人床和飯桌都放不下。只好搭上下舖，丈夫睡上舖，妻子帶着孩子睡下舖。每天吃飯打開折疊桌，飯後再合上。家裏雖然擠，小兩口的日子倒過得滿快活。我和他們聊了半天，沒聽他們對房子問題有怨氣。丈夫講，他們對物質生活上的事情沒有什麼太大的欲望。

我感到，儘管我們這代深遭文革浩劫影響的年青人仍面臨着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他們已取得了極可貴的成績。他們是在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換取幸福，爲中華民族爭氣的。我敬佩我的同胞們，深深地爲他們感到自豪。我不時地想起他們，用他們的精神鞭策自己。

● 文藝園地 ●

我們心中的憂愁

——悼念詩人和散文家
李廣田去世十七年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趙繼康



李廣田，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電影作家協會理事、《五朵金花》、《摩雅遜》等電影的編劇、《黃河》及《礦神》等。趙女士於一九五〇年曾發表短篇小說「恩凡」，並曾在《新華月報》上發表散文。其作品頗為讀者所稱道。

「我忽然感到自己是一棵樹，是一株枝葉扶疏的大樹，當木葉盡脫時，我感到舒暢而堅實，當新葉初生時，我整個生命都為希望所襲擊；最幸福的是葉實累累，這時候，我從不吝惜；最羞於滿身浮華而空無所有。想誇耀自己年輪的，還是要把根紮下去，紮到最深處，也要把枝葉伸出去，伸向太陽去！……」

這是三十年代的重要詩人、散文大家和文藝評論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試放三首」中的一首詩。那時，他帶領了一群雲南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去到昆明市郊宜良縣採摘菓子回來，在小火車的煤煙和風塵中，寫下了這一即興之作。當時，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初次提出，造成了神州大地學術空氣「東風夜放花千樹」假象的時刻。廣田先生誤以為文藝的春天已經到來，作為大學副校長和一級教授，置身於喧鬧的天真爛漫的青年學生中，感染了他們下鄉遠足的真熱烈與興奮的情緒，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在詩的卷首寫下了「試放」的標題。

這樣健康的一首詩，本來用不着謹小慎微地加上「試放」字樣出現。不過，由於一九五〇年以來，知識份子領域已經進行了多次運動。正式的知識份子割尾巴運動查思想查三代姑且不論，這文藝界又最是多災多難。一九五〇年打從延安作家肖也牧一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引起寫光明寫黑暗爭論以來，一九五一年開展了電影「武訓傳」批判，一九五四年開展了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唯心主義批判，一九五五年胡風給毛澤東的萬言書一發表，全國又展開胡風份子批判，公佈了胡風和他的朋友的三

批通信信件，「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就等同於法律，可以給所有定為胡風份子的作家，逮捕上手銬，以後索性擴展為全國清查反革命的肅反運動。知識份子被幾次運動敲敲打打，早已成了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廣田先生性格向來很含蓄，沉默寡言，深思多慮。動員鳴放，他祇發三首詩，並小心地用了「試放三首」，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況其時，毛澤東在各省市書記會議上的插話，也早已指出：「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都出來，各省要注意，對重大的成熟的問題，以一個人為主，組織寫些文章，把邪氣壓下去！」這樣的插話在當時是絕密的。如果不是文革中，紅衛兵把它印成材料，我們這些非黨的知識份子，也許永世不知。廣田先生如果知道鳴放是在放長綫釣大魚，恐怕連這個「試放」的「放」字也不會敢用。可是，這樣的小心謹慎的老作家，逃過了一九五七年、一八五八年的反右派運動，一九五九年反右傾說了實話，依然落了網。因為在一九六〇年全國第三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時，我作為青年作家和廣田先生同一個代表團坐火車去北京開會。一路上我總感覺這個老詩人，有些愁眉不展，不苟言笑，像是一個憂愁騎士。趁他不在面前時，我悄悄問雲南作家協會一個姓李的秘書長。秘書長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這次叫不叫他來開會，還研究了好一陣呢！當然情緒不佳啦！」我聽了有點不服，私下向廣田先生表同情說：我很喜歡他過去的散文，他喜歡的德國作家里爾克，也是我喜歡的文。我讀過梁宗岱譯的里爾克「交錯集」，覺得寫得真美。廣田先生臉上浮起了一絲苦笑，憂愁地說：「不要談這些了，小托爾斯泰的話一點不錯，知識份子要在火裏燒三次，水裏浸三

次，然後在荊棘中滾三次！」見有人來，又馬上閉口不言，什麼也不說了。後來又有一次，我為私事開會遲到了半小時，大概是背後頗多閒言。廣田先生有心愛護我，想告訴我什麼，但見有人走近，又欲言又止。但那長者的關切之情，至今二十多年，仍深印我腦海。他要向我說什麼呢？我那時候被打中了右，內部控制而不自知，年紀輕不懂事，下放勞動也不當回事。老馬識途，也許他為我的前途耽憂吧？

一九六〇年三次文代會後，我和廣田先生沒有更多的接觸；祇在報章雜誌上，讀到過廣田先生的夫人，王蘭馨女士研究紅樓夢中詩詞與人物性格關係的理論性文章，衷心十分欽佩。王蘭馨女士在古典文學上的造詣，和評論分析紅樓夢詩詞的精緻獨到見解。同時，我也聽說過一些他們夫婦之間，伉儷情深的趣聞。譬如說，王蘭馨女士也是雲南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去上課時，天一下雨，廣田先生就會巴巴地送了傘去。可是，王蘭馨女士講課，從來是滔滔不絕目不斜視。廣田先生手裏拿了傘，悄悄站在教室外面，有時一等一個多小時，學生們擠眉弄眼，人人暗暗好笑。而每到傍晚，吃罷晚飯，這一對教授夫婦，又總會互相扶攜着去到翠湖公園散步。兩人并肩漫步而行，相互招呼着路上每一塊石子每一道坡坎。他們在飲食起居上，也從來相親相愛，相敬如賓，幾乎形影不離地生活了半輩子。讓人奇怪的是，報章雜誌雖然發表了王蘭馨女士的文章，廣田先生這個卅年代的大作家，在那些年間，却很少發表文字。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開始，我個人被揪鬥遊街，打成了反動文人。在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從另一打成反動作家的協會副主席劉樹德處，聽說了廣田先生在雲南大學也被隔

離審查了。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想來王蘭馨女士一輩子沒有和廣田先生分離過，在隔離審查期間，一定是渡日如年。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又聽說飽受逼供信折磨的廣田先生，忽然在看守疏忽時失蹤了。後來在昆明市郊的蓮花池中找到，他已經淹死了好幾個小時了。據說他身上穿了許多套衣服，直挺挺地站立在蓮花池的污泥濁水中，腦後還有傷痕。人們把這個消息告訴王蘭馨時，她以為是在詐她，瞪着眼睛馬上回答說：「我和他劃清界限！我和他劃清界限！」

親愛的讀者們哪，你以為應該責備王蘭馨女士無情無義，和丈夫「劃清界限」麼？天啊！一個革命者如果自殺，那叫做背叛革命，死有餘辜。如果家屬不馬上劃清界限，還會批鬥家屬。王蘭馨女士在和廣田先生分離的情況下，乍然聽說，當然很難相信這是事實。所以，按照社會適應邏輯，本能反應地叫出了「劃清界限」的話，兩隻眼睛當時已經直了。但是，她還在認為這消息不是真的，而可能是在詐她考驗她，審查她的反應。等到看到了廣田先生的遺體，弄明白廣田先生真是死了，連遺囑都沒有留下地去世了。她連哭也哭不出來，神智也幾乎失常了。

廣田先生在六一年寫的「樹的比喻」一文中，複述過里爾克的一段話：「……一棵樹永不計算時間，勇敢地站立在暴風雨中，好像永恒總在他們面前，寂靜、廣大而忍耐！」那二十多年，他的確一直是在忍耐之中，忍耐沒有真理的批判，忍耐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學習，忍耐諸如作協秘書長之流「哼」的一聲鼻息，忍耐無事生非的流言和侮蔑，忍耐法西斯的逼供毆打，忍耐名稱叫做噴氣式的反扭雙手下跪請罪……。但是他終於忍耐不下去了，知識份

子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共同的個性——士可殺不可辱！於是，他挑選了蓮花池這樣一個無比純潔象徵的地名去死，直挺挺地站立而死，不明白事理的小市民居然還說：「李廣田真怪！臨死穿那麼多衣服，一套又一套的。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死到臨頭，還捨不得丟好幾套毛呢衣服！」可悲的庸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廣田先生和金錢的觀念相去十萬八千里，他那是冷呀！精神的寒冷，靈魂凍結的寒冷！

改革中，人命如螻蟻。廣田先生早年，引用過 JOHN DONNE 的一段文字：「……每一個人都是大陸的一份子，大海的一份子。倘若一隻土蜂被大海淹沒，歐洲就少了一份子。任何人的死亡，對我都是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部份。所以，不要疑問喪鐘為誰而敲，它就如你而敲。」這樣一個充滿人性、充滿感情的詩人，在史無前例的浩劫中，又怎能不為人世間的殘酷而心冷！那一層層的衣服，正是一個象徵。詩人以自己的死，直立着的極度寒冷的死作為象徵，表達了一顆不屈的心，譴責了人性的冷！

李健吾在序言中感嘆，提起了廣田先生另一首早年的詩：「腳永踏着土地，永嗅着人間的土的氣息，昂了首，望着天上，望着白的雲，彩色的星，也望着碧藍的晴空……。」這，也許正是廣田先生在人世間最後的寫照吧！他死得撲朔迷離，充滿了朦朧的象徵，死得恰如一首詩。但是，是一首憂愁的詩，悲傷的詩，痛苦的詩！

王蘭馨女士在廣田先生死後，不言不語廢寢忘食地發了許多天楞，但最後振奮起來了。振奮和行動起來，為了給廣田先生找一塊土地埋葬築墳。可是，墳地選在哪裏呢？她想，墳堆多的地方，做鬼會不會也搞運動呢？不認識

的野鬼，如果再揪鬥廣田先生，那該怎麼辦呢？孤零零地築一座遠離眾墳堆的孤墳吧，廣田先生在九泉之下，又是否會寂寞呢？

這些話，她很認真地找了雲南作家協會那位被打成反動作家的副主席家人商量，大家聽了不發一言，真是淒苦萬分。最後好像是埋在聶耳墓附近，想給聶耳在鬼域作伴，但聽說雲大的革命委員會又提了抗議，屍骨入土未安，又下令遷移。

運動，沒完沒了的運動。全世界都在那裏建設前進時，三十多年，神州大地在萬歲萬萬歲的統帥下，祇知整人鬥人地搞運動。就是到了現在，粉碎四人幫已經八年，但也祇是八年沒有大的運動。而且，儘管人人都說今後不會再搞運動了，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敢從心裏真正作出保證，今後沒有整人的運動！李廣田先生的夫人，連築一座墳，都會衷心恐懼，害怕人死之後，在陰曹地府還有運動，做鬼也沒有個人自主的局面。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時時都在待宰割的恐怖中，由此可見災難之深重了！

當然，每次運動，都是中共中央權力鬥爭的反映。形式上，又必然假階級鬥爭之名來進行。所謂的階級鬥爭，又從來是自上而下，雷厲風行。知識份子對權力一般并無慾念。然而，一到運動來了，却總不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也正是生活在海內外知識份子心中最大的憂愁。舉國上下，并無一片世外桃源的安樂土，使人竟會憂慮人死也非萬事休，這豈不是莫大的可痛可哀麼？

有時候，我們文藝界的知識份子，也不免在暗下嘀咕：西方最多風雲變幻的中南美洲，宮廷政變，其範圍也最多是在宮廷之內。中國的歷代王朝，在宮廷之外改朝換代，百姓雖遭離亂，也可以有逃難的自由。是凡戰火未及處

，也還有一片安居樂業的偏安場所。唯有這社會主義的封建統治，控制遠勝於先秦保甲連座的局面。歲歲年年，號召人民關心政治，組織強制的政治學習，其內容無非是灌輸式地要求人民大眾背誦中共中央的各種政策文件，或是中共黨報社論。而中共中央內部一旦有了意識型態的爭論。城門失火，又必然殃及池魚。不論是反右、反右傾或文革反黨內走資當權派，



在文革期間，人們可以不上班生產，但不可以不應付政治學習。圖為上海鋼鐵廠某車間工人在停工學習。

知識份子必然陪綁。不論黨內哪一派得勢，哪一派下台，知識份子都要受到無辜的牽連。這倒真應了那句話：「人頭落地，還不明白頭是怎麼掉的。」文學藝術是意識型態領域，所以文藝界的知識份子每逢運動又必然首當其衝，從來是權力祭壇前待宰的羔羊犧牲（祇有粉碎四人幫這一次例外）。搞理工科學的，在文藝界出事遭殃之後，也難以避免自全，這倒真不如國民黨統治時期，知識份子祇要不過問政治，可以容許小康人家自得其樂。政治祇是職業政治家的事，文藝家可以批評政治家，可祇要組織什麼黨派。筆鋒犀利如魯迅，也還是善死善終。做老百姓氣極了，就會想，哪怕神州大地仍然是封建皇權，但祇要是個好皇帝，如唐太宗，也還有個三百年盛世繁榮。粉碎四人幫後，總算沒搞大的運動，但也祇是八年太平。而且，從一九八一年的秋天開始，反反覆覆，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跡象，真正的朋友會悄悄勸告：「說話當心！去了美國別忙着回來！」是啊！毛澤東生前說過：文化大革命每五年到八年要搞一次，要有第二次文革、第三次文革……如今，儘管人人都自我安慰地說：「總算活過來了，今後不會再搞運動了！」可是，天安門的畫像在，紀念堂的個人崇拜在，這一條語錄雖說不大見人提及了，但既有此語錄在，有朝一日又變成最高指示的可能性也在。誰的言論一過激，馬上四座臉色變。

「法治」仍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為準則，是中共黨員或不是中共黨員均受此制裁！「自由」三十多年從來不是正面的辭彙，而相當於「反動」字義。連「自由化」都要反，何況「自由」呢？民主牆一取締，「民主」一詞也成了禁區。十億人民，很可能大多數不識「天賦人權」為何物，報章雜誌也少見經傳。我個人也是在

文革期間，偷聽「美國之音」，才第一次懂得了人權的含義。而也真巧，就在我偷聽「美國之音」的第二天，街頭貼出了「偷聽敵台」的打紅槓佈告，有人偷聽收音機廣播，被判了刑。那時，尼克松還沒來中國大陸，「美國之音」在當時也包括在敵台範圍，當時我若不是用耳機偷聽的，完全也有可能被捕判刑。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所謂的公安局，多少年來以唯成份論調配工作人員，工農出身文化水準不高的大有人在。從一些監獄的暴露文字來看，那都是些共產黨的黨性很強，人性却很缺乏的機構。所謂的保衛部門，對於不馴服的知識份子，



文革期間，大陸到處都貼滿了大字報。

在暗底下的監視與迫害，至今也仍然怵目驚心，危機四伏。即使到了海外，也未見得鞭長莫及，一用民族主義做幌子，就可以視如寇仇，包圍打擊。三十多年的封閉，物質的貧困，加上精神上的貧困，社會學知識的貧困，要想製造一些腦袋瓜狹窄頑固效忠於中共的人濫施刑罰，實在太容易了！廣田先生一生謹慎，但臨了却選擇了蓮花池，以死來納諫中共中央的朝廷，其用心的良苦，是可以明瞭意會的。可是，除了死諫，難道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嗎？

去年年底，我初來美國，在「世界日報」上，看到了一篇紀念李廣田先生的文章，心中動了一念：我是從雲南來的，多少瞭解一些廣田先生非正常死亡的前後情形。能夠在海外寫成文字，為廣田先生一吐沉冤的，捨我其誰？那虛假的追悼會，有時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自己的親姐夫在文革中慘死，形式上在八寶山開了追悼會，骨灰未許放進八寶山。可追悼會一完，工作機關便好像甩了一個包袱，再有何問題需要解決，單位對家屬的態度，經常是不耐煩地置之不理。我親生的父親，在文革初期被亂拳打死，也并無「法治」懲辦兇手。而且，骨灰埋在蘇州，是以終生積蓄向人民政府買下的墳地，文革中，連母親的屍骨棺材都被刨被掘，以致至今屍骨無存。開過追悼會，也同樣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我不知道廣田先生的夫人子女，是否也受到同樣的冷落的待遇，一再遷墳後，最後情形如何，所以，馬上也很想仗義等等文章。然而，親戚朋友們都勸我，不要寫任何包含有政治內容的文章，牢騷太盛防腸斷啊！我妥協了，沒有提筆寫一個字。但將近一年過去了，有一天，我偶而在加州去了華埠的東風書店，看到了「李廣田文集」的新

版本。我翻閱了一下，看到了李健吾先生寫的一篇欲言又止的序。序中說：「李廣田先生是直挺挺站立而死的，提筆行文，感慨萬端，好像有許多話要說，却又說不出來。現在悼念他，擱筆者，非不欲言也，實難言也！」也許，在這吞吞吐吐之間，無聲勝有聲。然而，李健吾先生的這篇無聲的序，應該說行文實在太痛苦了，原因還在李先生身在神州大地吧？

文集中，收進了廣田先生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試放三首」中的那首「樹」，但下面并未加註，而把當年發表時的「試放」字樣去除了。想來是為「鳴放」的「放」字，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也還認為那是個危險的信號，唯恐有朝一日惹事招禍，影響家屬和文集的再版吧？文集的卷尾，收集了廣田先生寫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一封信。這是我過去沒有讀到的。從信的內容來看，既有乒乓球賽的比喻，我揣想那是寫在二十六屆世運會後的一九六一年，正是反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運動之後。廣田先生的女兒李軸，在編輯出版這一文集時，也不知是粗心，還是小心，并未註明這封信的年月日。但那信的結束語，有這樣引人注目的幾句：「……我天天在學習，在我所感謝的痛苦之中學習，忍耐就是一切！」這讀來竟彷彿是死者一聲被窒息了的呻吟，一聲瘖啞的隱藏在字裏行間的吶喊。使我在驀然間，似乎聽到了地底下的鬼魂的沉重嘆息，不能不重新為以往那三十多年組織運動群眾鬥爭作家教授的現象，憤怒和激動起來。由此，又終夜難寐，輾轉反側，回想去年動了一念而未寫有關廣田先生之死的文章，誠然是初來乍到，對寫文章的分寸，衷心還有顧慮，但在自己的下意識深處，也是為死者不能復生，對慘死者，總是在感情上不願回顧，不忍回顧。可是，再往深處想想，至今

在神州大地，不是還有許許多多像廣田先生一樣的活着的人麼？改革派和恢復派之間，自由化派和反精神污染派之間，不是又在那裏天天學習麼？自由化派甚至不敢承認自由化或是正在檢討自己的自由化傾向有錯麼？誰敢說「自由」這兩個字呢？誰敢提人權呢？我忽然又覺得，廣田先生文中，總喜歡用樹來比喻人。我初讀他的「試放」三首詩，還特別喜歡「樹」這一首。然而，這也可能不恰當——因為，我們可以是樹，向大地和人民奉獻纍纍的葉實，但不能永遠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鬥爭沒完，而且，我們也決不是樹，我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有愛也有恨的人！如果我們勞動了，我們也要享受纍纍的葉實，為什麼就被整得不敢說「享受」這兩個字，而永遠止於「奉獻」了呢？我們并不僅以追求享受為人生的唯一目的，可我們追求那敢於說「享受」兩個字的自由，那暢所欲言決不忍耐的自由！樹是無聲的，而我們要求有聲的自由，若是十億人民都成了無聲的植物，這個社會也就實難言其專制了！

假如，廣田先生還活着，我一定要向他說這幾句話：「我們逆來順受慣了，今後決不逆來順受！您不應該用『死亡』本身去寫撲朔迷離的象徵詩，而是應該倔強地活着，去寫火一樣熱烈的戰鬥詩！沒有犯法，憑什麼關起來隔離審查？大躍進餓死了人，為什麼不允許人說話？教書祇是一種教學職業，憑什麼一聲令下，就強制作政治學習？人人在事後都說五七幹校是集中營，可是，人人那時都是乖乖地做了集中營中的階下囚！士可殺不可辱，廣田先生您誠然用死說明了這一點，可是，又為什麼一定要死呢？熬着活着也好，反抗不屈也好，總之，活着才是勝利，活着才有力量去爭取明天

，活着才能拿起戰鬥的筆！而且，最要緊的，是決不對加之於我們身受的痛苦，表示些微的感謝！除非那是懦於強暴的反意語，是迂迴的控訴和揭露。但那也未免太含蓄太內向太書生氣了！忍耐就是一切的日子，決不是人受得了的，那是奴隸的待遇啊！」

祇是，廣田先生已聽不見我的話了。而且，在現在說來容易，在海外說來容易，在當時那法西斯統治的年代，爭論是祇能招來毒打的，帽子和拳頭會鋪天蓋地地揮了過來，亂棒打死一個人也非常容易！如果不是每一個人都覺醒，採取一致的行動，個別的反抗，也許由於太出於意外，會爭得大不同的特別寬容，但也不會對運動產生逆轉的效果。孫中山先生說的必須喚起民眾，在今天依然有着十分現實的意義，這是為爭取人權所必須的。而且，即使是馬克思，也承認過美國的「獨立宣言」是世界上第一個人權宣言，並認為人權是為改變奴隸人身依附、半依附地位從而成為封建特權和神權的對立物。人權也包含了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所有權不受侵犯的自由……當我理解了這一詞彙的含義之後，我要說，如今我是下定了決心，再不畫那阿Q的圓圈了。而且，即使絞索已套到了脖子上，我也要說，決不感謝那絞索，這便是當我重讀「李廣田文集」，看到了李健吾先生作序的難言之隱，想起了廣田先生的夫人，王蘭馨女士為廣田先生擇墳害怕做鬼也不自由的恐懼與憂慮，深感天下有心人聞此均會為此心痛，所想到的和決心斗膽說出來的。

至於廣田先生生平，我因并非深交，所寫當然掛一漏萬，祇能作到言無不盡，知無不言。

願廣田先生在九泉之下安眠！

路路路通

魯人

作者簡介：魯人，中國大陸青年作家，現在美國某大學進修，曾在國內報刊上發表過多篇作品。



齊通在一個相當廣闊的社交範圍裏被人們喚做「路路通」。這個綽號遐邇皆知，遠比他戶籍簿上的正式名字響亮。你不認識他？無所謂。祇要你在中國大陸B市生活，那就終有一天同他在某種機緣下結識，並成為這位儀表堂堂的小伙子的朋友，有幸列名於齊通那本百科全書式的通訊本上。

這個三十二開、錦緞封面、重磅道林紙的本子，是齊通慘淡經營的心血。自第一頁起，依照姓氏繁簡寫滿了各界人士的單位、住址及電話。百家姓上有的這裏備有。寬寬的天頭地角用箭頭勾入一些錄以備忘的小註，形式式，包羅萬象。譬如某甲手中富裕一套單元房間，總想以此換回遠在邊疆的兒媳，可惜一直是「手捧豬頭找不着廟門」，未遇其人。某乙所在單位掌握着市面上奇缺的能夠拔絲的盤條，却弄不到急需的解放牌卡車。某丙是公安局戶籍科長，人品還過得去，但也有個傷透腦筋的難題：家裏蹲着個嫁不出去的麻臉大姑娘，出來進去總是爹娘心病……哦，大千世界，芸

芸衆生！中國大陸，問題如山！哪個單位沒有問題？哪個家庭沒有麻煩？「路路通」即是一位排難解紛的專家！莫看他年不滿三十（那粉撲撲、嫩生生的娃娃面孔，使他顯得還要年輕一些），社會經驗却相當豐富。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熟人。「出門看天色，入門看臉色」是他的口頭禪。即以上述甲乙丙爲例，當齊通探知凡此種種之後，便挺身而出，四處遊說，頻頻穿針引綫，施展笑臉外交。他把某甲的跛腳外甥介紹給了戶籍科長的麻臉女兒，結果兩情相悅，一拍即合，喜煞了兩家老人。齊通乘勝說服科長將公安局打算淘汰的一輛解放卡車價撥給了某乙，從而使某乙放出一批盤條到邊疆，換回了某甲兒媳的戶口……經過如此這般的幕後努力，甲乙丙三方皆大歡喜，而齊通也就堂堂正正地成了某甲那個單元房間的主人。

齊通是個靈脩人：劍眉、細眼，笑起來有兩個坤式酒渦，甜甜蜜蜜。論職務，他祇不過是某機關的萬金油幹部，頂不起眼的辦事員，却有呼風喚雨的神通。他子身一人，獨立門戶，家中來客多如過江之鯽。他終日奔波，無所不至，是天字第一號大忙人。

如果您有幸來到齊通家裏，就會恍如置身於一位訴訟代理人的事務所。這個獨居室的單元，二十四平方米的實用面積，安排得既經濟又合理。貼牆是一張考究的軟床，齊通在外面跑得人困馬乏，回來後先要四仰八叉地往床上一倒，瞪着天花板噴煙吐霧。室內都是拋光傢俱，挨床那張寫字檯上，辦公用品齊全。書籍多是「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之類。每有閒暇，他便足不出戶，潛心閱讀。

寫字檯左方那個有暗鎖的抽屜，是他的武器庫。外匯券、僑匯券、國際體育比賽入場券、內部觀摩電影票、優先購買豬肝、核桃的醫師證明……雜陳其中。他運用起這些東西來，如同拈起十八般兵器，真可以說是得心應手。齊通就像泥鰍鑽沙一樣，專尋那些人際關係的空子鑽去，搭橋說合。他很少上班，却又百事纏身，他是公用傳呼電話的大主顧，郵遞員的重要服務對象，久而久之，鄰裏之間難免有些議論……於是，那些年齡大於他一倍或者一倍半的長者，好心好意地勸道：「小伙子，

別老在外邊跑，往家裏亂招人！自個兒唸唸書，學點本事比什麼不強？……」而齊通臉上堆着謙遜有禮的笑容，連聲答應，心裏却嗤笑不已：「上個月水暖設備失靈，不是我跟房管所打交道，靠你們能行？……嘻嘻。」

每天子夜時分，即兩日之交的時刻，齊通總是坐在那把在大陸尚不多見的氣墊安樂椅上，翻閱那本通訊簿，撫弄「武器庫」裏的全部家當，凝神思索，運籌帷幄……

且說今年早春的一天，齊通拖着疲憊的雙腿返回家裏，啟鎖時看見門隙插着一個五彩信封，上面龍飛鳳舞地寫着：「齊通先生雅啟」。落款是專供海外來賓下榻的華僑飯店。這字體好生眼熟，拆開來，飄出一張揉搓得不成樣子的字條……齊通定睛一看，失口「啊」了一聲，嘴巴都合不攏了。

字條上祇有寥寥數語，筆體稚拙：「我惡毒攻擊林副統帥，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特此請罪。」底下是他齊通的親筆簽名，以及年月日。

齊通怔了片刻，才又抽出信箋，正文是：「通弟大鑒：愚兄現住華僑飯店三〇七室，盼速來晤談為快。龍金虎。」

齊通倚門而立，如同中了定身法一般紋絲不動。他那兩隻韶秀不俗的眼睛裏閃着迷離的幽光，兀自出神……一封便箋和一張筆據，將他的思緒帶回到十幾年前的時光，帶回他誤入迷途的起點。

這齊通原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小寄養在舅舅家裏。據知情人說，他因先天不足，童年時體弱多病，被舅母憐愛地稱作「豆芽菜」。文化大革命爆發那年，齊通是小學四年級學生。「史無前例」的狂流，把這個孩子拋向

社會——身為鐵路局長的舅舅入監了，富農出身的舅母被遣回原籍；小齊通無家可歸，像個野馬駒似地滿世界亂跑，自己找飯吃。一日，小齊通閒逛到了城市中央的街心公園，看到許多畫匠猴子一樣靈活地攀在臨時搭



起的脚手架上，奮力揮舞排筆，塗抹出一副林彪的巨型肖像。畫面是青年時代的林彪站在平型關上，唇紅齒白，勝賽舊戲裏的美貌小生。小齊通委實幼稚，他在沉默的人群裏觀看了一陣，竟然不知深淺地嘀咕道：「這麼俊氣

？不對吧？聽說打年輕起就是個禿瓢……」左右鴉雀無聲，背後却伸來一隻長滿粗黑毛的大手，將他的脖領扭住，拖着走出人群，直到一條小巷的深處……

「小崽兒，」這個體粗如桶的青年大漢，五官粗獷，面皮赤紅。他上着農民式的家紡粗藍布對襟小褂，下穿印有「安全生產」字樣的工裝褲，足蹬解放鞋。在世道大亂的當今，憑這副亦工亦農亦兵的打扮，說他是幹什麼的都可以。這漢子見四下沒人，虛張聲勢地吼起來：「開口敢傷副統帥，不要小命啦！」

小齊通嚇得渾身節節，哪裏還答得出話來？

胖大漢子歪拉嘴角冷笑着，繼續恫嚇：「哼，自己跳出來的反革命！你，叫什麼？」

「齊……通。」

「齊通，你的小命算是捏在我手心裏了！你敢不聽話，我就向革委會、軍代表揭發你的滔天罪行！」言畢，他從打着補丁的衣袋裏摸出幾枚硬幣，去臨街小店買來廉價紙筆，喝令小齊通寫了那樣一張要命的字據。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無異於鐵板定釘的賣身契。漢子藏起字據，滿意地拍打着齊通瘦骨嶙峋的肩膀：「行，往後你就是我龍金虎的人了！」

他們就這樣相識了，從此結下惡緣。龍金虎是個社會青年，外祖父在香港。他聯絡了一些常在公海上作業的漁民，走私手錶、半導體收音機乃至長統絲襪，送走麝香、人參、袁大頭。香港的滯銷貨，一出手便是好價錢，利潤豐厚。值其時，社會秩序不勝其亂，走私倒把已經算是相當文明的勾當了。

從此，齊通穿上了這種亦工亦農亦兵的「道反服」，成為龍金虎手下的小嘍囉。這個集

團裏淨是些無家可歸的打手、醉貓、流浪漢。齊通年齡最小，每逢出行，必是殿後。他專在街頭招攬生意，交付貨款，有時還選「龍大哥」之命訂同伴的梢……曾有幾次，齊通決心洗手，但這是不可能的。龍金虎時常亮出那厲害的殺手鐮，提醒齊通少生幻想。那是一份足能置人死地的文契呀，齊通沒奈何祇得咬緊牙關幹下去……

七零年初，龍金虎忽然從齊通的生活中心消失了。後來得知：他那位有金錢而無子嗣的外公病入膏肓，指定龍金虎為財產繼承人……這麼着，齊通才得以擺脫魔爪。誰料想，這傢伙竟突然從天而降，再次闖進他的生活呢。

木立了片刻，齊通漸漸恢復了往常的冷靜和自負。一抹揶揄的嘲笑，牽開了他的唇角。他暗笑龍金虎，這斷好不曉事，竟不懂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簡單道理，居然把「路路通」當成了隨意調遣的小伙計！殊不知齊某人十幾年來走南闖北，早已磨煉成了油子，足能與任何老手相匹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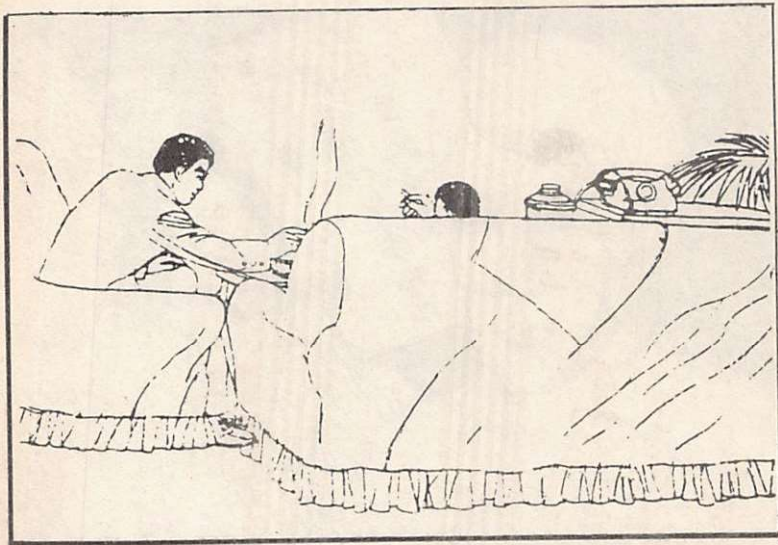
於是，他信手寫了封半文不白的回函：「龍兄助鑒：潤別多年，歲月悠悠。忽接魚雁，太高興啦！奈因賤體不適，無法前往，盼來舍間小坐。齊通。」

他深信龍金虎必有求於自己，才將那張早已失效的文契主動寄還。因此，信發出之後，他息交絕遊，就像老謀深算的姜太公，垂下釣餌，坐等願者上鉤……

幾天之後，龍金虎果然找上門來。這當兒，齊通正獨自受用一頓挺不錯的午飯。遺憾的是，緊張而無規律的生活，業已敗壞了他的胃口，食不甘味。龍金虎的到來，正可以提高興緻，為佐餐之用。

他們熱烈擁抱、握手。齊通笑說：「老龍，你成潤佬啦！街上碰見，我都不敢認你了！……」

龍金虎的派頭與當年判若兩人。他更胖了，簡直可以算是臃腫。意大利式的嗶嘰西裝，



經手工剪裁得無懈可擊；頸上吊着「丹鳳朝陽」的花俏領帶，足下的皮鞋光可鑒人。當年那股蠻橫的霸氣沒有了，一舉一動都透着斯文。他揚頭大笑：「歲月難留。當年你瘦得像隻小雞，如今是頭小虎啦……」環視室內，又讚道

：「到底是實幹家呀，在大陸能維持這樣的生

活水準，也算不易了……」

齊通客氣地微笑着，敬上煙茶——都是舶來品。這些招待活動使他顯得熱情友好，而又免去了首先開口的義務。

飲着滾燙的印度紅茶，龍金虎慢慢開言：「賢弟，你我深交多年，關係非同一般。我們不妨略去某些程序性的客套，開門見山地交換意見……」

齊通矜持地微笑着，不言也不語。

龍金虎豎起一個指頭，戳點着沙發扶手，如是者多次之後，才又說道：「坦率地講，我們以前的那些荒唐事，是不名譽的。今後，一切合作當以遵守國家法令為前提，促進四化……」接下去便是連篇大套的政治術語，宛如人民日報的社論摘要。

齊通狐疑地盯着龍金虎，暗忖：「這個壞東西，滿嘴官話……要當心！這種沾了一身文革習氣的『大陸崽』，在港澳也是被人看不起的……」

「敝公司急需煤。」龍金虎在結束了冗長的說教之後，目光灼灼地宣佈：「大量的煤。」

近年來，由於外貿方面的部份權力下放地方，各省市為爭取外匯而相互掣肘，致使許多熱門出口物資價格慘跌；與此同時，許多有權勢者紛紛插手，呼風喚雨，牟取厚利，出現了中學女生見面也要扯幾句生意經的奇怪現象——這也是一種時髦呢。

齊通兩手一攤：「愛莫能助呀，龍老兄。」

他確實沒有辦法。原煤係當局直接控制的一類物資，不經「中央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

「批准，一兩煤也休想出境。「路路通」縱有
天大本領，也做不得「中央」的主。」

「煤，已經到手了。」龍金虎豐腴的臉上
，自負之態可掬。「而且繞過了中央的五礦總
公司……」

「哦?!」齊通不勝驚異，手中的勺子落地
，他也未曾覺察。

龍金虎代他拾起，放還原處。「老弟，我
們不走煤路，而是以『腐植酸』名義出口……」

略一點撥，諳曉世事的齊通心裏便是一片
豁然：這壞東西也沒有枉過這十幾年，虧他想
得出如此妙計——將雞鴨稱作雞蛋，瞞天過海

龍金虎以手支頤，無名指上五克拉鑽石的
結婚戒指閃光耀眼，似乎也在誇示主人的足智
多謀。「……港口、船隊都已安排停當。問題
是從煤礦到港口貨位的鐵路運輸不好辦，還得
借助老弟……」

齊通醒悟地露齒一笑——龍金虎的來意是
這個！看來他非但沒有忘記自己的舅舅是鐵路
局的當權派，而且想必早已打探出舅舅有權調
動車皮，哼，這壞東西！

龍金虎娓娓地道：「我知道你有辦法。且
不說令舅身居要職，單是老弟這樣一位『路路
通』，也不會令愚兄空手而返……」

齊通心裏暢快，表面嗔怪：「誰這樣亂講
？」

「有口皆碑。」

「傳聞失真，蒼蠅也會變成大象啊！」齊
通祇是一味推託。

龍金虎不作聲了。他是生意人，自然懂得
「賢弟」是在拿搪，再多的勸說祇能適得其反
。他大概嫌室內溫度過高，解開了胸前幾個鈕

扣，露出襯衣裏面的一個光亮的金屬紅心。

這個冷場拖得很長。齊通和龍金虎都在思
謀下文。他們當初也并非真朋友，何況如今？
然而，牟取高利的欲念又將他們牢牢繫在一起
，誰也不想罷手。

「另請高明吧……」齊通吞吞吐吐地打破
僵局，還點出幾個人名，都是當年一同鬼混的
阿狗阿貓。「他們若是都辦不下來，我再試試
……」

「齊通，都是老哥兒們，你我何必叫板呢
？」當年的粗俗話，從龍金虎嘴裏滑出……他
登時住口，覺得有失身份，然而覆水難收。「
我是商人、資本家。（隱隱地冷笑）按照馬克
思的說法，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我要四
十節車皮，事成之後，商人交付……」（故意頓
了頓）COMMISSION（回扣）是天經地義的
……」

齊通垂下頭，凝視足尖；但他出言却很凌
厲。「我的『COMMISSION』是多少？」

「通例。成交額的百分之二。」
齊通咽下口水，喉核咕嚕一響……對於低

新的大陸人，這簡直等於一座金山。他不動聲
色地問：「怎樣交付？」

龍金虎殷勤建議：「幾個辦法隨君選擇：
我可以在香港律師樓給你辦個證書，指明這是
閣下繼承的遺產；也可以替你存入瑞士銀行……」

「不……」煙雲一樣不堪回首的往事，重
現於齊通眼前。他對龍金虎極不信任。「我要
現鈔。一手交一手，要美元。」

龍金虎不假思索，爽快地一拍前胸：「君
子一言，駟馬難追……老弟，敝公司是家族
會，我是董事長，太太以及堂兄表兄弟們是董事
。將來付了錢，連收據都不必寫……」

齊通心裏答道：「今生今世，我再不會給
你立什麼字據了。」沉吟了一下，忽然又想起
一個緊要關節，便單刀直入地插問：「老龍，
私憑文書官憑印……你？」

龍金虎挑動眉尖，再度揚頭大笑：「哈哈
……『諸萬一生唯謹慎』，佩服佩服！看，這
是鄙人的資格證書、鄙人言行代表公司意向……
這是鄙人的邊境通行證，這是……請過目！」



「他把厚厚一疊文件拋在茶几上。

他們握別之後，齊通把這件事情重過心秤，再做權衡，直到認為自己的表現無懈可擊的時候，才放心睡去。

「舅舅，」次日，齊通蹲伏在舅舅——鐵路局伊局長的皮轉椅旁，嘴巴幾乎貼在了老人那聽覺不靈的耳朵上：「我需要四十節車皮，您大筆一揮，就行啦！」他的話輕鬆之至，彷彿是學齡前的兒童在討要糖果。

「要車皮？小孩子瞎胡鬧……」伊局長笑着抬手括了齊通的鼻子一下。由於膝前祇有一女，他一向將外甥視為己出。

齊通趁勢作出一臉頑皮相，哼唧唧：「有位老同學從香港來，急需車皮……」

伊局長閉目養神：「公事，要到局裏去談。車皮要你這毛孩子操心？奇怪……」

「四化成敗，匹夫有責！」齊通神情陡變，正顏厲色：「眼看着港澳同胞的合同書做公文旅行，我於心不忍哇……」

伊局長扶着老花鏡，重新將龍金虎的合同副本來回看過，仍然不置可否：「小通，這份材料，我轉給局裏有關同志，請他們研究處理吧。」

一句話嚇得齊通臉色發白，心跳律加速。這合同祇能私相授受，囫圇辦理，哪裏經得起細究？他眼珠一轉，佯笑道：「祇怕時間拖不起。龍先生是中間商，這批……哦，這批『腐植酸』已經轉售給了南美，貽誤時間是要罰款的……」

齊通時而嘻皮笑臉，時而假癡假呆。真是忙得不亦樂乎。在農村插隊時，有一回他被「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臨時抓差，在「革命样板戲」——「沙家浜」裏客串那個祇呼一句「毛主席萬歲」便被槍斃的倒霉鬼王福根，結果是

整個一個砸鍋。人人都笑他笨。然而，曾幾何時，在人生舞台上，他却成了表演行家。

遺憾的是，不管齊通怎樣指天咒地，伊局長緊閉尊口，一聲不響。他祇得快快而返。他沒有回家，在市內兜了幾個圈子，托熟人搞了兩張「四郎探母」的戲票，打算陪同舅舅前往觀看，以便迂迴進擊。

電話打過去，舅舅焦急萬分地驚叫道：「小通！正要找你，你舅舅又犯病了！」

伊局長當年在牛棚裏落下冠心病的根子，而今隔不三五天便要發作。齊通趕到醫院時，伊局長已經昏昏迷了，臉色如蠟。單間病房裏架上了輸氧設備，醫護人員忙進忙出……伊局長那位老實得像塊木頭的千金——齊通的表姐，正在一旁暗暗垂淚……

於是乎，「四郎探母」的戲票在意外情況下派了新的用場——分贈給兩位上了年紀的主治大夫。人家不肯收，是齊通硬塞過去的。

當夜，齊通陪床熬了整整一個通宵，極盡孝順之能事。「小通，」伊局長清晨醒來後，看見外甥清秀的臉上罩着一層缺覺的晦暗，俊逸的雙眼佈滿紅絲，很是心疼。

舅母道：「小通在你身邊伺候了一夜。」伊局長抬起視線，與齊通期待的目光遇個正着。

「你生舅舅的氣了？」伊局長氣息微弱地說。

「我，我傷心……」齊通蹙眉，擠眼，做出痛苦狀：「十幾年前，我無家可歸，龍先生救過我的命……」他開始來敘夾談，繪聲繪色地講述一個悲涼感人的故事——即與編造的故事。言至最後，齊通完全進入了角色的規定情緒，彷彿自己真是天下一切不幸的集大成者。直說得舅母老淚盈眶，以手掩面；舅舅喟然長

嘆，雙眉緊皺。於是，伊局長吃力地喂動了一下瘦削的雙頰，右手抖抖索索地伸向主治大夫遺忘在床頭案几上的圓珠筆……

齊通心花怒放，痛快得如同三伏天飲了一瓶井藏啤酒。大功告成了！當伊局長落筆在合同單上，寫出簡短有力的批示的時候，齊通已然彷彿凌駕着五彩祥雲，飄然欲仙了。

當晚，交付「COMMISSION」的儀式，在齊通那間幽暗的小屋裏，鄭重其事地舉行。

龍金虎準時踐約。一進門，齊通便打出歡迎的手勢，却不出聲，他怕對方身藏微型錄音機，二度授人以柄。他用鋼筆在掌心寫了個「請」字。

龍金虎對他的狐疑報以寬厚的一笑。二話不說，他敞露襟懷，解開暗扣，於是一大疊淡青色的票子像一掛瀑布似地落在寫字檯上。齊通暗吸冷氣——林肯頭像、華盛頓頭像……龍金虎又打開一隻皮箱——全是清一色的票子……

「刮刮叫的硬通貨！」龍金虎大聲揚氣。齊通的心呀，擂起了急鼓。他下意識地把兩手在衣角上正而反、反而正地擦來擦去，緊張得不敢交睫。看，票子上還印着發行年號——「一九四五」，那時的美元，和金元一樣值錢呢！齊通不願在龍金虎跟前丟面子，努力維持着淡漠的假象：他那纖細的手指攤開又收攏，慢悠悠地探過去……臨到桌面時，這手終於失去控制，迅如蛇舌似地一攔復一揉，轉瞬之間，那些大票子便在主客二人眼前消失盡淨。龍金虎客氣地微笑着，顯得涵養功夫很深。他仔細驗過因有伊局長批示而用過鐵路局印鑒，并附有運輸單據的合同書，認定確鑿無誤；然後親切地有如當年那樣拍打着齊通肩頭：「兵貴神速。我已經訂了下一班回港的機票，

總算可以向做公司全體同仁復命了。老弟，凡事要小心嘍，同樣的麻煩，在我頂多是吊銷通行證，永遠不得入境；在你就要上經濟法庭，坐班房囉！

此時，假如齊通尚能冷靜地保持常人見地，也許不難聽出龍金虎話裏的不祥之音。但他已經處於微醺的狂熱之中，甚至沒有留意這番饒舌。他把那些票子重新捧出，逐一貼在額上，輕輕搓捻，豎起耳朵辨聽聲音，接着又像盲人似地翻起眼睛，聳聳鼻孔，深深吸氣，在確乎嗅到那種由於千萬人摩挲而形成的鈔票特有的特殊氣味後，才放下心來。至此，一切疑慮都渙然冰釋了。齊通笑逐顏開，雙額現赤，無言地同龍金虎熱烈地擁抱。

夜闌了。小屋裏仍然燈火通明，齊通還在狂歡痛飲。昔日對龍金虎的怨尤，業已轉變為無窮的感激。一個窮小子，忽然變成了腰纏萬貫的潤佬。這真像是一場夢呢。

次日清晨，一陣急急的叩門聲將齊通吵醒：「香港來的電話！」

趕到公用電話處，話筒裏清晰地傳出龍金虎的聲音：「齊通嗎？噫，你上當了，那些票子不是鈔票……」

「怎麼？」齊通錯愕了。

「那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在歐洲戰區發行的貨幣代用券，早就不流通了，也不能兌換

齊通頓覺天旋地轉：「什麼？！」

龍金虎的聲音依然和氣可親：「請你不要怪我。這都是令舅大人的蛇蝎之計：他讓我把你表姐辦去英國自費留學，那筆「COMMITMENTS」是她的學費、路資……」

「你這黑棍！」齊通咬牙切齒，但聲音裏却沒了底氣：「你怎麼敢血口噴人？……」

「哼哼，我是念在十幾年的交情上，看着你怪可憐的……對囉，你不能拿着那些廢紙去銀行，令舅這一招真毒——你若是去銀行請求兌現，公安局馬上抓你，判你個『擾亂金融』的罪名，伊局長已經跟公安局長打過招呼了！信不信由你，拜拜！」

齊通手一抖，像甩掉毒蛇似地甩掉話筒，俄而，又強自定了定心神，撥通了伊局長家的電話……

「他們都去飛機場啦！」那邊，老嫗姆扯着嗓門在喊：「今個兒是大姑娘的喜日子，出國留洋嘍！……」

天啊！

齊通蹣跚地往外走去，步步都像踩在刀尖上面，痛不可當。他惶惶然信步走到城市中央的街心花園——當年邂逅龍金虎的地方。這裏綠樹含齒，垂柳依依，春意盎然。他在矮矮的松牆旁邊蹲下來，痛苦欲絕地低嚎一聲，自捧着滾燙的臉頰，先是抽泣，而後痛哭起來。

他在一場黑吃黑的角逐中一敗塗地！

借着殘存的幾份酒氣，報復的念頭在齊通心中掠過：龍金虎剛剛出境，那批打上「腐植酸」標記的烏金尚在產地，他要向有關部門檢舉、揭發……

但這也祇是一閃念罷了。在這官官相護的社會裏，齊通怎敵得過局長大人呢？好一個狡獪家！略施小計，就使「路路通」滿盤皆輸，還險遭不測……這個小有心機的外甥，就這樣被他的老奸巨滑的娘舅冷酷地、不動聲色地玩弄了。

齊通索性嚎啕大哭起來。

讓他縱意拋洒傷心之淚、懊惱之淚，抑或還有懺悔之淚吧！然而，大放悲聲之後，他將起身走向何處？——讓我們拭目以待……

致叛逆者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齊升煥

絕壁上
你執着地攀緣
希望
沒有繩索
選擇
沒有同伴
扭曲的肌肉
又開的手
不屈的血
倔強的汗
你
在昨夜夢中光榮地死去
肉化清風汽化煙
空即是色
却又在絕望的清晨中醒來
慈悲照舊
衆生依然

去吧
疲倦的風
再一次推動祥雲
把那古老的祝福和詛咒
送到善男信女中間
來吧
無聲的雷
再一次推動瑞雨
把每一滴希望和孤獨
播在叛逆者的心田
絲絲情悽
切切情懷
點點感激
如綿、如怨、如願

色即是空

臧克家的臉皮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劉龍江

古云：文如其人，但對歷經劫難的中國大陸作家來說，似乎不大適用。因為他們早已學會適應波譎雲詭的政治，隱藏自己的真面目。真面既隱，文自然作偽居多。好在近來當局已聲言尊重創作自由，以後，或許能多看到一些表露真性情的文字。不過，有時也能從莊嚴的虛偽之中，窺見某些文人的可憎的本相。

我手頭有一本去年十月的「人民文學」，此雜誌是中國作協的「機關刊物」，算得上很有權威，這一期刊出老詩人臧克家的回憶文「我與『新月派』」。臧是大陸詩壇的風雲人物，早在三十年代便以苦吟見長，很有名氣。在他的後半生中，國內文苑歷經離亂，一片凋零，但他老人家一直走紅，曾主編「詩刊」多年。文革中雖也被發配「幹校」，但似乎沒吃多少苦，所以他能唱出激越的歌頌五、七幹校的「向陽詩抄」。直到前年極左派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圍剿朦朧詩，這位七十八歲的瘦小的戰士仍披掛上陣，「站在鬥爭前列」。在早年，他與「新月派」有過交往，而以徐志摩為代表人物的新月派，又向來被官方指為資產階

級的沒落的流派的。因此，這位老詩人又要標榜自己的閱歷又要表現潔身自好，所需伎倆，就變得格外有趣了。

該文從他自己在一九三〇年隨聞一多學詩寫起，着重敘寫了他如何經過武漢大革命，如何「認識了革命的偉大意義」，進而以詩作武器投入戰鬥。他的意思是從走上詩壇的第一步，他就是革命的。然而單有革命的激情不夠，於是他愛上了聞一多和徐志摩的詩。徐的四本詩集，他「幾乎都能背誦，喜愛之深，可以想見」。不過且慢，臧克家對新月派的「沉吟和喜愛」，是很有分寸的，他把新月派詩的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分得很清楚，他鄭重道：由於「新月派」在思想陣線、文藝陣線上，「成爲了革命陣營的敵手，因此，他堅決反對；同時，又十分欣賞新月派「用比較精美凝練的字句，新穎的想像力與奇特的表現藝術技巧，表現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情感」。總而言之，在內容上思想上，「新月派」是仇敵，但在藝術上，却是他的母親。他吮吸的是狼的乳汁，但他聲明他決不會是狼孩。

我們知道，對抒情詩而言，思想和形式是

融合爲一，不可分離的。向技巧圓熟的新月派詩人學詩藝，正是大好事，何須扭扭捏捏？臧克家的尷尬之處正在於此。他費盡心機地證明：肉味鮮美無比而藏有劇毒的河豚，只有他能吃。而且他吃了之後，在革命詩壇上馳騁得更

有勁道。

且看他如何效新月派刻意練字，所舉的例子無非是那麼幾個，從他在不同時期的談詩的文章，我至少已見過三四次。那就是：「鐵門響聲截斷了最後一人的脚步，這時，黃昏爬過了古鎮的圍牆。」還有更爲膾炙人口的那兩句：「日頭墜落在鳥巢裏，黃昏還沒落盡歸鴉的翅膀。」差不多成了他的口頭禪，所不同的是這一回搬了「新月派理論家、學者葉公超先生」爲他這兩名句叫好，說葉在青島與他談天，一開頭就背起這兩句，「而且盛讚它」。臧克家是很會看氣候的，現在不正要實行「三通」，和台灣和平統一嗎，所以他自豪地提起葉公超賞詩的雅事，要在以前，他決不這樣蠢。

到文章末尾，臧克家仍唯恐人家把他當做「新月派的門人，又再次聲明：「新月派詩、新月派詩人給我的影響很大，但必須緊跟一句：只是在表現藝術上！」至於其他，不但一致，「而且大相逕庭」！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詩壇不倒翁的苦幹真性情來了：油滑、沒有節操、虛偽，爲了自己的名與利可以幹「下作」的事。我唯一佩服的是他那張愈老而愈厚的臉皮，在四人幫當令的年代，他激昂的朗誦過「打倒鄧小平」的詩，而後又歌頌華國鋒，而後又歌頌鄧小平、歌頌「清除精神污染」，他總能兜售一些使當權者喜歡的貨色。到末了他賣的就是這張厚厚的臉皮。在中國大陸，似乎還能賣一些時候，且不受譴責，這正是文壇的悲哀。

電視機前斷想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田江

一邊吃午飯，一邊打開電視，看CNN (CABLE NEWS NETWORK) 的午間新聞專輯。雖然離開中國大陸好幾年了，可是當年由官方擬定的思維模式「回憶對比」，却不期然而然地在腦際活動起來。當年最風行的「回憶對比」，便是以「新社會的甜，比舊社會的苦」，想之不足，還有實物對照，如吃憶苦飯，百十人在一起，吃一頓以南瓜、野菜、米糠拌和煮成的飯，據說舊社會窮人就吃這貨，雖難吃，但不吃則有缺乏「無產階級感情」之罪嫌，吃時能流點淚最佳。閑話休提，且看電視。

電視正播送一則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攝製的新聞特寫：一位年約十七歲的高中生被徵召入伍，即將開赴前線。他坐在一大群或則娃娃臉，或則絡腮鬍入伍者中間，神色自若，輕鬆地回答美國記者提的問題。他長得很英俊，從骨架看，是個正在發育的強壯的半大小子。他告訴記者說，他已上過一回戰場，這是第二次。他說他不怕死，為什麼呢？因為真主祐他。霍梅尼早已擬好了萬全之策：死者上天堂，活着當英雄。古今中外的聖人都是有萬全之策的

。孔教不也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嗎？至於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有萬千紅衛兵在武鬥中高唱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毛語錄歌或者「林副統帥」的「上戰場槍一響，完蛋就完蛋」慷慨赴死的。與霍梅尼比起來，國產貨更為悲壯。因為毛林的「教導」中只指出一條路——死路，沒有活路。此舉似欠缺辯證法，但更見得中國青年之敢於慷慨就義。十七歲至二十歲時的血是滾沸的，聖人們最愛喝。在今年，大陸的軍中作家李存葆在力作「高山下的花環」之後，又以一題名為「山中，那十九座墳塋」的中篇震動全國。該小說中有一位因勞累而昏迷死亡的解放軍戰士孫大壯，他生前日記中最後一頁的最後一行，把毛澤東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誤寫為「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這麼一誤，倒洩露了聖人統治人民的秘訣。

再往下看，美國記者在這伊朗青年即將離家的時刻，訪問了他的家庭。在場的有他那面容憔悴而強作達觀的父親、和三位以黑披巾遮蔽了頭臉的女性。那是青年的母親、兩個妹妹

，其中一個僅八九歲。記者提問：青年從軍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全家人立刻異口同聲地回答：出於完全的自願，沒有人強迫他。全家都為了他成為聖戰的戰士而自豪。這叫「同仇敵愾」，也即聖人們最為喜歡的「輿論一律」。五十年代初，不知好歹的胡風因向中共中央上「萬言書」，被毛澤東打進十八層地獄，反對「輿論一律」便是胡風的罪狀之一。然而，「異口同聲」，恰是叫人最恐懼的事。因為，這恰好證明政治的高壓已到了極端。古之有識之士嘆「萬馬齊喑究可哀」，不錯，統治者使得百姓噤其七嘴八舌，民間萬喙息響，只有聖人洪鐘似的聲音迴響在世間，這已是莫大的政績了。不是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嗎？暴君輕而易舉地做到了。但這還不夠，更高明的是弄得老百姓全成了聖人的回聲，總是「××指示我照辦，××揮手我前進」，都是異口同聲，萬眾一心，絕無反調。我不知採訪的美國記者作何感想，這種答詞在大陸早已流行多年。就是現今，若有外國記者在國內採訪，問國人對魏京生等人被判入獄有何異議，可有誰敢直言當局的錯失？誰直言誰便被人譏為呆鳥。極權之下，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輿論。所謂「獨裁使人沉默」，也是老話了。可是，又偏偏不准你「沉默！」你的心在詛咒、在流血，但必須強顏歡笑，向暴君唱頌歌。子民們一邊腹誹，一邊三呼萬歲，一邊還覬視旁人，看看有誰敢公開表示反抗，便可群起而攻之，置之於死地，向暴君邀功，借此預先備下苦幹本錢，以備將來自己也不幸失言獲罪時求取減等發落。這種情形，在中國的監獄裏最為常見。想到此處，我忽然悟出伊朗婦女蒙面之妙用，也許，這從軍青年的母親在面紗之後抽泣，在詛咒，誰知道呢！讓真主去裁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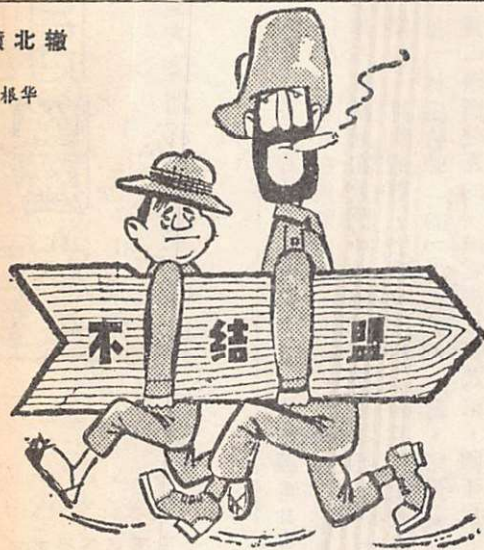
人道主义大合作 方成



從軍的青年一一吻別了父母和妹妹們，一身戎裝，上戰場去了。在火車站前，一隻綿羊被宰掉了，血流在地上，戰士們踩着羊的熱血行進。一位男子向兵士的行列灑一種水——姑名之聖水吧！我從未讀過可蘭經，不知其意。同時，我為林彪當年的「造神運動」惋惜起來。林禿子碍於不信神的唯物論，其儀式僅止於「早請示、晚滙報」，「忠字舞」，實在缺少聲勢。夫宗教也，必須具備諸多的儀式，才能使神更加神秘起來，威嚴起來。論此道，霍梅

南轅北轍

朱報華



尼倒是輕車熟路，比馬列的徒子徒孫如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霍查胡志明之流 顯赫多了。脚踩羊血、髮披聖水的兵士上了火車。那青年的朋友也來送別，叮囑他多加保重。青年沒有女朋友，他還沒到給人送玫瑰的年齡。以兩伊戰爭之慘烈和長久，這高中學生也許一去不復還了。他坦然地走進死亡，他將變成傷亡人數中一個枯燥的引不起任何人興趣的數字，除了他的親人。

火車隆隆遠去，前方便是炮火和屠殺，真正的青年沉湎於壯美的幻想中，真主的召喚使他充滿犧牲的激情。無疑，他是個勇敢的戰士。霍梅尼調教出來的青年，終於表現了一股理想主義的豪氣。這種豪氣，只有受了長久蒙蔽、缺乏理性的人才會有。當年的紅衛兵也是這樣奔赴武斗上戰場的，也是這般慷慨赴死的。但是，同是赴死，伊朗的青年幸運多了。伊朗人戰死沙場，除了天堂的榮幸之外，還可當烈士。除非亡國，家裏的光榮匾之類大概不會被人砸碎，也許親人能得到撫恤金。文革中死於非命的熱血青年呢，一直被罵着，只差沒被鞭屍。一位官方詩人還算客氣，擠出一點兒「人道主義」來，對着紅衛兵的墓唱道：

隔着三尺黃土，
我聽見你在哭。

不是輕浮，

確是輕浮，

大渡河濤聲如訴……

……

問訊清明慈母淚，

可透了年年加疊的新土。

風呵，莫把它吹乾，

染幾朵小黃花，

打發少年寂寞。

（周綱：「石棉紅衛兵墓」）

錦綉青春猛地被砍殺了，人命萬千，只換來「輕浮」二字。我真要為這些不幸的靈魂號哭！而那一位屠殺了萬千青年的千古罪人，却安臥於水晶棺內，仍享受着人們的瞻仰。另一位毛澤東式的暴君，在伊朗仍活得很好，正微笑着把青年送進屠場去。歷史真是何其冥頑不靈啊！一番「回憶對比」之後，只有嘆息而已。

感謝設計者並繼續徵求盟徽

自中國民聯刊登廣告、公開徵求盟徽以來，我們收到不少盟徽草案。現將部份草案選登，請各界評議，如您認為不滿意，可再行設計新草案。

盟徽設計要求如下：

一、一定要簡單易記（看第一次後即可重複）；

二、體現民族風格；

三、體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及多元的精神。

我們向盟徽設計者致以誠摯的謝意！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圖解：雙手捧着民主之花，花由民、主兩字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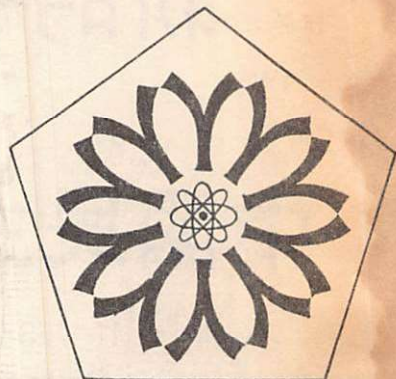
圖解：以中國傳統文字圖為架構，由平、重疊雙中字及兩人字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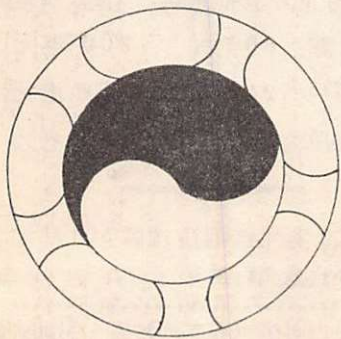
圖解：少象木初生，三少示多元、共存。圓代表中國。全圖為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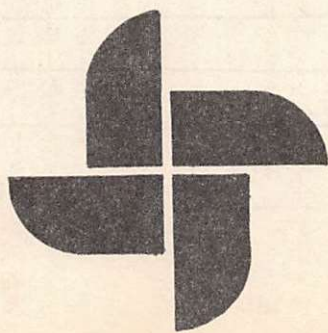
圖解：兩中字重疊，突出的尖角示萌芽的春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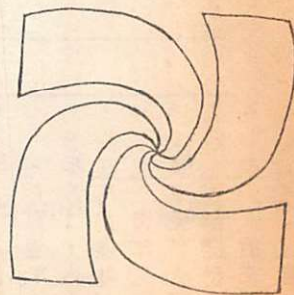
圖解：一切以人為主，十代表眾多。當中標誌示民運與科學不可分。



圖解：五角飛輪象徵多元及運轉不息。軸為陰陽兩極示中國傳統。



圖解：推進器的四翼推動中國達成民聯的四大目標。用藍色設計。



圖解：四瓣代表民聯的四項目標，漩渦示融合，開展為多元的發揮。

優待券 \$3.00

附此券，減少訂費美金三圓，
此券有效期至1985年12月31日

您想知道：

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明天將要發生什麼？
新的一代想些什麼？

您想聽到：

中國民主化的腳步聲嗎？

(購買1—30全套中國之春費用為60美元)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 _____

訂 費 (每年)

.....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 關：60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 美元 72 港元

學生訂戶：18 美元 6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
272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Tel: 3-667665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元以上
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

航空：10 美元 平郵：5 美元

請中國大陸公費生 免費訂閱

美國華僑陳覺文，東南
亞華僑黃福瑞，原香港商
人林廣凡，捐出巨款，資
助近千名中國大陸公費生
免費訂閱中國之春。現仍
有空額，請速寫信訂閱。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我也參加捐款行列

讀到美國華僑陳覺文、東南亞華僑黃福瑞的捐款信，久久不能自己。

我是中共立國後六十年代初逃到香港的一個難民，以後經商，小有成績。我曾目睹了大批難民冒着警犬和鯊魚襲擊的危險逃亡香港的場面。應該說，香港的繁榮是與大陸難民拼死拼活的工作分不開的。廿多年在港的體會是：只要中國老百姓有自由，他們就會創造一個人間天堂。

可是，今天，香港的自由正在減少，中共對香港的控制越來越大。在中共即將收回香港的形勢下，香港輿論急劇左轉，大批人士開始向共產黨朝貢，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某些人的奴顏和媚骨。不願意屈膝中共者，則設法逃亡海外。真正挺身而出，仗義直言者，又有幾人？哀哉，我中華民族！我們的勇氣哪裏去了？

中國民聯不畏專制的精神感動了我，我準備捐款6,000美金，資助250名中國大陸留學生訂閱中國之春。

已經逃到海外的原香港小商人：林廣凡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

請協助蒐集
大陸留學生名單



當今大陸，有幾人滿意共產黨的專制？

您想改變現狀嗎？請為民運盡一份力，

協助我們蒐集大陸留學生通訊錄。有一集

一，有二集二（寫明姓名、校、系即可）

。感謝您的協助！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272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6

≡ SECOND CLASS ≡
≡ PENDING ≡
≡ FLUSHING N. Y. ≡
≡ ISSN 0735-8237 ≡

T. P. Lee #9511 28-33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